

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看毛泽东的文革心路

谢昌余

(合肥行政学院,合肥 238000f)

摘要:认真研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13册),便不难发现,从1966年5月到1976年9月,毛泽东的文革心路大体经历发动文化大革命、结束文化大革命和捍卫文化大革命三个阶段。前后长达10多年,毛泽东最终不仅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达到“天下大治”,反而以捍卫文化大革命走到生命终点。究其根源,是毛泽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所致。

关键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革心路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4)01-0001-09

Reviewing Mao Zedong's Cultural Revolution intention from Mao Zedong's Manuscript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Country

XIE Chang - yu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Hefei 238000, China)

Abstract: A close reading of Mao Zedong's Manuscrip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untry (no. 12 and no. 13) finds it not difficult to discover that from May 1966 to September 1976, Mao's cultural evolution intention had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the launching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ending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defend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fter as long as more than 10 years, Mao Zedong ultimately not only did not e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achieve the "nationwide peace & order", but instead defend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ill the end of his own life. Well regarded as a tragedy, the source of it lies in Mao Zedong's adherence to the "class - based struggle" theory.

Key words: Mao Zedong's Manuscrip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untry; Mao Zedong; Cultural Revolution intention

从1966年到1976年9月,毛泽东的文革心路大体经历发动文化大革命、结束文化大革命和捍卫文化大革命三个阶段。本文以解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13册)(以下简称文稿)的方法对毛泽东这一心路历程作出具体分析。

一、发动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1966年5月—1969年3月)

(一)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文稿》中多处记录了毛泽东关于这一思想的阐述。1966年4月,毛泽东在审阅和修改文化大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的“五·一六通知”时,就非

常明确地指出: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但没有被识破,而且还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接班人,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还认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基于这种对党内、国内政治形势和干部队伍状况的错误估计,毛泽东决定:在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的同时,必须批判、清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1]43-44}。

由此,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1967年1月30日,在《对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报告的批语》中,毛泽东又写道:“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分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1]209}这里,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不仅是混入了党、政、军等重要部门,而且也混入了学校、工厂、农村、商业内部,人民群众内部。由此,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对象由初期主要是党政部门和知识界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968年4月,在阐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时,毛泽东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1]485}这种新的提法,使问题进一步升级:文化大革命不仅要有面的扩展,而且要向深度发展,即彻底清查解放前有着或被怀疑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的人。这样,文化大革命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清理阶级队伍。

从点到面,直至对深挖历史问题的思考,到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将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定位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1]593}的层面上。作这种定位表明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毛泽东思考、关心诸多问题的焦点所在——就是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以致到生命最后时刻,他还要中共中央为文化大革命作一个“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的决议^{[2]426-427 [3]1756-1758},希望留下一个为后人不能推翻的结论。甚至在生命临终之前,毛泽东又将发动文化大革命同赶走日本人、推翻蒋介石总结为他一生中的两件大事^{[3]1781}。

(二)采取写大字报的方法,推动文化大革命全面铺开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毛泽东所关注、思考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方法来发动文化大革命。

6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所写的大字报中终于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这就是:“出大字报”^①。为此,毛泽东当即批示道:“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1]62}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当天晚上播放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局面顿时大变。北京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们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贴出矛头指向各级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大字报,学校党组织陷于瘫痪,乱打乱斗现象开始出现。全国其他各地也不例外。对于这种乱的“新”局面,毛泽东写下《七律·有所思》^②,表达了自己十分满意的心情。

不仅如此,对待这种乱的“新”局面,毛泽东还从理论上给以肯定。经过在韶山滴水洞中整整11天的沉思,毛泽东得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结论。他认为,“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打倒党内右派的“全国性的演习”。正是在左派的打击下,根深蒂固的北京市一朝覆亡,盘根错节的北大、清华也顷刻瓦解。所以,在他看来,“乱”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天下大乱”是达到“天下大治”的必经途径,“天下大乱”是解决中国出修正主义问题的根本办法。由此,他还认为,这种“天下大乱”的“文化大革命”每隔七、八年就要又来一次^{[1]71-73}。

正是因为采取大字报的方法,达到了毛泽东的预期目的。所以,8月1日,也就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在写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中,对清华、北大附属中学红卫兵以大字报的方式向反动派造反的“革命造反精神”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热烈的支持”态度^{[1]87}。接着,8月5日,毛泽东自己也以大字报的形式,以“炮打司令部”为题,严厉指责刘少奇等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1]90}还是在同一天,毛泽东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文加写了一个批注,号召全党向以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开展斗争^③。

总之,通过播发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鼓动广大群众运用大字报的方法向各级党委开战,终于达到毛泽东推动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的目的。所以,在1966年12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大字报的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1]144}

(三)支持红卫兵运动

继采取大字报的方法推动文化大革命全面铺

① 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中写道:“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14页。

② 1966年6月,毛泽东在《七律·有所思》一诗中写道:“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7页。

③ 《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是《人民日报》为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而写的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此文。毛泽东加写的批注是:“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93页。

开后，毛泽东又以支持红卫兵运动的方法，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形成席卷全国的风暴，推动文化大革命向深度和广度迅速展开。

从《文稿》中可以看到，从1966年8月1日到12月15日，毛泽东写下的支持红卫兵运动的批语有12条。归纳其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肯定红卫兵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明确表态支持红卫兵运动。就在支持清华、北大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中，毛泽东还明确表态他热烈地支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运动^①。1966年8月31日，对林彪在送审的讲话稿中“革命的小将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赞扬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你们干了大量的好事，你们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这段话后面加写的“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的很！”一句话，毛泽东批示道：“这样修改很好”^②。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以自己实际行动激励、支持红卫兵运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总共1100多万人次。1966年9月13日，就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一事，毛泽东在给林彪等的信中说：“林彪、总理、陶铸同志：卧病三天，尚有微温，今天略好。可在明天（十四）或后天（十五）上午十时或下午五时在天安门开七十万人大会。我能起床，即去见见群众，不能起床，则请你主持，我不去了。”然而，15日下午，毛泽东还是赶到天安门广场，又一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及首都的百万师生和红卫兵^{[1]133}。这说明毛泽东是多么支持红卫兵运动，又对红卫兵运动寄予多大期望！由此，他还要求各级领导支持红卫兵运动。11月1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参加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的一些中央和其他方面的负责人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1]158}

第二，对红卫兵运动所造成的社会动乱问题，毛泽东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1966年8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写报告，汇报了国务院八个口（外事、文教、科学三口除外）机关两个多月来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对这些单位如何贯彻“十六条”，搞好文化大革命问题提出了10条意见。在8月29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此发表意见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它去搞。”^{[1]112}他还说：“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跨一批。跨就垮，要准备个别中央局、一部份省委、一部份市委垮台。”^{[3]1440}采取“放任自流”、不惜一批党委垮台的姿态显示

出毛泽东对通过红卫兵运动来推动文化大革命向深度和广度的开展已下了何等大的决心。

第三，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1966年9月4日，中共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报告说：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党委，不是号召工农兵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而是组织工人农民反对学生运动。报告认为“这是方向的错误”。对此，毛泽东批示道：“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1]124}

第四，批准红卫兵运动发展到农村。1966年12月13日，周恩来将《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稿》送毛泽东、林彪审阅。意见共10条，其中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红卫兵可以参加民兵。”“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联。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联，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农村文化大革命。”对于这个《意见稿》，毛泽东的批示是：“退总理办。请林彪同志主持开会通过，旋即发出。”^{[1]173-174}由此，红卫兵运动发展到农村。

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纷纷遭到围攻，被“炮打”。相当多数的党政负责人因遭到红卫兵的责难和攻击被迫一再检讨而始终无法“过关”，有的被野蛮揪斗以至失去人身自由。许多党政机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社会秩序处于失控的无序状态。毛泽东所需要的那种“天下大乱”的局面终于出现。

（四）号召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支持“全面夺权”

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和部署，大字报和红卫兵运动虽然打开了局面，但到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仍然是在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进行。如何突破这个范围，推动运动向社会各个层面深入？这又是毛泽东所关注和思考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为此，毛泽东发出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从《毛泽东传（1949—1976）》得知，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其具体含义就是“全面夺权”^{[3]1462-1464}。

《文稿》显示，从1967年1月8日到3月9日的前后仅两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写下的支持全面夺权的批语就有18条。在这些批语中，毛泽东充

① 在1966年8月1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中，毛泽东还写道：“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7—88页。

② 这天下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北京及全国各地的50万师生和红卫兵。林彪发表讲话。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18页。

分肯定了全面夺权的意义和作用。他指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1]193}由于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被看成是如此重要，所以，当得知《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分别于1967年1月4日、1月6日宣布接管报社的信息后，毛泽东很快就予以高度评价。他指出：“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1]185}这个指示，实际上成为在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号召。1月10日，对江青报送的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文汇报〉〈解放日报〉记者评述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毛泽东当即将其批给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①，一致行动起来。”^{[1]186}紧随之，1月11日，毛泽东对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的贺电稿作出批示：“很好。”^{[1]188}1月14日，对陈伯达送审的以《红旗》杂志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一文，毛泽东当日批示：“写得很好。”^{[1]193}文章高度赞扬上海的夺权，号召“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4]187}从1月8日到14日，前后只有6天，毛泽东就写下4条支持全面夺权的批语。而且，内容由支持一个单位造反派的夺权到支持整个上海市造反派夺取市委、市政府领导机关的大权，这说明毛泽东为了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推动文化大革命的深入不惜以摧毁自己

亲手建立起来的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机构为代价。仅从1月到2月初，《人民日报》以编者按、社论的形式发表支持夺权、号召夺权的文章就有8篇^②。上海市、山西省、贵州省、黑龙江省、山东省等5个省、市宣布夺权。可以说，1967年1月、2月的中国，夺权风潮如火如荼，如疯似癫。全国民众真正地卷入了文化大革命。对此局面，毛泽东感到由衷的高兴，这从他1967年2月8日和卡博、巴卢库的谈话中可以得到印证^③。

二、结束文化大革命——落实政策，治理混乱局面，恢复生产和社会秩序，将社会生活逐步引入正轨（1969年4月—1975年10月）

（一）再没有给中央文革小组写批语^④

翻开《文稿》，我们就可发现，从1968年12月18日起，毛泽东就再没有给中央文革小组写过一条批语。而在此之前，从1966年8月21日到1968年12月17日的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写给中央文革小组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共同阅看的批语竟达61条之多。（不包括这一期间专门写给康生、陈伯达、陶铸、江青、关锋、戚本禹、王力、姚文元等人阅看的74条批语）

对待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的态度为何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变化？解读《文稿》之中的《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便不难看到，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是毛泽东同时作出的两个决策。设立中央文革小组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顺利发动和开展文化大革命^{[1]40-44}。

随着刘少奇等人问题的解决，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基本完成。所以，在九大党章修改过程

① 虽然毛泽东的批示里没有正面提到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但他“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不言而喻，就是号召和鼓励各地造反派向所在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夺权”。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66—1467页。

② 它们是：1月1日的元旦社论；1月9日转载《告上海市人民书》的编者按；1月12日，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1月16日，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1月19日，发表社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1月22日，发表经陈伯达审定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参见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5—197页）2月1日，在刊登贵州省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发表了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2日，在刊登黑龙江省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又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70页）

③ 1967年2月8日，毛泽东在同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20页。

④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557页写道，中央文革小组九大后被取消。王年一在其所著的《大动乱的年代》第335页写道，九大后，中央文革小组的取消还拖延了一些时日，以后悄然消失。但两书都没有提供中央文革小组被取消的具体时间。实际上，直到1970年3月13日，中央文革小组仍然存在，因为，1970年3月11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在国务院之下设立一文化组，管理有关文艺、电影、出版、图书、博物等方面的工作。文化组的思想政治领导属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分工归中央文革。对于周恩来的这个报告，毛泽东3月13日批示“同意”。（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2页。）然而，从1968年12月18日起，《文稿》中就未见毛泽东写给中央文革小组阅看的批语，所以，本文使用“再没有给中央文革小组写批语”的提法。

中,原来由康生主持起草的修改党章草案中规定“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常委领导下,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毛泽东在审阅时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1]584-586}1969年3月在《对林彪中共九大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中,毛泽东写道:“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个也不要提”^{[1]11}。在讨论九大一个文件的署名时,毛泽东又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3]1547}显然,“文化革命快要结束”是毛泽东不设“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不提“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不用“中央文革”署名的理由。这也是《文稿》从1968年12月18日起未见毛泽东写给中央文革小组阅看批语的原因。由此应该能够得出结论,此时的毛泽东正在思考着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二) 落实政策

由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已被打倒,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开始由发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转向落实各项政策的问题上。这表现在:

1. 多次提出解放老同志。查阅《文稿》得知:从1972年1月10日参加陈毅追悼会到1975年12月18日,毛泽东为落实老干部政策、处理老干部问题写下了36条批语,解决了40多位老同志的问题。这些老同志,都是副部级和军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有的还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经毛泽东批示后,他们之中有的被解除监禁,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1973年11月15日,给毛泽东写信恳求解除对其关押,给其一定限度的自由。毛泽东写的批语是:“似可释放。请中央酌定。”^{[5]366}有的被允许送医院治病,1972年8月5日,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的子女林梅梅等给毛泽东写信,请求让其父出监治疗休养。毛泽东批示道:“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5]307}有的被解放,如在原海军政委苏振华的来信上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5]290}有的被恢复名誉,1972年11月4日、12月5日,毛泽东两次在被迫害自杀的原马列主义研究院秘书长柴沐的妻子王若林恳请责成有关部门为柴沐平反,恢复名誉的来信上批示:“纪、(指纪登奎)汪(指汪东兴)酌处。”他还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5]324}不同意开除柴的党籍。有的被重新安排工作,如对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诚要求工作的来信,毛泽东批示道:“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给予工作。”^{[5]301}1975年5月17日,在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请示报

告上,毛泽东再次写下批语:“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5]432}1972年7月22日,对原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请求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来信,毛泽东批示:“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5]304}有的被重新作出政治结论,如原一机部副部长白坚,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隔离审查。患病因得不到抢救在当年12月11日死于北京复兴医院。其子白克功给毛泽东写信恳请中央早日为父作出政治结论。毛泽东批示道:“白坚在我的印象里不错,应为他做出政治结论。”^{[5]299}有的被昭雪,如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傅连璋,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1968年3月去世。1975年5月17日,毛泽东批示道:“傅连璋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5]432}

对于对老同志们使用的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毛泽东批示要“一律废除”^{[5]334}。对于老同志遭受林彪等人的政治陷害,毛泽东也有自责。在杨成武女儿关于杨成武是受林彪等人政治陷害的来信上,毛泽东批示道:“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5]294}。对于一些审查时间较长而无结论的案件,毛泽东采取从宽处理的政策。如对周扬等人问题,毛泽东批示道:“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5]441}对被审查达8年之久的原地质部副部长刘景范问题的批语是:“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于追究。”^{[5]412}

老干部是文化大革命发动和全面开展之时的被打倒对象。他们在受到错误批判后,不仅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而且处境也十分艰难。为解放老干部所写下的大量批语,正说明此时的毛泽东在为结束文化大革命作努力。

2. 恢复邓小平工作,赋予邓小平工作重担。从《文稿》来看,自邓小平被打倒后,毛泽东第一次提到邓小平是1967年10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送审的《刘少奇言论》一书的《出版说明》中的“他伙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一句改为“伙同其他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删去了另一处同刘少奇并列的邓小平名字。他还在陈伯达、江青的送审报告上批示:“《说明》中,不提邓小平。”^{[4]422}此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我们不能断定此时的毛泽东就已经有了解放邓小平的意思,但是把邓小平问题和刘少奇作了区分,确是后来解放邓小平的思想基础。

1972年1月,在参加陈毅追悼会时,在同陈毅家属的谈话中,毛泽东将邓小平的问题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为邓小平复出定了基调^{[5]285}。

1972年8月14日,在对邓小平8月3日提出愿做一点工作来信的批语中,毛泽东再次将邓小平问题和刘少奇加以区别。为此,他还对邓小平的历史作出充分肯定。他批示:“他(指邓小平)在中央

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5]308}这种对邓小平历史的充分肯定说明了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复出。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并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3年3月,毛泽东对这个决定作出“同意”^{[5]347}的批示。至此,邓小平正式复出。12月12日、14日、15日,毛泽东又先后三次向中央政治局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介绍邓小平,称赞邓小平办事果断。对邓小平的一生作出“三七开”。评价邓小平是“柔中寓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还说,邓小平是他为政治局请回来的“秘书长”、“参谋长”^{[5]347-348}。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由毛泽东确定,邓小平担任党的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1975年2月,周恩来病重住院治疗期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7月,经毛泽东批准,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这期间,邓小平开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全面整顿,使全国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人所共知,邓小平是作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第二号人物于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的。解放邓小平并让他担任重要职务,自然会引起人们对过去许多问题的重新认识。它直接关系到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和评价,所产生的影响和震动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作此决策,期盼邓小平“把工作干起来”^{[2]366},固然同他对邓小平问题和刘少奇有区别的判断有关,但更能说明此时的毛泽东希望结束文化大革命。

3. 批评、纠正和调整“左”的文艺政策。文艺界、知识界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也是社会各方面特别注目的敏感领域。为此,毛泽东多次讲话,写下多条批语,努力纠正一些“左”的做法。

1975年7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5]443}

出于对文艺界现状的这种不满意,7月14日,毛泽东亲自找江青谈话,提出纠正、调整“左”的文

艺政策问题。他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5]446-447}

11月15日,在有关传达这次谈话的一封信上,毛泽东又批示:“我讲的不完全,至少应该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5]447}。这里,毛泽东用鲁迅提倡对那些“不是穿心烂”、仅是“有着烂疤”的苹果应该削着吃的生动比喻,进一步说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能因为一个人有点毛病就丢开的道理。

从7月25日到11月2日,毛泽东又连续就文艺界有关人士的来信或材料写下7条批语^①,再次明确指示对文艺政策进行调整。

其中,反映最强烈的是7月25日毛泽东对电影《创业》问题的批示。

《创业》是在银幕上塑造中国石油工人战天斗地形象的作品,被批准在1975年春节上映,受到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但却遭到江青和当时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严厉批判,指责该片“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并开列出“十条罪名”。对此,编剧张天民1975年7月18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不同看法,建议重新上演该片。毛泽东批示全文如下:“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5]450}毛泽东的批示,语气严厉,明确具体。表达出他对当时极“左”文艺政策的强烈不满和纠正、调整极“左”文艺政策的迫切要求。

4.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1972年11月7日,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周培源就66届至70届的大专毕业生工资待遇等问题向毛泽东报告,说: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教育革命中,有一个问题急待解决,就是如何处置66届至70届的大专毕业生。66届已经毕业6年之久,至今仍未转正定级。一些大型国营企业工人的工资已经高于同龄的大学生,致使向此等单位招生,已有许多人不想上学。周认

① 这7条批语是:1. 1975年7月25日对电影《创业》的作者、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张天民来信的批语。2. 1975年7月29日对电影《海霞》导演谢铁骊、摄影钱江来信反映当时的文化部对送审影片《海霞》进行刁难一事,毛泽东批道:“印发政治局各同志。”3. 对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理论系青年教师李春光的一张大字报的批语。李在大字报中尖锐地批评当时的文化部负责人炮制“十条罪名”扼杀《创业》,后又消极抵制毛泽东关于《创业》的批示。对此,毛泽东批道:“此件有用,暂存你处。(指邓小平一引者注)”4. 9月19日对山东省章丘县明水公社侯家学校教工谢革光在给红旗杂志的信中提出《诗刊》杂志复刊的建议,毛泽东批示:“同意”。5. 对洗星海夫人钱韵玲1975年9月27日来信提出举办洗星海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建议,毛泽东批示:“印发在京中央各同志。”6. 11月1日对鲁迅之子周海婴1975年10月28日来信提出出版《鲁迅书信集》和新版《鲁迅全集》的建议,毛泽东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7. 11月2日对作家姚雪垠1975年10月19日来信的批语。李在信中请求支持他继续完成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毛泽东批道:“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50-455页。

为,这些大学生全国有80万左右,来自各阶层、各地区,处理好他们的问题关系重大。由此,周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意见。其中有:鉴于我国科学文化急需加速发展,大学生还要继续培养,而且要培养质量更高的,他们的资格尤其是经济地位不能过低。对此,毛泽东批示:“此事关系很大。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国务院文教组及北京市委各同志研究。请中央考虑作出决定。”^{[5]326}这条批语不仅解决了80万大学生生活待遇问题,而且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和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都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概排斥、否定知识分子的极“左”观点,毛泽东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在1975年5月3日召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毛泽东提出:“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把知识分子贬为“臭老九”的情况,他借用人们熟知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一句台词说:“老九不能走”^{[5]431},以说明革命和建设事业是离不开知识分子的。1975年10月16日,对《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材料的批语是:“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5]477}这些批语,对于当时在极“左”年代里怎样正确看待知识分子起了正确引导作用,对于改变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困难处境和不利地位起了积极的影响作用。

(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文化大革命初期,虽然毛泽东也提出“促生产”,但由于他的主要注意力是放在“抓革命”上,所以,我国经济建设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因“革命”所造成的“动乱局面”遭到严重破坏。九大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开始关注经济建设问题,而且,他还将经济建设同社会安定、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结合起来加以思考。

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长期动乱局面,1974年8月,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5]402}1975年1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在杭州听取周恩来汇报时再次指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5]402}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强调“安定团结”的这两次讲话,都是在中共中央文件中用黑体字印发的。前者是在经毛泽东圈阅的中共中央1974年10月11日关于准备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中引用的,后者是在经毛泽东圈阅的中共中央1975年2月10日转发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中引用的^{[5]402}。这正说明了毛泽东将安定团结看成是顺利开好四届人大和发展国家经济建设的首要条件。先后仅5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就两次强调安定团结,这非常明显地隐含着打算结束文化

大革命的意思,甚至达到非常迫切的程度。他希望全国上下不要再发生大的变故,特别是中央内部应该团结一致,以便在近期顺利地召开拖延已久的四届人大,从而能够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走上经济建设的道路。

正是因为毛泽东希望结束文化大革命,所以,1974年11月,他在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李先念、汪东兴谈话时就非常明确地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5]440}这个指示,为四届人大重提“四个现代化”目标提供了重要依据。两个月后,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1964年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零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6]479}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整个《报告》的精髓,是此时毛泽东的希望所在,也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所在。

也正是因为毛泽东希望结束文化大革命,所以,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毛泽东非常明确地表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5]405}。1975年1月13日至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产生了以朱德为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为副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一大批富有治国经验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这种人事安排,更表明了毛泽东准备结束文化大革命、发展经济建设的想法。

这一期间,毛泽东对有关国计民生方面的问题也很留意,从1975年5月25日到10月27日的5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先后对农产品价格、山区农村食盐价格比城市贵、农村工作以及农村社队办企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问题所写的批语就有5条。此外,毛泽东还写下5条批语对国防、科技工作作出明确具体的指示。所有这些,都能反映出此时的毛泽东准备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心态。

三、捍卫文化大革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5年11月—1976年9月)

收入《文稿》中的《毛主席重要指示》^①(1975年10月—1976年1月)、《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1975年11月13日)、《关于打招呼会议的两个批语》(1975年11月22日、23日)、《对毛远新关于传达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1976年1月31日)、《对华国锋在中央召集的打招呼会议上讲话稿的批语》(1976年2月25日)、《对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稿的批语》(1976年4月7日)、《对吴德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稿的批语》(1976年4月7日)

^① 该文是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谈话整理而成,并经毛泽东审阅批准,于1976年3月3日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发,作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文件。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91页。

等文献基本反映了毛泽东由支持邓小平全面整顿转向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思想进程。认真研读这些文献,我们不难看到:

(一)1975年8月和10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就迟群(校党委书记)和谢静宜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等问题先后两次向毛泽东告状这一事件是引发毛泽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直接原因

刘冰等的信是通过邓小平转交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中记录了毛泽东对这封信的强烈不满。他认为这封信:一是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谢静宜;二是信中的矛头是对着他的;三是邓小平偏袒刘斌;四是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5]486}。由此,毛泽东认定:周荣鑫、刘冰要翻案。甚至他还认为刘斌等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甚至要算帐的一批人的态度。为此,毛泽东指示将刘斌等的两次来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3]1754}随着毛泽东指示的下达,清华大学全校展开了“教育革命”大辩论,开始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

(二)严厉批评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

按照《毛泽东传(1949—1976)》的说法,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就是在“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号下展开的^①。所谓“全面整顿”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改革”^{[7]255}。“全面整顿”实质上就是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种种“左”的错误做法,进一步落实党的正确政策,大力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进而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对于这种在“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号下进行的“全面整顿”,毛泽东显然不能容许。他批道:“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5]486}他还批道:“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指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嘛?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5]486-487}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点名批评邓小平,认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历来不提这个纲”,“代表资产阶级”^{[3]1771}。如此严厉批评之后,在江青集团的煽动和指使下,各地造反派根本不顾中央规定的政策界限和方式方法,许多地区和单位层层揪“走资派”、揪“代理人”。致使生产秩序再度混乱,国民

经济再度滑坡,整个形势再次动荡不安。

(三)捍卫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根本原因

晚年的毛泽东曾多次将文化大革命列为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毛泽东还对文化大革命作出“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的评价。所谓“有所不足”就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尽管如此,毛泽东又说:“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5]488}由此可见,此时的毛泽东虽然承认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但仍然是十分勉强的。“基本正确”是他对文化大革命的主导评价。作这样的评价,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作一个后人不能推翻的结论。这也是他生命终止之前所坚持的最后原则。为此,他还要邓小平主持制定一个中共中央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为什么要邓小平主持制定一个中共中央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对此作了回答。她写道:“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作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是‘仁至义尽’了。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2]426}然而,令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提议却遭到邓小平的婉言拒绝。毛毛接着写道:“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2]427}

(四)“打招呼”是毛泽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方法

在毛泽东看来,对文化大革命态度问题,不只是邓小平一个人,而是涉及到相当多的老干部。他认为,一些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采取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5]487}。由此,毛泽东决定,采取“打招呼”的办法,“帮助”老同志“打通”思想,回头转弯,不再“犯错误”^{[5]490}。1975年11月

① 1975年5月29日,邓小平在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钢铁工业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思想。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0页。

13日,毛泽东专门写了一个关于“打招呼”的批语。他写道:“过去只有河南同80%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指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负责人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5]495}对于“打招呼”会议的开法,毛泽东于11月22日、23日又接连写了《关于打招呼会议的两个批语》^{[5]504}。足见毛泽东对这件事是多么重视。

11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共130余人。会议由邓小平传达的经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讲到:“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革的帐,总是要翻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2]428}

显然,按照毛泽东指示召开的这次“打招呼”会议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邓小平在传达文件的时候当众作个检讨;就是要让老同志都知道毛泽东的态度,让老同志们回头转弯,不要再“犯错误”。26日,中共中央把《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党委常委。“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迅速展开,持续进行了9个月的全面整顿工作,至此中断,全国局势重新陷入混乱。

为了推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深入开展,经毛泽东批准,从1976年2月下旬起,中共中央再次在北京分批召开“打招呼”会议,参加会议的对象扩大到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性文件——《毛主席重要指示》,并部署各地各部门的运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发表了经毛泽东批示“同意”的讲话。主要内容有:要把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摆在首位;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各地以这次打招呼会议为界,转好弯子^{[2]525-526}。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要求组织县、团以上干部学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正式在全党大规模开展进行。

(五)为捍卫文化大革命成果采取的重要组织措施

1976年1月31日,毛远新给毛泽东的请示报

告中说:我已向王洪文、张春桥传达了主席对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的指示,他们表示完全拥护,保证支持,并建议此事政治局应指定专人分别向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和军委常委、各总部负责人传达。我个人考虑,确实需要。这样做也等于向下打个招呼:小平同志有错误^{[5]18-519}。毛泽东当天批示:“已阅,同意。”^{[5]518}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也就是197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通知说:“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2]450}这和一年以前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中央“一号文件”相比,确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据这个“一号文件”,不仅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连叶剑英也被冠以“生病”,不再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对于这个人事变化,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评论说:“这次人事变动所涉及的,不只是邓小平一个人,而是将有可能翻‘文革’案的重要人物——叶剑英,一起撤换了下来。明显地,这次的人事变动,是毛泽东下决心保卫‘文革’成果的一个重大举动。”^{[2]450-451}

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说:“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毛泽东的批语是:“照发。”^{[5]530}至此,邓小平终于被再次打倒。

在此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阵阵声浪中,毛泽东翻完了他人生之书的最后一页。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2] 毛毛.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传(1949—1976)(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4] 王年一. 大动乱的年代[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选集(下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范君李丽]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物质利益的初步探索

肖燕飞¹, 胡峰²

(1. 湖北美术学院马列主义课部, 武汉 430205; 2. 武汉市工业合作联社, 武汉 430000)

摘要: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贡献在于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他在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时, 不同于前人之之处在于是以现实的物质生产作为社会历史的发源地,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物质利益进行了初步探索。在《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中, 马克思开始接触现实物质利益问题, 从而迫使其在此决定性问题上有了初步突破, 但还是从精神自由出发来谈出版自由; 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 马克思开始从精神领域跨入物质领域, 接触客观物质利益, 并发现了物质利益的作用; 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 马克思开始把出版自由与物质利益结合起来考察, 并指出社会生活具有客观必然性。

关键词: 《莱茵报》; 物质利益; 探索

中图分类号: A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 (2014) 01-0010-04

Marx's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material interests in the Rhine Daily period

XIAO Yan - fei¹, HU Feng²

(1. Ministry of Marxism - Leninism, Hubei Institute of Fine Arts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430205, China; 2. Industrial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of Wuhan City, Wuhan 430000, China)

Abstract: The major contribution of Marx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s to have discovered the objective law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When he was examining the law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different from the forefathers, Marx took the realistic material production for the birthplace of social history and preliminarily explored material interests in the Rhine Daily period. In his Debates about the Freedom of Press and Releasing Rank Conference Records, Marx began to contact the real material interest problem and made the preliminary breakthrough in this crucial issue, but he still explored the freedom of press from the angle of spiritual freedom. In his Debates over the Act of Wood Theft, Marx moved from the spiritual field into the material field, contacted the objective material interests, and found the function of material interests. In Moselle Reporter's Defense, Marx began to combine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material interests, pointing out that the social life is of inevitable objectivity.

Key words: Rhine Daily; material interests; exploration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1]374}。当然马克思的贡献不仅仅在于肯定了人类社会规律的存在, 更重要的是首次把“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看作“历史的发源地”^{[2]191}, 即是以现实的人的

物质资料生产作为其社会发展规律思想的生长点和逻辑起点, 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存在基石和发展规律。在马克思之前, 从来都没有人系统科学地揭示人类社会规律。

针对威廉四世 1841 年 12 月 24 日颁布新的书

收稿日期: 2013 - 06 - 13

作者简介: 肖燕飞 (1981 -), 女, 湖南益阳人, 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

报检查令,年轻的马克思敏锐地看到了这个新的书报检查令的实质,写下第一篇政论性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以抨击扼杀出版自由的书报检查制度。虽然从总体上来说来马克思仍是在唯心主义指导下完成的,从精神自由出发来考虑出版自由,并把它归结为对客观精神、理性的崇拜,但这是马克思迈向尘世生活的第一步。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毕竟只是一个起点,对于马克思的世界观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是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在这一时期,物质利益问题可以说是首次进入马克思的视野,他第一次遇到了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促使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转向唯物主义的最初动因源自于: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问题的辩论;莱茵省总督沙塔尔就摩泽尔谷地的农民状况同《莱茵报》记者展开的论战。正如列宁所指出的,1842年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上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已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3]83}

一、《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在这里论战的不是个人，而是等级”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从哲学上对出版自由进行了论证,虽然猛烈地抨击了德国的专制制度,但就其世界观而言,因为受到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的影响,仍旧站在民主主义立场,将精神、理性看作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从精神自由出发来捍卫出版自由。

马克思在当时在如何看待物质利益这个全局性问题上,看法是基本错误的,他轻视物质利益,且要求辩论的代表们的政治立场不应该为物质利益左右,而应该服从于自由精神,他指出,精神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它不能只有一种存在方式。“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适的表现”^{[4]11}。在他看来,人的理性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的本性,是人所固有的特权,普遍自由是人的本性。“没有一种动物,尤其是具有理性的生物是带着镣铐出世的”,“因为难道自由不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本质,因而也就是新闻出版的类本质吗?”^{[4]171}。

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自由的一个重要

方面是言论和出版自由,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体现了人的自由本性。他提出:“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4]201}，“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4]179}

可见,马克思在讨论出版自由时,主要是在精神世界中驰骋,认为精神无所不及,无处不在,无所不知。他对出版自由的论证主要是诉诸理性而实现的,因而在看待物质利益问题上,他轻视物质利益,更重视精神理性的决定作用,认为物质斗争是粗糙的,为自由斗争却是高尚的,“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4]179}

可以得知:此时,马克思的世界观仍然是唯心主义,他对理性的理解基本上还是黑格尔主义的,仍属于青年黑格尔派,但在社会发展规律思想方面也出现了某些唯物主义的萌芽。在此时,他开始怀疑国家是否是理性的体现(如果是这样的话,普鲁士归家就不应该扼杀出版自由),并且还注意到了人们不同的等级差别与等级背后的物质利益关系。他强调:“在这里进行论战的不是个人,而是等级。”^{[4]146}“在形形色色反对出版自由的辩论人进行论战时,实际上进行论战的是他们的特殊等级”^{[4]155},从而揭示了产生不同的意见分歧进行辩论后面所隐藏的等级利益。在这里,马克思开始看到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并非主观恣意妄为的,而是决定于人们自身的等级地位。

尽管马克思的出发点仍是唯心主义,重理性而轻物质利益,可一接触到现实物质利益问题,就会发生矛盾、冲突,就会遇到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从而迫使其在此决定性问题上有了初步突破。

二、《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现在演的是现实生活的戏”

由于农民生活贫困,因而林木盗窃问题日益严重。普鲁士内阁为维护其利益,在1821年6月,就颁布法律规定了擅自砍伐林木和盗窃林木的处罚。后来,又陆续补充了新规定。但在19世纪40年代,普鲁士审理的刑事案中,绝大多数是属于盗窃林木和违反森林等立法的“罪行”。林木占有者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利益,企图通过林木盗窃法,把拾捡枯枝当成“盗窃林木”论处,以扼制贫苦农民的咽喉,断绝他们的生计。“他们所要求的并不是法的人类内容,而是法的动物形式。”^{[4]249}威廉四世支持贵族的要求,借口1821年6月的法律已过时,

要求省议会辩论通过新法案草案,1841年11月,国王颁布命令,对于新法律中提出对盗窃木柴及其他森林产品的行为加强刑罚措施。

农民拾捡树枝是否构成盗窃?莱茵省议会对此展开了激烈辩论。马克思以《莱茵报》为阵地积极参与辩论,并写下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强烈谴责这种不道德的法律。

多年来,农民在森林里拾捡枯枝,这已是习惯性的权利。但在统治者看来,农民中有人是故意先把幼树砍伤,等树枯后再拾捡枯枝,因而他们把拾捡枯枝视为盗窃。马克思认为,林木占有者是“为了幼树的权利而牺牲人的权利”^{[4]243},“获得胜利的是被奉为神明的林木,人却成为牺牲品遭到了失败!”^{[4]243}在此,这里“人的权利”指的就是贫苦农民的权利。可见,马克思是和贫苦人民站在一起并坚决拥护他们的物质利益。

马克思从理性原则出发,认为法律应该是“事物的法理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4]244},即法律应该反映事物的本质,而不是事物的本质去迎合法律。“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4]176}按照法律要求,立法者应该以最伟大的人道精神制定出公正的法律以预防犯罪。“如果法律把那种未必能叫做违反林木管理条例的行为称为盗窃林木,那么法律就是撒谎,而穷人就会成为合法谎言的牺牲品了。”^{[4]244}

农民在森林里拾捡枯枝,这是自然界赋予农民的权利,马克思用生动的比喻写道:“自然界本身仿佛提供了一个贫富对立的实例:一方面是脱离了有机生命而被折断了了的干枯的树枝树杈,另一方面是根深叶茂的树和树干……这是贫富的自然表现。贫民感到与此颇有相似之处,并从这种相似感中引伸出自己的财产权;贫民认为,既然自然的有机财富交给预先有谋算的所有者,那么,自然的贫穷就应该交给需要及其偶然性。”^{[4]252}农民在森林里拾捡枯枝,也是农民的“习惯权利”,是合法的。林木占有者企图通过立法的形式剥夺农民的这种权利,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违法行为。

在国家问题上,马克思区分了“国家应该是什么”与“国家实际是什么”。他认为真正的国家应公平无私地对待所有公民,“而不是理性自由的实现的国家就是坏的国家”^{[4]226},普鲁士国家应该成为理性和公正的代表,而不应该站在私人利益的立场。马克思对私人利益充满了鄙视:“私人利益总是怯懦的,因为那种随时都可能遭到劫夺和损害的身外之物,就是私人利益的心和灵魂。”^{[4]255}可结果却是马克思对国家的理性认识同普鲁士的现实

有了严重的冲突。普鲁士的国家和法并没有成为理性自由的代表,反而沦为了林木占有者的工具和奴仆,“成为林木所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4]267},“应该为了保护林木的利益而牺牲法的原则呢,还是应该为了法的原则而牺牲林木的利益,——结果利益所得票数超过了法的票数。”^{[4]288}

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虽然一方面贬低、鄙视、谴责私人利益,认为其是“下流的唯物主义”,是“违反各族人民和人类的神圣精神的罪恶”^{[4]289},“没有什么东西比自私的逻辑更可怕的了”^{[4]267};但另一方面私人利益还是占了上风,私人利益对国家和法仍具有无法抗拒的决定作用。国家和法仍是维护林木占有者的物质利益。如此,矛盾便产生了。这就是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说的使他产生“苦恼的疑问”。他从国家、法的理性认识与经济事实的冲突中,首次认识到了自己唯心主义社会观的缺陷;也正是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首次从精神世界殿堂进入到尘世生活,从精神领域跨入物质领域,接触客观物质利益,并发现了物质利益的作用,这为他日后解决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当然,就其社会历史观而言,仍是唯心主义。因为,在马克思为贫苦农民的习惯权利、物质利益进行辩论时,立足点是从法律逻辑上予以分析而不是求证于经济,因而还有很浓的思辨性质。

三、《摩泽尔记者的辩护》:社会生活具有客观必然性

在《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中,马克思还是从精神自由出发来谈出版自由;《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马克思开始从精神领域跨入物质领域;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开始把出版自由与物质利益结合起来考察。

1842年12月中旬,《莱茵报》连续刊登了本报记者彼捷尔·科布伦茨的两篇报道。第一篇报道指出了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异常欢迎1841年新书报检查令。另一篇报道了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葡萄酒农,大量破产,处境非常悲惨。有些乡镇虽然拥有茂盛的林木,可农民却从未分到过木柴,这就暴露出摩泽尔地区乡镇管理的不合理。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指责《莱茵报》的报道歪曲事实,是对政府的恶意中伤,“是企图煽起不满情绪并削弱当局与臣民之间的联系”,并向记者提出控告。科布伦茨未能很好地完成任务,给马克思的信中表明要离开战场。马克思挺身而出,为报道摩泽

尔地区情况的记者做辩护。1843年1月5日,《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刊登在《莱茵报》上。

在当时,普鲁士的当局互相推诿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葡萄酒农的贫困原因。他们要么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是由于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灾害造成的,要么就是从与他们生活无关的农民个人生活条件或是偶然现象去追根溯源。总之,普鲁士当局都是从他们的治理范围之外去寻找贫困原因,而害怕接触问题的实质。

马克思无情地批判了普鲁士当局在对待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贫困状况问题所持的冷漠态度与错误的理解;指出造成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农民贫困原因在于普鲁士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制度。他说:“不能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和国家管理机构无关,正如不能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位于国境之外一样。”^{[4]364}这种贫困状况表现了客观实际与国家管理原则之间有矛盾。根据普鲁士国家的官僚制度管理原则,下级无条件地听命于上级,根本不顾群众的死活;而政府高级官员对自己的下级信任远远超过人民群众。

当然,在这里,马克思的高明在于并没有停留于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是去控诉现象背后的深层动机。他指出了普鲁士国家“现实与管理原则之间的矛盾”,但他并没有停留于此矛盾,而是进一步分析了此矛盾,指出矛盾的解决不能取决于个别官员的意志,而在于改变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他说:“人们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人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人们就不会违反常规地以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善意或恶意为前提,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起作用的地方看到这些关系在起作用。”^{[4]363}尽管普鲁士政府当局有最善良的主观意图,但这决不能解决现实与管理之间的矛盾。因为这种意图代替不了现实的“客观关系”。在此,马克思强调了观察问题的客观立场,强调了在人的活动后面的“客观关系”的作用,认为决定整个国家制度的客观基础在于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关系,因而马克思看到了社会生活的客观必然性。基于当时马克思还没有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在此,他对“客观关系”是出于一种抽象原则的提法,还不是指物质社会关系或是生产关

系。但是马克思一开始就能在当事人表面动机背后去寻找事物的深层原因,而不是停留在表面想象,这就引导他一步一步走近于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总的说来,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遇到了许多重大的经济、政治问题,首次遇到了物质利益难事,并在物质利益问题上有了初步的突破。他抓住了社会结构中上层建筑的核心问题——国家,看到了物质利益对国家和法的决定作用以及国家和法的活动的客观必然性。但是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国家本质概念的看法仍未超出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范围,受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的影响,将理性推到了至尊的地位。也正是在他对国家理性与尖锐现实的矛盾冲突中,产生了使他“苦恼的疑问”。马克思意识到以往自己信奉的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的缺陷:理性主义国家观不能改变实际的立法。于是他决定退回到书房,认真分析和研究社会发展的历史材料,探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在《德法年鉴》时期开始转向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374.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1.
- [3] 列宁.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83.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11-364.
- [5] 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6] 顾海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孙伯鍨,张一兵.走进马克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 [8] 杨耕.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9]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的哲学话语[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 [10] 庄福龄.简明马克思主义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范君]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马克思主义历史人文解读

卢立波¹, 刘金花²

(1. 华侨大学 旅游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21; 2.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 杭州 310028)

摘要: 新文化运动中传统儒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陈独秀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在当时主导了一个反儒的潮流, 对儒家文化进行全面的批判。本文从马克思历史人文角度对这篇文章进行解读。以期来正确认识《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对其正确认识有助于我们在今天思考: 正确认识陈独秀所言“孔子之道”和现代化的不适应问题。在古代, 儒家独立承担着培植中国人道德意识的使命。现代社会中融入这种封建社会的价值理念, 应如何取舍。在唯物质利益这种价值观充斥的现代社会中, 在系统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重塑中国人的道德世界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儒家文化; 现代化; 反思

中图分类号: K8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 (2014) 01-0014-04

Chen Duxiu's Confucius's Way and the Modern Life

——Marxis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of it

LU LI-bo¹, LIU Jin-hua²

(1. School of Tourism Studies,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21, 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was brought onto the cusp, when Chen Duxiu's Confucius's Way and the Modern Life led a trend of anti-Confucianism and conducted an overall critique of Confucian culture. This paper criticizes the boo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history and humanism so as to have a correct knowledge of it, which will help us meditate and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incompatibility of Confucius's with the modern life. In ancient times, Confucianism independently undertook the mission of cultivating the Chinese people's moral consciousness. How to integrate this feudalist value into modern society is of great worth to remolding the moral world of the Chinese people on the basis of systematic reflections 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modern society which is filled with the value of materialism.

Key words: Confucius's way and the modern life culture; Confucian culture; modernization; reflection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大思想变革, 它以“民主”和“科学”为主题, 严厉打击和批判了两千多年的传统儒家文化, 对于推动五四运动, 加快“民主”和“科学”在知识分子之间的传扬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新文化运动由于对儒家文化的严厉批评, 也一定程度上抹杀了儒家文化,

特别是孔子学说中很重要的一些社会礼仪。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他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两个概念, 宣扬了当时中国最需要的民主和科学, 但在一定程度上, 也正是以他为代表, 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全盘而彻底的否定,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无疑是陈独秀全面反

收稿日期: 2013-09-18

基金项目: 华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校级课题“通识教育背景下新建校区校园文化建设研究”(12HSZ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卢立波(1987-), 男, 福建泉州人, 历史学硕士, 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儒学的一面旗帜。

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的写作历史背景

为了探寻中国的出路,中国的志士仁人先后经历了由器物、制度到思想的探索。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继器物和政治制度启蒙后的文化启蒙运动。革命派在封建帝制瓦解的废墟上建立了民主共和,宣告了民族主义的胜利。但相继又进入军阀混战,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他放弃了共和主义的信仰,尊孔复古。共和梦被打碎,一大批思想上受过西方民主文化震撼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器物改革和政治革命都不能从根本上救中国,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头脑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识,必须从文化上冲击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通过普及共和思想来实现真正的共和政体。作为新文化运动骄子《新青年》杂志应运而生。《新青年》是一场中西文化无声战争的阵地,在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文化的同时,对两千年的儒家文化进行了近乎全盘的否定。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以他理解的西方“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对以孔子之道代表的封建文化进行了猛烈抨击,认为孔子之道和“民主”、“科学”是不相容的,前者是落后的,后者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进步的现代社会,封建体制下的封建文化与现代生活是完全不相容的。

袁世凯复辟,尊孔复古,在各地先后成立了“孔教会”、“尊孔会”等,康有为一直以来作为变法改革的领军人物,这次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宣扬“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势无中国矣。”面对这股反动潮流,《新青年》下的很多自由知识精英发表文章抨击这种愚昧。《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就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是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前期的反儒作品。

二、《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的主要内容

陈独秀是当时的反儒大军的主将之一,其言论在当时也“风靡一时”,在当时思想文化界影响很大。《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在论及“吾人所欲议论者,乃律以现代生活状态,孔子之道,是否尚有遵从之价值是也。”^{[2]140}“依据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进化的观念,从经济、政治、伦理道德观念和学术等多方面分析孔子思想同现代社会和生活的不适应性,因此非但不能以孔子之道律今,而且必须告别方可。”^{[2]139}

(一) 伦理道德:批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

儒家文化。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是陈独秀早期的文章,他认为不能把孔子之道和儒家文化传统分开,和当时复辟派所谓孔子之道是好的一样,只是与经由后期的改造变坏的观点相悖。

何谓孔子之道?有学者认为是所有孔子的学说论点,包括经济、政治、道德、教育等;有学者认为包括“人道”、“天道”、“仁道”;还有学者认为是以“仁”和“礼”为主要内容的人本、人文思想;陈独秀认为孔子之道就是“封建时候的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儒家之言社会道德与生活,莫大于礼;古代政治,莫重于刑。”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士大夫。”^{[2]144}其实质就是以“三纲五常”为支架架构起来的尊君、忠君的封建社会的奴隶道德。通过提升个人的伦理道德修养,即“修身”,由家到国,达到“治国、平天下”,践行自己的政治理想,效忠于君主。这样的孔子之道和民主社会注重人人平等是相违背的。

陈独秀批判这种封建伦理道德中人的“工具”性。“夫为妻纲”,妻子是丈夫的附属品,儒家文化有言“妇人者,伏于人者也。”“女不言外”等教条。妻子嫁入夫家是没有一点独立地位的。于夫:“夫死不嫁”;于公婆:“戒之敬之,夙夜毋违命。”;于舅姑:“妇事舅姑,如事父母”。“父为子纲”:子是父的附属品,其婚姻大事和前途问题必须听从于父母之言,否则则视为不孝。“君为臣纲”:臣是君的附属品,由家庭的“孝”提升到对君的“忠”。所以有“父要子死,不得不死;君要臣亡,不得不亡”之谚。他揭露批判了这些服务于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奴隶道德,认为它和现代西方社会提倡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妇女可以参加工作争取自己的独立地位等等民主制度、自由平等的精神是相违背的。

陈独秀对儒家文化的批判是对孔子之道不适应现代生活的论证,论证的层面不仅包括伦理道德,也包括政治。主要是说明儒学伦理道德不利于个人人格的独立,它扼杀个人的能动性。他所期望的新青年的形象是不依赖于父母,自食其力,有独立人格的。所以在培养人才方面,他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中强调四大主义:“现实主义”、“民主主义”、“职业主义”、“‘兽性’主义”。其中“民主主义”重在培养民众的民主政治觉悟,培养独立人格。

(二) 政治观点:关于孔教要不要定为国教。

陈独秀对康有为上书总统、总理请将孔教定为国教的言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宗教是出世的,而孔子之道“则于人伦日用、举动云为、家国天下,皆

有得有礼,可持可循,故孔子之教,乃为人之道。”^{[2]141}重在“人事”。除此之外,陈独秀认为伦理道德应该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迁,而宗教其根本是“不易随世间差别相而变迁”。

在随后一篇《再论孔教问题》中,陈独秀继续论述不应该把孔教定为国教,“今之反对国教者,无不持约法中信教自由之条文。”^{[2]182}认为将孔教定为国教也是违背信仰自由的。同时,“政教合一”也会引发各种社会矛盾。

(三) 学术观点:社会进化论。

“一种学说,可产生一种社会;一种社会,亦产生一种学说。影响复杂,随时变迁…若夫文明进化之社会,其学说之兴废,恒时时视其社会之生活状态为变迁。”^{[2]140}十九世纪末,秦纳、勃兰兑斯等文化历史派认为种族环境和时代是决定民族文化的三要素。陈独秀认为,有什么样的经济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组织,相对应的也有属于其特定的文化传统。孔子之道生长于半封闭的大陆环境,是建筑于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是立足于家国一体的宗法制社会的文化。其本质上,陈独秀认为它是封建时代的奴隶道德。陈独秀看来,不论是物质和精神都在不断进化之中,道德又岂能除外?孔子之道作为一种伦理道德“必以社会组织、生活状态为变迁,非所谓一成而万世不易者。”^{[2]145}用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来规范资本主义社会是万万不可的。在他所追求的西方民主共和制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孔子之道也好,更大范围的儒家文化也好,都已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不再符合民主共和的趋势。

4. 经济的观点。“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而在孔子之道的纲常名教的压迫下,“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人格之个人独立极不完全,财产之个人独立更不相涉。”^{[2]142}还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在伦理、经济两方面,个人都是独立的,又以经济上的个人独立为根本。在此观点上,陈独秀对孔子之道继续加以揭露和批判。

三、《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的历史反思

(一) 对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的评价

“任何历史事件和社会思潮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我们考察和评价某一社会思潮的是非功过,不能离开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3]75}《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的写作背景在前边我们已经陈述的很清楚,在这样的大背景和小背景下,陈独秀的反儒学观点反映了当时社会变革的要求,是

中国近代史上反帝反封建的举措,对当时人民觉得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也正是基于政治需要的立场对儒学进行了全面批判,其中也隐藏着不少缺点。

1. 批判的政治功利性。陈独秀反孔在当时尊孔复古,复辟帝制的背景下进行的,主要是反对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戴着这样的有色眼镜难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没有全面认识孔子之道。起码在这篇文章中体现的都是些全面批判。他认为孔子之道和西方共和社会中的民主是完全相违背的,忽视了孔子中民本思想。其实,尊孔学派中的陈焕章认为孔子思想不仅与共和的原则相和,而且正足以在共和的原则下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实际社会问题。

2. 思想局限性。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动荡的历史,在西方枪炮冲击下,国人先是在器物上变革,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也宣告了这一变革的失败;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一系列的政治变革,最后也以袁世凯复辟帝制宣告失败。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发动了“文化战争”,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猛烈抨击儒家文化,拿西方的民主和共和、宪法完全对应于儒家文化,用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批判康有为把孔教定位国教的观点,而不是客观全面的分析,没有做到特殊情况特殊分析,结果肯定是“全盘皆毁”。

3. 思想错位。“孔子之道”是在“养育中国古代文化的土壤,是一种区别于开放性的海洋环境的半封闭的大陆环境;是一种既不同于游牧经济,也不同于工商业经济的农业型自然经济;是一种与古代希腊、罗马的城邦共和制、元首共和制、军事独裁制以及中世纪的西欧的封建等级制和印度种姓制均相出入的家国一体的宗法制社会”^{[4]83}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上层建筑”,它既是一种伦理道德,也是一种政治制度。

陈独秀虽然认识到中国从封建走过近代和现代的趋势,但是他所谓的“现代生活”是完全西方化的,欧化的民主共和政治,是完全移植过来没有实践过的一种理想生活,更多的是倾向于政治层面,换句话说,是“上层建筑”。

两种“上层建筑”怎么也不是适应不适应的问题。孤立的把两种文化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抽出来探讨适不适应的问题,只会扭曲它们。

认识任何一种事物、现象、人都应该用全面客观的眼光在审视。认识《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是这样,认识陈独秀也是这样。我们不能因为他在这

篇文章中所表述的反儒观点而否定他在历史上的意义,更所谓,这篇文章是在前期的一时之言,随着以后认识的不断加深,他对孔子之道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这包括:在社会进化论之后,在“实用主义”理念指导下,他认为,孔子之道并不全是反面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只要是能解决社会问题,它就是有用的;关于学术的观点,改变了前期的变迁论,认为国内国外,求实的就是真理;认识到孔子之道和后儒的区别上,更好的把握孔子思想的实质;认识到孔子所倡导的一些传统美德有可取之处等。

(二) 走在现代生活的路上

陈独秀生活在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交界处,月开始对儒家文化的批判到逐渐认识到它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今天我们以在现代社会中真实生活过的体验者和改造者的立场,想“孔子之道”中那些所谓的仁、义、忠、信等道德观念在现在一个“唯物主义”(“物”是物质利益)的时代是急需的。

中国在封建社会里沉睡了将近两千年,中国以其惯有的“以内向外辐射”文化传播方式和周边少数民族进行封闭性的交流,落后西方近百年。即使在近代,国人仍然没有走出儒家文化的困境,直到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文化的猛烈抨击。思想启蒙,五四运动铺开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嬗变。但当时中国的国情是内忧外患。“在强大的亡国灭种压力下,领导中国现代化的不是那些最具现代目光的人,而是充满民族意识的人,这就极大阻碍了现代化的发展和现代政治共同体的重建。”^[5]¹⁶“在中国,儒家的价值观念和态度阻碍了政治精英转向改革事业。”^[6]¹⁶⁶在中国,有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举起了现代化的旗帜。例如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向欧美学习,向苏联学习,最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立了自己的现代化。

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对孔子之道的态度,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比新文化运动更彻底的批判,不仅仅是在知识分子界,已经深入到广大民众,也就是这一个革命,几乎割断了儒家文化的传承。西方文化滚滚而入,我们不时仰视外来文化,短暂的快餐似的文化充斥了社会各个层面。我们不时疑惑:老祖宗留下的伟大遗产在一代代人身上的还有多少?前几天看见一篇文章,是说韩国人一般会让孩子接受一种称为“乡学”的教育,主要是学习孔子的“仁、义、礼、智、信”,这本是我们祖宗的东西,我们狠狠批判过的东西,在高度现代化的今天,别的国家在学习,而我们自己尚没有意识。这是很可悲的。今天,特别是经济高度发展,物质资源日益富足,人们往往更多的感觉精神世界的空虚和匮乏。

正所谓“择其善而明用之”,充实我们的精神不仅仅需要现代化的意识,历史积淀中找到民族的根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现在是,将来也是,一个民族只有精神上的根,才不会在激烈的风雨下打垮。

1. 继承优良传统,培养社会责任感。一个国家的强盛不论是说在知识,还是在教育,其实最主要的是“人”。国民的优秀才能造就一个国家的伟大和成功。如今,拜金主义、实用主义等不良浪潮席卷中国,不论是成年人,就是小孩子对钱的“刮目相看”也常常令我们吃惊,长此以往,不知道我们这样的“礼仪之邦”何以在世界舞台上走下去。

孔子由亲亲而言仁,由尊尊而言义,恢复周礼。以其为根基,“孔子之道”延续五千年,五千年绵延不绝,到了21世纪仍然具有深远的现代价值。以“仁”为核心的孔子之道,以孔子之道为根基的儒家文化,其内在的就包含了“和谐”的理念。虽然说“仁义礼智信”在风见识到具有一定的工具性价值,现代社会利益冲突、物质泛滥,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美德观念日益淡化。以至传统道德沦丧,人们对于自身的关怀和对他人的仁爱观念越来越淡,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为之捶胸顿足之事。

现在国内国外关于中国文化断代、中华传统精神支柱失落说日益广泛。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我们需要在系统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重塑中国人的道德世界。如果我们能密切结合时代的问题和精神,把“孔子之道”学说中所蕴含的现代意义充分阐发出来,则必将大有益于当今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并获得其相应的种种事功。古老的儒学,也将由此萌生出新的意义和新的生命。

2. 从批判中学会创新。“孔子之道”本身更多是一种学识,一种道德理念,只是在前年政治风雨中不断被统治者拿来管理臣子和子民,不停加以改革,顺应统治的需要,作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官方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工具,把民众异化,就像一张网,没有漏网之鱼。其“三纲五常”,小到家庭中妇对夫的服从,儿对父母的服从,大到臣对君的服从,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封建秩序的维护。那种尊贱之别,地位卑尊深深根植于民众头脑,深化了民众的服从和顽固的心理。即使在今天,在商业、教育,特别是政府部门,尊卑地位划分的很详细,不能越级,否则则触犯了众怒。这不仅仅造成我国教育和政府部门工作烦杂,效率不高,重要的是缺乏灵活性和创造性。

日本从大唐学习文官制度,从中国引入佛教,在本国内无不进行了新的改造,使(下转第62页)

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对经营绩效影响研究

——以国内上市银行为例

郑兰祥, 周洁

(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 合肥 230601)

摘要:2008年金融危机后, 银行资本结构与经营绩效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再次得到重视。对16家上市银行进行了研究, 利用SPSS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得出银行经营绩效的盈利性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负相关, 而与附属资本比例和银行的资产规模显著正相关的结论。

关键词:上市银行; 资本结构; 经营绩效

中图分类号: F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1-0018-04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capital structure on the performance of commercial banks ——with the domestic listed banks as an example

ZHENG Lan - xiang ZHOU Jie

(School of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 structure and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banks is again attached importance to. After researching on the 16 listed banks and empirically analyzing them with the SPSS software,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profit - making rate of the banks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roportion of the first shareholder's holding of shares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ubsidiary capital ratios and the banks' asset scales.

Key words: listed banks; capital composition; operating performance

一、问题提出

加入WTO后, 国内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中国银行业规模的开发管理性能, 抗风险能力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市商业银行在引领其他银行进步的同时, 也对促进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稳定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2008年的金融危机, 各国都意识到应该找出当前全球金融和银行体系不稳定的根源。结果又一次肯定了商业银行资本的风险防御能力, 而怎样提升商业的资本数量可以达到防御风险的目的又成为了各国一致考虑的问题。所以, 银行资本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再一次成为重点。本文对数

据进行实证分析, 通过怎样合理的调整资本结构, 在保障银行经营绩效的前提下, 提高银行的风险防御能力。

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开端是1958年Modigliani和Miller提出的资本结构模型, 这也是著名的MM理论^[1]。在此基础上, 之后经过很多年的研究和实践, 资本结构理论也在不断的深化和发展, 从而得出更多的资本理论, 如: 权衡理论、信号理论、代理理论、融资优序理论、控制权理论等。而这些理论均说明了, 资本结构对企业的经营绩效造成了的影响。

而国内对于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相对于国外来说又出现比较晚。早期的主要有于良春和鞠源

收稿日期: 2013-10-28

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09-10D28); 安徽大学江淮学院院级社科研究项目(2012SK1001)

作者简介: 郑兰祥(1965-), 男, 安徽凤台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金融运行与管理。

在1999年通过对银行资本结构的研究,认为我国银行业存在股权高度集中及垄断低效的问题^[2]。近年来,有郎咸平、赵勇、陈四辉、高晶等人分别通过实证研究对银行的资本结构和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3]。而分析的得出的结论,在开始时,发现并两者并不具有相关性,而后期转换角度,学者把资本结构的分析指标具体化,认为资本结构与经营绩效之间存在二次、三次关系。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在资本结构理论探讨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国上市银行资本结构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和西方经典理论的结论并不一致,而且所选取的财务数据的时间期限较短。因此,关于上市银行资本结构和经营绩效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二、实证分析

为了验证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对其实际经营绩效产生的影响,本文对中国上市银行的数据进

行实证分析检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更好的分析出中国上市银行资本结构对经营绩效的影响作用,进一步提出改善中国上市银行资本结构的建议。

(一) 样本及变量的选取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给出了资本结构的定义,即资本结构是指企业负债与股东权益的比例,即企业全部资金来源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经营绩效是指一定经营期间的企业经营效益和经营者业绩。企业经营效益水平主要表现在企业的盈利能力、资产运营水平、偿债能力和后续发展能力等方面。本文的目的是研究我国上市银行的资本结构与其经营绩效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根据两者的定义,选取资产负债率,核心资本,附属资本三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反应银行资本结构,选取净资产收益率,不良贷款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反应银行经营绩效的盈利性和安全性,选取银行资产规模作为控制变量^[4]。如表1所示:

表1 模型中相关变量及其含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符 号	变量的定义
解释变量	资产负债率	DAR	总负债/总资产 * 100%
	核心资本	CR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附属资本	SUBC	附属资本/资本总额 * 100%
被解释变量	净资产收益率	ROE	净利润/净资产 * 100%
	不良贷款率	NPR	(次级贷款 + 可疑类贷款 + 损失类贷款)/各项贷款 * 100%
控制变量	资产规模	SIZE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选取样本的时间段为2010-2012年。从各大上市银行年报里采集所需要的数据并且精确到两位小数。本文采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回归分析不仅可以判断变量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以及关系密度,还可以可进一步指明关系的方向,并能进一步说明因素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二) 理论假设

假设一:银行资产负债率与银行资产收益率负相关。

当银行有资金需求时,首先会选择内部资源来满足,其次才会选择债务融资以及股权融资,如果一家银行的盈利能力强,仅仅靠内部资源就可以满足其需求,对外部资产的需求就会减少,这样就会使资产的负债率降低。

假设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显著负相关,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显著正相关。

在控股的企业中,股权过分集中与一个地方,容易造成大股东仅考虑自身的利益,而不顾小股东的权益,这很显然不利于银行提升经营绩效,而且这种一股独大的情况在进行一些决策时带来的风险也就更强。

假设三:附属资本比例与银行资产收益率显著正相关,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显著负相关。

增加附属资本可以更加便于商业银行调整资本结构,从而降低资本成本,可以适度缓解商业银行的压力。同时附属资本比例的提高,资本多元化,银行的抗风险能力也得到提高。

(三) 实证检验

根据之前表1中对变量的具体定义,本文运用回归方程(1)和回归方程(2)分别来验证上市银行资本结构与其盈利性及其安全性之间的影响作用^[5]:

$$ROE = \beta_0 + \beta_1 DAR + \beta_2 CR1 + \beta_3 SUBC + \beta_4 SIZE + e(1)$$

$$NPR = \beta_0 + \beta_1 DAR + \beta_2 CR1 + \beta_3 SUBC + \beta_4 SIZE + e(2)$$

表2 上市银行资本结构对其盈利性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

Variable (变量)	Coefficient (相关系数)	Std. Error (方差)	t - Statistic (T 统计量)	Prob. (概率)	VIF (方差膨胀因子)
C	0.544	1.532	0.355	0.452	
DAR	0.03	0.1	0.289	0.014	1.264
CR1	-0.16	0.03	1.838	0.004	1.165
SIZE	1.01	0.062	-0.159	0.022	1.158
SUBC	0.928	0.215	0.569	0.013	1.018
R ² (拟合值)	0.897	Adj - R ² (调整后的拟合值)	0.786		
F - Statistic (F 统计量)	1.875	P (F - Statistic) (相伴概率)	0.032		
D - W (杜宾 - 瓦森)	1.996				

回归结果显示, R² 为 0.897, 调整后 R² 为 0.786, 说明在 2010 - 2012 年间, 以上 16 家上市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 (ROE) 的变化的 78.6% 可由四个变量的变化来解释, 方程的拟合度较好。

回归结果中, F 为 1.875, P (F - Statistic) 为 0.032, 说明该回归模型的线性关系在 95% 的置信

水平下显著成立。D - W 值为 1.996, 该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方差膨胀因子值 (VIF) 均小于 2, 说明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其中由 T 检验的结果可知, 四个变量对净资产收益率 (ROE) 影响显著。

表3 上市银行资本结构对其安全性影响的结果

Variable (变量)	Coefficient (相关系数)	Std. Error (方差)	t - Statistic (T 统计量)	Prob. (概率)	VIF (方差膨胀因子)
C	-24.952	21.905	-1.139	0.921	
DAR	0.086	0.148	0.580	0.018	1.251
CR1	0.103	0.043	-2.391	0.036	1.264
SIZE	2.403	0.868	0.053	0.042	1.158
SUBC	-0.326	0.219	1.488	0.028	1.165
R ² (拟合值)	0.864	Adj - R ² (调整后的拟合值)	0.748		
F - Statistic (F 统计量)	1.341	P (F - Statistic) (相伴概率)	0.019		
D - W (杜宾 - 瓦森)	2.645				

实验结果中, R² 值为 0.864, 调整后 R² 的值为 0.748, 说明在 2010 - 2012 年间, 上述 16 家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的变化 74.8% 可由其他四个变量的变化来解释。F 为 1.341, Sig 为 0.019, 说明该模型在样本范围内, 拟合程度很高, 整体回归效果是比较显著的, 该回归方程的解释性很强。D - W 值为 2.645, 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方差膨胀因子值 (VIF) 均小于 2, 说明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通过上面两个实证检验的结果得出, 上市银行的资本结构和经营绩效是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的。具体结论如下:

1. 商业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 (ROE) 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CR1) 显著负相关, 而与附属资本比例 (SUBC) 和银行的资产规模 (SIZE) 显著正相关, 与假设相符。

这些说明, 当银行拥有控股股东, 而其他的股

东都是分散的小股东的时候, 小股东由于持股比例较低, 他们在监督经理人员的问题上都存在“搭便车”的动机, 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经理人员难以受到监督。对银行的盈利影响不好。另一方面, 也可以通过增加附属资本增加银行资产规模, 从而调整银行贷款结构。

2. 商业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 (ROE) 与资产负债率 (DAR) 正相关, 这点与假设不符。

这虽然与研究假设不一致, 但也可以从代理理论中得出解释。代理理论认为, 在经理人市场充分有效的前提下, 企业的资本结构中债务比率的增加会导致企业经营者由于企业的破产风险的存在而采取更符合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为, 这就使企业的经营绩效能够得到有效的增加。

3. 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 (NPR) 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 (CR1) 显著正相关, 与附属资本占总

资本的比例(SUBC)显著负相关。与资产规模(SIZE)非显著负相关。

这种结果表明,股权过于集中,会影响中小投资者的参与,导致资本的流动性差,降低了银行资产的安全性。银行附属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越高,说明银行业务的多元化,分散了风险。同样的道理,银行规模越大,其投资更趋向于多元化,资金的配置更为有效,进一步分散风险,从而保障银行安全性。

三、政策含义

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到,上市银行的经营绩效与资本结构相互影响,合理的资本结构是银行不断提高自身价值的最重要的保障之一。在商业银行不断提高其经营绩效的同时,又反作用于资本结构,使资本结构进一步趋于合理。根据上述分析,结合我国上市银行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 优化核心资本结构

银行股权越合理,银行治理效率越高,银行价值越大。如前所述,目前我国上市银行大股东占绝对控股优势。从理论上说,这种产权结果的治理效率是较高的。但是,这样会导致社会公众股分布零散,使上市银行的内部人控制严重。大股东所在比例越大,银行的内部控制就越强,产权结构治理的效率就越低。根据实证分析,改善和完善银行股权状况成为优化银行核心资本的关键。因此建议大股东通过股权转让、减持等方法从一些行业退出,以便能为银行带来更多的利益。

其次,在国家控股的基础上,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商业银行不同于一般企业,要想对其进行管理,法人股股东必须要有较强的专业知识。但是这类人在现有的股东中占得比例很小,这样一来就加大了对银行经理层管理的难度。因此引入机构投资者是非常必要的。一是机构投资者股权相对集中,可以有效的进行监管。二是机构投资者具有完善的金融管理知识及经验,可以再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其专业能力。引入机构投资者有两个好处,一方面形成战略合作关系,不仅丰富了国内市场也有利于国外市场的开发。另一方面,境外投资者拥有比国内更优秀的技术水平,通过学习,更加有利于提高经营效益。

(二) 优化附属资本结构

不同于其他企业,具有很强外生性的存款是商业银行负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商业银行资金的一

个重要来源,这就大大增加了商业银行经营风险,影响经营绩效的提高。而通过提高商业银行的附属资本,可以缓解这种状况,提升银行的经营绩效。通过增加附属资本,多元化而且合理化了银行的资本结构,在降低资本成本的同时,提高了商业银行的资本收益率。

另一方面,我国上市银行的附属资本结构不够多元化,而附属资本的完善可以在某些方面上代替核心资本,提高银行绩效。主要有三个方法,一是发行次级长期债券,提高银行在偿债方面的能力,但是要注意发行比率。二是创新的混合资本工具。这样可以同时具有股本资本和债务资本的性质,而且在我国对其发行没有限制。三是为了防范银行可能出现的损失,提前提取一定比率的呆账准备金。

(三) 适当提高银行负债经营比例

根据实证分析,银行的经营绩效与银行的资产负债率是存在正相关的关系的。在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今天,负债经营可以有效地减轻由于市场波动而给银行造成的损失。从回归分析中可以看到,上市银行绩效水平与其资产负债率息息相关,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往往能带来较好的效益。银行可以积极利用负债经营的减税效应和财务杠杆优势,不断提高企业绩效水平。高回报同时意味着高风险,在银行负债比例增加的同时,所面临的财务风险也不断增加。因此为了控制负债经营风险,银行应及时建立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时刻关注企业财务风险状况,规避风险,控制风险,在保证财务安全的前提下将负债经营比率不断扩大。

参考文献:

- [1] Modigliani F, Miller M. H. . 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ion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8:48 (3) :261-97.
- [2] 范文燕,刘宗华. 论融资结构与治理结构的关系 [J]. 财经科学, 2002 (5) :57 - 61.
- [3] 林瑜. 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经营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D]. 厦门:厦门大学, 2008.
- [4] 李灿. 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指标决策价值的局限性分析 [J]. 财务报告与分析, 2008 (12) :81 - 82.
- [5] 刘宸晨,何妍. 上市商业银行资本结构与现实竞争力关系的实证研究 [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11 (6) :26 - 29.
- [7] 鲁剑.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以机械行业为例 [D]. 南京:东南大学, 2006.

[责任编辑:范 君]

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的法理分析

曹红军¹, 王迎²

(1. 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 淮南 232001; 2. 招商银行合肥分行, 合肥 232001)

摘要: 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是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创新的产物, 客观存在于行政诉讼中。实践证明, 它的出现实现了行政审判“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针对这一新的试点中的司法制度, 从制度价值、司法价值和程序价值三方面进行法理分析, 以期指出这一制度存在的法理价值, 为立法提供理论素材。

关键词: 行政诉讼; 相对集中管辖; 法理分析

中图分类号: DF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1-0022-04

Leg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ve concent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CAO Hong-jun¹, Wang Ying²

(1.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of Huainan, Anhui Province,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2. China Merchants Bank of Hefei, Hefei 232001,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ve concent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s the product of the innovation of our country judicial practice in recent years, which objectively exists i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The practice proves that its existence helps achieve the organic unity of “political effects, legal effects, social effects”. In view of this new system in the judicial system, this paper mak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system value, justice value and procedure value, in order to point out the theoretical value of this system an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material for legislation.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relative concentration of jurisdiction; legal analysis

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就是通过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的方式,将部分基层法院一审行政案件的管辖权交由其他基层人民法院集中管辖以实现最大化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一种司法制度。这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结合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对管辖制度的变通。从理论上讲这种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悖于《行政诉讼法》中有关区域管辖原则相应规定的,但它是合法且客观存在的,是我国司法实践创新的产物。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主要做法:一是指定辖区某一个法院行使集中管辖案件;另一种方式为上级法院逐案指定的方式。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3年试点“行政诉讼相对集中指定管辖制度”,实践证明改

革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在此基础上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13(3)号文件^①指定安徽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安徽省唯一一个“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法院”进行试点,全国其他省份也纷纷选择一些城市进行试点。可见,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在我国已经不是一种司法理论的对象物,而是一种司法实践的客观存在。

对于成文法国家而言,任何司法制度或司法行为的解析都必须以成文法条为基础和前提,然后结合法学理论、法律价值、立法目的以及道德规范进一步寻求法律意义上解析的正当性、合理性。因此若要对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这一具体的、试点改

收稿日期:2013-10-28

作者简介:曹红军(1983-),男,安徽亳州人,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法律硕士,研究方向:诉讼法学。

^① (2013)3号《关于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在部分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内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试点中级人民法院要根据本辖区具体情况,确定2至3个基层人民法院为集中管辖法院,集中管辖辖区内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行政诉讼案件。从2013年6月20日开始实施行政案件的相对集中管辖。

革的司法活动进行法理分析,一个基本前提必须在现行《行政诉讼法》框架内,结合社会司法现实的需要,深入分析相对集中管辖这一司法制度的合理性新因素和新内涵,达到遵守现行法律制度这一静态状态下,探求这一制度潜在的动态活力。基于此,笔者在遵守现行《行政诉讼法》条文前提下,以行政诉讼权利本位为价值目标,以司法正义为终极追求,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综合把握法律规范在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法院等多重法律关系中的整体性,继而分析把行政诉讼制度设计、司法运用和程序保障等有机统一起来,探究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理论和司法价值所在。

一、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的制度价值分析

法律规范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特征,同时具有价值宣告功能,行政诉讼法律规范也不例外。因此,作为法律规范具有“道德与法律”、“正义与实用”这样的对偶性因素。行政诉讼法律价值亦是人们通过司法实践认识并有实践本身来诠释的关系范畴和过程范畴。正如德国考夫曼先生在《法律哲学》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正义以及还有正确的法是作为法律发现程序的产物来被理解的”。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条规定体现出《行政诉讼法》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作为首要价值。另外行政诉讼被告特定以及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均体现出该法第1条诉讼价值。《行政诉讼法》第1条是统领性的条文,起着立法目的解释的作用,所有条文的司法实践效果都要为实现第1条立法价值而接受检验,但是,在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却事与愿违。这从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非正常的高撤诉率和原告败诉率是可以看出的。浙江省高院课题组在调研文章中写到“根据统计资料显示,从2000年至2004年,全国行政案件一审判决撤销、变更被告具体行政行为以及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总数分别为16568件、15785件、13637件、12629件、14624件,与同期结案总数相比,一审原告方胜诉率分别为19.69%、17.88%、16.05%、14.34%、15.86%,五年中原原告方胜诉率均低于20%。自《行政诉讼法》实施至2004年的

15年中,全国行政诉讼一审案件的撤诉率平均为41.25%。2000年至2004年行政诉讼一审案件的撤诉率分别为37.83%、33.34%、30.67%、31.59%、30.64%,但与同期全国一审民事案件的撤诉率19.92%、20.09%、19.97%、20.7%、21.65%相比,仍要高出10%左右。”^{[2]45}浙江省高院课题组调查研究问卷显示:针对当前行政审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设计了四个答案分别为“党政机关的干预”、“法官业务水平跟不上形势要求”、“当事人双方实力相差悬殊”、“行政与司法的关系过于密切”,不同主体回答所占的比例为:审判人员答案比例依次为45.8%、34.7%、17.8%、11.8%。而行政诉讼的原告以及与行政诉讼联系密切的人员,回答问题的比例次序为49.4%、27.6%、28.7%、37.2%。可见,与行政诉讼有关的人员与审判人员都认为行政诉讼审判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外部干预,而调研的数据也支持了这种看法^{[2]44}。

行政诉讼司法实践的现实不禁让人思考:如何能使行政司法行为有序的实现《行政诉讼法》第1条立法目的,并让行政诉讼司法实践受到法律立法目的指引和控制成为摆在广大行政诉讼法官面前的现实性命题,在面对“史上最牛公函”^①,老百姓不愿告官,不敢告官,法院不能常态的独立公正审理时,广大法律人不得不正视和反思我国现行的行政司法体制,正如马怀德教授在《行政诉讼原理》一书中所写“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不能被有效地实现以及法律不被正确的实施,最大原因在于行政诉讼体制的制约和限制”^[3]。基于此,我们不得不按照常人的思考逻辑对《行政诉讼法》法律目的性规定进行反思:“面对实践难题,在行政诉讼审判中,法院如何规避行政权的锋芒,使原告和被告在一个公正、客观、平等的平台上进行充分的抗衡;不得不思考在遵守《行政诉讼法》现有规定的前提下,如何合法和合理的处理“司法与行政”、“权利与权力”关系进行试探性实践。浙江台州中院和丽水中院改革经验给了我们创新答案即“用制度保障立法目的的实现”。被行政诉讼实践“逼”出来的“台州经验”驱使迷失立法目的的司法行为向法律价值进行正当地回归。台州中院和丽

^① 重庆市涪陵区法院收到涪陵区李渡园区委管委会所谓的“史上最牛公函”,具体内容为:“一审(法院)不应采信(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的)错误鉴定结论,应做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如果一审法院不采信我们的意见,而一意孤行或者基于其他原因,硬要依据上述错误鉴定结论作出判决……将会造成原告缠诉或者上访,并且不利于处理另外三户养殖户的诉讼。我们想,这也是一二审法院都不希望发生的后果!”。

水中院司法实践经验的“蝴蝶效应”^①也将呈现。在当代中国司法体制背景下,我们在司法改革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如果一味的模仿国外建立专门的行政法院或者提高审级的完全集中管辖模式都不太现实,因为要么是司法成本过高要么是体制障碍,而试点中的行政诉讼相对管辖制度却能够在不触动现行司法体制也无需重构审判组织的情况下,以很小的成本和代价实现静悄悄的革命,进而有效地改变了当前司法困境,并且从制度上保证《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的实现。

二、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的司法价值分析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7条规定了行政诉讼案件一审法院管辖的一般原则(原告就被告)。但我们知道行政诉讼司法实践和法律原理启示我们:无论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是多么的完美,其一般性规定都不可能囊括人们生活的全部社会事例。正如英国著名法学家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所写的:“对法律的解读首先应在遵守规则一般意思和规则权威的前提下研究法律精神,同时要兼顾法律规范中处于边缘地位、不能也不容忽视的一些‘空缺结果’。因为法律规范若想拥有灵活性和适应性必须有这样一些‘空缺结果’,它可以赋予法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填补法律的空缺结构,他们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在原被告份量不等的利益之间作出公平、公正的平衡^{[4]134}。行政诉讼实践中受理难、审理难、执行难、以及非常态的高撤诉率和原告败诉率使行政诉讼“原告就被告”的管辖原则需要“空缺结果”来弥补,表明现行《行政诉讼法》一般性管辖原则在实现其立法目的方面遇到了困难。

事实上,哈特所指的这种“空缺结果”体现在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2条和第23条规定中。第22条规定了上级人民法院有权指定下级法院因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案件。第23条规定了上级法院可以提审下级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也可以将自己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移交下级法院审判。第22条和第23条规定赋予了规范以活力与变通力,不会使法律规范变得混乱并丧失权威。正如哈特指出的那样:“法必须主要地(但不能绝对地)指向多类人、多类行为、事物或情况;法对广泛社会领域的成功运作取决于把个别行为、事物和情况认定为法所作的一般分类的实例,这样一

种广泛扩散的能力”^{[4]124}。浙江台州和丽水中院的法官们通过司法实践,能动地把司法实践中的复杂情况和行政诉讼法律规范巧妙地灵活地结合起来,进而真正发挥了法律规范的基础性作用,最终实现立法目的。

可见,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2条和第23条立法规定为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调整案件审判管辖权提供了立法依据,最高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更是针对第22条和第23条的立法条文作了进一步细化解释,确认行政诉讼可以指定异地管辖。那么本文讨论的相对集中管辖可以说是指定异地管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完全符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的要求。由此可见“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制度”是由我国的特殊行政诉讼司法实践原因引起的管辖权指定,目的是实现司法的公正、独立,进而使人民法院能真正意义上行使管辖权,它的出现是因为行政权干涉、影响、压制司法权的现实导致的。最高人民法院法(2013)3号《关于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通知》使浙江台州中院和丽水中院的“个别试点行为”演变为“普遍性”。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行政诉讼相对管辖制度,但是渗透着这一制度的因子,因为相对集中管辖实质上是一种指定管辖。由此分析可知,通过建立行政诉讼相对管辖制度对司法来说有着现实的指导价值,在司法实践中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2013年7月1日,淮南市第一起相对集中管辖行政案件(马某诉淮南市公安局某区分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案)在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标志着安徽省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正式运转,其司法价值意义更具深远。

三、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的程序价值分析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应以公平正义为实质追求,集中表现在认定事实清楚准确,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公正合法,诉讼程序民主,充分保障当事人及参与人的辩论权等合法权益方面,最终体现在诉讼结果的客观公正。实现司法正义就应当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可见,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都是司法正义的内容,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重要保障。公民对个体权利公正的理性感受,是来源于国家在给予权利正义保护的理念评价。一般而

^① “蝴蝶效应”理论是气象学家洛伦兹1963年提出来的,其大意是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两周后在美国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蝴蝶效应说明,一个坏的微小的机制,如果不加以及时地引导、调节,会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危害;一个好的微小的机制,只要正确指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将会产生轰动效应,或称为“革命”。

言只要公民权利正当行使,国家就会给予正义保护,公民个人就会感受到社会的公正,对社会充分正义的信心。作为社会主体的主观评价而言,如果人们依照法律做了相同的行为会得出同样的结果,人们就会切身感受到司法的公正,感受到社会充满正义,反之就会对社会因缺乏公平正义而失去信心。事实上,司法判决结果的公正更是作为社会是否公正的主要标准,而对于判决结果的公正是如何得出的,即结果公正产生的过程往往受到忽视,这也正是我国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中重实质正义轻程序正义的弊病。从以往司法实践看,所谓结果的实质正义会因为评价主体认知能力的差异以及受到主观期望和对司法结果之间差距程度的影响,相同的判决结果体现的公正感会因人而异。因此,程序正义对于司法实体公正的保障直观重要。在当前我国行政诉讼领域,法院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难以保证结果公正的背景下,程序公正的意义显得更为重要,更是受到行政相对人的热切渴盼。

回避程序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各国立法均把回避原则作为一般性原则在立法中予以规定。我国《行政诉讼法》第47条规定了回避制度,即授予当事人基于合理理由认为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审判人员予以回避的权利。但这种仅针对“审判人员的回避的制度设计”对我国行政诉讼特殊被告(行政主体)而言并不是实质意义上的回避。“原告就被告”管辖制度的设计不禁让人质问:“对于审理本地同级政府或者是上级政府案件的法院是否也应当回避?如果不回避,则法院是否能公正客观的审理此类特殊被告的案件?”。长期以来,立案难、审判难、执行难等行政诉讼司法实践的现实困难问题,从根本原因来讲是法院缺少独立审判的条件所致。可见,现行管辖制度无法有效排除政府对行政审判的干预,对于一个在人事和物质方面都依赖于本地同级政府的法院来讲,人们也无法相信其能公正的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因此,从制度设计层面疏远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密切联系,是能够保障司法的公正审判的。我国地方法院司法实践证明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制度改革能够较好的解决立案难、审判难、执行难问题,能够提高行政审判的公信力。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调研显示:“施行行政诉讼集中管辖制度后行政机关被判决败诉的案件数量明显增多。2008年丽水市行政诉讼行政机关败诉率为26.9%。2008年和2009年分别集中指定管辖的56件案件中,行政机关败诉率分别约为35.7%、17.9%。丽水中

院在对集中管辖制度的调研总结会上听到更多的是各基层法院的院长对集中管辖制度的“肯定”,如审判压力极大地减轻,行政机关不方便“协调”、诉讼压力大大增加,行政的相对人对法院信任度和公信力显著提高等等^[5]。因此,在现阶段我国行政诉讼审判中,对于行政机关这一特殊被告主体情况而言,审判机关整体回避能更好地保证审判活动的公正与独立,进而实现保障程序性和实体性公正的目的。例如,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英国的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疏远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目的都是追求通过建立一个具有公正性的审判机构,进而保证司法法能够排除行政权干扰以使审判可以获得最大程度的公正。

对于行政诉讼审判中的现实难题,长期以来,我国行政诉讼法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呼吁对现行制度进行改革,从新设计出一种具有公正性、排除行政权干扰的行政诉讼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法(2013)3号《关于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通知》中试行的“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正是对现实呼声的回应。“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是被司法实践所证明了的相对有效的整体回避审判制度,它智慧的火花来源于基层一线司法人员的理论和审判实践创新,是被司法现实“逼”出来的司法审判制度,在试点地区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这一制度将为实现《行政诉讼法》第1条的立法目的,实现司法权和行政权的良性互动,有效发挥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功能,提高行政审判的公信力,使行政诉讼呈现“原告放心、法官安心、律师专心和被告上心”的良好局面终将发挥其应有的司法功能。

参考文献:

- [1] 考夫曼. 法律哲学[M]. 刘幸义,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30.
- [2]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行政案件管辖制度研究——以浙江省行政案件异地管辖为典型展开[J]. 法治研究,2007(2):44-45.
- [3] 马怀德. 行政诉讼原理[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05.
- [4] 哈特. 法律的概念[M]. 张文显,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 [5] 叶赞平,刘家辉. 行政诉讼集中管辖制度的实证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2):137-138.

[责任编辑:范 君]

小微企业营销风险演化机理及防范策略

何叶荣^{1,2}, 李玲²

(1. 安徽理工大学能源与安全学院, 安徽 淮南 232001; 2. 淮南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安徽 淮南 232038)

摘要: 小微企业营销风险是其经营风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首先阐述了小微企业营销风险的概念, 然后根据小微企业的自身特点和生存环境, 运用风险演化理论, 分析小微企业营销风险类型、研究其营销风险演化机理, 最后提出相应防范策略。

关键词: 小微企业; 营销风险; 演化机理; 防范策略

中图分类号: F27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1-0026-05

Marketing risk evolution mechanism and protective strategies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HE Ye - rong^{1,2}, LI Ling²

(1. School of Mining and Safety Engineering, Aust,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uainan, Anhui 232038, China)

Abstract: Marketing risk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business risks in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This paper first expounds the concept of the marketing risk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and then, based on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living environment, analyses the types of their marketing risks with risk evolution theory,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marketing risk evolution and finally proposes corresponding preventive strategies.

Key words: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marketing risk; evolution mechanism; preventive strategies

一、研究现状

营销风险管理是企业风险管理理论与营销管理理论的结合, 风险管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起源于美国, 国外企业风险管理理论主要针对金融与保险市场, 如 (Michaels, 1996) 《Technical Risk Management》^[1], (Smithson et al, 1995) 《Managing Financial Risk》^[2], (Waring & Glendon, 1998) 《Managing Risk》^[3], (Dherty, 2000) 《Integrated Risk Management》、(Hazard or Physical Risk Management)^[4] 及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5]。分别从技术风险的管理、财务风险管理、企业安全风险及财务风险管理方面有所涉及。国外研究企业营销风险的理论成果多数是新产品开发风险、广告风险、价格风险等具体单项风险的研究, 系统企业营销风险研究较少。

我国学者对营销风险的研究内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营销风险预警的原理和方法的研究, 如余廉 (1999) 《企业营销预警管理》是关于营销风

险管理方面最早的书籍, 系统阐述了营销风险预警的原理和方法^[6]; 2. 营销风险管理的一般理论与营销风险管理实务的研究, 如张云起 (2000) 以影响营销风险的重要风险因素为评价对象, 构建评价体系, 针对评价结果确定营销风险等级, 对企业营销风险实施不同方式的预警和控制^[7]; 3. 营销安全研究, 如李蔚 (2002) 从营销安全的角度提出了对营销风险的防范问题^[8]。

国外对风险演化的研究是从演化经济学领域进行的, 风险演化是借鉴了生物进化论的思想和概念。国内学者杨峰 (2005) 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对集群风险的内生和外生原因进行了分析, 他从技术风险和制度风险进行分析, 认为在集群演化过程中存在创新能力风险和技术风险, 而制度风险主要是制度路径依赖风险^[9]。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 虽然对营销风险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是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等大多比较陈旧; 营销风险的评价方法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收稿日期: 2013-08-1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1374114);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AHSK11-12D29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13YJCZH077); 淮南科技计划项目“煤矿风险知识管理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2012A00913)

作者简介: 何叶荣 (1971-), 女, 安徽霍邱人, 副教授, 管理学硕士, 在读博士, 研究方向: 企业方向。

还存一些问题,对模型的可信度验证不够;对企业因营销风险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微观营销风险的识别和度量层次,对风险的多因素演化尤其是对小微企业的营销风险内涵、演化机理的研究还没有。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家庭作坊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统称为小微企业,在当前形势下,小微企业是我国经济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其数量占企业总数的90%以上,在我国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活跃劳动力市场、增加就业途径、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起着关键性作用。然而,近来,由于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用工成本持续上升、融资越来越困难及小微企业自身问题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小微企业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多,如融资风险、生产风险、市场营销风险等。且风险随着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增加不断演化升级,给小微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带来极大危机。由于篇幅有限,在本文中重点研究小微企业营销风险的演化机理及防范策略。

二、研究过程

(一) 相关概念

小微企业营销风险是指小微企业在营销过程中,由于营销环境、消费者需求、竞争状况、自身经营、管理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其营销战略与市场需求不相适应,营销策略不当等各种风险,如宏观环境风险、营销策略风险、竞争风险、营销管理风险及企业自身风险等。

营销风险演化是指营销风险在对企业造成影响的过程中会发生的各种变化,导致原来甲风险演化成乙风险,乙风险演化成丙风险,且风险演化的方向是多方位的,既有纵深演化,也有横向演化,还有同时向各方网络状演化,对企业及利益相关者造成损失。比如,由于原材料涨价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企业成本风险,成本提高会引起价格风险,价格上涨会引起部分消费者流失,从而引起竞争风险和客户风险;这些风险相互传递并相互作用,最终可能会引起企业资金短缺,进而演化成企业的财务风险或财务危机等^[10]。

营销风险因子是指影响企业营销活动的一些不确定要素。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营销风险源。

营销风险载体是指能承载或携带营销风险因子的物质因素和各种潜在效应,包括资金载体、信息载体、产品载体、促销人员载体等。

营销风险接受体是指受到营销风险影响和辐射的相关产品、服务、业务流程、职能部门、相关企业或其他利益相关者。

营销风险演化路径是指营销风险因子从营销风险源出发,依附于营销风险载体,沿着特定的渠道向风险接受体靠近,该渠道即为营销风险演化路径。

营销风险演化诱因是指促使营销风险源中的风险因子在载体的承载下,沿着风险演化路径向风险接受体运动的驱动力。在没有风险诱因的情况下,风险因子表现为无规则缓慢运动或相对静止状态。风险诱因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风险因子向风险接受体运动的速度,且不同的风险诱因会使风险因子向不同的方向运动。如原材料质量问题(风险诱因)会使风险向产品质量风险方向运动,即导致产品质量风险;促销人员服务态度不好(风险诱因)会使风险向客户关系风险方向运动,即客户关系风险,从而导致客户流失,销售业绩下降^[11]。

(二) 小微企业风险源分析

导致小微企业营销风险有很多内部和外部不确定因素,这里从宏观营销环境变化、营销策略、市场竞争和营销组织管理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1. 宏观环境风险。宏观环境风险是企业控制不了但又面对的风险,主要有包括人口、政策法规、经济、文化、自然环境等风险。只有对宏观环境进行充分的研究分析,对宏观环境风险发生的特点、方式及影响度进行预测,才能尽可能减少宏观环境风险对企业营销绩效的影响。目前小微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呈现出市场结构不合理,产业链上下游分化严重。上游企业垄断着能源、信息、物流等资源;下游企业则竞争过度,成本高收益低。自2011年10月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先后两次以小微企业为专题研究扶持与发展的战略部署,国务院、国家发改委、财政部、银监会等部门也先后出台多项扶助措施(如税收政策、金融政策、用工政策和土地政策等)。但是,政策的力度还不够,小微企业仍然面临严峻的宏观营销环境风险。

2. 营销策略风险。指由于小微企业的产品、价格、渠道、促销等营销策略的制定不当及执行力度不够而引起的风险。

产品风险。产品不能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而导致的产品销量不够、市场份额下降、利润低的风险。小微企业在刚进入市场时,由于对市场状况的不清楚,对市场信息的了解不够准确,产品附加值低、缺乏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等问题,导致小微企业产品风险不断演化升级。

价格风险。由于小微企业采取的价格策略不当导致损失的可能性。目前在资源和市场两大约束条件的约束下,小微企业对价格没有自主权,其经济规模与经济范围都不能与大企业抗衡,不能控制自身产品的价格。大型企业利用自己的规模优势进行地区差别定价,以高价格地区的盈利来填补低价格地区的损失,小微企业实力微薄,在面对价格风险时,所受冲击较大。

渠道风险。在供应链环节中由于小微企业的响应速度慢、信息不畅通、渠道管理不规范等原因

而引起的风险。渠道风险是目前影响小微企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促销风险。小微企业在开展促销活动的过程中,由于促销行为、促销策略不当,促销人员素质相对较低等因素导致促销绩效下降引起的风险。如人员推销风险、广告风险、销售促进风险及公共关系风险等。

3. 市场竞争风险。由于市场中各种竞争对小微企业的营销绩效造成的风险。包括顾客风险、替代品风险、供应商风险、竞争对手风险和潜在入侵者风险等。小微企业的顾客忠诚度比大企业要低的多,因此小微企业的顾客风险也比大企业的顾客风险要高,小微企业的顾客风险主要存在于顾客与企业进行交易的过程中,比如顾客流失、顾客投诉、顾客违约及顾客欠款等,从而对小微企业的营销造成很大的影响;替代品风险是由于其他企业生产的相似产品在外观、功能、技术、成本及服务比本企业的产品具有更多的优势,不仅得到了顾客的喜爱,更能迅速地抢占本企业的市场份额,从而引起本企业的营销风险;供应商风险主要由供应商的违约行为所导致的,比如:由于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供应商供应了质量不合格的原材料或半成品、运输或物流成本的增加、供应商没及时供货等,进而引起小微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产品质量下降、生产产品供不应求等一系列风险;竞争对手风险主要是由于竞争对手在产品、服务质量、技术水平、成本控制与营销策略等方面的提高或改进,进而对该小微企业的营销造成风险。

4. 营销组织风险。小微企业多数是自主创业,家族企业居多,其管理人员大都具有很强的技术实力但缺乏应有的营销知识,由于缺乏相关的营销理论指导,就有可能造成营销战略决策的失误和偏差,这是引起小微企业营销风险演化的内在因素。营销组织管理风险主要有营销组织结构风险,营销人员风险,营销组织制度风险。小微企业营销组织结构较单一,不能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从而导致风险的产生和演化;营销人员风险一方面由于小微企业对营销人员的重视程度不够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营销人员本身素质较低、责任心差等因素导致的风险;同时,由于小微企业营销组织制度不健全或不合理造成对营销人员激励不足、组织冲突加剧导致了营销组织管理风险。

(三) 风险演化诱因分析

1. 小微企业本身的“营销近视证”。目前,很多小微企业的主要目标是追逐短期利润,缺乏远景规划,为了实现其经营目标,会采取一系列营销策略。有些策略可以与其他企业实现共赢、共同发展,有的措施则是通过降低别的企业利益来实现自身利益的增长,这就导致了营销风险的演化。“营

销近视证”是小微企业营销风险演化的助推器。

2. “风险的牛鞭效应”。小微企业在营销过程中,由于上下游企业间交流的不通畅,存在大量的“信息孤岛”,从而造成信息扭曲,且这种扭曲会沿着营销价值链逐渐放大,这种“牛鞭效应”的营销信息偏差增加了营销活动各环节的无效率工作,使营销风险在各个价值链中演化升级。

3. “响应滞后”效应。相关营销信息从源头到终端之间每个环节都有一定的响应滞后,这将会导致营销信息接收者接收到信息之后,做出的反应已经不适合营销信息发出时的要求了,造成营销行为总是比市场需求慢一些,导致营销风险的产生。比如,市场需求信息随着时间在不断发生变化,如果小微企业对市场需求信息的反应速度较慢,当市场调研部门对需求信息的调研出现“响应滞后”时,会把过时的市场需求信息在不断的“响应滞后”过程中依次传递给营销决策部门和生产部门,最终生产出来的产品可能已经落后于市场的需求了。

4. 营销道德风险。一些小微企业的经营者为了提高绩效获得高利润,有时候会向消费者夸大产品功能,甚至提供虚假的公司资质给供应商及经销商,采取一些违规甚至违法的手段竞争,损害了行业整体利益,营销道德严重失范,这些行为必然导致营销风险的演化升级,影响价值链相关群体的利益。

(四) 风险演化过程分析

小微企业在营销过程中,当风险源中的风险因子与各种风险载体结合并受到风险诱因的激发,形成风险流并沿着风险演化的各种路径蔓延并感染风险接受体,在演化的过程中,风险流一般会经过一个或多个隐性的风险墙,如果风险演化形成的风险波超过风险墙,则风险会溢出风险墙,感染风险接受体并对风险接受体造成影响,如果风险演化中形成的风险波低于风险墙,风险流无法通过风险墙,继续停留在风险路径中或回流到风险主体中,不会对风险接受体产生影响。当然风险流在风险路径中还会受到风险诱因的激发,仍会使风险继续演化升级,穿越风险墙并影响接受体;未穿过风险墙的风险回流到风险主体,如果控制得当则会将风险弱化,若未加以控制或控制不当可能还会进一步演化。如图1所示,初始时刻在某一点的风险在风险诱因作用下,沿着营销系统中的各种利益链演化并扩散到生产经营中的一系列点和面,导致企业的生产经营蒙受损失。风险除了在企业内部演化外,还会在企业间演化。因为企业间的利益是相关的,构成利益链的各企业之间风险必然也具有相关性,一个企业内的风险必然会对相关企业产生影响,从而形成一个企业间风险演化流。同时,在营销风险演化过程中,还会发生一系列性质的变化,比如,在供应链环节中,供应商原材料质量不合格,导致生

产厂商生产出来的产品出现质量问题,造成企业产品质量风险的出现,产品质量不好销售不出去,进一步引起促销风险,既使销售出去也会频繁出现故障,导致售后服务风险及消费者对产品和企业的信用风险,进一步演化为人员管理风险、财务风险等,

也就是说营销风险在在演化的过程中发生了质变。营销风险在演化过程中发生质变的原因在于营销系统内有很多相互影响的因素,一个因素发生了变化,会导致其他因素随之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就是营销风险产生演化的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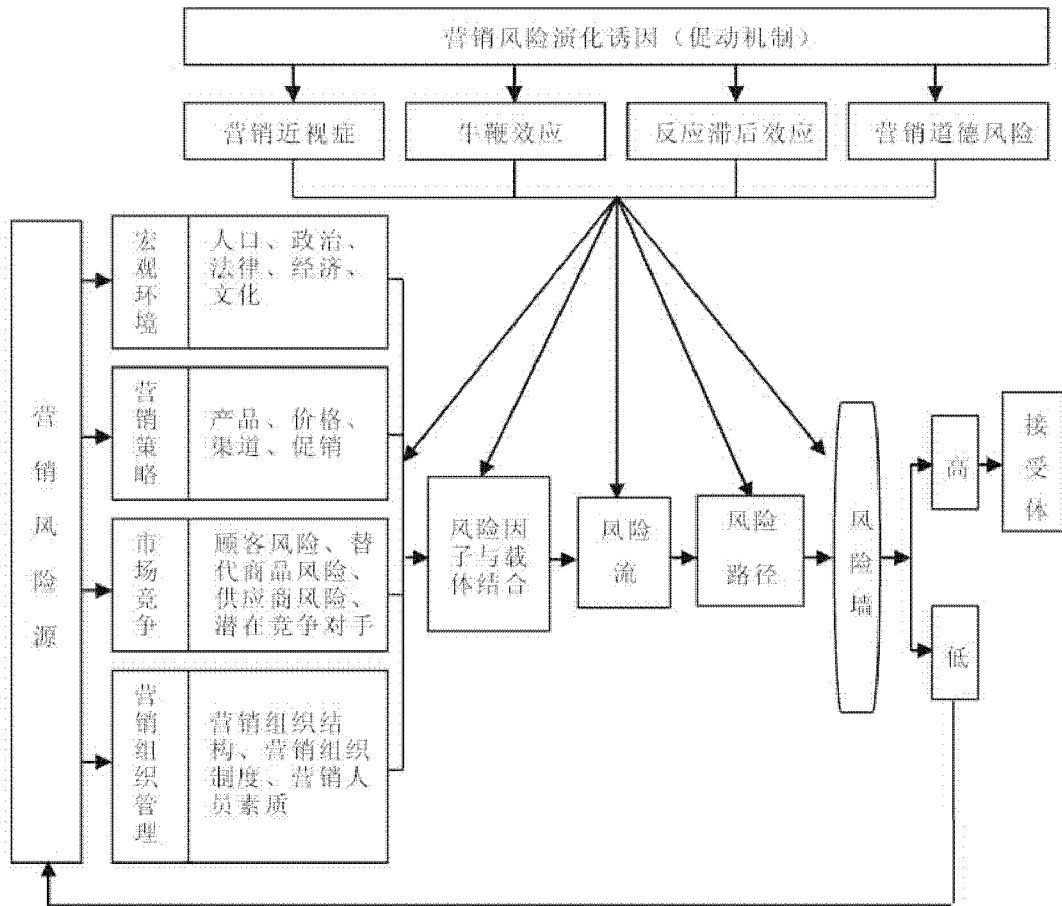


图1 风险演化作用图

三、对策建议

(一) 加大政府支持的力度,创造良好的宏观营销环境

政府要加大对小微企业政策扶持力度,运用财税、金融、市场监管等手段,要细致、详实并具有可操作性。一方面要改革财、税体制,从根本上减轻小微企业的税费负担,让利于小微企业,增强其市场风险抵御能力。切实发挥政府的政策功能和导向作用,加大对创新型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降低其经营的市场风险。另一方面要改革金融体制,构建小微企业和大企业平等使用信贷资源的融资环境,鼓励民间资本建立中小金融机构,控制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对初创小微企业扩大专项资金规模,使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切实得到解决。第三要深化垄断行业改革,营造民企与国企间对生产要素的平等使用权、市场竞争公平参与权、同等受法

律保护的宏观环境,健全并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小微企业升级助力,鼓励小微企业创新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为小微企业营造良好的经营发展环境。

(二) 创新营销运营模式,提高市场竞争力

1. 寻找市场空白点。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小微企业不要跟实力强大的大企业对抗,应充分把握市场需求的变化,寻找市场空白点。发挥靠近市场前沿的优势,在竞争变化快的领域活动;利用经营机制灵活的特点,涉足大企业尚未进入的领域;集中力量参与那些大企业不愿从事的批量小、品种多、微利零销的领域。

2. 突出特色。根据小微自身的资源状况,采取相应的手段,强化自己的经营特色。比如,技术上要拥有某项专利技术、专有技术或多年研究出来的专项精良技术;在市场上,首先抢占特定的目标市场,培养客户满意度打造客户的忠诚度;在产品大体相同的情况下,争取以优质的服务,良好的企业

形象等取胜。

3. 借风扬帆。小微企业无力创新时,可以以大企业为龙头,为之供应零配件或从事某一道工序的加工,从中积累生产经验,增强产品研发能力,积蓄足够的能量,逐步提高自身的生产经营水平和产品的研发能力,获得高效发展。

4. 差异化策略。面对当今人们越来越突出的个性化消费需求市场,消费品生产已从规模化、大批量生产转向小批量、个性化生产。大企业的规模化、大批量生产虽然对社会化生产的需求能够满足,但难以满足小批量的个性化需求。而小微企业数量多、分布广、行业类别多样,它们又具有靠近市场、贴近顾客和机制灵活、反应敏捷的经营优势,能满足一些零售商业领域,居民日常分散的、零星的、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三) 建立健全营销风险防范与处理机构,强化应对风险的能力

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下,小微企业营销风险随时都可能演化,因此建立营销风险防范与处理机构是至关重要的。

1. 在营销部门内部成立专门的风险管理中心。建立一套动态营销风险预警系统,随时对风险进行监测,并对风险的发生原因进行分析,及时与其他部门的风险管理中心协调和沟通,把风险发生的概率控制到最低,早期切断风险路径或消除风险诱因,降低或消除风险演化的可能性,及时把风险控制可在控范围内,使企业营销风险及时得到控制。

2. 定期收集营销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分析评价。随时收集企业营销相关信息,包括宏观环境信息、竞争对手信息、产品信息及市场需求信息等,这些信息是小微企业进行营销决策的依据。有充分、准确的信息才能增强市场预测的准确性,降低市场竞争风险,控制产品及价格等各种风险。

3. 建立绩效考核体系,健全高效的员工激励机制。小微企业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绩效考核体系,对员工绩效进行公平公正的考核和评估,同时建立一套与绩效考核目标相一致的薪酬体系与员工激励机制,以此提高营销人员工作积极性,并把考核结果作为选拔晋升、奖惩的依据。既能提高营销绩效又能将人员流失风险降到最低。

4. 加强客户关系管理,增强小微企业市场竞争力。进行亲情营销、柔性营销,加强与客户的感情联系,针对顾客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和处理,维系好与老客户、大客户的关系,积极开发新客户,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防范市场竞争风险。

5. 树立营销风险文化意识观念,强化职工的风险防范意识。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对营销人员进行

风险意识的疏导,培养员工的风险意识观,定期对员工进行风险处理演练,提高其对营销风险的处理及应对能力。

四、结论

小微企业营销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营销风险演化因素也是复杂多样的,不可能杜绝风险,只能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防范,从控制风险源、切断风险路径、减少风险载体、消除风险诱因,将风险降到可控范围内并阻止其演化。针对小微企业目前的营销风险及演化状况,建议从三个方面加强防范,增强小微企业风险防范能力,降低风险演化概率。在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形势下,小微企业的营销风险及其演化将越来越复杂,关于小微企业营销风险演化机理及防范策略的研究,基于篇幅的限制,对小微企业营销风险预警控制方法的研究及风险演化的测度与评价将在以后的论文中逐一论述。以全方位加强小微企业的营销风险能力建设,切实提高小微企业的营销绩效。

参考文献:

- [1] Michaels J V. Technical risk management [M]. NJ: Prentice - Hall, 1996.
- [2] Smithson C W, et al. Managing financial risk - a guide to derivative products, financial engineering, and value maximization [M]. Chicago: Irwin, 1995.
- [3] Waring A, Glendon A I. Managing risk [M]. London: International Thomson Business Press, 1998.
- [4] Williams Jr, et al.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8th. ed [M]. New York: Irwin/McGraw Hill, 1998.
- [5] Jean - Philippe Bouchaud. Marc Potters. Book Reviews: Theory of Financial Risks: From Statistical Mechanics to Risk Managemen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1.
- [6] 高风彦,余廉. 企业营销组织的风险模糊评价与预警管理[J]. 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学报, 2000 (2): 112 - 114.
- [7] 张云起. 营销风险等级评价及预警控制[J]. 中国管理科学, 2008 (11): 347 - 355.
- [8] 李蔚. 企业营销安全及其预警体系研究[D]. 成都: 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2.
- [9] 杨峰,杨文选,李卫锋. 产业集群风险: 一个演化经济学的视角[J]. 经济师, 2005 (5): 58 - 61.
- [10] 邓明然,夏品. 企业风险传导及其载体研究[J]. 财会通讯: 学术版, 2010 (1): 20 - 23.
- [11] 沈俊. 企业风险传导条件、类型及路径研究[J]. 当代经济管理, 2009 (6): 23 - 26.

[责任编辑: 范 君]

辅助 SDN 节点旅行社实现个性化旅游的软件系统研究

张毅芳¹, 倪明²

(1. 安庆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2. 华东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南昌 330013)

摘要:随着社会进步和人们生活质量水平提高,在旅游界悄然兴起了个性化旅游。在单个旅行社无法实现个性化旅游时,可以通过供需网系统提供的软件平台来实现。从实现个性化旅游功能角度,给出了供需网节点旅行社实施个性化旅游的软件系统功能模块图,并描述了各个模块间关系,在此基础上,给出了该软件系统的数据需求、用户界面、流程图及相关说明等内容。研究表明:该软件系统在实现个性化旅游时,充分体现供需网理念及特征。

关键词:个性化旅游;供需网;系统分析;软件架构

中图分类号: N94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 (2014) 01-0031-05

PT software system analysis for SDN node travel agency

ZHANG Yi - fang¹, NI Ming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Anhui 246133,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East China Jiao 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a new phenomenon of personalization tour (PT) has sprung up quietly in the tourist circle. When single travel agency can't implement the mode of PT, the other SDN nodes can do so through SDN software plat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lementing PT, this paper states the function model diagram of PT software system for SDN node travel agency, describes the relations of function model diagram for the software system, and presents the data requirements, user interface, program flow chart, and relevant explanations, etc. The study shows that sufficient concept of SDN has been embodied when PT is carried out by the software.

Key words: personalization tour (PT); supply and demand network with multi-functional and opening characteristic for enterprises (SDN); system analysis; software construction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与消费观念也逐渐改变,在旅游业,传统旅游方式难以满足游客对旅游的多样化需求。如完全的自助旅游、半自助游、利用网络平台寻旅友游等传统旅游方式,在推进旅游业发展中曾经起着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国外经济环境不容乐观和社会发展本身要

求进步的情况下,某些旅游方式并不是很适合当今的游客。因为,完全的自助旅游,尽管可以克服跟团旅游(即由旅行社组织的旅游)中“玩不好、吃不好、睡不好,还累”现象,但是由于该种旅游方式是游客自己安排在旅游过程中的所有事项,包括乘车、就餐、住宿和景点安排等,该种旅游方式可以完

收稿日期:2013-12-0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962010,71262011,71261005);省青年科学家培养计划项目(20122BCB23009);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22BAB201041);省高等学校科技落地计划项目(KJLD13040);赣鄱英才555工程项目(赣组[2013]58号);省软科学项目(20122BBA10101)和省教育厅科技项目(GJJ13328)资助

作者简介:张毅芳(1980-),女,安徽安庆人,讲师,研究方向:企业管理。

全按照游客的意愿进行,能够充分体现个性化需求。但是,这种旅游方式对一般游客来说,需要支付很高的费用,所以,并不能够得到广泛推广。半自助旅游,是指游客通过旅行社或者其他中介机构代理预定饭店和火车票或者飞机票等事务,在旅游目的地的其他活动由旅游者自行安排,即所谓的“机票加酒店”的模式。尽管该种模式可以解决完全自助旅游中的订票和预定酒店问题,但是,在景点旅游时,无法深层次体会景点的历史人文气息。所以,该种旅游方式对游客来说,也不能够尽情了解旅游地的各景点的人文历史,等游客归来时常常有一种遗憾的感觉。利用网络平台寻旅友游,是指为了获得旅游地景点的信息,外地游客通过网络寻找旅游地的旅友,以期在旅游过程中相互帮助。其中,费用的分摊由双方协商解决。这种旅游方式的确能够解决半自助旅游中的遗憾问题,但是,也有弊端。如难以判断通过网络认识的旅友是否是骗子,在具体分摊费用方面歧义多而不能结伴而行,等等问题。因此,学界提出个性化旅游,如李蕊蕊(2006)^[1]认为在当今信息社会,旅行社关注其如何重新进行其业务结构的调整。胡富松和王洁党(2008)^[2]阐述了个性化旅游在海南有广阔的发

展空间。《计算机与网络》(2010)^[3]发布了 MSN 旅游频道旨在帮助国内白领用户打造旅游生活文化,在旅途中享受个性化定制的旅游服务。胡志芳(2012)^[4]提出基于案例推理的个性化旅游信息服务模型,并讨论了模型的扩展实现和 workflows。鉴于此,把供需网 SDN (Supply and Demand Network with Multi-functional and Opening characteristic for Enterprises) 理论^[5],引入个性化旅游系统,对其平台进行设计。

一、系统功能需求及其功能模块关系

游客对个性化旅游的需求,主要包括乘车方式、景点选择、宾馆与就餐的选择等。为了实现上述需求,需要对该系统进行功能分析。分析结果,如图 1 所示。该系统可分为七个模块,即旅客定制个性化旅游功能模块、旅游管理局审核管理功能模块、旅行社管理功能模块、导游管理功能模块、食宿管理功能模块、景点管理模块和系统开发与维护功能模块。前六个模块属于第三方个性化旅游系统特有模块,最后一个模块属于系统管理员维护与开发模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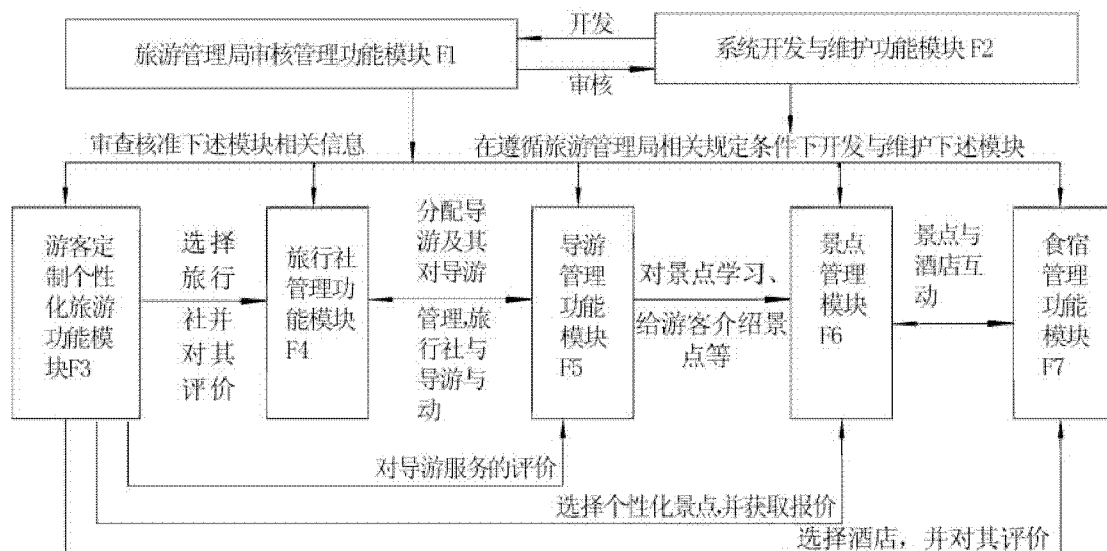


图1 第三方个性化旅游系统功能模块结构图

由图 1 可知,该模块主要为了实现以下几类用户需求:旅游管理局、旅行社、导游、食宿企业(主要指餐饮和住宿企业)、游客和第三方系统开发与维护方(通常为系统管理员)。以下针对上述

几类用户,来说明图 1 中各功能模块之间的关系。

(一) 旅游管理局

本系统平台必须为旅游管理局提供接口,以实现对旅行社、食宿企业、导游、游客、第三方系统开

发与维护方和景点审核与管理。旅游管理局对旅行社的审核与管理,主要通过旅游管理局审核管理功能模块对旅行社进行年检、服务质量确认、接受游客投诉等服务;旅游管理局对游客的审核与管理,主要体现在对景点的管理,也就是通过旅游管理局审核管理功能模块对景点进行管理,即旅游景点在开放前,需要旅游管理局的审核与认定,审核未通过的景点不得开放,游客也就无法选择;审核通过的景点可以在景点管理模块中发布,以供游客挑选;旅游管理局(通常由卫生管理局完成)对食宿企业的审核与管理,主要通过旅游管理局审核管理功能模块对食宿企业的卫生、安全等情况进行审核与认定;旅游管理局对导游的审核与管理,主要通过旅游管理局审核管理功能模块对导游的资历、服务质量等方面进行审核与认定;旅游管理局对第三方系统开发与维护方的审核与管理,主要通过旅游管理局审核管理功能模块对第三方系统开发与维护方资质、系统是否符合与旅游相关的法律法规等审核与认定。

(二)旅行社

与旅行社管理功能模块相关用户有:旅行社、旅游管理局、导游、游客和第三方系统开发与维护方。旅游管理局对旅行社审核与认定的结果通过旅行社管理功能模块反馈给旅行社;旅行社通过旅行社管理功能模块对导游管理、根据游客定制景点需求分配导游和导游在旅行社间的互动;第三方系统开发与维护方通过开发与维护功能模块对旅行社管理模块进行开发与维护。

(三)导游

与导游管理功能模块相关用户有:旅游管理局、游客、旅行社、导游和第三方系统开发与维护方。旅游管理局对导游资历审核与认定等结果通过导游管理功能模块反馈给导游;导游通过导游管理功能模块更新自身信息,并将相关信息输出到旅游管理局、旅行社和游客等;第三方系统开发与维护方通过开发与维护功能模块对导游管理模块进行开发与维护。

(四)食宿企业

与食宿管理功能模块相关用户有:旅游管理局(通常以卫生管理局为代表)、游客、食宿企业和第三方系统开发与维护方。旅游管理局(通常以卫生管理局为代表)对食宿企业的资质、等级和卫生

等审核与认定等结果通过食宿管理功能模块反馈给食宿企业;食宿企业通过食宿管理功能模块更新食宿相关信息,并将相关信息输出到旅游管理局和游客等;第三方系统开发与维护方通过开发与维护功能模块对食宿管理模块进行开发与维护。

(五)游客

与游客定制个性化旅游功能模块相关用户有:旅游管理局、旅行社、导游、游客和第三方系统开发与维护方。旅游管理局将与旅游相关的法律、旅游常识等知识通过游客定制个性化旅游功能模块反馈给游客,以增强游客旅游相关知识;游客通过游客定制个性化旅游功能模块对旅行社设施与服务和服务的质量等进行评价;第三方系统开发与维护方通过开发与维护功能模块对游客定制个性化旅游功能模块进行开发与维护。

(六)第三方系统开发与维护方

与系统开发与维护功能模块相关的用户有:旅游管理局、系统开发与维护人员、旅行社、食宿企业、导游和游客。系统开发与维护人员为上述用户使用的系统提供程序开发与维护工作。

二、系统数据需求

(一)旅行社数据库

旅行社数据库属于基础数据库,其主要数据项有:节点旅行社编号、节点旅行社名称、节点旅行社联系方式(站点、地址、电话)、节点旅行社响应游客速度、节点旅行社等级(由旅游管理局每年审核与认定)、游客对节点旅行社满意度(由游客在完成每次服务后给出,该数据项为动态数据)、旅游管理局对节点旅行社的评价(旅游管理局根据旅行社从事业务的表现给予动态评价,该数据项为动态数据)、节点旅行社间的互评(每次合作结束后,发出邀请合作的旅行社需要对受邀旅行社就其合作过程及其效果进行评价,该数据项为动态数据)和导游对节点旅行社忠诚感和满意度(由导游根据旅行社对其管理水平和方式进行评价,该数据项为动态数据)等。

(二)景点数据库

景点数据库也属于基础数据库,其主要数据项有:景点编号、景点名称、景点位置(通过GIS地图给出)、景点展示(用图片或影像等多媒体形式表示)、景点报价(指该景点被游客游览时的价格)、

旅游管理局对景点审核与认定、游客对景点的评价(游客游览后,从总体上给予景点的评价,该数据项为动态数据)和与景点相关的背景或典故等人文地理知识简介等。

(三) 旅游相关的法律法规数据库

旅游相关的法律法规数据库中的数据项有:法律法规编号、法律法规名称、法律法规颁布的部门、法律法规颁布的时间、法律法规相关条款、法律法规使用时注意事项和与旅游相关法律法规使用者(含旅游管理局、旅行社、游客、导游、第三方系统开发与维护方和食宿企业)对法律法规修改补充的建议等。

(四) 旅游相关的知识及最新旅游资讯数据库

旅游相关的知识及最新旅游资讯数据库中的数据项有:旅游相关的知识及最新旅游资讯编号、旅游相关的知识及最新旅游资讯名称、旅游相关的知识及最新旅游资讯来源、旅游相关的知识及最新旅游资讯的发表时间和旅游相关知识和最新旅游资讯使用者(含旅游管理局、旅行社、食宿企业、游客、导游、第三方系统开发与维护方和食宿企业)对知识或资讯的修改与补充等。

(五) 食宿企业数据库

食宿企业数据库中的数据项有:食宿企业编号、食宿企业名称、食宿企业位置(通过 GIS 地图给出)、食宿企业状况展示(用图片或影像等多媒体形式表示)、旅游管理局(通常以卫生管理局为代表)对食宿企业的审核与认定(属动态数据项)、食宿企业提供服务的报价(以供游客选择和预订)、节点食宿企业间的互评(每次合作结束后,发出邀请合作的食宿企业需要对受邀食宿企业就其合作过程及其效果进行评价,该数据项为动态数据)和游客对食宿企业的评价(由游客享受服务后,对食宿企业提供服务给予总体上的评价,该数据项为动态数据)等。

(六) 导游数据库

导游数据库属于基础数据库,其主要数据项有:导游编号、导游名称、导游情况简介(用图片或影像等多媒体形式表示)、导游对景点掌握状况、旅游管理局对导游的审核与认定(属动态数据项)、游客对导游的评价(由游客享受服务后,对导游提供服务给予总体上的评价,该数据项为动态数据)和导游间的互评(每次合作结束后,发出邀请

合作的导游需要对受邀导游就其合作过程及其效果进行评价,该数据项为动态数据)等。

(七) 游客数据库

游客数据库中的数据项有:游客编号、游客用户名、游客登录密码、游客经济状况(可选项,用模糊词语表示,可用很好,较好,一般,较差来表示该数据项的值)、游客通讯地址、游客联系电话、游客的偏好(包括景点、食宿等偏好)和游客曾经旅游过的地点等。

三、用户界面与程序流程图

该系统主要有 6 类用户,所以,应该有 6 类用户界面。第一类用户界面是旅游管理局用户界面,旅游管理局通过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后,拥有对旅行社、导游、食宿企业、第三方系统开发与维护方管理权和对景点是否开放的批准权等。第二类用户界面是旅行社用户界面,旅行社通过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后,拥有对游客定制的景点确认权、分配导游权、审核和接受游客支付的费用权、向旅游管理局提出修改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议权、查阅旅游管理局审核与认定结果权和查阅游客或导游对其服务或管理评价的结果权等。第三类用户界面是导游用户界面,导游通过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后,拥有对景点背景知识学习权、查阅旅行社分配游客的结果权、查阅旅游管理局对其审核与认定的结果权、查阅游客对其服务评价的结果权、建议旅行社重新分配游客权和向旅行社提出建议修改相关管理制度权等。第四类用户界面是食宿企业用户界面,食宿企业通过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后,拥有发布最新食宿服务与价格权、审核和接受游客支付的费用权、查阅旅游管理局审核与认定结果权和查阅游客对其服务评价的结果权等。第五类用户界面是游客用户界面,游客注册后,通过用户名和密码登录,拥有浏览景点介绍权、发出定制旅游景点的订单权、旅游费用的支付方式决定权、针对旅行社给出的景点报价谈判权、旅游结束后对景点的评价权、最新旅游资讯的了解权、对旅行社提供服务的评价权、对导游提供服务的评价权和对食宿企业提供服务的评价权等。第六类用户界面是第三方系统开发与维护方用户界面,第三方系统开发与维护方通过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后,拥有对各个模块、数据的开发与维护权(必须在符合旅游管理局的法律法规范围内)。

程序流程图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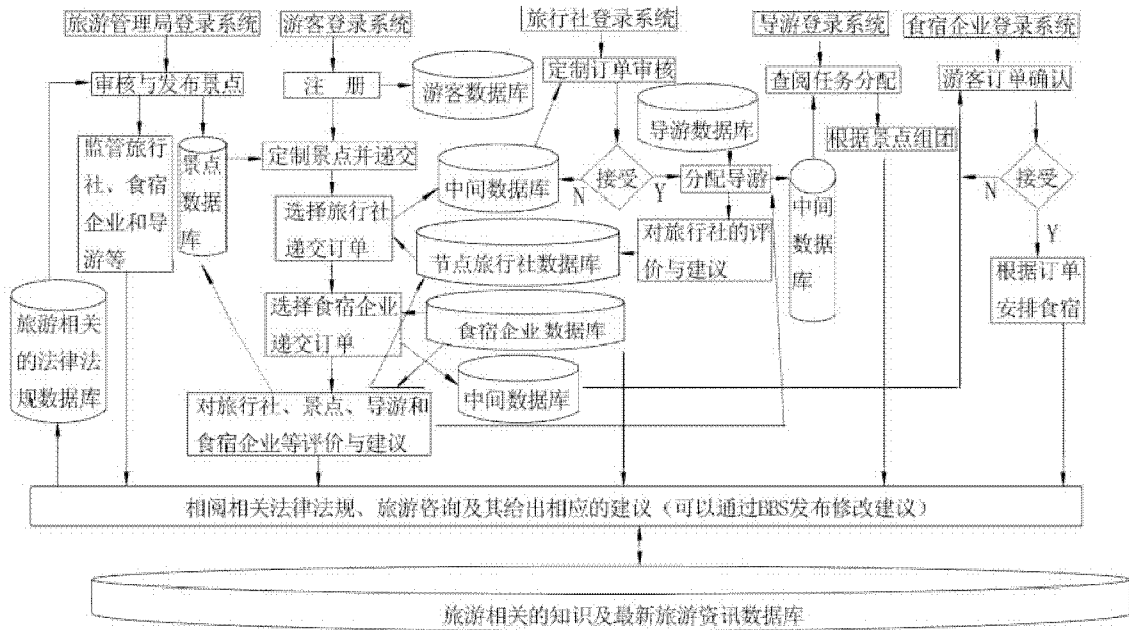


图 2 辅助 SDN 节点旅行社实现个性化旅游的软件系统流程图

说明:为了使得流程图更加直观,避免存在流程图线条交叉,图 2 中未给出游客与旅行社、食宿企业谈判交易流程,导游和旅行社的谈判交易流程等

四、软件特征描述及说明

(1) 软件在整个运作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五类用户的需求。该系统在实现五类用户需求同时,完成七个数据库的记录更新。

(2) 任何游客只要注册后,就可以登录该系统,并可以自由选择任何一个 SDN 节点旅行社、食宿企业和景点等,这也充分体现了 SDN 完全开放性特征。

(3) 在完成每次旅游服务后,游客可以对给其提供服务的 SDN 节点旅行社、食宿企业和导游等进行评价,且评价结果更新相应数据库中的数据项。游客在完成每次旅游服务后,还拥有对景点评价权和旅游相关法律法规修改的建议权等,这充分体现了 SDN 的多功能性特征。

(4) 该软件在实现个性化旅游时体现 SDN 以下特征:动态性,动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旅游团由游客递交订单中的选择景点而形成,即同一个游客在一次旅游中可以多次组团。另一方面,在每次合作结束后,动态更新各类型数据库;网络性,单个旅行社是不可能以较低价格实现个性化旅游的,只有通过网络化平台,实现不同旅行社间的合作,共享各自的导游资源,才能够真正实现游客的个性化旅游;敏捷性,借助于 SDN 节点网络可以迅速答复任何游客对某个景点需求,并且每次能够给出较为准确的景点报价,以实现个性化旅游选择与景点报价的互动。该软件中的各类数据库通过 SDN 节点网络实现完全开放性的共享,特别是导游资源的贡献和旅行社的合作,是能否成功实现个性化旅游的关键。

五、软件系统应用价值

在实现图 1 中各功能时,应该充分吸收来自全球范围内旅行社,任何一个节点旅行社一旦接收到游客的景点定制需求时,则该旅行社应该将需求信息发布在 SDN 网络平台上,以供其他旅行社系统配置景点和分配导游,这是能否实现个性化旅游的关键。当游客接收到旅行社反馈信息时,游客可以通过该平台实现与旅游相关事项的个性化服务(如就餐、住宿和景点内乘车等)。所以说,当今旅行社如果应用 SDN 理念、方法和技术,那么,从罗伯特·梅特卡夫所说“一个网络的价值等于加入网络的节点数的平方”梅特卡夫定律看,一个 SDN 知识网络价值等于加入该网络的节点数的平方。因此,该平台以完全开放性来吸收不同类型节点(如旅行社、食宿企业等组织形态),从而最大程度提高游客的个性化旅游服务质量水平。

参考文献:

- [1] 李蕊蕊. 个性化旅游市场中两大主体——旅游者、旅行社的变化分析[J]. 特区经济, 2006(3): 230-231.
- [2] 胡富松,王洁. 党个性化旅游在海南的发展前景[J]. 琼州学院学报, 2008, 15(2): 91-92.
- [3] 百度文库. MSN 中文网推出旅游频道 打造个性化旅游[J]. 计算机与网络, 2010(1): 4.
- [4] 胡志芳. 基于案例推理的个性化旅游信息服务研究[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2012(3): 78-82.
- [5] 倪明. 供需网理论及其在企业管理变革中的应用[M].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责任编辑: 范 君]

为20世纪的散文研究一辩

陈剑晖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州 510631)

摘要: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散文研究存在误解、争议和偏见,散文文体的独特性和价值性被低估,其原因在于散文自身的宽泛性、外部的时代性等。新世纪的散文研究要走向深入和阔大,散文研究者要建立现代意识的散文批评视野,在建构散文理论话语时要注意中西理论的圆融与自洽,还要与整个学科的建设相结合。由此,散文的文体问题,也还有巨大的研究空间,学术界需要不断开拓散文的研究领域,建立良性健康的散文评价标准和价值观念。

关键词:散文;散文批评;散文文体;散文空间

中图分类号: I20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1-0036-04

The debate for the essay study of the 20th century

CHEN Jian - hui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misunderstandings, controversies and prejudices in the study o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uniqueness and value of the essay style is underestimated. The reasons lie in the comprehensiveness and external temporal spirit. The deepening and expansion of the essay study of the new century and the researchers' construction of essay critical scope shall not only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integration and self-sufficiency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theories, but also be combined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hole subject. Consequently, there is still huge space for essay style research, and the academic circle need to constantly open up the field of research and establish sound and healthy evaluation standard and values of essays.

Key words: essays; essay criticism; essay style; essay space

最近以来,有幸应一些刊物之邀对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我国文学进行回顾与总结,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散文研究。然而,回顾与总结新时期以来的散文研究却不免令人沮丧:以往几乎所有对新时期,乃至整个20世纪的散文研究进行回顾与总结,即“概论”、“概观”、“综述”一类的文章,都对20世纪的散文研究(包括散文批评、散文史和散文理论)颇多微词、评价不高。不但评价不高,有的人还喜欢嘲讽贬低散文研究,认为只有没有才气、没有出息的人才愿意去研究散文。这种状况,既反映出其他学科一些人的偏见与傲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从事散文研究的人底气不足,缺乏应有的自信,有的甚至还缺乏自尊。20世纪特别是新时期的散文研究真的如此乏善可陈吗?

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来看,坦率地说,我过去的一些文章和专著对于散文及其文体研究也持悲观主义的态度。但近期,当我较为认真地重读近三十年来散文研究领域一些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和专著,并与二、三十年代的散文理论相比照后,我的态度由悲观转向了乐观。我深感许多人对20世纪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散文研究的总体成就的评价是偏低的、不准确的;或者说,一些人从一开始就是带着先入为主的有色眼镜来评价这一时期的散文研究,这样自然便得出了有悖于事实的结论。我的思路由经验主义转向了实在论。

在我看来,20世纪的散文研究纵然不能与小说、诗歌相比,但它超越戏剧乃至后来的电影、电视

收稿日期:2013-09-20

基金项目: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散文文体观念与文体演变研究”(11BZW09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剑晖(1954-),男,广东揭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研究应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不妨回顾一下:20世纪之初,当小说、诗歌、戏剧研究还嗷嗷待哺、十分孱弱的时候,散文这边厢已经热闹非凡:既有周作人的“美文”说、“极致”说,傅斯年、刘半农的“文学散文”说,王统照的“纯散文”,胡梦华的“絮语散文”,又有郁达夫的“个人本位”说、“心体说”,林语堂的“幽默”、“闲适”、“性灵”的倡导,还有梁实秋的“文调”等等。五、六十年代,虽然散文研究较为冷落萧条,但至少还有“形散神不散”、“诗化”等散文观念深入人心。至于九十年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散文研究更是有了长足的发展。虽谈不上姹紫嫣红,但至少不会比诗歌、戏剧逊色多少。

那些漠视散文研究,从来就对散文持有偏见或对散文一知半解的人,总是说散文没有理论,没有自己的范畴概念。但试问:“美文”、“闲适”、“性灵”、“文调”、“形散神不散”、“诗化”、“真情实感”等算不算散文的范畴概念?再试问:假如上述这些范畴概念均不能算作理论,那么请举出20世纪的戏剧、电影电视,乃至诗歌又有哪些既贴近该文体的本体,又有内在的规定性的理论?又有多少真正站得住脚的范畴概念?

由此可见,就理论的归属性、自洽性、确定性和普适性来看,20世纪的散文理论并非一无是处,并非像人们所想像的那么差。因此,在评价20世纪包括新时期散文研究时,我们首先要摒弃厚此薄彼、文体优劣的思维惯性,要以公平、公正与宽厚平和之心来对待散文研究;其次要有历史感。只有尊重历史,才有可能对新时期特别是“五四”时期的散文理论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我以为,这是我们评价、反思和总结新时期的散文研究必须明确的问题。

一

当然,散文研究的被冷落、被误读和被贬低并非没有原因。

首先是散文的文体太宽泛且没有边界,难以把握与规范,更难找到理论的切入点,加之有大量非文学的文章杂混其间,如此一来便使一些懒惰的研究者望而怯步,他们不但不想深入地去探究散文的真谛,反而认为散文不值得研究,甚至认为只有才气不足的人才愿意去伺候散文。其次,从“五四”时期起,便一直有人在贬低散文,比如傅斯年一面倡导“文学性的散文”,一面又认为:“散文在文学上,没崇高的位置,不比小说、诗歌、戏剧。”^[1]建国后一些著名的作家如冰心、夏衍、吴组湘等,也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散文是培养和训练青少年文字能力的有效工具,有点像绘画中的素描,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必练的基本功。正因为一般人包括一些著名作家都轻视散文,认为散文是较低层次的文体,这样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叙述中,散文也就处于较

为尴尬的地位,有时甚至只是作为点缀而存在,这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散文研究者的自信心和自尊感。第三,也是最为重要、但过去往往被忽略的一点,就是许多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到“现代性”的“中国想象”之中。他们普遍认为20世纪的文学进程,实际上就是现代性的演化发展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小说、诗歌、戏剧由于更加贴近时代与社会,能承载更多的现代性的宏大主题,因而自然受到文学史家们的青睐。相反,散文由于保留着太多的古典审美趣味,由于其倾向于自由、性灵、闲适的本性与激进革命的现代性价值取向相悖,这就注定了散文被冷落、乃至被边缘化的命运。

从文学研究的外部环境来看,“五四”以后,文学理论的层面也发生了变化。在我国古代,小说、戏剧理论十分薄弱,古代有关文章的理论,基本上都是散文理论,所以散文理论在古代可以说是正宗,享有有很高的地位。但“五四”之后,随着小说、诗歌日渐占据上风,加之西方的文学理论大规模介入我国,并在理论的建设 and 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完全压倒了传统的古典文论,因此,甚至可以这样说,时至今日,西方的理论批评话语已然成为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和理论建构的主导性观念和标准化用语。在这样的语境中,一些文学研究者唯小说、诗歌,尤其是唯西方文学理论的马首是瞻,与此同时对显得有些古旧落伍的散文及散文研究不屑一顾,也就不难理解并在情理之中了。不过在我看来,以承载“现代性”内涵的多少为衡量一种文体及其研究成就的标准,并以此确立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种价值判断其实带着极大的政治功利色彩,实际上对散文创作及散文研究是极不公平的。须知: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散文可能在表现“现代性”内涵方面不及小说和诗歌,但在审美性、语言的涵咏以及提高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方面,它比别的文体有优势。因此,无视散文在升华整个民族的语言素质、思想素质、道德情操和审美水准上的价值,一味地亲小说诗歌而远散文,说到底是一种十分浅薄、不足为法的短视。这种文学史观和价值判断上的偏见虽不至于毁灭散文,但它对散文这种文体造成的伤害早已是有目共睹。笔者指出这点,并不奢望改变这种偏见,只是希望通过上述的抗辩,为现当代散文的存在壮大争回其合理性的地位。至于说到理论层面上的传统话语被西方话语遮蔽,或日渐向西方话语归附,其实也是利弊互见、得失并存。固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得益于西方文学理论,也引进了一些西方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手段,但它的浮躁与急功近利等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更何況,在津津乐道于西方话语,唯西方话

语马首是瞻的时候,又有多少学者掉进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倒是散文研究,虽然从没有过“各领风骚三五天”的大红大紫,但它那份不跟风、不赶潮,“任凭风吹浪打,我自闲庭信步”的从容平静、淡定沉稳的气度,有的时候不是更难能可贵,更应该获得应有的评价以及得到人们更多的尊重吗?

不过话说回来,虽有学科偏见和人为误解,但在短时间内要改变小说、诗歌等文体的理论独霸文坛的局面恐怕也不容易。因此作为散文研究者,能够自救的是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有历史感,更重要的还要有自尊自信,不要妄自菲薄,自我贬低,自我矮化。此外,也没有必要言必“五四”,把“五四”的散文理论捧上天,将当代包括新时期的散文研究打入地下。应看到,尽管“五四”时期的散文理论超过了小说和诗歌,也确立了一些散文的范畴术语,但正如我在《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一书所指出的:“虽然第一代散文批评家有着天然的理论自觉和明锐的目光,但他们一般来说都没有建构散文理论体系的耐心,更少结合当时的散文创作实际进行具体细致的分析。”^[2]即是说,“五四”时期的散文理论基本上是印象式、感想式、随意性的。那时的散文大家如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等往往在提出了某个富于文体意义的范畴概念后便止步了,没有兴趣再进一步追问下去,更没有在“文学史”的意义上进行深入研究,或在理论体系方面进行系统的建构。如一直被视为现代散文基石的周作人的“美文”概念,居然不到一千字,且是随随便便写下,这在今天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至于王统照的“纯散文”、郁达夫的“心体说”等也没有在文体建设的层面上作进一步的理论论证。正是有鉴于此,对那些无限抬高“五四”时期散文研究的成就,而认为“散文理论和散文批评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走的是一条向后退的路子”^[3]的论断,我一直是不以为然,也是不敢苟同的。我的学术态度是:作为一个不甘平庸、希望有所作为的散文研究者,一方面我们要向传统致敬,将现代的散文精神与“五四”和古代的散文血脉相连;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有跨越传统,跨越前人的学术野心。我相信,只要抱着这样的学术野心,加上对散文的爱和执着,当代的散文研究便有可能与小说、诗歌研究对等起来,成为中国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翼。

总之,新时期30年来的散文研究的确是有成绩的,并不像某些带有色眼镜者所认为的那样一无是处、一潭死水、一团混沌。当然,新时期散文研究的不足和缺陷也显而易见。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找出阻碍其发展的症结,同时寻找新的兴奋点和生长点,从而将新世纪的散文研究引向深入和阔大。

三

我认为,新世纪的散文研究要走向深入和阔大,第一是散文研究者要建立现代意识的散文批评视野。长期以来,散文研究之所以落后于小说,根本的问题在于散文研究者过于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我们的散文研究基本上还局限在传统文论的范围内,而审美观念中又保留着太多古典的趣味,同时又满足于散文研究的“静态”平衡格局,不愿意打破散文的华严秩序。正是这种封闭性、保守性、趋古趣味和过分的平静妨碍了我国散文研究的发展。而现在,该是告别这种过于保守,过于狭窄,过于小家子气的研究格局的时候了。当今我们散文研究的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起拥有现代意识的宏阔散文研究视野。

这种现代批评视野,在我看来应包括如下的内涵:首先,是散文观念的现代化。这就意味着散文研究者要解放思想,改变以往那种过于保守,过于谨小慎微的研究姿态,而是要大胆破除传统的散文观念和模式。什么“形散神不散”、“诗化”、“文体净化”、“文化散文”、“学者散文”、“真实与虚构”、“真情实感”等等,都可以在现代散文批评视野中重新审视与确认;其次,现代的批评视野,预示着散文研究者要强化怀疑精神和批评气质,要具备独立而健全的批评人格。尽管在此之前,已有王兆胜、张宗刚等人在这方面作出了表率,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一方面,当前有质疑精神和批判意识的散文研究者还太少,只有当散文研究界拥有了一批既有完整人格又具备批判怀疑精神的研究者的时候,散文领域才有可能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才有可能在文化哲学和时代精神的高度上对散文进行批判与建设,而这才是散文研究真正繁荣的标志。另一方面,我们倡扬怀疑精神和批判气质,但我们坚决反对狂妄无知与无畏。比如最近有一篇叫《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4]的文章,认为“先秦散文”是子虚乌有,“广义散文”是悖谬,至于当代的散文研究更是一片空白,所以必须“推倒重建”。作者还宣称:他要靠一支笔,一个人扭转一个时代的散文风气,他甚至宣称自己是“被召唤来为中国散文立论和立法的”。什么是狂妄无知和无畏?在我看来,这就是典型的狂妄无知和无畏。这位论者根本不了解中国现当代的散文研究现状(如“广义散文”早被研究者摒弃,但他却对其大加讨伐),对古代散文也是一知半解,却拿着长茅像唐吉珂德那样大战风车,如此的“推倒重建”实与现代的散文研究精神相去一万八千里;第三,强调散文研究中的现代意识,还意味着要大胆引进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比如叙述学的理论,结构主义的理论,语言分析理论,新批评的细读法以及心理分

析方法等,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20世纪的小说、诗歌研究之所以一跃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正宗”,盖因有丰富庞大的外国文学理论资源作为支持。虽然在引进借鉴过程中也有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现象,但总体来看还是利大于弊。总之,西方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引进,不但有利于开拓深化当代散文研究,同时也是建立现代意识的批评视野的题中之义。

第二是在建构散文理论话语时要注意中西理论的圆融与自洽。上面我们讲到,新世纪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在建构散文理论话语时引进了西方的文艺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虽不似一些小说、诗歌研究那样生搬硬套,或进行名词术语的“大轰炸”,但消化不良,与传统散文理论未能内达到真正的圆融与自洽,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此外,有的散文研究注意到了西方的理论资源,但对散文的本体特征的思考却不够深入透彻。比如笔者过去的散文理论建构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一书中,笔者引进了主体性哲学、文化哲学、生命哲学和叙述学、结构主义等西方的理论资源来研究散文问题,虽然主观上力图将这些理论与中国散文的独特语境相融合,但由于学养的欠缺和对散文的体悟不够,结果正如王兆胜所批评的,还是有些“隔”和“远”。在《散文理论的春天何时到来?——对散文核心范畴的一种阐释》^[5]一文中,笔者试图用“文气”、“笔调”、“氛围”、“味”、“趣”等范畴来阐释散文的艺术特征与美学风格,现在看来还是未达到学术的预期。之所以未能达到目标,就在于未能抓住散文的本体特征作文章。那么,什么是散文的本体性特征呢?现在看来,应是“诗性”统帅之下的“个人性”、“真实性”、“自由性”、“散淡性”和“优雅性”。关于散文的这些本体性特征,笔者将另外撰文加以论述。我在此处谈及这个问题,其旨在于说明创新之难,中西理论融合与自洽之难,建构散文理论体系之难。当然,也有一些新锐学者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如张育华的《本体性流变与审美现局——转型文化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散文》^[6],徐珊的《沉重的肉身,黑夜的澄明——新时期女性散文中孕育文化初探》^[7]等论文,就是在中西融合方面值得注意的文章。前者引进文化研究、系统论、叙事学等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当代散文,在“转”和“化”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后者从女权主义话语体系的视角来研究女性散文中的“孕育文化”,在理性思维和灵性体悟方面达到了较好的圆融与自洽。在我看来,这正是我们建构散文理论的信心和希望之所在。

第三,新世纪的散文研究,需要思考的问题还很多。举例说,在建构散文的理论话语时,还要与整个学科的建设相结合,只有学科“挺立”起来,散

文才有可能与小说、诗歌平起平坐。再如散文的文体问题,也还有巨大的研究空间。此外,还需要不断开拓散文的研究领域,如现代传媒对散文创作的影响问题,生态散文的创作问题,等等,都需要我们的散文研究者作出解释。

在这里,我还想谈谈关于建立良性健康的散文评价标准和价值观念的问题。如众所知,我们过去评价散文的标准是“匕首”加“投枪”,是战斗性和抒时代之情、人民之情。而现在,当这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价值标准被摒弃之后,散文的价值评判却陷入了新的无序和混乱之中,这种无序与混乱,表现在创作方面,是各种“散文选本”,各种“当代散文史”所选作家或作品不仅离谱杂乱、相互打架,也看不出有任何标准,看不出是什么价值理念在支持这些选家和史家的判断。就散文研究来说,则是自说自话,互不认帐,既在基本理念上缺乏共识,也缺少同人之间的互相欣赏与尊重,尤其是对于同人学术成果的漠视。比如,某著名高校主编的一本学科“概要”,其中有一章为“散文研究状况”,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章根本就未能全面、系统、客观地反映出新时期散文研究的信息。一些影响较大、大家公认的对新时期散文作出贡献的散文研究者在“状况”中只字未提,不少在新时期散文发展史上产生过重要作用的论著也被莫名其妙地遗漏,而一些学术质量平平,也没有产生过任何影响的论著却忝列其中。由此可见,“状况”的编撰者不单对新时期的散文研究缺乏必要的学术积累,而且缺乏同一的价值标准,甚至还流露出十分明显的圈子意识。否则,就不会存在着如此严重的以偏概全与资料遗漏,不会对新时期散文的研究现状如此地陌生和漠视!正因为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在我看来,这样的“概要”的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是大为可疑的。而就散文这个学科来说,它的学术价值和建设意义更是可以忽略不计。

参考文献:

- [1] 傅斯年. 怎样做白话文[A]. 胡适.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C]. 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5:218.
- [2] 陈剑晖. 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M].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13.
- [3] 楼肇明. 当代散文流变研究·序[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
- [4] 周伦佑. 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J]. 红岩,2008(3).
- [5] 陈剑晖. 散文理论的春天何时到来?——对散文核心范畴的一种阐释[J]. 文艺共鸣,2006(2):115-119.
- [6] 张育华. 本体性流变与审美现局——转型文化语境下的中国散文[J]. 现代传播,2003(2):19-23.
- [7] 徐珊. 沉重的肉身,黑夜中的澄明——新时期女性散文中孕育文化初探[J]. 文艺评论,2003(5):51-60.

[责任编辑:吴晓红]

文体学视野下的隐逸文学考论

赵玲玲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文学院, 广州 510630)

摘要: 隐逸, 经历了纷繁复杂的时代变迁, 从上古时期的个体化的选择, 逐步发展为大多数士人群体化的精神追求和行为选择, 并从简单的社会现象演变为具有深刻思想价值的文化信仰。隐逸文学作为隐逸文化的一个具体分支, 经过儒道两家思潮的渗透和佛教思想的熏陶, 演绎出众多艺术形态和文学类型, 丰富了古代中国的文体之学。

关键词: 文体学; 隐逸; 范畴; 自由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1-0040-05

Study on reclusion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ylistics

ZHAO Ling - l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0, China)

Abstract: After numerous and complicated epochal transformations, reclusion has gradually progressed from the ancient period of individual choice to the spiritual pursuit and behavioral choice of most scholars, and evolved from the simple social phenomenon into a profound cultural belief of profound thinking value. As a specific branch of reclusion culture and under the infiltr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s well as Buddhism, reclusion literature has developed diversified artistic forms and types, greatly enriching the ancient Chinese stylistic theories.

Key words: stylistics; reclusion; category; freedom

最近二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文体学的研究方兴未艾,文体学成为了一门显学。从学科归属上来说,文体学是一门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原则和方法的独立学科,它探讨的文体特征、本质及其规律,虽然涉及众多学科,但却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体系,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论。可以说,文体学是一门横断众多领域的边缘学科,即它可以应用一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另一门科学的对象,使得不同的科学方法和对象有机地结合起来。文体学生长于若干学科的交界处,并不断渗透以扩展自己的领域。本文尝试以文体学的视野和方法,探讨中国文学中的隐逸主题,考察“隐逸”这一范畴如何从思想领域进入美学艺术领域,并最终呈现在文学和文化领域。

一、隐逸文学与儒道文化的渊源

隐逸思想大致经历了先秦至两汉的酝酿期,魏晋至盛唐的逐渐成熟期和中唐以后衰变期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诸侯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动乱的时代孕育出隐逸思想。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都继承并发挥《周易》中的隐逸思想,为后世士人的隐逸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这种不以世事累心、尚慕清虚的思想,更多地为道家所继承;而“潜龙勿用”、“亢龙有悔”、“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的思想则为儒家所继承。《楚辞》中屈子的“自疏”情绪,渔夫形象的创造,是隐逸文学的萌芽;《论语》中也记载了几个有关隐士的片段,像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蓑丈人等,生动地展现了隐

收稿日期:2013-09-20

基金项目: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逸”范畴的审美空间研究》(12BZW009)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赵玲玲(1970-),女,湖北郧县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与文化传播。

士的风采;尤其是《庄子》,除庄周自身的形象外,并有藐姑射之山、无何有之乡、大树意象等,《让王》篇还记载一系列隐士事迹,这些都是其隐逸哲学的文学表达,对后世隐逸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庄子》的出现,标志着隐逸文学的成形。

《周易》的隐逸思想集中反映在《遁》卦,《遁》卦卦辞:“遁,亨,小利贞。”《彖》曰:“遁,遁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小利贞,浸而长也。遁之时义大矣哉!”陆德明解释道:遁,“同隐退也。匿迹避时奉身退隐之谓也”。指出《遁》卦是讲隐逸之事的,而不得时是隐逸的原因。此外,其表现隐逸思想的还有《蛊》卦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后《象》辞又作了进一步发挥,谓:“不事王侯,志可则也。”褒扬隐士淡泊功名、谦和守正遁世无闷的品格;《周易》中的隐逸多与时势相关联,人生的仕进出处多强调“与时偕行”。君子隐遁之由在于其所处的不利环境,因为“小人方用,君子日消”,为避免祸害,君子应待时而动,适时地选择隐遁避世。

老子的隐逸思想可以概括为“盛世之隐”,具体表现有三点:其一,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理想的社会境界,即“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其二,功成、名遂、身退。春秋战国越国大夫范蠡为典型。据《史书·越世家》载,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后,“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于是勾践表会稽山以为范蠡奉邑。”至汉代,留侯张良在辅佐刘邦打天下以后,出人意料作出“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的选择。

与老子的“盛世之隐”不同,庄子隐逸思想可以说是“乱世之隐”。庄子处在战国后期,因诸侯兼并战争而带来的社会动乱进一步加剧,庄子的乱世之隐更关注个体的生存处境。《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述过庄子拒绝楚王千金重聘的故事,曰:“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其一:愤世嫉俗,放言抗志于浊世;其二,蔑视权贵,追求自适自快:庄子蔑视权贵,主动疏离政统。除上述引《史记》凸显的铮铮铁骨,类似的还有《秋水》篇;其三,全生远祸,不为世用:表现为“尊生”、“重生”;其四,体道自然,逍遥无待:庄子选择的人生境界:“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子。”而这种境界正是《逍遥游》的境界——“若夫乘天地之

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样的“志德之人”还有《大宗师》的“真人”、《应帝王》的“无名”、《刻意》的“圣人”、《逍遥游》中“藐姑射之山”的“神人”。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隐逸思想(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关键在于“道”:其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士志于道”,在仕与隐的抉择上,“道”必是其首先考虑的因素。此为孔子在仕隐上的抉择。而孟子的“无道则隐”的另一种表述是:“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其二,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孔子《泰伯》“不在其位,不谋其道”;孟子《尽心》上“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早期的隐逸,还只是偶然发生的个案。《庄子·让王篇》的让王故事,只发生在那些继承王位资格的别人身上;《史记》加载的吴太伯与弟弟仲雍的故事,或出于重生的目的,或为了让贤而逃避王位,隐迹僻壤。而介之推、屠羊说等人,是为了逃避赏禄而隐逸;伯夷、叔齐、长沮、桀溺、接舆等人,是为了规避随时都可能降临的祸患。先秦两汉时期的隐逸文学作品以朴素自然为特色,数量虽不多,却开创了此类文学的先河,并开启了后世诸如山水诗、游仙诗等文学体裁的端绪。诗歌总集《诗经》中招隐诗、赐归诗、拒招隐诗等也可见。其《考槃》、《衡门》、《鹤鸣》等诗,描绘了隐者旷达自适、贴近自然的生活,而“考槃”、“衡门”等词汇也在后世成为隐逸的代名词。

二、隐逸的多种文化形态

隐逸文化源远流长,传说中的巢父、许由应该是隐者的鼻祖。而隐逸思想被真正明确提出,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身份或符号,则源于孔子。在道家“隐退”观念和魏晋以来的佛教“避世”、“遁世”理念的影响下,隐逸行为从被动的、个体的行为选择,渐渐成为一种主动的、群体的美学风尚,青山、樵夫、河流、渔舟成为隐逸者最外在的意象符号。从文化形态角度看,隐逸主要有以下类型:

第一,孔子的道隐。孔子隐逸思想的核心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这是一种无道则隐、存身求仁、审时而动的主张,实质上就是“道隐”。无论身在何处,只有内心平和,才

不会拘泥于一时、一世、一人、一地,而可以求得超越尘俗的精神解脱。孔子认为,隐是修身,仕是治国平天下。而二者的共同指向是由外在功业和内在修身构成的人格。道隐是中国隐逸文化的开端。

第二,庄子的心隐。庄子说:“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逍遥游》)庄子认为,隐不是身隐、形隐,而是“大浸稽天”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不热的心隐、神隐。隐的目的是为了拉开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距离,获得一种超越性的自由体验。据《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记载,楚王听说庄子贤,便派使者去请他,送他千金和宰相的尊位,但他笑着说:“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庄子的“隐”不再强调地理或空间的环境,更注重的是隐者的心态和价值观念,朝着“心”的方向发展。

第三,东方朔的朝隐。朝隐就是隐于朝堂,其代表人物是西汉时期的东方朔。他一方面,“好古传书,爱经术”、“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也受到兵家的熏陶。汉代从本质上是以“能力”或者“功劳”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标准,士人的最高理想是要“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因此东方朔在兵略方面的准备也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时,他又“多所博观外家之语”。以上说明了他思想来源的复杂性。由于受到不同思想的影响,在东方朔的思想中,既有积极入仕的一面,又表现出消极出仕的一面。更重要的是,东方朔在现实境况的压迫下,将二者调和于一身,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朝隐”思想。

“朝隐”的提出固然解决了士人在仕与隐之间的调适难题,但同时也大大削减了传统隐逸精神所固有的“从道不从势”风范及与强权不合作的批判色彩,演变到后代,往往变成一种官场上的“大儒”习气,成为对真正隐逸精神的戕害和消解。“朝隐”实质上是一种权变之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仕”的另一种表现和存在形式。

第四,“竹林七贤”的林泉之隐。林泉之隐与朝隐相对,指的是不入仕途而隐于山林泉石之间的人。避世之隐中最著名的是“竹林七贤”。魏晋时期由于战乱频繁,加上道家思想的影响,很多文人选择了远离政治的生活方式。六朝隐士的数量是整个封建王朝时期最多的。

这个时期出现了对隐居生活由衷赞美和吟咏的“隐逸诗”。西晋张载和左思的《招隐诗》就用了

“招隐”二字。东晋诗人陶渊明有“千古隐逸诗人”之称。他虽没有以“招隐”为题的诗篇,但他的诗却达到了“隐逸诗”的巅峰。最著名的是《饮酒》:“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这种“隐逸诗”真正达到了超凡脱俗的地步。

魏晋士人创造出了丰富的精神价值,山水诗、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的出现就是明证,同时这也标志着中国文学进入了自觉的时代。林泉之隐是抗言不羁、孤傲独立的士人精神的光辉显现,是孔子之隐的继承者。在后来的历史岁月里,其批判精神难得一见。它把中国隐逸文化推向光辉灿烂、非常成熟的阶段。

第五,白居易的中隐。中隐是中国传统隐逸观念的重大转折,是大、小隐之间的调和,它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是道德统治与政治统治的矛盾纠葛在中唐社会政治文化作用下的独特产物。中隐是一种吏隐,它以散官、闲官、地方官为隐,在小隐大隐之间找到一条折衷之途,既可以免饥寒之患,又可以躲避朝堂纷争。白居易作为中隐的代表,其心态在《中隐》一诗中阐述得明白晓畅:“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第六,苏轼的酒隐。酒是中国文人消解悲剧意识的重要因素,酒隐的鼎盛正说明中国文人把酒的文化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同时也说明中国人把获取解脱的心理机制推进到了最为发达和精致的境界。

隐不在朝,亦不在野,而在精神,酒隐是其精髓者。苏轼的酒隐赋予了隐逸一种“醉生梦死”相反的价值。苏轼质疑、颠覆着传统的价值观念,对功名仕途不复看重,对案牍劳形的俗吏生涯更深表厌倦,却不能抽身而退。而酒把虚幻与现实的鸿沟弥合起来,搭起了一座让人自由出入于精神与现实中的桥梁。这座桥梁不是把人引向泥潭,而是把人超生到了理想的云端。酒隐之圣的苏轼因此而走向了传统士大夫文化人格的顶峰。

第七,明清的壶天之隐。壶天之隐是指隐居于园林中的隐士生活。自然山水的美景不仅仅是其寄情抒怀的地方,而且可以通过改造山水赋予其人文内涵。明清园林之盛,乃是历代无法比拟的,因而诗人可以借助园林之趣,模拟自然变化,自得其乐。中唐以来的“中隐”思想导致汉以来传统隐逸思想的转变。对于士人而言,“隐”已不再成为身体力行的实践行动,而是一种获得心理平衡的精神

享乐,园林便成为这种精神享乐的载体。“穷人行乐之方,无他秘巧,亦止有退一步法。我以为贫,更有贫于我者;我以为贱,更有贱于我者;我以妻子为累,尚有鳏寡孤独之民,求为妻子而不能者;我以胼胝为劳,尚有身系狱廷、荒芜田地,求安耕凿之生而不可得者。以此居心,则苦海尽成乐地。”(《贫贱行乐之法》)李渔的“穷人行乐之秘诀”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孤立的行乐之法,或曰“精神胜利法”,而是中国的隐逸文化——甚至是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到衰落时期必然产物。

隐逸文化发展到壶天之隐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它的整个发展历程是与中国历史的发展相吻合伴生的。当隐逸文化完全走向自己的反面时,产生这种文化的传统社会也就耗尽了其最后的能量,连同隐士一起沉入了自己建构的壶中天地,新世纪的曙光也就同时诞生了。

三、隐逸诗作为隐逸文化的文体典型

隐逸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形态,但是作为诗歌大国,隐逸诗是中国古代隐逸文化的典型和符号。先秦两汉是隐逸诗创作的自发行期,此期的隐逸诗概貌具有明显的不成熟特征;魏晋南北朝则是隐逸诗的多元化发展时期,其中隐逸诗的各种类型都已基本形成,有的还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隋唐是隐逸诗的全面繁荣期,但也经历了隐逸精神的低落及其转变,此期的隐逸诗主题更加多样,流派纷呈,且各种风格相互渗透,相互关联,和谐并存。然而,其中一以贯之的主题仍是对生命解脱方式的理想与实践追求,正如霍建波先生认为的“寻找精神家园,寻求人生归宿,正是隐逸诗蕴涵的一贯主题,也是历代隐逸诗人的不懈追求。”^[1]

中国最早的抒情隐逸诗人有殷末周初的伯夷、叔齐,周末的楚狂接舆,汉梁鸿等。伯夷、叔齐《采薇歌》云:“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楚狂接舆当孔子行将适楚,歌而讽喻其不能隐:“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不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殆而。”梁鸿《五噫之歌》:“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阙崔嵬兮!噫。民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

而把游仙题材与隐逸主题紧密联系起来、并以游仙形式创作较多隐逸诗作的,开始于阮籍与嵇康。霍建波认为:“以嵇康、阮籍为核心,何晏、郭遐周、阮侃为辅助,所出现的集中创作隐逸诗的正始时期,标志着隐逸诗创作进入自觉时期,也是游仙隐逸诗创作的正式形成期”。嵇康隐逸诗既有

对传统隐逸的追慕,也有对游仙长生的希冀,还表现为“把隐逸体玄融入游仙之中,使他的游仙诗与曹氏父子不同,不在于长生之想,而在于免祸全身,不在于享乐自由的追求,而在于获得一种泯灭是非善恶与造化同体、与自然合一的恬静状态。”^[2]

道教神仙思想在唐代尤其是盛唐得到了非常充分的发展,并影响了众多文人的文艺创作,出现了许多游仙隐逸诗,其中成就较为突出的有常建、李颀、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许浑等人。常建的游仙隐逸诗主要表现为禅境与仙境的融合,以佛禅空静、幽寂的境界,表现游仙的快乐,曲折传达诗人对隐逸情怀的满足。这一表现,是继阮籍、嵇康乃至郭璞之后游仙隐逸诗的新发展。

唐代的水田园诗歌非常有名。而在中国诗歌史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是谢灵运,继他之后对山水诗做出重大贡献的是谢朓。大小谢多在其山水诗中表达归隐之情,因此将部分山水诗称为山水隐逸诗。南北朝时期,山水隐逸诗在沈约、江淹笔下有了新的发展,除纯粹地描绘山水景物以表达隐逸之情之外,也通过描摹园庭风光来展现隐逸情趣,有时甚至还杂有列仙之趣来表达隐逸之志,从而兼有其他类型隐逸诗的特点。沈约诗如《宿东园诗》、《行园诗》、《休沐寄怀诗》等,诗中描绘的景物显然不单纯是自然的山水、林木,而杂有经过人工改造的园庭的景候风物;在对园庭风物的夸耀中,流露着的依然是耽溺于四时美景佳物的隐逸乐趣。这是沈约山水隐逸诗不同于大谢、小谢的地方之一,标志着山水隐逸诗发生了变异,开始向田园隐逸诗靠拢,是盛唐时代山水田园隐逸诗形成的端倪。

陶渊明为“浔阳三隐”之一(梁人沈约《宋书·周续之传》、萧统《陶渊明传》),其“质性自然”(《归去来兮辞》),回归田园是一切的解放,更是对“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的终极追求”^[3]。梁代钟嵘《诗品》卷中“宋征士陶潜诗”条尊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4]。陶渊明隐逸诗的题材中,都与乡村、田园生活息息相关,可以说,田园是他安心立命的寄托,是他人生理想的最终归宿,也是他诗歌最为着力的地方。陶渊明对后世隐逸诗人的影响是深远的。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归去来兮”一语,已成为士大夫文人表达对官场生活的厌倦、对田园生活向往的号角,不仅具有号召力,而且时常警醒、催化后世文人。高适《封丘县》有“始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之句,李白《古风其三十九》有“且复归去来,剑歌《行路难》”之语。

晋末宋初,佛教对隐逸文化开始全面渗透,二者亦开始了合流的进程。此种现象源于其二者的

相似性。佛家思想从精神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出世思想,讲究出离俗世之菩提道心,这与隐逸文化是相通的。其次,佛教教徒的修行,远离尘嚣,栖居于深山老林,过着远离世俗、清静而单纯的生活。古代典籍记载的隐士也大多居住在清幽的山林之中,与世人断绝交往或交往很少。因而,不少隐士与佛家关系密切,深受佛家思想的影响,更有甚者是隐于佛理的隐士,即是亦佛亦隐、佛隐难分。而实际上,古人也是一直把出家向佛的僧人当成隐士来看待的。

佛理隐逸诗在隋唐五代时蔚为大观,呈现出十分繁荣的局面。唐代很多著名的诗人,其诗歌都有明显的佛教印记,如孟浩然、王维、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韦应物、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李贺、贾岛、刘长卿等人;即使唐代辟佛最激烈的旗帜性人物韩愈,在思想上、诗歌创作上也自觉不自觉地深受禅理影响,“韩愈之受禅宗思想影响恐怕是很难完全否认的,这还反映在他晚年的诗词之中。在历尽了人间坎坷沧桑之后,韩愈的诗中也有一种阅世的禅意”^[5]。柳宗元虽是唐代山水诗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从早年就崇信佛教,被贬之后,把佛禅作为化解人生不幸的灵药,甚至生命的归宿,可谓隐于佛禅之中。如其《江雪》。诗中的“蓑笠翁”是一位远离人世红尘的隐者,他的隐居具有浓厚的禅意。柳宗元的佛理隐逸诗还有许多,如《渔翁》、《构法华寺西亭》、《禅堂》。

此外,佛教对唐诗歌产生的更为直接的影响,无疑是唐代的诗僧,这些诗僧也创作了为数甚多的诗歌。诗僧中较为重要的代表是王梵志、皎然、寒山、拾得等人。寒山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位著名的隐逸诗人。他深自隐藏,安贫乐贱,一无所求,只坚守一颗坚固之心:“自怜心的实,坚固等金刚。”(《寒山诗注》二八九)寒山的佛理隐逸诗,兼有对山水风光的描绘,表现为佛理隐逸诗与山水隐逸诗的融合,同时颇具禅家空静、高远的意境。佛禅境界是寒山的终极追求,亦是其安身立命的最后归宿,如“任运遁林泉,栖迟观自在”(《寒山诗注》一六四)、“任你天地移,我畅岩中坐”(《寒山诗注》一七一)。项楚先生说:“在寒山的世界里,只有寒岩与白云,细草和青天,还有一个任运栖迟的诗人。任随天地变改,他枕石而眠,快活自在,在与自然的融合中,诗人似乎已经化为了寒岩的灵魂,而进入了永恒的境界。”^[6]

贾岛是介于诗人与僧人之间的第三种人。贾岛早岁为僧,后韩愈怜其才,于是教他为文,并让他还俗应举。尽管还俗后的贾岛一直忙着科举应试,希望出仕做官,但是佛教出世的思想时刻缠绕着

他,禅堂的清静生涯也影响着他的诗歌创作。闻一多先生精辟地指出:“我们该记得贾岛曾经一度是僧无本。我们若承认一个人前半辈子的蒲团生涯,不能因一旦返俗,便与他后半辈子完全无关,则现在的贾岛,形貌上虽然是个儒生,骨子里恐怕还有个释子在。”^[7]其隐逸诗中,多有对清幽、静寂等景物的描绘,意境悠远、清苦,具有浓厚的禅境。如其著名的《题李凝幽居》诗与《寻隐者不遇》诗。无论僧人访隐者还是寻隐者,贾岛始终保持着禅僧的“衲气”,崇尚禅门超尘恬淡的清修意境,隐逸情调与禅境有机融合,僧隐不分。

晚唐时期,许浑的佛理隐逸诗以佛禅作为隐逸情趣的一个重要内容,表现了对禅家空静、清幽之境的留恋。韦应物是由中唐到晚唐的过渡性人物。其早期继承了盛唐诗人关注现实、追求理想的传统,诗歌气势壮大,带有刚健明朗的盛唐余韵。但由于后来的仕途不得志,壮志难酬,以看破世情的无奈和散淡代替慷慨为国的昂扬之气,像谢朓、王维一样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因此其此期的隐逸诗称为吏隐诗。韦应物有诗云:“腰悬竹使符,心与庐山缙”(《郡内闲居》)、“公门且无事,微雨园林清”(《县斋》),这两首反映了韦应物吏隐的特点:公门无事,幽静清闲,因而官署也像山林、田园一样可供诗人隐居。为稍后白居易表现亦官亦隐的吏隐诗树立了榜样。

因此,无论是游仙诗、佛理诗、山水田园诗还是招隐与反招隐诗歌等,都是中国古代隐逸文化在文学文体层面的典型呈现,体现了鲜明而丰富的隐逸美学思潮。

参考文献:

- [1] 霍建波. 宋前隐逸诗研究(序一)[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2] 鲁红平. 现实忧患与生命超脱的矛盾纠葛——嵇康游仙诗简论[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113-117.
- [3] 鄢化志. “归去来兮”辨[J]. 文艺研究,2001(3):155-158.
- [4] 何文焕. 历代诗话(上)[M]. 北京:中华书局,1981:13.
- [5] 姚南强. 禅与唐宋作家[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91.
- [6] 项楚. 寒山诗注·前言[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7] 闻一多. 唐诗杂论·贾岛[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33.

[责任编辑:吴晓红]

“文学空间”转向:现代汉诗文体研究的理论契机

黄雪敏

(华南师范大学 城市文化学院, 广东 佛山 528225)

摘要:文学空间是艺术家在审美构思中形成的艺术世界,也是作家和读者进行诗与思对话的平台。在“文学空间”基础之上形成的共时性文学批评理论,即“空间诗学”,既是一种新的文艺学批评理论,又是对于历时性文学批评的补充和完善,更是在更为深广的维度和层面,构建当代诗学的理论体系。由此,以空间为途径进行诗学文体理论的对话,是解决古今诗学的共通性和融合性问题的通途。

关键词:文学空间;现代汉诗;文体学;共时性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1-0045-04

The turn of “literary space”: theoretical chance of the study on modern Chinese poetry

HUANG Xue - min

(School of City Cul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Foshan, Guangdong 528225, China)

Abstract: Literary space is a kind of artistic world constructed by the artists in their aesthetical conceptions as well as a platform where the writer and the reader make dialogues about their literature and thoughts. Synchronic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based on literary space, namely “the poetics of space”, is not only a new kind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but also a supplement and perfection of diachronic literary criticism and especially a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ontemporary poetics at a deeper and broader level. Thus, to conduct a dialogue on poetic stylistics by means of space is a thoroughfar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commonality and fusion between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poetics.

Key words: literary space; modern Chinese poetry; stylistics; synchronicity

空间是有形与无形事物存在的根本载体,“文学空间”同样包含着文学生产、文学传播和文学消费的全过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空间问题已经逐渐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的一大热点,西方学术界也发生了所谓的“空间转向”,“空间理论”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认知范式之一。在“空间转向”的学术背景之下,从空间的维度出发对文学活动进行重新诠释,无疑是当下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途径。尽管时间和空间都是构成文学作品的基本要素,但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人们都只对时间倾注了过多的

热情,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空间。将“空间批评”作为解读诗歌的理论角度,一方面意味着承认现代汉诗对于古典诗歌的全方位突破,如文字的、题材的、价值的、情感的、形式的、风格的等方面的空间创新;另一方面也将从文体自身或比较文学的角度,探析个体与公共、乡土与都市、精英与民间、心理与现实等诗歌空间的内在关联,进行全新的以空间为坐标的诗歌文体理论体系探索。

收稿日期:2013-09-18

基金项目:2013年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当代诗学空间批评理论研究”(13Q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雪敏(1978-),女,广东潮州人,副教授,文艺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文艺学与现当代文学。

一、诗学空间反思与探索

20世纪文学的研究,一直以来学者们习惯于采用时间线性研究或派别、思潮的历时性研究途径,这两种研究途径虽然描述起来简便易懂,但也容易遮蔽汉诗的整体风貌。进入20世纪后期,文艺研究在经历“语言论”、“认识论”、“人类学”等转向后,呈现出“空间转向”的新面貌,学者们纷纷将以前给予时间、历史、社会的青睐转向空间上来。空间研究在当代知识和政治发展中日益呈显学之势。在多元交织、互相渗透的后现代动态语境中以空间理论深入文学学术研究无疑是一个重要新维度。因此,“文学不再是观照世界的一面镜子,任何一种个别的叙述,都难分难解地涉及到其他的叙述空间。文学空间不再是对某种固定空间之中时间演绎(事件或情感)的模仿、再现或表现,文学文本必然投身于空间之中,文学空间固然来自于现实空间,但同时,更重要的是文学本身就成为社会现实空间建构的重要组成。”^[1]

目前,从“文学空间”视野出发去研究文学的做法,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就目前能见到的资料来说,国外最早可以追溯到俄国的文艺理论家巴赫金,他成稿于1937年的著作《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首次把哲学层面的时空体用于文学意义上的转义。法国的雷蒙德·威廉斯1973年发表的《乡村与城市》一书考察了有关“城市”和“乡村”空间关系不断变化着的“情感结构”,从16世纪的田园诗一直延伸到当今的全球文学。其后,克里斯丁·罗斯1988年的《社会空间的兴起:兰波和巴黎公社》,考察了兰波的诗歌道路,以及其他很多文化生产;另外,迈克·克朗在1988年出版的《文化地理学》中以“文学景观”为题,辟专章讨论了文学中空间的含义,认为文学,诸如小说、诗歌、戏剧、传奇等,都体现了以不同方式进行的对空间进行阐释的努力,文学景观是“文学和景观的两相结合。”

在国内,对于空间理论的研究相对来说尚处在起步阶段,主要是一些学者对外国理论家的相关论述的译介。著作方面,主要有包亚明主编的《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和《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王文斌译的《后现代地理学》等著作,主要是从社会学角度对空间理论进行翻译和介绍。而运用空间理论对文学进行研究的工作目前我国还比较少,主要有阎嘉主编的《文学理论精粹读本》,其中

专门介绍了“空间批评”;朱立元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2005年的增补版也增加了由陆扬所写的《空间理论》一章。可以说,空间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正在逐渐被我国学术界接受,对社会学理论、城市研究、文化研究以及文学研究等都产生了影响。进入新世纪,传媒诗学与文化传播模式嬗变问题日益引起国内学者的兴趣和关注,国内知名学者如王岳川、欧阳友权、金元浦、黄鸣奋等人侧重对传媒与消费社会、公共空间、文化及权力话语、全球一体化的文化意识编码、媒体的狂欢等做了多维度、多层面的探讨,但专门针对现当代汉语诗歌采用“空间视域”进行研究的著作不多,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张桃洲《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部分采用了现代汉诗的“空间性”理论进行研究,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意义的创新之作。

从目前“中国期刊网”能检索到的论文来看,当前已有的涉及汉诗及其文体的空间化研究的一般性论文约190篇和15篇硕博毕业论文,如杨有庆《空间诗学——对后现代文学活动的空间化研究》、卢桢《现代中国诗歌的城市抒写》等。专题论文还有:周云鹏《新诗诗性空间的开拓(1917-1937年)》、敬文东《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的“空间主题”》、沈天鸿《时间、空间与诗》等,还包括《江西社会科学》的学术专栏“文学地理学:文学研究向空间维度延展”等。这些作品或理论研究,一方面承认了“文学空间”的合理性,对研究对象进行历时性的空间研究或者是对某一类型的文学体裁进行空间研究,但另一方面,缺乏将现代汉诗看作一个整体系统进行共时性空间思考和阐释,也没有对其多维审美空间的研究和观照。因此,本课题基于后现代文学活动的空间化,力图从“文学空间”的维度,即从与时间的历史性向度相对的一种共时性的视角出发,对一直以来以时间、流派为尺度建立起来的那种文学观念进行“空间还原”。具体地说,就是把研究的重心从以往的历时研究转移到现在的共时研究上来,以一种横向超越的方式对后现代语境中的现代汉诗的基本问题进行思考。

二、文学空间的多元化构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一直存在着“理论缺失焦灼症”,而“空间批评”作为当代学术的一种新颖的理论尺度和方法论,有必要引入文学研究尤其是诗学研究。空间理论以空间区域(有形和无形)

为模块，补充或者改变传统上以时间、派别、思潮为轴心的诗歌史研究，提供一种新颖的理论视野和批评方法，更全面、更细致地理解现代汉诗，因为“空间批评”理论蕴含着哲学思维范式的嬗变与诗歌美学理论概念的焦点转移，为中国诗学特别是二十世纪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照可能和问题框架。

构建文学空间的理论，探索“空间诗学”，所要进行的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确立“文学空间”理论及其“空间视域”的内涵和外延。

“空间理论”的内涵在于，“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地理景观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揭示了一个包含地理意义、地理经历和地理知识的广泛领域。将文学评价成主观的恰恰遗漏了这个关键问题。文学是社会的产物，事实上，反过来看，它又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发展过程。”^[2]而进入文学场域后，“空间理论”进入文学研究而形成的“文学空间”理论即“空间诗学”，就从外在表现上被学者界定为三个彼此联系并逐层递进的“文学空间”层次，即以“文学地理学”为中心的“现实关系层次”，以“文学场”为中心的“文本空间层次”和以“文本互文性”为中心的“审美文化层次”。

其次是具体分析“空间诗学”所采用的具体批评手法，从更实际的意义说，就是普遍的“空间诗学”如何应用于特殊的现代汉诗研究，如“文学空间”三要素（背景、场景、场面）、三类型（意象型、幻象型、意境型）原理在诗歌创作论和鉴赏论中的审美和批评价值，以及“空间视域”在诗歌文体批评方面的独特性应用优势。

再次，以现代汉诗为基础，追溯古典诗学的艺术空间理论，打通古代诗学话语和现代诗学理论之间的藩篱。古代诗学的空间意识，不仅在“言——象——意”三者之间展开，也在从“意象——意境——境界”三者之间展开，构建了我国诗歌审美空间的经纬。古典诗歌的“养气说”、“胸中有丘壑”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说，以及郑板桥的“眼前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理论，都不同程度地从创作主体、创作技巧、作品构成或艺术鉴赏等角度，涉及了文学艺术的审美空间的创造方式。这也是我们审视20世纪诗学与古代诗歌之间脉络发展问题的一个主要途径。

最后，在空间批评理论的指导下，通过细致的文本阅读、比较与举证，分别探析现代汉诗在语言、

题材、情感、意象、意境、哲理等六个层面对于古典诗歌以及西方现代诗歌的继承、突破和创新。20世纪现代汉诗这种文体在这六个方面开拓了新的诗歌书写空间。

三、诗学空间的艺术探索

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伴随着“白话文运动”而蓬勃兴盛的现代白话诗歌，始终伴随着政治和革命的车轮，从一开始，就烙印上了民族、民主和民生的痕迹，在神州大地上进行了无数次的思考、探索和斗争。因而，从内容层面看，诗学空间探索如果以20世纪诗歌，即现代汉诗为研究对象，那么就具体解决一下这些诗学及相关文体问题。

第一，现代汉诗的地域空间论。这是空间诗学最直接的、最本源的问题所在。因而，所要讨论的对象，一是包括乡土诗歌与都市文学中的空间话语异同，如黄礼孩等主编的《出生地：广东本土青年诗人作品》和《异乡人：外省青年诗人作品》诗集影响深远而广泛。二是“西部文学”（于坚等人提出）及“西部诗歌”对于文学空间的拓展，其中纠缠着诸多地域主义、民族主义等复杂情怀。三是“诗分南北”观念从古代到当代的发展脉络。从颜之推《颜氏家训》中的“诗分南北”一说提出后，这种观念一直在古代文学中颇有流传，南方婉约而北方刚健的诗风的认识得到了认可，在“京派”、“海派”文学的对比与研究中也有一定呈现。四是在20世纪末期，“打工诗歌”在当代诗坛中的独树一帜，开辟了“当代诗史”（杨克语）。五是港台诗歌的审美空间拓展，尤其是台湾诗歌中的乡土情怀的抒发。六是“文学空间”理论视域观照下的古典诗歌研究取得了新突破，并以新面貌呈现在现代学术版图的“坐标”中（如“唐诗地理”、“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的研究等）。这种“诗歌地理学”的理论范式也反映在现代汉诗的“版图”研究中。

第二，现代汉诗的个体与公众空间论。个体空间是作家和读者个人的、私隐的空间，是艺术的、生活的、情感的自我空间。而公众空间是群体的、国家的、政治的空间，是泛化的、开放的、革命的广场空间。因为20世纪中国的独特历史阶段，因而个体空间与公众空间存在着契合、疏离、矛盾和对抗。因而，涉及的具体问题包括：一是分析现代汉诗对于“个体空间”（私人的、隐秘的、艺术的空间）的尊重，强调和突出个体情感在诗歌抒情中的“在场”，以及20世纪诗歌中个体抒情对于传统诗美的继承

和发扬;二是分析现代汉诗对于“公众空间”(大众的、革命的、政治的空间)的参与,通过文本细读来展示现代汉诗在20世纪中国革命进程各个阶段的历史性使命(“启蒙”、“救亡”、“革命”、“自由”等);三是分析现代汉诗在个体和公众空间中的游走、对抗、妥协等,反思现代汉语诗歌的“公众空间”对于“个体空间”的侵蚀、干涉和占领,以及现代汉诗的先天不足和艺术缺失。

第三,现代汉诗的传播空间论。传播空间是诗歌或文学赖以存在、发展的物质通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诗歌的生命力。因而,必须着力于探讨民刊、选本、诗集、论坛等传播空间的内在逻辑以及建构作用。这个方面,大约需要深入挖掘的问题有六个方向:一是文学期刊和杂志、报纸等传统媒体中的汉诗传播(如《星星诗刊》、《羊城晚报》“花地”副刊等);二是个人诗集和诗群诗集的传播(如艾青《归来者的歌》、黄礼孩《一个人的好天气》及《东莞青年诗人30家》等);三是诗歌民刊的传播(如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及《大象诗志》《九月诗刊》等刊物);四是诗歌选本传播(如杨克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王光明主编的《年度最佳诗选》等);五是诗歌论坛的传播(如“诗江湖”、“诗生活”网站等);六是理论专刊中的汉诗传播(如黄礼孩《诗歌与人》的“完整性写作”专刊等)。这六种传播途径共同构建了现代汉诗的物质化存在和传播空间。

第四,现代汉诗在接受空间论。按照陈文忠先生的意见,人们对经典文本的接受可区分为相互联系的三个维度:作为普通读者的纯审美的阅读欣赏(效果史)、作为评论者的理性的阐释批评(阐释史)、作为创作者的摹仿借用(影响史)^[3]。现代汉诗在接受空间就由欣赏审美空间、阐释批评空间和影响创新空间组成。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探讨现代

汉诗在港澳台地区和海外空间的接受问题。因为现代汉诗在中欧、中印、中美等文化交流中的具有“空间互涉”的能力,即由于现代汉诗在域外文学空间中的传播和接受而引发的多种诗学问题。

由此可见,在“文学空间”理论视域中,采用不同于时间、派别的空间视野(也会比照思潮和流派),审视现代汉诗在体式、题材、风格、传播、接受等空间领域所进行的突破,我们会发现它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对于中国现代文明的进程所起到的极其重大的作用,并作出了(几乎超越自身的)美学的、思想的、政治的巨大贡献。

综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已经获得了较大成就,但是历时性的阐述模式过于机械,缺乏空间性、逻辑性,也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与缺陷。因为文学的创作并非完全按照因果律进行,而是充满着“天才式”、灵感型和偶然性的创作。文学的研究,必须在传统的历时性思潮、流派等研究基础上,引入新的“空间批评”理论。近百年来,我国文学的形式、题材、形象及其所处的文化、社会、时代环境等等都出现了的空间上的巨大迁移和变化,因而以“空间批评”理论重构二十世纪文艺学的理论体系是值得尝试的学术探险。

参考文献:

- [1] 刘进. “空间转向”与文学研究的新观念[M].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35(3): 42-45.
- [2] 迈克·克朗. 文化地理学[M]. 杨淑华, 宋慧敏,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72.
- [3] 陈文忠. 20年文学接受史研究回顾与思考[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 31(5): 534-543.

[责任编辑:吴晓红]

文体的传承与流变

——以晚明小品和中国现代散文为例

陈 鹭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048)

摘 要:小品文在散文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梳理从晚明到现代这一段时期小品文走过的路程,探讨小品文文体传承与流变的内因与外因,总结其盛衰的历史经验,重新确认小品文小、真、趣等方面的审美特质及其创作规律,对于振兴推动当代散文创作的发展,既有其理论的价值,也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小品文;文体;美学特质

中图分类号: I20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1-0049-05

The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of style

——taking the example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s and modern Chinese proses

CHEN L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The prose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prose. This paper, by retrieving the journey of proses from late Ming Dynasty to the modern times, explore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f the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of the prose, sums up the vicissitudes of its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reconfirms such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creational rules as being small, true and fascinating. This is both of theoretical value and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prose creation.

Key words: essays; styl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晚明小品文与中国现代小品文都是在各自时代里取得了辉煌成就的文学样式。晚明小品一反先秦、唐宋散文的“以文载道”的“高文大册”,不拘格套,流连于自我、性灵和趣味,不仅颇受时人欢迎,而且对后世的散文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现代小品承接了晚明小品的文脉又有所发展,因此近百年来的散文小品创作虽出现过断裂,甚至散文文体还一度遭受到了生存危机,但整体上散文小品创作的成绩是不容低估的。特别是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1]及至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散文小品更是一路走红,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文体。究其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散文小品这一文体在

继承传统时又有发展,有所创新流变。但过去的散文研究对继承研究得较多,而对创新和流变则较少涉及。有鉴于此,本文拟在传承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中国现代小品文文体的流变及对晚明小品的跨越。

现代小品文的成功,的确是古代小品文的“顺势”传承分不开的。小品文兴起于文学觉醒的六朝,其代表作品是《世说新语》。以后经过唐宋的发展,特别是在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创作中,小品的洒脱心态与灵动笔调所形成的影响几可以与“大品”抗衡。及至明代万历以后,则先有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继有竟陵派力主“幽

收稿日期:2013-09-20

基金项目: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散文文体观念与文体演变研究”(11BZW09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鹭(1985-),女,广东揭阳人,首都师范大学2011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深孤峭”。创作上则是徐渭、李贽、屠隆、汤显祖、陈继儒、袁宏道、袁中道、张岱、钟惺、祁彪佳、谭元春、王思任、徐霞客等名家辈出。这样,小品终于冲破了千年来正统文章的重重束缚,正式登上了文坛,不仅形成了广泛的影响,而且具备了自己的神髓和美学风致。

现代小品文作家十分推崇古代小品尤其是晚明的公安竟陵派小品,他们纷纷撰文阐述小品文与晚明小品的历史渊源。这其中尤以周作人谈得最早,谈得最多,论述也最为全面透彻。在《给俞平伯的信》中,他就明确指出:“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2]。由“言志的散文”出发,周作人还提出了“美文”、“风致”、“气味”等现代小品的美学要求。在二三十年代的晚明小品热中,林语堂也是积极的鼓动者和实践者。据他自己介绍,他是通过沈启元编选的《近代散文抄》才得以结识晚明小品的。林语堂不仅喜爱晚明散文,还通过办《论语》、《人世间》等刊物,提口号,亮旗帜,大力倡扬“性灵”的散文和“闲适笔调”,在当时的确产生了很大影响。除了周作人、林语堂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受晚明小品影响的作家还有梁遇春、俞平伯、钟敬文、许地山、郁达夫、施蛰存、废名、丰子恺、阿英、味橄、沈启元等等。他们或发表理论文章,或编撰各种晚明选本,或身体力行进行创作,以此来筑构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现代小品文。正是在这批有心人的不懈努力下,中国现代小品才取得了如此高的成就,甚至在三十年代掀起了一股“晚明小品热”。

比较两个不同时代小品文体,可看出它们有许多共同的特征:

一是“小”。晚明和现代的小品文,都具有陈继儒所说的“短而隽异”的特点。“小”首先体现在题材上,即小品文的取材一般都是“从小处着眼”。所谓“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纳入尺幅;一种心境,一点佳意,一把悲情皆可繁衍成篇,这与“高庙大章”的所谓“小品”确是大有区别的。其次是外形即体制的“小”。晚明的袁宏道、张岱的作品自不用说,现代的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写的文章亦然。他们的文章多则一二千字,少则几百字,极少有一篇文章超过三千字的。但小品文的可贵和独特处正在于它的“微中见著”,即“短而隽”。所谓“隽”,即短小中有味,而且有品。比如周作人的小品文,写的都是身边的一些小题材,如北京的饮食、喝茶、故乡的野菜、乌蓬船等等,看似琐碎平淡,但琐碎平淡中有叙事、说理和抒情,有自由自在的表达、有陶然自适的性情在其中。俞平伯、郁达夫的游记小品清新秀美、真切灵动,颇具晚明小品的情

趣神韵。这是小品文独特的一种思维品质,也是小品文区别于“小品”的显著特征。

二是“真”。晚明小品尚真,这主要表现在作家敢于在作品中说真话,表真心,抒真情。他们彻底放下“高文大册”那种道貌岸然的架势,充分肯定人的个性、自我和感性的生命追求,甚至将狂放耿直的性格、风流放诞的欲望赤裸裸地展现在作品中。袁宏道认为:“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同君面”。散文小品只有抒发了自己的真性情,才不会“万口一响”,“共有一诗”。现代小品文承接了晚明小品崇“真”的传统。周作人不止一次表示,小品文需要“真实的个性”与“真的心搏”。郁达夫认为,小品文字的可爱,就在于它的细、清、真。真是小品的内质与灵魂。真就是不虚伪、不做作、无道学气、无空洞语,率直表达对社会人生的看法。由于晚明和现代小品文作家将“真”作为创作的第一要务,而且力求“句句真切,句句可诵”。这样,他们的创作,自然也就“俯仰之际,皆好文章,信心而出,皆东篱语也。”^[3]

其三是“趣”。“趣”由“真”来,“真”由我生。“趣”,可以说是晚明小品和现代小品作家追求的另一个艺术目标和散文的境界。诚如陆云龙所说:“率真则性灵现,性灵现则趣生。”所谓“趣”,即尚自然本色、追求天然;“趣”也是幽默谐谑、嬉笑怒骂。现代小品文作家同样心宜“趣”这一优良传统。首先是周作人极为重视“趣味”这一美学范畴。早在1928年,在《〈燕知草〉跋》中,他就正式提出“趣味”这一小品观念,认为“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现代小品文创作中的另一位主将林语堂,则不仅力倡性灵闲适中的幽默趣味,而且创作了《论西装》、《忍耐》、《我的戒烟》、《会心的微笑》、《脸与法制》、《蚤虱辩》等大量既有丰富广泛的知识,独到的人生见解;又性灵不绝如缕,文笔欢畅流动,嬉笑怒骂皆成趣味的文章。其他如梁实秋、钱钟书、王了一等,其作品也大抵是“以雅化俗”,貌似平常,实则充满了人生的趣味。

除了“小”、“真”、“趣”之外,晚明与现代小品文还讲究文笔的“活”,即灵活生动,如行云流水,舒卷自然。讲究“畅”,即明白晓畅,话语家常,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特别是为了反叛正统的古文,晚明与现代小品文作家为文时大抵都能做到自由自在地表达,不为格套所拘,不为章法所役。这种“自由性”的追求,最合散文的本性,也最能体现出小品文的优势。正因晚明和现代小品有上述的艺术特征,因而它们不仅是纯正的散文,有美的情趣和韵味,而且拥有自由自在的本性。所以在特定的时代里,它们所取得的成就便超过了别的文体,受

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

中国现代小品文以晚明小品为圭臬,是两个不同时代小品文内在精神的暗合。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是处于“王纲解纽”的时代。较为宽松的时代环境,以及对自由和感性生命的追求,为小品文的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还应看到,较为一致的生活态度和审美情趣,以及对自由自在的性灵文学的追求,这些都是“顺势”传承得以成功的前提和基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时期出现了张中行、季羨林、金克木、汪曾祺、林斤澜、黄永玉、黄裳等散文作家,小品文才又恢复了活力。他们以自由的心态,淡泊的性情,静虚的心境,写下了一大批静心闲谈,冲淡蕴藉的小品文,从而对接上了晚明和“五四”至三十年代小品文的优良传统。可见,对于小品文来说,“小”、“真”、“趣”、“活”、“畅”,特别是自由自在的表达,独立不依的精神,是小品文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是小品文得以繁荣的内在线索和外在线索。

二

从文体的生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小品文是在纵向继承和横向借鉴中发展起来的,即所谓“内应”和“外援”。但过去的散文研究者一般只看到晚明和现代小品的相同之处,却很少研究它们之间的不同点,至于现代小品文在传承晚明小品过程中的文体流变,以及现代小品文对晚明小品的创新和超越,过去也极少涉及。因此,接下来拟对两个时代小品文的不同点作进一步的探讨。

晚明与现代小品文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表现人文精神方面有所不同。晚明和现代小品与古代散文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它们表现出了鲜明的人文主义特征。但细加品察,两个时代小品所表现出来的人文主义精神内涵又有所不同。晚明小品人文精神的来源,基本上都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其间既有儒家文化中某些包含着人本要求的养料,更多的是道家、禅宗文化中具有个性解放倾向的思想,此外还有明中叶以降市民文化对作家的影响。这种人文精神的价值取向,主要是对个人生活方式的重视和个人性审美方式的强调,尚未能将个人对人性自由的渴求与人对社会的权利和政治自由的思考相结合,在审美上也未能完全摆脱中国古典文学的价值取向。这一点在袁宏道、张岱等描写自然山水的作品中表现得尤其突出。而中国现代的小品文,是在“五四”新文学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一方面深受近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一方面又从英国随笔那里获得新滋养和

“新气息”。英国随笔对中国现代小品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在深层结构即思想和精神层面上,英国随笔吸引中国散文家,引起他们强烈兴趣的,是它那浓厚的个人色彩,比其他散文形式可以更自由,更直接地表现自我。郁达夫在总结现代散文第一个十年的创作成就时才这样说:“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4]可见,英国随笔对于现代小品文作家突破传统散文正统观念的藩篱,充分表现自我个性的解放需求,以及培养健全的主体人格,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具有现代意义和独特品格的新体散文,无疑有着直接和积极的借鉴价值。

正因从“外援”获得与正统古文异质的元素,这样中国现代小品文在表现人文精神,在处理个体与时代,与社会人生的关系等方面,也就有别于晚明散文。其中最明显的一点,便是批判性。晚明小品虽也有反叛传统,不满社会现实的一面,但他们更多的是寄情山水,以酒当歌,幻想自由,而极少反映出个体在现实社会中争取自由的抗争和努力。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现代小品文则不同。它们高扬批判的大旗,发出种种不吉利的“枭鸣”,批判专制社会的黑暗与国民的愚昧。总之,“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1]172}正是现代散文尤其是三十年代小品文的一大思想特色。在这方面,鲁迅的杂文自不必说,即便“语丝派”的杂文,他们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不论在“社会批评”还是在“文明批评”方面,都体现出鲜明的批判性、揭露性和讽刺性。其他如梁实秋、林语堂以及钱钟书、王了一的小品文也莫不如是。

其次,是理性精神。晚明小品主要以“情”胜,以“品”显,而现代小品文除了重视“情”外,还注重议论和逻辑推理,这样现代小品文便具有理性思辨的色彩。如梁遇春的《谈“流浪汉”》,从辨析词义开始,旁征侧引,借题发挥,由“流浪汉”写到马夫、作家、画家、思想家、历史人物,甚至连《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也作为论证“流浪汉精神”的材料。作品从表层进入深层,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思辨,文章的结构自由开放,虽有拉杂、重复、结构分散的不足,但没有任何古代文章学的八股气,可说是典型的“兰姆式”的随笔。现代小品文固然继承了晚明小品文体简约,用笔随意洒脱与推崇“性灵”等优点,但现代小品文由于吸收了西方近代人文的资源,加之英国随笔的滋养,因此其内容更多地体现出新的时代精神和现代启蒙意识,同时在思维上也更侧向理性的议论和叙事。这不仅表现在梁遇春、钱钟书等随笔小品中,在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王了一

等的作品中也经常可以见到。

现代小品文与晚明小品在文体的表达和结构上也有所继承和流变。晚明小品一般以文笔的简约和结构的精致取胜。它的优点是“短而隽异”，缺点是过于精雕细刻，有时反而限制了结构的开放和表达的随意。另外，过于小巧凝炼的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内容的丰富开阔。再者，晚明小品尽管也提倡“信腕信口”，“宁今宁俗”，但由于受文言文语体的束缚，所以无法像现代小品文那样真正达到自然平易，通俗畅达。当然，更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受到英国随笔的文体笔调和浓厚的幽默谐趣的影响，现代小品文在二三十年代形成了一股“谈话风”的创作潮流。作家们以闲适从容的心态，家常絮语般的口吻，轻松活泼的笔调谈生活，论古今，谈人生，论梦想和社会问题。这样随随便便，随心闲话，如披浴衣，啜香茗；如在“江村小屋”里同友人围炉谈笑的散文境界，的确渗透着英国随笔的格调，也是我们在晚明小品中极少见到的。

三

文学比较可以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两个不同时代散文的共同特征和不同点，以及文体的传承与流变。但比较不是我们的目的，笔者的目的是通过晚明与现代两个不同时代的小品文的比较，借助古代散文的优长，去除其消极的因素，力求突破传统散文的某些限制，为新世纪中国小品文的发展注入一些新质。

若论及晚明小品的消极因素，笔者以为不能回避创作上的“自娱性”问题。我们知道，晚明小品的崛起与繁荣始终贯穿着“文以自娱”的文学精神。他们反对“文以载道”，不再把文章当做“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是“每著文章自娱”，并在“自娱”的同时“娱人”。将“自娱娱人”视为文学写作的终极目的。应当看到，“自娱娱人”一方面离不开特定的时代风尚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反对“文以载道”上有其积极意义。但在这种“自娱性”创作观念的影响下，晚明小品也的确出现一些弊端。比如，晚明小品特别喜欢为市井隐逸、风尘侠女、黄冠缙衣立传，且极力渲染其“迂”、其“愚”、其“痴”、其“癖”，这其中虽有某种不同于“世路中人”的生活理想的寄托，但其自娱自乐、逃避现实生活的写作动机也显而易见。正因逃避现实，过于追求“自娱性”，晚明小品才长期以来被视为“空疏之学”和“亡国之音”。相较而言，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中前期之所以被称为小品文的黄金时代，正是由于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小品文敢于抨击时弊，扬露痼疾，鼓吹新潮，启蒙心智。

即是说，这一时期的小品文在思想内容上与社会时代十分契合，在艺术形式上又相当精湛完美，因而这时期的小品文代表了散文创作的最高水准。但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小品文的复兴，“自娱性”的小品文又开始出现并迅速泛滥。这类小品文的共同点是逃避现实，无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和民众的生存困境，而沉溺于“闲”和“俗”，迷恋于无关痛痒的个体世界的浅层表现。比如写饮食、衣着、养生、养鸟、美容，以及猫狗的故事、蟋蟀斗、逛街市、时装和购买，等等；或者谈禅论道，寄情于山水明月，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淡泊和清高。不是说小品文不能写日常生活、凡人俗事中的“苍蝇之微”。问题是，这些“苍蝇之微”要“微中见著”，要有“品”有“味”，有大爱和大情怀。如果小品文仅仅满足于顾影自怜自恋式的“自娱自乐”，而且这种“自娱自乐”仅仅显示了生活中肤浅、庸俗、虚假和丑陋的一面；或只是某些作者用来作秀和煽情的道具，那么，这样的“自娱性”不仅远未达到晚明小品的散文境界，相反地有可能大幅降低现代小品文的思想文化品位。因此，新世纪的小品文若要重现新文学之初那种“极一时之盛”的绚丽景象，必须一方面重视小品文的“以文自娱”功能，使小品文真正做到能“怡人耳目”，“悦人性情”；另一方面，又要强调小品文必须正视现实，介入当下，不回避重大的时代命题和社会问题。这样，现代小品文才有可能在我国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获得一定的话语权，而不至于被边缘化。这是笔者比较晚明与现代小品文之后的第一点思考。

第二点思考是关于现代意识的问题。现代意识是渗透进小品文的一种内在精神。“五四”时期到三十年代中期的小品文因注进了这种内在精神，故而充满了生命和活力。在这一时期，小品文由于“经过西洋现代思想的陶熔浸润，自有一种新的色味，与以前的显有不同，即使在文章的外观上有相似的地方。”^{[2]446}这个“显有不同”，就是在继承传统散文的基础上，在思想艺术上又有所流变，这就是“五四”时期为西方文化所冲激而觉醒的现代意识。这种以倡导、推动科学、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思想为内核的现代意识，一旦投射到现代小品文上，就催生出了一新的文学观念和文体的变革。然而，三十年代中期以后，这种现代意识却猝然间断裂了。随着散文整体上的式微，我们看到，自三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后期的小品文，其实又回到了当年周作人批判过的“载道的散文”或“赋得的散文”的老路上，即便在小品文复兴的九十年代，仍然有不少“感恩”、“颂圣”的小品文。这类小品文在思维模式上是反现代性的，在立意结构、语言表达、情调意蕴上则体现出封闭性的特征，

而作家的人格主体也是萎缩的。正是面对着这样的尴尬局面,当下的小品文亟需来一番精神和思维方式上的换血,这就是去除狭隘保守的传统散文观念,以及奴性的感恩和宗道意识,代之以理性的精神,独立而开放的现代意识和批判质疑态度。倘若新世纪的小品文能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则不仅意味着新世纪的小品文在真正意义上向着“五四”时期的小品文回归,同时预示着新世纪的小品文具有超越晚明小品的可能性。

第三点思考,是自由性的问题。晚明小品留给现代小品文的一笔宝贵遗产,就是确立了“自由性”这一散文的本质特征。的确,晚明小品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自由随意。作家们不屑于固守原有的文类规则,大胆追求“法外之法”、“味外之味”和“韵外之韵”。而落实在用笔上,则是自由挥洒、随意点染、独抒性灵。现代小品文深受晚明小品这一特质的影响,作家们以其独立的主体人格和自由精神,彻底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而对散文自由精神的皈依,使现代小品文获得了文体的大解放,同时其自由随意、真诚轻松地谈话风又拉近了散文与读者的距离。事实证明:自由性是散文的本体特征,而小品文则是最适宜自由表达的文学载体。由于人类的精神在本质上是独立而自由的,而散文特别是小品文则是人类心灵的最高表现形态,是精神与生命借助语言文字的最为直接的呈现,这就决定了独立和自由是小品文旗帜上最为耀眼的标志。如果当下的小品文作者能够像晚明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散文作者那样,在“玉纲解纽”的时代里敢于反传统,同时尽可能使自己成为独立而自由的人,并因此进行自由而真诚的写作,努力开拓一条小品文创作的审美新途径,那么,新世纪小品文在精神生命的质量,在文化品格以及文体形式的创新等方面,将有一个新的样貌。

最后,是“趣”的问题。晚明小品尚真重趣。袁宏道说:“世人所难得唯趣。”上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的散文就继承了晚明小品重趣的传统。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以及后来的钱钟书,王了一等,他们不仅主张小品文要有趣,而且身体力行,写作了大量富于情趣的小品文。但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小品文的这一优良传统中断了。直到出现了贾平凹、王小波、韩少功、刘沙河、孙绍振、南帆、韩石山等人之后,“趣”这一小品文的优良传统才有所恢复。但应看到,这种恢复还远远不够,而且只是局部性的。因为重“趣”还未成为当下散文创作者和研究者的共识,同时时下还有大量“无趣”的小品文存在着。所以,在谋求小品文发展的同时,我们要重视晚明和现代小品这一重要资源,在“真”、“情”、“理”之后再加上“趣”字。因为“趣”是小品

文的一个重要元素,有趣则小品文生机盎然,娱人心情,悦人耳目;反之则面目可憎,刻板乏味。当然,“趣”若能与散文的智性,与丰厚的精神,高贵的心灵达到深度的交融,则这种“趣”就更有味和有品了。

考察、比较晚明小品与现代小品的传承与流变,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认知:其一,现代小品文是现代知识者对自己、对社会、对世界进行思考和自由表现的重要载体,并由此确立其思想和艺术价值。因此,小品文应高扬现代理性批判精神,以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介入现实人生,以真诚、情趣和性灵征服读者。在笔者看来,现代小品文既可以开展“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也可以亲情爱情友情,以及饮茶喝酒养花养草、谈禅说道修身养性为其内容,但不论写什么题材,都应以独立自由,真诚情趣和坚守小品文的纯洁性为旨归。中国近百年小品文的发展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无论任何时期,小品文只要拥有了上述元素,小品文就必然兴旺繁荣,反之便是一片冷寂凋零。其二,小品文是散文的正宗,是散文这一文体艺术纯度最高的品种。因为现代意义上的散文,虽然与小说、诗歌、喜剧并列为一种文体,它也有属于自己的辉煌。但由于其门槛较低,加之体质不纯,这样就难免经常被人讥为“准文学”。而作为散文精华部分的小品文,它因“短而隽异”,既可张扬自我个性,又可自由随意挥洒;既可讲“情”讲“韵”,还可讲“趣”讲“智”;既可激发“灵感”,又可诉诸想象,还可追求语言的精妙,形式的完美。因此,衡量一个时代散文的繁荣与否,艺术成就的高低,最为主要的标尺,就是看小品文达到了何种的高度。正因小品文在散文中居于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将两个不同时代的小品文放在一起比较,回顾现代小品文走过的路程,探讨文体传承与流变的内因与外因,总结其盛衰的历史经验,重新确认小品文的审美特质及其创作规律,对于振兴推动当代散文创作的发展,在笔者看来既有其理论的价值,也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鲁迅. 小品文的危机 [M]//鲁迅全集(第四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92.
- [2] 周作人.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 [M]//俞元桂. 中国现代散文理论.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431.
- [3] 林语堂. 论文 [M]//俞元桂. 中国现代散文理论.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63.
- [4] 郁达夫.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M]//俞元桂. 中国现代散文理论.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446.

[责任编辑:吴晓红]

汾阳出土唐代墓志校理

周阿根, 叶太青

(阜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 安徽 阜阳 236041)

摘要:墓志是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的重要产物之一,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对汾阳市出土的50方唐代墓志进行了系统校理,发现其中存在着文字误释、标点误施、注释疏误等不足之处,希望研究有助于汾阳唐代墓志的利用,以期对墓志等古代文献的校勘和整理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汾阳;唐代墓志;校勘;标点;注释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4)01-0054-05

Collation of unearthed epitaphs of Tang Dynasty in the city of Fenyang

ZHOU A - gen, YE Tai - qing

(Research Center for North Anhui Culture, Fuyang Teachers College, Fuyang, Anhui 236041, China)

Abstract: The epitaph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roducts of funeral culture in ancient China, which contains ric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nformation. By carefully collating the 50 unearthed Epitaphs discovered in the city of Fenyang, this paper finds such mistakes in the recording words of the epitaphs as mistaking words, punctuation and annotation, etc. It is hoped that this paper may be of help to the use of the epitaphs of Tang Dynasty in the city of Fenyang and of reference to the collating and arrangement of ancient literature.

Key words: Fenyang; epitaphs of Tang dynasty; collation; punctuation; annotation

汾阳为三晋名邑,自古物产丰饶,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文化渊博。汾阳出土文物众多,仅汾阳市博物馆搜集的历代墓志就达二百余方,其中唐代墓志达130余方,王仲璋先生选取其中50方唐代墓志,进行了全面释读、标点和注释,编成《汾阳市博物馆藏墓志选编》,这些唐代墓志对于研究唐代的历史文化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诚如张庆捷先生所言“观一地之文化,材料最丰富、最能有序流传着,莫过于碑碣墓志”^[1]。墓志文献的校理涉及诸多学科理论知识,每一方墓志的整理往往需要将历史学、文化学、文字学、训诂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稍有不慎,就会出现种种疏误^[2]。王仲璋先生从事文物文化工作30余年,对汾阳文化情有独钟,此次对汾阳出土50方唐代墓志进行了系统的整理,

包括识读、标点、注释,并详细描述了每方墓志的形制、款式、质地、出土时地、馆藏地点等信息,为汾阳地方历史和唐代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笔者系统研读了这50方唐代墓志,受益匪浅,但发现其文献校理方面,偶有疏漏,兹不揣鄙陋,略呈管见,以求教于王先生及诸位方家,希望我们的研究有助于提升汾阳唐代墓志的利用价值,同时希望我们的研究对墓志等古文献的校勘和整理有借鉴作用。

一、文字误释例

1. 《任子墓志》^①:“嗟夫,赤鸟落景,白菟沉魄,和璧沦辉,随珠瘞彩。粤以贞观十五年正月廿日遘疾终于本第,春秋五十有五。”(第5页)

收稿日期:2013-12-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YY07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0YJC740141)、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09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阿根(1970-)男,江苏兴化人,文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史和辞书学。

①墓志名为作者所加,一律采用“墓主姓名+墓志”的格式,此前学界多采用墓志首题。

“赤乌”，当作“赤乌”，代指太阳。从文例来看，“赤乌落景”和“白兔沉魄”相对成文。“白兔”，即白兔，月亮的代称，传说月中有白兔，故称。复审原拓，乌实作_鳥，当为鸟的俗字，“乌”在墓志文献整理过程中，每每被误释为鸟，对此笔者多有论及^[3-4]。“赤乌”一词，历代墓志多有用例，《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刘懿墓志》：“自豸龙启胃，赤乌降祥，磐石相连，犬牙交错，长原远叶，繁衍不穷，斧衣朱纓，蝉联弈世。”本书中乌被误释为鸟的仍有多例，均当据改。《穆循墓志》：“岂渭金浆失验，玉体无征：随逝水之东迁，逐飞鸟而西迈，以开元四年二月二日卒于里第，春秋八十有一。”（第37页）“飞鸟”当为“飞乌”，指太阳。《宋崇超墓志》：“君文武绝伦，忠贞贯古，弓开七札之用，箭落九鸟之能，允应旁求，才成三捷（周按：原录文作三捷，非是），弱冠高第，累任清资，特敕授京兆府匡道府折冲，赐紫金鱼袋。”（第71页）“箭落九鸟”当为“箭落九乌”，暗用了“羿射九乌”的典故。《靳妃墓志》：“遂留幼女，乃召太原王洪谏，纳彩问名，以为合卺，缉纂家业，绍绪妻族，享奠式陈，永为宗祀。哀慕号叫，罄竭家诸，乃筮青乌礼营安厝。”（第101页）“青乌当为青乌”，青乌子为古代勘舆家，墓志多用简称。

2.《任举墓志》：“冥冥九绝，漫漫长夜。弃我白屋，黄泉是舍。一窆绝颜，千龄永谢。”（第19页）

“绝颜”不词，复审原拓，实作“红颜”。“红颜”指红色的脸堂，这里用红润的脸堂代指墓主任举。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古代红颜并无性别区分，后代红颜专指美女，是词义引申发展的结果，对此，笔者有专文论述，可参^[5]。

3.《任玄播墓志》：“父彦威，隋朝乡长，襟带人物，管辖州官，望之俨然，即之温也！”（第25页）

复审原拓，“州官”之“官”原拓实作“閭”，“州閭”是古代地方基层行政单位州和閭的连称。《礼记·曲礼上》：“夫为人子者，三赐不及车马，故州閭乡党称其孝也。”郑玄注：“《周礼》二十五家为閭，四閭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襟带人物”和“管辖州閭”相对成文。“州閭”一词，历代墓志习见，《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张玉憐墓志》：“笄年既及，为文贞侯所聘。事舅奉姑，勤孝有闻。承郎接妹，婉顺见美。故以流誉于乡党，传芳于州閭矣。”《五代墓志汇考·李章妻金氏墓志》：“夫人乃岷之仲女也。呜呼！兰芬丽质，桂馥芳容。贞效恭姜，令誉早闻于乡党；颜逾曹谢，德崇已振于州閭。”

4.《任玄播墓志》：“垂拱二年正月十二日终于

家第，春秋七十有九，即以其年二月二日從葬于兹氏城东二里平原，礼也。”（第25页）

“從葬”之從，原拓作_徙，为徙的俗写，“從葬”实为“徙葬”之讹，墓志整理过程中从、徙每每发生讹混^[6-7]。“徙葬”犹“迁葬”，此不赘论。《汉语大词典》未收“迁葬”一词，当补收。另本书《李庭剑墓志》：“夫人苏氏，长垂信义忠孝之美，侍舅姑，节行无亏，训子三从被矣。”（第75页）“训子三从”当为“训子三徙”，这里是暗用了孟母三迁的典故。墓志中经常用“三徙”来喻指母训，《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卢兰墓志》：“思其亲也，则寒木生庭；孝其姑也，则江流入室。七德是备，足以事夫；三徙既成，尤能训子。”《五代墓志汇考·张继业墓志》：“先妣姜氏，以柔顺之德，播雍睦之风，肥家九叶于六亲，训子不忘于三徙，累封天水郡夫人。”

5.《宋感墓志》：“以天授二年，岁位大梁，月临折木，夹钟司景，与夫人任氏合葬州西南三里平畴，礼也。”（第29页）

“折木”不词，俗写“𣎵”“木”相混不别，此乃墓志俗字常例，不赘论。“折木”当录作“析木”，为星次名，十二星次之一。与十二辰相配为寅，与二十八宿相配为尾、箕两宿。《汉书·律历志下》：“析木，初尾十度，立冬；中箕七度，小雪；终于斗十一度。”墓志中“岁位大梁”和“月临析木”成文，“大梁”和“析木”同义对举，均为星次名。“析木”一词历代墓志习见，《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元昭墓志》：“春秋有六十，正光三年歲次析木之津二月癸亥朔廿二日甲申酉時薨於其第。”《隋代墓志铭汇考》〇〇二《高潭墓志》：“以隋开皇二年，岁在析木之津，二月廿二日丙申，窆于冀州渤海郡蓨县南之西卅里。”

6.《田仙墓志》：“及乎亲歿，毁形灭性，泣血绝浆。方之高柴，同乎顾悌，扬名后世，遗烈子孙，遏庭之训以播于庭闈，君子之风备专于乡邑。岂期积善不祐，遗疾弥留，药石无征，奄归遥夜。”（第61页）

“遏庭之训”一语费解。复审原拓，“遏”实作“過”，二者形近而讹。“過庭”为典故词，《论语·季氏》：“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后因以“过庭”指父训。“过庭之训”乃墓志常语，《唐代墓志汇编》贞观一五七《辛衡卿墓志》：“君风神爽俊，仪望闲雅，灵府之内，独王虚舟；襟袖之间，自标奇韵。家有赐书，门传旧业，要道之方，冥符至性；过庭之训，远照生知。”《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麟德〇〇八

《梁延怀墓志》：“公乡闾称为教首，宗族号曰慈仁，昆季是谐，孝恭膝下。子受过庭之训，光显尊亲，孝养无亏，报恩未极，灾风混起，良木斯摧。”“过庭之训”常省作“过庭”，《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宋虎墓志》：“君禀训过庭，志尚清韶，少砺名节，长播声美，内懃孝弟，闺门敬让，外施笃信，义结交友。”唐李商隐《五言述德抒情诗献杜仆射相公》：“过庭多令子，乞墅有名甥。”

7.《高胤墓志》：“夫人宋氏，令淑有闻，礼仪无忒，以哀以痛，深有戚容，尽哭无时，悲不可极。”（第65页）

“尽哭”不词，复审原拓，“尽哭”实作“昼哭”，繁体“盡”和“晝”形近而讹。“昼哭”一词为墓志习语，形容生者极度悲伤之心境，《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太妃墓志》：“既而良人不幸，藐诸在室，昼哭夜歌，礼无违者。”（473页）《隋代墓志铭汇考》一七三《封使君夫人崔氏墓志》：“庶与子偕老，腾兹茂实，遭命不谐，良人中逝。昼哭避嫌之礼，得白天然；断织慈教之心，率由本质。”《唐代墓志汇编》文明〇〇八《王岐墓志》：“夫人京兆孙氏，随州录事之女。箴规合度，琬琰成姿，卜邻有口于三迁，作婢用该于四德。从来昼哭，切龙剑之孤沉；今日和鸣，随风箫而共去。”《五代墓志汇考·史匡翰墓志》：“半枯旋叹于未亡，一恸俄闻于昼哭。风飘宝匣，翻成别鹤之悲；尘暗妆台，永结孤鸾之恨。”

8.《李庭剑墓志》：“泣血三朝，绝浆七日，号天叩地，攀恋无依，遂用龟兆之占，克从筮箸之吉。以廿五日去城五里，于太安乡建立莹域合祔，礼也。”（第75页）

《说文解字·竹部》：“箸，飯鼓也，从竹者聲。”“箸”是古代的筷子，《荀子·解蔽》：“从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筮箸”一词费解，复审原拓，“筮箸”实作“筮著”，俗书“𦵏”“𦵏”相混不别。“筮”用蓍草占卜休咎或卜问疑难之事。《易·蒙》：“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王弼注：“筮者，决疑之物也。”“著”草名，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我国古代常用它的茎占卜。“筮著”在墓志中可倒乙作“著筮”，《唐代墓志汇编》会昌〇四九《冉氏墓志》：“有女一人，适于上谷侯泰，寻居孀寡，誓在柏舟。以著筮未吉，时载勿通，虽松域苟同，而坟垄有异。”

9.《殷秀成墓志》：“君讳秀诚，汝南郡人也，元承黄帝之苗裔，殷王之后也。昔因从宦，聊寄于兹，以时系年，其将久矣，乃为西河人焉。”（第77页）

“从宦”不词，复审原拓，“宦”实作“宦”，墓志俗写“穴”“宀”相混不别，此不赘论。“宦”为“宦”的俗字，“从宦”犹言做官。“从宦”一词，唐代墓志习

见，《唐代墓志汇编》龙朔〇三六《董氏墓志》：“夫人董氏，舒州望江人也。惟父与叔，纁青拖紫，有陈之代，从宦渡江，并誉重南金，声高东箭。”《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天宝〇七五《李复墓志》：“公秀而文，温而厉，在家而孝友着，从宦而冰霜洁，解褐补长葛尉。”传世文献亦多有用例，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伟长从宦于青土。”唐武元衡《兵行褒斜谷作》诗：“矢橐弧室岂领军，僭爵食禄由从宦。”

10.《李朝墓志》：“夫人扶风马氏，柔明宛丽，淑顺宜家，道妇无污，孝闻郡邑。事夫尽如宾之敬，训子有择邻之贤。”（第95页）

“道妇无污”一语费解。复审原拓，实作“道妇无亏”，原拓“道妇”二字当乙正。“道妇无亏”为墓志习语，常用来赞美妇女的品行高尚。《唐代墓志汇编》咸通〇七〇《王氏墓志》：“闺门有则，妇道无亏。柔顺以睦，洁白自持。”《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贞元〇六五《荆肆墓志》：“妇道无亏，母训有则。时称贤淑，不亦可乎。平居无何，歎尔遘疾。司命夺算，奄从逝水。”《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乾符〇〇二《范氏墓志》：“北海盛族，庆貽懿德，妇道无亏，母仪不忒。”“道妇无亏”在唐代墓志中，也可以写作“道妇无替”、“道妇无缺”、“道妇无违”等，均用来赞美妇女的品行。

11.《李朝墓志》：“恐星霜递迁，陵谷无准，琢之贞石，用播征猷。”（第95页）

“征猷”不词。复审原拓，实作“徽猷”，“徽”“猷”形近而讹。“徽猷”指好的名声、业绩。“徽”古有美义，《书·舜典》：“慎徽五典，五典克从。”陆德明释文：“徽，王云美，马云善也。”《文选·陆机〈拟行行重行行〉》：“此思亦何思，思君徽与音，音徽日夜离，缅邈若飞沈。”张铣注：“徽，美也，言思君美德及音信也。”“徽猷”一词，历代墓志习见，此不赘论。赞美人品行，墓志中以“猷”为语素的词除“徽猷”外，通常有“芳猷”、“鸿猷”、“皇猷”、“嘉猷”、“佳猷”、“令猷”、“清猷”、“壮猷”等。

12.《靳岷墓志》：“噫，夫其[生]也苦浮，其死也苦休，动静沦移，古来常矣！”（第101页）

“夫其[生]也苦浮，其死也苦休”一句费解。复审原拓，“苦”实作“若”，二者形近而讹。古代文献整理过程中，苦若往往相讹，这一点前辈学者王念孙、郭在贻等多有论述。“夫其生也苦浮，其死也苦休”一句化用了庄子的话，《庄子·刻意》：“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以人生在世，虚浮不定，因称人生为“浮生”。《唐代墓志汇编》载初〇〇四《徐澄墓志》：“天道悠悠，人生若浮，遽悲过隙，空叹藏舟。一归厚夜，万古长秋，寒局月惨，荒垄云愁。”

二、标点误施例

13.《任鹭墓志》：“公幼冲奇嶷，冠立雄强，属九五龙飞策。名幕府，荡凶寇，剪奸讹，立元勋，叙芳列，蒙授朝请大夫，拟乐平丞，旌其效也。”（第21页）

此段文字标点有误。“策”当属下，“策名”谓科试及第，南北朝以来墓志多有用例。《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齐·韩裔墓志》：“自策名公府，执笏王朝，出镇入守，留连羈勒。”《隋代墓志铭汇考》二〇一《杨宏墓志》：“释褐周宋王府参军，策名盛府，参政英蕃，趋奉贤王，殊蒙礼遇。”《唐代墓志汇编》永徽〇〇五《段氏墓志》：“君既策名英府，陪随藩邸，蓊卷桑梓，因即家焉。今为洛阳人也。”《五代墓志汇考·孟弘敏及妻李氏合葬墓志》：“声名益誉于济流，远迹咸钦于问望，乃策名霸府，筮仕王庭。”《汉语大词典》“策名”条首例举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梦》：“钟辐，虔州南康人也，始建山斋为习业之所，因手植一松于庭际，俄梦朱衣吏白云：‘松围三尺，子当及第。’辄恶之。尔来三十余年，辄方策名，使人验之，松围果三尺矣。”例证晚出，可补南北朝墓志例。

14.《王龙墓志》：“遐考遂古卜洛惟永，叶县双凫蹈王，成而遂往江南，独步匡晋朝而俾义，国谍详矣，可录而言。”（第39页）

此段文字无法读通，多处标点有误，应该作如下校点：“遐考遂古，卜洛惟永。叶县双凫，蹈王成而遂往；江南独步，匡晋朝而俾义，国谍详矣，可策而言。”其中“叶县双凫”和“江南独步”均为用典。“叶县双凫”暗用了东汉王乔的典故，《后汉书·方术列上·王乔》：“显宗世，为叶令。乔有神术，每月朔望，常自县诣台朝。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临至，辄有双凫从东南飞来。于是候凫至，举罗张之，但得一只焉。”；“江南独步”暗用了汉末文学家王粲的典故。王粲，字仲宣，唐李翰《蒙求》：“张凭理窟，裴颀谈藪。仲宣独步，子建八斗。”

15.《靳岷墓志》：“府君抱松筠芝操，禀山岳奇气，乡闲有名，里仁为美，享龄七十六去，咸通十三年七月廿九日终于私第。夫人陇西李氏，茂姿天降，兰蕙齐芳，窈窕令仪，邕容□丽，享年五十七去，咸通七年九月廿三日而终矣。”（101页）

文中的两个“去”字均应该属下。“去”在中古近代汉语中，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用法就是作为介词，引介时间、地点。“去”作为介词引介时间，南北朝以来墓志习见。《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于夫人墓志》：“龄登九十，耄疹未蠲，医不救

命，去二月廿七日薨于洛阳金墉之宫。”《唐代墓志汇编》永徽〇八五《刘掩墓志》：“夫人则魏司空祥之后也。素履贞顺，雅符容德，福扇祸袞，先落桂枝，去永徽三年六月二十日终于第。”《五代墓志汇考·封准墓志》：“公讳准，先公第三子，前摄降州长史。幼攻文笔，长寻武畧。礼让温和，乡间进美。”传世文献中也有用例，南朝梁任昉《奏弹刘整》：“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车栏、夹杖、龙牵，疑是整婢采音所偷。”^[8]《汉语大词典》“去”字条义项14释作“介词。在。”首例《京本通俗小说·碾玉观音》：“去那左廊下，一个妇女，摇摇摆摆，从府堂里出来。”甚晚，另《汉语大词典》介词“去”两例所引成份均为地点名词，略显不足。

三、注释疏误例

16.《杨秀墓志》：“君讳秀，字文才，汾州隰城人也。其先出自洪农，芳猷以著，因官得封，遂适此焉。”注释③猷(yóu)：计谋。（第7页）

该条注释不确。诚然猷有计谋的意思，但揆之墓志原文未为安。“猷”当为名声、品行之义，墓志中赞美人的品行常用“猷”为语素来构成复音词，如“徽猷”、“鸿猷”、“皇猷”、“嘉猷”、“佳猷”、“令猷”、“清猷”、“壮猷”等。《汉语大词典》“芳猷”条释作“犹美德”，亦不确。

17.《高胤墓志》：“曾祖讳辅，祖讳承礼，父胤，并养道丘园，自闲情性，勤于耕凿。奉彼晨昏，仁者相传，至于今日。”注释②耕凿：务农兼务木工。（第65页）

此条注释有误。将“耕凿”解释为“务农兼务木工”，有望文生训之嫌疑。“耕凿”本义耕田凿井，后来引申指农耕之事，典出古诗《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后常用“耕凿”形容人民辛勤劳动，生活安定。传世文献多有用例，南朝梁萧统《锦带书十二月启·太簇正月》：“某执鞭贱品，耕凿庸流，沈影南亩之间，滞迹东皋之上。”唐吴筠《高士咏·庞德公》：“耕凿勤厥躬，耘锄课妻子。”唐太宗《临层台赋》：“肆黎元于耕凿，一文轨于车书。”

18.《慕容义墓志》：“嗣子知璿，少亡，次子璿芝等，志切蓼莪之诗，情恻罔极之德。仁孝不匮，宅兆开莹。”注释16蓼莪(lù é)之诗：蓼莪皆草名，《诗经·蓼莪》：“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第59页）

此条注释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注音有误，《诗经·周颂·良耜》：“其笠伊纠，其耨斯赵，以薊荼蓼。”毛传：“蓼，水草也。”“蓼”作为植物名，为一

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有水蓼、红蓼、刺蓼等,其读音当为 liǎo。其次,注释引用《诗经》引文有误,当为“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19.《刘赞墓志》:“以其年四月廿七日,持翼哀歌,戚仪前引,护輶车于州城西南隅西河县万户乡万户原之侧,忽虑桑田变海,深谷为陵,刻石叙文,存乎不朽。”注释27 輶(chuán)车:送灵之车。(第97页)

“輶”在隋唐五代墓志当中大多数写作輶,由于汉字俗写的类化作用,往往又俗写作輶,后来进一步简化作輶。輶的意思载运棺柩的车,解释为送灵之车,不确。另輶的正确读音应该是 ěr,輶没有 chuán 的读音。

四、其他

20.《郭彝墓志》:“痛伤行路,悲悼人伦,获瑞鸟以坟莹,蒙佳城而窆柩。”(第11页)

复审原拓,“坟莹”实作“莹坟”,当乙正。

21.《殷秀成墓志》:“承上之荫,具备凶仪,称家有无,忌营葬事,以其年当月廿十三葬在汾州城西南五里万户乡之原,礼也。”(第77页)

“廿十三”这种数字表示法有误,十是衍文,当写作“廿三”。因为“廿”本来就是二十的意思,再加上十,就是画蛇添足,类似的数字还有“卅”、“卌”等。

22.《任鍊墓志》:“唐故汾州押衙兼都巡廨使云麾将军□□中监西河任府君墓志铭并序”(第99页)

文中的“□□”为两个缺字符,这两个字磨泐不清,作者用□来表示,不失为谨慎之举。墓志由于长期埋藏于地下,同时由于运输与储藏的不慎,出现磨泐是十分正常的现象。部分磨泐的字通过反复揣摩或者根据墓志程式化的语言,是可以识读的。文中缺字符是表示墓志的职官的,同时通过仔细揣摩字形,这两个字符和下文组成“试殿中监”,唐官制规定担任某一官职,但无正式任命,称为“试”。

参考文献:

- [1] 王仲璋. 汾阳市博物馆藏墓志选编·序[M].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0: 2.
- [2] 周阿根. 墓志文献校理疏误例说[J]. 学术界, 2012(4): 95-102.
- [3] 周阿根. 《全唐文补编》文字校勘举隅[J]. 语言科学, 2009, 8(5): 554-560.
- [4] 周阿根. 《辽代石刻文续编》校点琐议[J]. 语言科学, 2013, 12(2): 219-224.
- [5] 周阿根, 徐地仁. “朱颜”不等于“美女”[J]. 汉字文化, 2002(3): 43-44.
- [6] 周阿根. 五代墓志俗字考辨[J]. 学术界, 2010(9): 140-146.
- [7] 周阿根. 任景述墓志录文校补[J]. 安徽史学, 2011(4): 123-125.
- [8] 方一新, 王云路. 中古汉语读本[M].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384.
- [9] 罗竹风. 汉语大词典[Z].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86-1993.
- [10] 毛远明. 汉魏南北朝碑刻校注[M]. 北京: 线装书局, 2008.
- [11] 王其祚, 周晓薇. 隋代墓志铭汇考[M]. 北京: 线装书局, 2007.
- [12] 王仲璋. 汾阳市博物馆藏墓志选编[M].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0.
- [13] 赵超.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 [14] 周阿根. 五代墓志汇考[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2.
- [15] 周阿根. 五代墓志校点举误[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07(2): 32-34.
- [16] 周绍良. 唐代墓志汇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17] 周绍良, 赵超.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责任编辑: 吴晓红]

《何典》“𦉳”本字考

陈源源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35)

摘要:据文献记载,“𦉳”为“绕”字之异体,有“纠缠、戏弄、扰乱”之义。但《何典》中的“𦉳”字并非此义,它是个动词,意为“缠绕”。通过对明清及近代方志中方言材料的考察,结合当时方言的语音特点,并佐以现代汉语方言材料,发现:“𦉳”是“绕”的方言记音字,“绕”又可写作“裹”、“攮”等形式,这反映了清代吴方言中存在日母字读为泥母字的语音现象。

关键词:何典;𦉳;记音字;本字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4)01-0059-04

Research on the dialectal characters “NIAO” in the novel of HeDian CHEN Yuan – yuan

(School of Humanity,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32503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cords of literature, NIAO is the different form of RAO with the meaning of “playing tricks on somebody”. But in HeDian, it is a verb, meaning to “twine”. Through investigating the dialectal information of local record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modern times, combining the phonetic features at that time and the proof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dialects, we find that NIAO was the record of RAO’s pronunciation and RAO has various forms of NIAO (裹)、NIAO (攮) and so on, which reflects the phonetic phenomenon of RIMU (日母) reading as NIMU (泥母) in Wu dialect in Qing Dynasty.

Key words: HEDIAN; NIAO; characters that record pronunciation; the original characters

《何典》是一部吴语小说,全文大量使用方言记音字,为研究方言语音提供宝贵资料,值得重视。以“𦉳”为例,其在《何典》中的使用情况如下^[1]:

(1) 罗刹女见弄他不翻,忙解下臭脚带来,把他扎手缚脚,周身𦉳住,抱回亭中,将他骨髓慢慢的呼来吃。臭花娘看在旁边,真是眼饱肚中饥,敢怒而不敢言。(第十回)

(2) 活死人为了臭花娘,心慌胆碎,东奔西走;不料狭路相逢,也遭他臭脚带𦉳住,不免弄得束手待毙。(第十回)

依据文意,“𦉳”是个动词,意为“缠绕”。但文献记载,“𦉳”乃“绕”之俗字或异体,意为“戏扰、扰乱”,并无“缠绕”义。本文拟对这种现象作出解释。

一、“𦉳”乃“绕”之异体,“戏扰、扰乱”之义

“𦉳”为“绕”之异体^①,有“纠缠、戏弄、扰乱”之义,在明清俗语中文献记载颇多,如:《俗书刊误·俗用杂字》:“戏相扰曰𦉳。音泉^②”^[2]《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言戏扰不已曰𦉳,音如裹。嵇叔夜《书》‘𦉳之不置。’”^[3]明岳元声《方言据》卷上:“相戏谓之𦉳,乃了切。戏相扰也,嵇康《书》:‘𦉳之不置。’亦作绕。”^[4]⁶⁴《通俗编》卷二十二《妇女》:“按:𦉳,奴鸟切,俗谓缠扰不休也。”^[5]《越谚》卷下“单辞只义”:“𦉳,越音‘告’上声。男女杂扰,儿童戏耍也。”

收稿日期:2013-12-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明清吴语方言字考释与研究”(12YJC740009);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明清吴语方言字研究”(10CGZY05YBQ);高等学校访问学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类型学视角下的明清吴语词汇研究”资助

作者简介:陈源源(1982-),女,安徽宣城人,文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训诂学研究。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业师方一新先生的悉心指导,后又承蒙姚永铭、王云路、汪维辉、黄笑山、周志锋等诸位先生指教,前辈马贝加教授也在百忙之中审读全文,获益良多,谨致谢忱!文中错误概由作者本人负责。

①方一新师《“讷”为“讷”、“喧”之异体、“绕”为“𦉳”之异体说——兼论〈大字典〉〈大词典〉“讷”、“绕”等字的注音》一文,对“𦉳”为“绕”之异体已有考证,本文不再赘述。参见《古汉语研究》,2009年第1期,第60-61页。

②“泉”是“裹”之讹字。

佞;曩那日子,尚俗泥执^①[6]281-285。赵元任在讨论吴语音母时,指出“日母在古音是鼻音加摩擦音,吴语文言中取它的摩擦成分,拿它当床禅看待,白话取它的鼻音成分,拿它当泥娘看待”^[10]。魏建功《吴歌声韵类》在讨论吴歌声类时将吴音与国音的异同与旧三十六母(或四十一母)比较,得出如下结论:“吴音‘泥’读n的字,是开合两呼;读ɲ的字,是齐齿呼。……吴音‘娘’‘日’均读作ɲ,皆为齐齿呼。”^[11]可见,无论是在清代还是在近现代,吴语日母字白话音读如泥母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现代汉语方言中,不仅吴语区有这种现象,其它方言中古日母字读为[ɲ]、[n]的现象仍十分普遍。如武汉方言中[n]声母字特别多,除古泥(娘)、来母字外,还有部分古日母字和少数古疑母字,惹假摄、饶扰绕效摄、柔揉流摄、染冉咸摄、壬任纒深摄、然燃热山摄、人仁忍刃认韧臻摄、瓢穰壤攘嚷让宕摄、仍扔曾摄、肉辱褥通摄等古日母字声母就读为[n]^{[12]350}。湖南娄底方言今读[n]声母的,不限于古泥来母字,部分古日母、疑母、影云以母今读细音的字也读[n]声母,如古日母字惹读[niɔ⁴²]^{[12]182}。

我们来看古日母字“绕”,在现代吴语区或邻近的徽语区,它的声母读为[ɲ]、[n]。如褚半农《上海西南方言词典》收有“绕轧”^②一词,义为“纠缠不清,如‘迪桩事体勿是像依讲个介清爽,有眼~个’(这件事不是像你说的那么清楚的,有点复杂的)”,他还特别说明“也可写成‘𦉳轧’”^[13]。由此可知,上海西南方言中存在“绕”读为“𦉳”的现象。又如表示“缠绕”之义的“绕”字,金华方言读[ɲiau²⁴],崇明方言读[ɦɲio³¹³],绩溪方言读[ɲie²¹³]^{[12]6112};上海方言中的“绕脚”读为[niɔ¹³⁻⁵⁵ tɕia?⁵⁵⁻⁵⁴],在表示“纠缠”这一义项时,编写者加

注“‘绕’谐‘𦉳’”,苏州方言“绕脚”一词中的“绕”读为[ɲiæ³¹],丹阳方言读为[ɲio¹¹]^③,杭州方言中的“绕小脚”读为[niɔ¹³ ɕio⁵³ tɕia?⁵⁵]^{[12]6112}。

据文献记载及现代汉语方言材料,我们认为“绕”读为“𦉳”是完全可能的。民国十九年(1930年)排印本《嘉定县续志》也证明这一点,“绕,俗读如袅,如曰绕紧。《正韵》:‘而绍切,缠也。’”^{[7]94}只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个读音为“𦉳”表“缠绕”之义的汉字是“绕”字,故用同音字“𦉳”代替,《何典》中的“𦉳”就是“绕”的方言记音字。

三、字随音变与“绕”的记音字“𦉳”、“裊”、“攪”等

除“𦉳”字之外,“绕”还可写为“裊”、“攪”等字,这是字随音变的结果。如《吴下方言考》卷九《效韵》:“裊,音鸟去声。许氏《说文》:‘裊,以组带马也。’案:裊,绕系之使不脱也。吴中谓以带绳类缠物曰裊。”^{[14]295}《越谚》卷中“服饰”类:“攪纬,裊裕,俗作‘攪’^④。此将锭间纺成棉丝,用篾攪成长茧样,以便纳梭备织。凡丝线盘旋系之曰‘攪’。”^⑤又卷下《单辞只义》:“攪,裊。俗作‘攪’,或省作‘裊’。凡丝线绳索旋系之曰攪。从《唐韵》。”^{[6]310}此“攪”字当是“裊”之增旁字,由于“用丝线绳索缠绕”与手的动作有关,故增手旁。

《吴下方言考》中也有一个“攪”字,《吴下方言考》卷七《巧韵》:“攪,音吊上声。《玉篇》:‘攪,撻也。’案:攪,提而掷之也。吴中凡力大于人丛中取出人物曰攪。”^{[14]233}但这个“攪”与《越谚》中的“攪”不同,不是表“缠绕”之义,读音也不相同,它们不是同一个词,字形偶同而已^⑥。

① 其中,“日”读为“泥”。

②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也收有此词,标明为上海方言,读音为[niɔ¹³⁻¹¹ ga?⁵⁵⁻⁵⁴],意思是“事情遇到的障碍、麻烦”,如:“辩桩事体里向有点~”。参见《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第六卷)第6112页。

③ 上海、苏州、丹阳方言材料均引自《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第六卷)第6113页。

④ 侯友兰等点注的《越谚》第211页“攪”作“搗”,误,谷应山房藏版正作“攪”。

⑤ 《越谚》中其它例证亦可见“攪”有“缠绕”之义,如卷中“技术”类:“撈球,纸包水银,外攪绵丝,成团撈之,球手相应,善者数百下。李绅《拜三川守诗序》云:‘击大球其遗与。’”“外攪绵丝”就是“用绵丝缠绕在外面”的意思。

⑥ 许宝华、[日]宫田一郎主编《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1999年版)收有“搗”字,释义为“掀”。引民国《定海县志》:“搗,俗读如袅,谓揭去之也。如掀去缸盖曰搗缸盖。”按:《汉语方言大词典》所收“搗”疑当作“擗”,“音袅”当作“音泉”。查考民国年间排印本《定海县志》:“搗,俗音丁么,俗读如袅,谓揭去之也。如掀去缸盖曰搗缸盖。”(参见[日]波多野太郎《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卷七,日本:横滨市立大学,1969年第187页)“袅”正作“泉”,“擗”误作“搗”。又翟灏《通俗编》卷三十八《识余》“近造字”条引《智灯难字》:“揭盖曰擗,音泉。”(第865页)张慎仪《蜀方言》卷下:“揭盖曰擗。”(参见纪国泰《〈蜀方言〉疏证补》,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408页)可见,此字与表“缠绕”义之“攪”字音义俱异。

四、结论

综上,我们认为:《何典》中表“缠绕”之义的“𦉳”是“绕”的方言记音字,“绕”又可写作“𦉳”、“𦉳”等。潘慎注认为“𦉳”有“缠绕”之义,“即绕字”^[15],确。这反映了当时吴方言中存在日母字读为泥母字的语音现象。

参考文献:

- [1] 张南庄. 何典[M]. 北京:北新书局,1926.
- [2] 焦竑. 俗书刊误[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580.
- [3] 田汝成. 西湖游览志余[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69.
- [4] 岳元声. 方言据[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64.
- [5] 翟灏. 通俗编[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500.
- [6] 侯友兰. 《越谚》点注[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7] 波多野太郎. 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卷六)[M]. 日

本:横滨市立大学,1968.

- [8] 李铭皖. 同治《苏州府志》[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141.
- [9] 章太炎. 新方言[M]//章太炎全集(第七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10] 赵元任. 现代吴语的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29.
- [11] 顾颉刚. 吴歌·吴歌小史[M]. 王煦华,整理.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223.
- [12] 李荣.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Z].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 [13] 褚半农. 上海西南方言词典[Z].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64.
- [14] 胡文英. 吴下方言考[M]. 扬州:广陵书社,2003.
- [15] 张南庄. 何典[M]. 潘慎,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1.

[责任编辑:吴晓红]

(上接第17页)之更好的适应本国的需要。我国批判继承“孔子之道”不像日本需要从国外引进,而是自有这样一种适宜其发展的土壤,我们需要做的是嫁接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新的理念,更适应现代化机器化生产以及现代人文理念的一种新文明。

3. 制度保障是关键。国家领导人也不止一次提及要发扬中国优良传统,但收效不加。这是一个全民性的运动,在对民众进行舆论性的影响外,最重要的是让其耳濡目染,实践起来确实是有点困难。最主要的是需要一个制度保障,小到对各种孝道、英勇事迹的激励,各种传统文化活动的开展,对不良行为的惩罚,而我们往往以“恶小”而不罚,以“善小”而不赏,大到从教育体制加强道德教育,各种但不仅仅是停留在教材考试类的书面教育。增加教材中这种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从小学教育开始除了道德说教外,当事人现场说法更能引起孩子们的共鸣。考试方面,书面考试可以占一部分比例,但不能是全部,平时的英勇事件、助人为乐事件都可以作为考试测评分算入成绩,以激励孩子不断

的努力。除学校教育外,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功亏于贵。主要的就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根植一些人文理念和关怀。

参考文献:

- [1] 中国中央电视台. 大国崛起——美国[M].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
- [2] 陈独秀. 新青年:民主与科学的呼唤[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 [3] 宾长初. 五四时期陈独秀反恐思想评议[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3):45-47.
- [4] 冯天瑜. 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中国古文化的特质[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 [5] 许纪霖. 许纪霖自选集[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 [6] 亨廷顿. 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M]. 李盛平,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范君]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隐喻的认知解读

张红丽

(太原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太原 030024)

摘要:运用著名隐喻研究者来考夫的隐喻理论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隐喻进行识别和归类,发现诗中的隐喻多与爱、生命和时间主题有关。同爱这一目的域对应的有战争、财富、胃口、负担、旅行、奴隶等源域;同生命这一目的域对应的有四季、旅程、盛宴等源域;同时间这一目的域对应的有镰刀、邪恶之徒、窃贼等。

关键词:隐喻;爱;生命;时间

中图分类号: I1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1-0063-04

Cognitive interpretation of metaphors in Shakespeare's sonnets

ZHANG Hong - 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aiy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yuan 03002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metaphors in Shakespeare's sonnets with Lakoff's theories of metaphors. The metaphors in the sonnets mainly fall into three categories of love, life and time. Corresponding with the target domain "love" are such source domains as war, wealth, appetite, burden, travel and slaves, etc. For the target domain of "life" are source domains like four seasons, journey, feast and so on. Sickles, evil guys and thieves are regarded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target domain "time".

Key words: metaphors; love; life; time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和诗人莎士比亚在1590-1598年间创作了154首十四行诗^[1-2]。这154首十四行诗感情炽烈、情调优美、思想深邃,堪称是英国文学的一座丰碑,英国诗坛的一朵奇葩。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永恒魅力和独特风格在于它丰富的词汇、精炼的笔墨、新颖的比喻、巧妙的结构与悦耳的音调,诗歌的艺术魅力在莎士比亚的诗集中发挥到了极致。大量的隐喻使用是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路易斯(C. Lewis)认为,隐喻是诗歌的生命原则,是诗人的主要文本和荣耀^[3]。诗人频繁借助隐喻表达思想,使诗歌变的复杂,故理解隐喻也就成了理解整首诗的关键。本文将综合著名隐喻研究者来考夫和约翰逊的隐喻理论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隐喻展开分析。

一、隐喻认知理论

有关隐喻的研究由来已久,传统隐喻研究即亚里士多德的“对比说”或“比较说”,认为隐喻是一种修辞格^[4]。

把隐喻作为修辞格向认知研究过渡阶段的最著名的理论是“互动理论”,它是由英国哲学家 I. A. Richards 提出,后经 M. Black 完善的一种隐喻理论。Richards 是最早提出“相互作用”这一概念的修学家。他对隐喻的定义依据的就是“相互作用”这一标准:“要判断某词是否用作隐喻可通过它是否提供了一个本体和一个喻体并共同作用产生了一种包容性意义”^[5]。Black 在 Richards 相互作用理论基础上对本体和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进

收稿日期:2013-05-31

基金项目:山西省回国留学人员科研资助项目(2011-082)资助

作者简介:张红丽(1972-),女,山西蒲县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语言学和英语教学。

行了详细具体的描述。Richards 将认知引入了隐喻分析,使隐喻研究朝认知领域发展,为认知语言学对隐喻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把隐喻研究纳入认知语言学领域的重要标志是 Lakoff 和 Johnson 所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根据认知语言学的研究,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不但在语言中而且在思想和行为中。隐喻认知理论认为隐喻是人类身体、大脑、心智和经验的产物,隐喻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映射过程。即人们在两种不同的事物之间找到某种相似性,而后把熟悉的、已知的、具体的范畴概念映射到抽象的范畴概念之中,也就是从始源域(source domain)映射到目标域(target domain)之中。Lakoff 将隐喻分为三类:结构隐喻、方位隐喻和本体隐喻^[6]。结构隐喻是以一种概念结构来构造另一种概念,两种概念相叠加,将谈论一种概念的各方面的词语用于谈论另一概念。如在 TIME IS MONEY 中,时间本身不是钱,也不是资源。但它通过隐喻被概念化为像钱一样的资源,可以像钱一样被浪费、节省、理智地花费,进行预算等。所以英语中有这样的表达: You are wasting my time. This gadget will save you hours. I've wasted a lot of time on you. 方位隐喻指运用如上下、内外、前后、远近、深浅、中心-边缘等空间方位的概念来理解另一概念系统。如在 I AM FEELING UP 中,“up”就是用“上”的方位概念隐喻性的表达愉快的心情。在本体隐喻中,人们将模糊的、无界的、抽象的感情、思想、事件、状态等看作是清晰的、有形的具体实体或物质。如 INFLATION IS ENTITY 中把“通货膨胀”隐喻为“实体”。于是就有了 If there is much more inflation, we'll never survive. We need to combat inflation. 等。

在谈到诗歌隐喻的话题时, Lakoff 认为,诗人在诗歌创造过程中除了使用传统意义上的各种修辞手段以外,更多的使用日常生活中的认知隐喻。从而赋予表述对象以具体特征,使抽象事物具体化,感情表征形象化,客观形象感情化,理性意义潜在化,用直接描绘曲折地表达思想感情^[7]。因此,从认知角度看诗歌与隐喻是同质的现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没有隐喻就没有诗歌,隐喻是诗歌的生命原则。那么作为文学巨匠的莎士比亚是怎样巧妙地使用认知隐喻来构建他的诗歌画面呢?

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隐喻

综合以上理论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隐喻进

行识别和归类,发现诗中的很多隐喻是关于爱、生命和时间的。这些隐喻大多由结构隐喻所构成。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对真、善、美的讴歌,对人性的充分肯定以及对“不朽”精神的追求在这些隐喻中得以很好的展现和释放。

(一)关于爱的隐喻

爱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永恒的主题。诗中的爱既包括爱情还包括友情。诗人一方面歌颂了爱情给人带来的欢乐、欣喜、疯狂,表达了他对爱情忠贞不渝、海枯石烂誓死不变的信念;另一方面却又因为朋友和爱人的背叛而感到忧伤、无助和悲痛。他清楚地看到了女郎的背叛,但却无法生起仇恨的念头,到头来发觉自己竟因对方的缺陷而爱得更深,于是这爱便也是值得称赞了。为了反映这个主题,诗中使用大量隐喻:爱即战争、爱即财富、爱即胃口、爱即负担、爱即旅行、爱即奴隶等。同爱这一目的域对应的有战争、财富、胃口、负担、旅行、奴隶等源域。

1. 爱即战争。为了得到爱去和对手进行激烈的战争是十四行诗的一个主题,因此爱就充满了竞争和痛苦,但这种战争却是诗人乐于参与的。在第 41 和第 42 首诗中,莎士比亚描述了两场战争:一是黑女郎赢得了年轻友人,一是诗人失去了年轻友人和黑女郎。第 41 首诗,年轻人是如此“高贵温柔”(gentle),所以遭人“艳羡”(won);又是如此“仪表堂堂”(beauteous),所以招人“撩诱”(assail)。第 42 首诗,“失败”(lose)反复出现,“A loss in love that touches me more dearly/ If I lose thee, my loss is my love's gain/ And losing her my friend hath found that loss/ Both find each other, and I lose both twain。”正是由于黑女郎赢得了年轻友人,诗人才被双重背叛,输了两场战争。这里用 won, assail, lose 等从源域战争投射到目的域爱情,来谈论情人之间的征服和被征服,获胜或惨败。第 31 首第十行“the trophies”原意是“战利品”,在此比喻诗人对已故朋友的爱;第 32 首第二行“ranks of better equipage”原意是“军事陈列”,在此比喻“更好的诗作”,第一个比喻说明能够被爱是一件多么自豪的事,仿佛赢了一场战争后得到纪念品一样;第二个比喻流露出诗人在和别的诗人争夺同一人的友情,在压力下希望得到他朋友的鼓励和支持。

2. 爱即财富。第 29 首诗,“For thy sweet love remember'd such wealth bring s/ T then I scorn to change my state with kings”,作者首次使用了隐喻

爱即财富。正因为他拥有无限财富,所以才不屑于同国王交换。在第40首诗中,这笔财富还遭到了抢劫“*I do forgive my robbery, gentle thief*”,在这里诗人称自己的朋友为“风流强盗”夺走了自己的爱。

3. 爱即食物。第75首诗,莎士比亚用该隐喻表达对年轻友人的感情,“*So are you to my thoughts as food to life. / Sometime, all full with feasting on your sight. / And by and by clean starve for a look.*”从这里可以看出,年轻友人俊美的外表像美味食物一样秀色可餐。当诗人看不到友人时,就像饥饿的人想看到食物那样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他。第147首诗,诗人把对黑女郎的喜爱称作不健康的胃口(*sickly appetite*)。

4. 爱即负担。爱是一种负担,一种每个人想承担的甜美的负担。第23首诗,“*overcharged with burden of mine love's might*”第一次出现了隐喻爱即负担。这里作者承受巨大的爱的负担而无法摆脱。第42首诗“*And both my sake lay on me this cross.*”中“*cross*”十字架喻指诗人的负担。在西方文化中,十字架是痛苦的象征。友人夺走了自己的情人,因此诗人失去了一切,对他而言,爱就成了一种负担。

5. 爱即旅行。旅行是许多隐喻的源域,第27首诗,“*but then begins a journey in my head*”,身体的旅行刚刚结束,心灵的旅程又开始了,这一切只是“为了你”。“*intend a zealous pilgrimage to thee.*”爱的旅程被赋予了宗教色彩,成了热情的朝拜。在诗人看来,他的爱人就如同上帝,同爱人的会面如同去朝圣一样。第117首诗,“*that I have hoisted sail to all the winds/ which should transport me furthest from your sight.*”这里作者靠风扯起帆把他送到离爱人最远的地方。

(二)关于人生的比喻

1. 人生即四季。关于人生即四季的隐喻贯穿于莎士比亚献给友人的十四行诗中。其中“春”出现6次,夏出现20次,“秋”出现3次,“冬”出现10次。春是一年中第一个季节,中国有“一年之计在于春”之说。春象征着一个崭新的开始,一个新生命的孕育,一个希望的到来。在第53首中诗人写到:“*Speak of the spring and foison of the year/ the one doth shadow of your beauty show/ the other as your bounty doth appear/ and in every blessed shape we know*”。此处,“春”喻指新鲜和活力。夏在诗中多次出现,如“*summer's green*”(Sonnet12),

“*summer's breath*”(Sonnet54),“*making on summer of another's green*”(Sonnet68)。英国的夏季不同于中国的酷暑,颇似中国春季的莺飞草长,绿意盎然,却又别具特色。英国夏天温暖而不炎热,是最宜人之季。然而英国的夏天又极为短暂,不历一月便已呈花褪残红之态^[8]。在诗人眼中,夏天象征着人生的巅峰时刻,辉煌但转瞬即逝,难怪诗人写到:就连美好的夏天也比不上爱友的美。如:“*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e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Sonnet 18)。诗人在欣赏夏的美好的同时也在感叹她的易逝。如:“*Summer's lease hath all too short a date.*”“秋”在诗中出现了三次,它是:“夏”和“冬”的过渡期,喻指人生由巅峰走向没落。如“*have from the forests shook the summer's pride / Thee beauteous springs to yellow autumn turned*”(S104),从中可以体会到“人生飞逝,美亦难留”。“*for never - resting time leads summer on / To hideous winter, and confounds him there*”(Sonnet 5),从中可看出,秋去冬来,大自然到了衰败的季节,人的一生也进入了低谷,寂寥失落的晚年。“*what freezing have I felt, what dark days seen! / what old December's bareness every where! And thou away, the very birds are mute/ or if they sing, tis with so dull a cheer/ that leaves a look pale, dreading the winter's near*”(Sonnets 97)。诗人此刻的心情也犹如人生四季的改变,友人的离去是诗人的世界一片阴冷与漆黑,到处弥漫着冬的荒芜,就连鸟的歌声都变得凄婉伤感,树叶也呈现出衰败的颜色。

2. 人生即太阳的旅程。莎士比亚用太阳的旅程即日出日落喻指人的一生,冉冉升起的旭日崭新又有活力。“*Full many a glorious morning have I seen / flatter the mountain tops with sovereign eye*”(Sonnets 33)。sovereign eye 指的太阳,它冉冉升起,给万物带来生机。当太阳到达山顶时,它在这一刻最温暖、最耀眼,宛如一个人到达其人生与事业的巅峰。“*And having climbed the steep - up heavenly hill, / Resembling strong youth in his middle age*”(Sonnets 7)。这是一个人最有能力最为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他应尽其所能实现成功的目标,否则将虚度青春。对莎士比亚的爱友来讲,他应做的就是生子,以此来继承自己的美貌,这样爱友的美貌就会因后代的继承而永不消逝。之后,太阳渐渐落下去了,“*like feeble age, he redleth*

from the day”(sonnet7)。这里日落就如同人到暮年,虚弱,行将朽木,只能靠回忆安慰自己。这样诗人用日出日落成功的描述了人生的三个阶段。

3. 人生即盛宴。第1首诗,“Pity the world, or else this glutton be / to eat the world’s due, by the grave and thee”。作者使用 Glutton 来描绘世界就是美食,人生如同一场盛宴,因此人生就是一次享受盛宴的过程。当盛宴被享用完毕就意味着人生的终结。如只把盛想要用完毕而不给世界留下任何回报,这样的人极为贪吃,在第2首诗中,“Were an all eating shame and th e thrifless praise”,贪吃和不生孩子都是让人可耻的事情,作者在劝说友人结婚生子。

(三)关于时间的比喻

1. 时间即镰刀。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一个最大的主题就是关于时间的描述和论述。对于诗中讲话人来说,时光飞逝,扫荡一切。时间的摧毁力和破坏力极大。时间即镰刀,这一比喻在第12、60、100、116、123、126首诗中多次出现,充分显示了时间的破坏性。镰刀出自古希腊神话,本是时间之神科拉诺斯的武器,克拉诺斯用镰刀阉割了自己的父亲乌拉诺斯,镰刀喻指残酷无情。这一比喻在第60首十四行诗里比较集中,诗中写道:“like as the waves make towards the pebbled shore, / So do our minutes hasten to their end; / Each changing place with that which goes before, / In sequent toil all forwards do contend. / And Time that gave doth no w his gift confound.”这首诗集中描写时间之潮带给人的紧迫感以及时间本身的毁灭性。时间馈赠给人以生命,却又将它送出的礼物捣毁:“/Time doth transfix the flourish set on youth. / And delves the parallels in beauty’s brow, feeds on the rarities of nature;s truth, / And nothing stands but for his scythe to mow.”时间假人以生命,说明时间的创造力量,同时,时间又毁灭一切,说明时间的毁灭性。他通过不断的毁灭和再生,创造了宇宙的连续性。

2. 关于时间的其它比喻。在诗集中,“时间”有时俨然成为了一个“邪恶之徒”。它是“嗜血的暴君”(bloody tyrant),对爱友的美颜施暴虐于某一天(Sonnet5, Sonnet 16);它是“窃贼”(thief),“偷取”(steal away)爱友春情勃发的活力(Sonnet63)。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莎士比亚对“邪恶之徒”的手进行了特写:那是双冬寒粗手(ragged hand)把爱友体内的夏天掠夺(Sonnet 6),是双残酷之手(cruel

hand)、狠毒之手(injurious hand)将爱友捣碎、折磨(Sonnet 60, Sonnet63),还是双毁灭之手(fell hand)抹掉前代留下的豪华与荣光(Sonnet 64)。这些细节描写表达了莎士比亚对时间的独特体验和思考,既刻画了时间对爱和美的无情侵蚀,也表现了诗人企图超越时间暴政的愿望。

三、结语

在穿越整个诗歌的进程中,读者观赏到了诗人精心构造的宏大而复杂的隐喻构架。爱是一场战争,充满了竞争和痛苦;爱是财富,使人富有;爱又是一个甜美的负担和一场美丽的旅行;人生宛若四季的改变,日出日落便代表了一生;人生又如同一次享受盛宴的过程;时间宛若一把破坏力极强的镰刀,一个邪恶之徒,一个嗜血的暴君。这些隐喻的设计把熟知的事物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出来,把读者带入了一个既跌宕起伏又层次分明的画卷中,使读者在获得美感享受的同时,也得到新的启示。从上面的分析可看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这些大量的隐喻不仅说明了这位诗人想象和联想的天才和技巧,而且通过这些隐喻可以读出他的思想,他的感情以及他在诗中要阐明的主题,体现了一个时代人文主义的风貌,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价值和开放性意义。

参考文献:

- [1]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M]. 屠岸,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 [2]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M]. 梁实秋,译.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 [3] 束定芳. 论隐喻的诗歌功能[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6):12-16.
- [4] 束定芳. 亚里士多德与隐喻研究[J]. 外语研究,1996(1):13-17.
- [5] I. A. Richards.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A]. 冯晓虎. 隐喻思维的基础,篇章的框架[C].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
- [6] Lakoff, George &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 [7] Lakoff, George. Ten Lectures 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 [8] 林瑛. 探析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十八首“夏日”的意象与人文主题[J]. 现代语文,2009(4):123-124.

[责任编辑:吴晓红]

英语学术论文摘要中评价型 - that 从句的人际功能

江加宏

(安庆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摘要: 学术论文摘要是一种特定的交际事件, 具有特定的交际目的和交际对象, 因而在语篇结构上不只是提供相关研究信息和对客观事实的陈述, 还具有特定的评价和人际等社会功能。对6种不同学科240篇英语论文摘要中具有评价意义的 - that 从句的研究表明, 学术论文作者在摘要中以不同的评价对象、评价源、评价立场和评价方式, 借助 - that 从句明示研究内容和研究发现, 或显性评价自己和他人研究结果, 表达自己的立场, 从而实现其人际交际目的。

关键词: 学术论文摘要; 评价型 - that 从句; 人际功能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4)01-0067-07

Interpersonal functions of evaluative - THAT clause in the abstracts of English academic papers

JIANG Jia - h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qing Teachers College, Anqing, Anhui 246133, China)

Abstract: The abstract of an English academic paper is a particular communicative event, which has particular communicative purposes and objects. Therefore, it not only provides relevant research information and presents objective facts, but also has particular evaluative and interpersonal function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240 abstracts of English academic papers chosen from key journals of 6 different disciplines, the paper finds that through various evaluated entities, sources of evaluation, evaluative stance and evaluative expressions, these abstracts widely employ the evaluative - that clause, which helps writers to manage their discourses in various ways and to signal a clear stance towards the information they present.

Key words: abstracts in academic papers; evaluative - that clause; interpersonal functions

近年来,学术语篇的体裁分析成为语言学研究的焦点之一,学者们对各种学术语类的宏观结构和微观语用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作为学术语篇的一种语类,学术论文摘要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课题。学术论文摘要是一种特定的交际事件,具有特定的交际目的和交际对象^[1],因而在语篇结构上不只是提供相关研究信息和对客观事实的陈述,还具有特定的评价和人际等社会功能。Hunston & Thompson^[2]、Martin^[3]、Crismore^[4]等分别从评价(evaluation/appraisal)、立场(stance)和元语篇

(metadiscourse)角度对论文作者是如何在摘要部分“推销”自己的研究成果、“说服”语篇社团其他成员接受自己的观点与目的进行了研究。鞠玉梅考察了学术论文摘要的宏观结构^[1];姚俊对英语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摘要的语篇模式与介入标记进行了实证研究^[5];曹雁等考察了科技期刊英文摘要学术词汇的语步分布和使用特点^[6]。但以上研究均未涉及具有一定人际意义的评价型 - that 从句的语用功能。基于此,本研究拟根据6种不同学科的240篇英语论文摘要中 - that 从句的使用

收稿日期:2013-10-28

基金项目:国家级英语特色专业项目(TS12154)资助

作者简介:江加宏(1972-),安徽安庆人,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和外语教学。

频数,总结出该构式(construction)的类型,探究其评价性人际意义,从而管窥其深层语篇语义功能,为国内学者英文摘要的写作和教学提供参考。

一、评价型 - that 从句的研究回顾

评价型 - that 从句是一个由 that 引导的从属关系句,从句与主句之间可为动宾或系表关系。在学术论文摘要中,这类主、从句共同影射作者对某事物的观点和态度,如 We believe that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holds between these features^①,主句 we believe 含评价和评价源(source of the evaluation); - that 从句含被评价实体(entity),亦即,由 - that 构建的从句是被评价实体——评价对象。评价型 - that 从句结构是学术语篇表达评价意义的一种有效途径^[7],通常由认知或情感动词如 think, know, believe, 言语行为动词 say, state 和交际动词 suggest, prove 等表达。

传统语法^[8-9]将评价型 - that 从句称为“外位结构(extraposition)”,王勇称之为评价型强势主位结构^[10],即概念主语移位至谓语动词后面,其位置由先行主语 it 替代。该构式显性表达目标情态立场^[11]^[6]^[5],同时还使立场背景化。此外,作者还用像 we are confident that those two variables will suffice to monitor success of CM implementation. 构式前景化自己的观点、立场。Biber et al^[12]研究发现,学术语篇使用评价型 it...that 构式远比小说和会话语篇多。Herriman^[13]认为,学术语篇作者高频使用评价型强势主位结构是以显性命题方式呈现自己的评价,目的是突显命题的普遍性和客观性。

以上研究仅限于 it...that 构式,未涉及具有人际评价资源意义的不同类别主语。主句的主语能使作者接受或转移评价的责任,或隐藏信息源。Halliday & Matthiessen^[11]通过情态语法隐喻阐释了 - that 构式主句的整体一致性。他们认为 - that 构式是单一情态动词使用选择的一个语法隐喻变

异。无论评价是主观的(I think)还是客观的(it is likely),作者都可以显性编码。Eggins^[14]^[18]把该构式称为附着于主句的情态化假拟从句,其目的是突显情态源或隐藏情态源。Thompson & Ye^[15]对 - that 构式主句谓词研究后强调,动词选择在转述结构中具有评价性意义,不同动词的选择会影响读者与所转述内容之间关系的建立。因此,动词的选择隐含作者的评价立场。上述研究丰富了评价型 - that 从句的研究,但均未论及作者是如何表达对评价对象的立场。本研究拟选取不同学科英语论文摘要,建立小型语料库,探究 - that 构式在学术论文摘要中使用频率,并分析其人际评价功能。

二、语料选取和研究步骤

本文研究语料选自国外人文社会科学(以下简称 SS)和自然科学(以下简称 NS)共 6 种不同学科:应用语言学(AL)、经贸(BS)、公共管理(PA)、生物(Bio)、计算机(CS)和电子工程(EE)类权威刊物 TESOL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BMC Biology, 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和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ducation 中 240 篇论文摘要,每科 40 篇。语料选取后,我们建立了一个近 40 000 字的语料库,运用检索软件 WordPilot2000 筛选出符合本研究的共 273 句含 - that 的从句(包括省略 - that 的句子,如 The authors acknowledge their numbers are only estimates.),其中剔除了 that 充当语法功能词的句子如 I am referring to that aspect of discourse.、It refers to constructions that contain a projecting and projected clause.,然后质性分析讨论相关数据。

三、结果与讨论

(一)评价型 - that 从句的使用频率

表1 英语学术论文摘要中 - that 从句使用的相关信息

项目	学科名称	AL	BS	PA	Bio	CS	EE	总数
摘要总字数		6 438	7 133	6 069	8 246	6 711	4 782	39 379
摘要总句数		238	256	241	249	223	209	1 416
- that 从句的总频率		42	57	46	60	57	11	273
- that 从句的篇频率		1.1	1.4	1.2	1.5	1.4	0.3	MD = 1.2

(Note: 不同学科论文篇数分别为 40)

① 文中所有例句均引自本研究选取的 240 篇论文摘要。

表1显示了不同学科英语学术论文摘要中评价型 - that 从句使用的总频率和篇均频率。由表看出,篇摘要句数约为6,且每篇摘要中至少有1句评价型 - that 从句。这表明,简短且具有总结性的论文摘要为作者提供足够的空间显性表达评价。

显性评价和人际介入是SS学术写作的特征^[7],但表1表明,不同学科并非严格对应显性评价和人际介入。生物学科摘要使用 - that 从句数最多,而应用语言学和公共管理类论文摘要中 - that 从句篇均数接近或等于平均数。因为SS研究者更多运用情态动词和表态度的副词等评价资源,如:

(1) Nevertheless, EPA may fail to minimize violations of and generally deter non - culpable individuals who are affiliated with large firm. (PA类摘要)^①

但简短、极具严密性的电子工程类摘要中评价型 - that 从句的使用频率最低,40篇摘要仅有10句。这说明电子工程学科研究者对研究内容涉及

的目标读者非常熟悉。因为目标读者可依据相关假设,借助已有知识能识别出研究的重要意义,故无需做显性评价。电子工程学科论文作者在摘要写作时最关注的是向目标读者提供本学科的最新发展,而不是显性呈现自己对相关研究的评价。

(二)基于不同评价维度的评价型 - that 从句

以评价对象、评价立场、评价源和评价方式为维度,我们将273句评价型 - that 从句进行了统计分析(见表2)。统计发现,论文作者共使用238句(87%) - that 构式呈现和评价自己的研究,这表明论文摘要主要是展现作者的自我认知评判。Coates^{[16][12]}认为,说话者的假设或可能性评价是由认知情态体现的。大多数情况下,认知情态表征的是说话者对命题真值的确信与否。亦即,研究者在论文摘要中运用 - that 从句评述研究的精确性或论述内容的真实性,呈现自己的观点、立场。研究结果和研究方法等抽象实体为主要评价源,由不同的转述动词表达评价。

表2 评价型 that 从句的分类

评价维度	次类	例句
评价对象	a. 作者观点	a. We show that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about “forgone” alternatives can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post - choice valuation.
	b. 以往研究	b. Although research shows that vocabulary can be acquired directly through reading, ...
	c. 研究目的	c. It is our hope that the framework will be applied to other contexts, ...
	d. 研究方法、模式和理论	d. It was found that the results of the model were in very good consistency with ...
评价立场	a. 态度	a. We demonstrate that the magnitude and duration of flagellar RNA accumulations are signaled by an acid shock induced Ca ²⁺ + influx.
	b. 认知	b. It is proved that the class of languages having quantum multi - prover interactive proof systems is necessarily contained in NEXP.
评价源	a. 有生命的(作者或者他人)评价源	a. Lefkoff - Hagijs and Mason (1993) found that this effect is due to the consumers' use of different product attributes in making and preference judgments.
	b. 抽象评价源	b.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learners' pragmatic competence on gratitude speech act does not develop in a systematic pattern.
	c. 隐性评价源	c. It is well - known that the inf - sup condition is satisfied for the first variant.
评价方式	a. 非动词谓词	a. The conclusion advanced is that the potential of interactive multimedia for language learning is high but that to realize this potential designers will need to ...
	b. 动词谓词 (包括研究行为/find, demonstrate, indicate; 话语行为/argue, propose; 认知行为/perceive, believe)	b.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role of political culture should not be ignored and that it may be very useful for explaining policy variations that exist between jurisdictions.

① 引自不同学科摘要的例句下文仅注学科类别。

(三) 评价型 - that 从句的人际功能

1. 评价对象的人际功能。

评价对象是指 - that 从句中的命题,即作者的观点。6种不同学科中绝大部分评价对象均为作者的观点(见表3)。由表3可知,作为说服和信息提供语类,论文摘要是作者以语篇方式对其研究及

研究发现进行强调,希望以此吸引读者、激发读者接受论文观点,从而通览全文。作者将自己的观点和研究发现前景化,强调研究结果与研究结果信度之间的相关性和重要性,在确立其研究重要意义和对该学科贡献的同时还增强了摘要的修辞效果^[7]。

表3 不同学科 that 从句表达被评价实体的百分比

学科	百分比	类别	AL	BS	PA	Bio	CS	EE	占总数的百分比
作者观点	78		78	84.2	78.3	100	94.7	80	87.9
以往研究	17.1		17.1	12.3	19.6	0	5.3	20	10.3
研究目的	4.9		4.9	1.8	0	0	0	0	1.1
研究方法	0		0	1.8	2.2	0	0	0	0.7

如前所述,评价型 - that 从句的主句通常包括评价源和立场,因为评价本身就涵盖了评价的重要性,无需说明研究观点的基础。这表明,论文观点或 - that 从句中呈现的评价对象是论文主体要充分论述的。但也有作者试图在摘要中通过主句和 - that 从句呈现支撑研究发现的相关信息从而强调其研究发现。如:

(2) The improvement of device linearity and the enhancement of current density suggest that the multi-step doped - channel FETs are very promising for high power large signal circuit applications. (EE)

作者有时用同样的主句,后接多个研究对象的评价框架:

(3)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role of political culture should not be ignored and that it may be very useful for explaining policy variations that exist between jurisdictions. (PA)

评价对象也可是研究目的,正面评价的研究方向或结果。多数情况下,SS论文比NS论文更多地以研究目的为评价对象。作者在传递研究目的的同时还提供相关的研究计划,并正面评价研究价值。如:

(4) It is hoped that the framework will be ap-

plied to other contexts and provide as a basis for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of English in national contexts.

(AL)

尽管作者在摘要部分大量陈述自己的研究发现,但表3显示,有10.3%的评价对象是他人的研究成果,这在SS类论文中较为突出。Hyland^[7]认为,SS领域研究者常给予他人更多的空间发表观点。表3表明,应用语言学、经贸和公共管理类论文摘要用 - that 从句陈述他人研究成果总共才48%,但电子工程类论文摘要陈述他人成果(20%)是个例外。对作者来说,简短的论文摘要语篇难以验证他人观点,评价他人成果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因此,作者几乎对以往研究不做负面评价,多数论文摘要以模糊语言如“根据研究或文献”阐明观点的来源。但实际上,所有研究都是建立在以往研究基础之上,论文摘要的功能之一就通过文献说明当前研究的创新性及与以往研究的联系。例如:

(5) It has been observed by E. Eberlein and U. Keller that the hyperbolic distribution fits logarithmic rates of returns of a stock much better than the normal distribution... (CS)

2. 评价源的人际功能。

表4 不同学科论文摘要中 - that 从句评价源的分布

学科	百分比	类别	AL	BS	PA	Bio	CS	EE	占总数的百分比
有生命的评价源	14.7		14.7	35.1	21.7	32.7	57.9	0	32.7
抽象评价源	51.2		51.2	54.4	69.6	52.5	12.3	50	47.1
隐性评价源	34.1		34.1	10.5	8.7	14.8	29.8	50	20.2

作者在对自己研究发现做出评价的同时还尽量使自己与论述的内容保持距离,即评价型 - that 从句的主句主语多为抽象评价源(见表4),有20.2%是以先行 it 作主语的隐性评价源。作者希冀以研究结果、模式、方法或整个研究为评价型 - that 从句的评价源限制自身的施事角色。施事的缺省有助于排除隐含的外部干扰因素,如个人兴趣,社会忠诚,推理能力等。这些因素会影响研究结果的真实性。该策略在 NS 论文摘要中更为突显,因为外部人为因素的排除有助于维护 NS 知识的合法性,表明该研究是建立在科学方法之上,并非是对以往研究的简单复制、伪造,或是对现有方法的僵硬套用^[7],这既暗含着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又表明研究方法的合理性,还显示了研究发现的价

值。如:
(6) Experiments on the more than 9000 tandem repeats from human chromosomes 1 and 22 demonstrate that our PTAS generates less costly histories in acceptable time than other heuristic methods. (CS)

先行 it 的使用是作者有意用抽象对象替代有生命的评价源,以期转移读者的注意力。这表明,概括性的评价源是不会引起争议或已得到广泛接受。例如:

(7) It has recently been suggested that a num-

ber of experimental findings of context effects in choice settings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ability of subjects to draw choice - relevant inferences from the stimuli. (BS)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作为施事的作者是很容易回溯的。因此,作者只有通过运用前景化的非人称代词 it,将其观点去个性化,使之具有客观性和概括性,这样作者可以明示该观点并非自己的主观判断。例如:

(8)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bypass flow provides an additional pathway for sodium uptake in rice and that this accounts for the functional and genetic independence of sodium. (Bio)

3. 评价立场的人际功能。

在前文我们注意到,评价型 - that 从句的使用主要是使评价主题化,使之在语篇上突显。而作者有时可能隐藏观点源,使 - that 从句中的命题评价前景化。这样的评价主要有态度型或认知型,并通过控制主句的谓词实现其评价意义。但态度型评价在学术论文摘要写作中不常见。而学生学术论文摘要写作则倾向使用态度资源,如喜欢、不喜欢、期望以及义务等^[5]。表5显示,认知型评价是摘要立场的主要表达方式,是作者对真值的评价或表征陈述的可信度。

表5 不同学科论文摘要中 - that 从句评价立场的分布

学科	百分比	类别	AL	BS	PA	Bio	CS	EE	占总数的百分比
		态度型	4.9	1.8	0	0	1.8	0	1.5
		情感	4.9	1.8	0	0	1.8	0	1.5
		义务	0	0	0	0	0	0	0
		认知型	95.1	98.2	100	100	98.2	100	98.5
		确信	38.7	53.5	41.3	59.0	91.6	44.0	54.7
		怀疑	56.4	44.7	58.7	41.0	6.6	56.0	43.8

在认知评价中,确信(certainty)在语料中占54.7%,这再次说明摘要语篇具有特定的目的。即作者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力图通过细致和精确的方法,说服目标读者,证实研究观点的可接受性和合法性。作者需要在摘要部分选择不同的评价立场,使命题令人信服,对读者产生即刻影响,从而激励读者通览全文。认知型评价方式在 NS 类和经

贸类论文摘要中的使用比较显著,尤其是转述动词的运用,间或使用高情态量值的形容词。如:

(9) a. It is apparent that these critical temperatures may provide quick and reliable screening for chilling sensitivity in plant breeding programmes. (Bio)

b. It is proved that the class of languages having

quantum multi - prover interactive proof systems is necessarily contained in NEXP. (CS)

而 SS 论文摘要则更多使用尝试性谓词 (tentative predicates)。也就是说, SS 类论文作者通常用表建议、讨论、表明或假设类的谓词陈述研究结果,

这是因为 SS 类论文的研究结论具有明显的开放性特点决定的^[17]。例如:

(10)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meaning negotiation may play a less prominent role in acquisition for children than it does for adults. (AL)

表6 人文社会/自然科学学科与 - that 从句搭配的 5 种常用词

排序	人文社会学科	频率	自然科学学科	频率
1	suggest	38	show	40
2	argue/argument	17	suggest	12
3	show	16	demonstrate	11
4	indicate	12	prove	8
5	find/found	6	indicate	7
所占百分比	64%	61%		

通过考察主要谓词的频率(表6),我们发现,不同学科摘要部分的确信陈述是有差异的,作者对 - that 从句中命题评价的用词也明显不同。show, demonstrate 和 prove 与 - that 从句的搭配在 NS 论文摘要中位列前五。相比, SS 论文摘要部分这些动词的使用较少,其确信陈述的动词主要为 suggest, argue 和 indicate。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映了 SS 对具体问题阐释的开放性特征,所以 SS 常呈百家争鸣之势。

4. 评价方式的人际功能

表7 英语学术论文摘要部分与评价型 that 从句搭配的动词类型

学科 百分比 表达形式	AL	BS	PA	Bio	CS	EE
非动词谓词	12.2	8.8	4.3	4.9	7.0	10
动词谓词	87.8	91.2	95.7	95.1	93	90
研究行为动词	33.3	50	27.3	60.4	85	55.6
话语行为动词	55.6	40.4	63.6	36.2	1.9	33.3
认知行为动词	11.1	9.6	9.1	3.4	13.1	11.1

由表7看出,英语学术论文摘要中很少使用形容词或名词等非动词谓词;而动词谓词也多是转述研究行为。我们对语料中所有谓词形式详细考察发现,仅有20例是非动词谓词形式,15句为名词,5句为形容词。而 Rodman^[18]对期刊论文摘要先行 it 作主语谓词使用的研究发现,评价型 - that 从句主句中40%的谓词为形容词,以 it is possible that...和 it is clear that...最常见。我们认为,尽管

作者试图体现论文的语篇功能,但与先行 it 搭配的动词十分有限。作者在 - that 从句中没有以证据引导读者,引入新话题,概括相关信息,或表达情感,因为他们力图提供的是对研究发现的评述,这既是一定程度的肯定又是对特定行为的强调。而名词使用频率高于形容词,是因为名词能呈现隐性和非人际性评价。例如:

(11) A key aspect of the IDA framework is that it explicitly models alternatives in the market as being indivisible, while past work has assumed perfect divisibility. (BS)

另外,动词的大量使用与摘要表达大量认知意义有关。我们知道,大多数评价是言据性的,关注的是信息或研究结果的效度。不同的动词能使作者有效调整评价,即不同的动词不仅可以表达作者的疑问或肯定,还能强调特定的行为^[7,15]。作者既可以以研究、认知或语篇聚焦建构评价,又可以隐性标记评价是基于研究的、阐释的还是转述的。表7显示,研究行为动词占了一半,其中 NS 论文作者倾向于使用此类动词,而 SS 的论文作者多使用话语动词。这无疑镜像了研究动词使用的整体分布,同时还反映了不同学科研究的意识形态,即 NS 研究强调实验的重要性和实验结果的阐释价值,而 SS 研究具有论辩性及论文语篇的说服力。有趣的是,行为动词与有生命评价源(语料中共有61句)和抽象评价源(语料中有59句)的共现频数基本相同,但在话语动词中,抽象对象的评价源(语料

中有 60 句)是有生命评价源的三倍。实际上,三分之二的话语行为动词的主语是抽象名词。因为有生命评价源在表达人际意义上具有风险性,从而影响了人称主语和话语动词的使用,且话语行为动词的使用也主要是强调研究观点的基础。如:

(12) a. Data analysis suggests that he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shaped her approach to US. academic discourse practices and the way she theorized about those practices. (AL)

b. This article begins by criticizing the recent intervention by Charles Murray, insisting that Murray opens the door to a laissez faire eugenics. (PA)

概言之,论文作者在选择填充评价型 - that 结构谓词槽时,动词比名词和形容词的使用要多。不同学科在动词选择上也明显各异,NS 论文作者倾向于选择行为动词而 SS 论文作者倾向使用话语动词。

四、结语

本文在自建语料库的基础上,通过质化分析研究发现,评价型 - that 从句广泛用于英语学术摘要语篇,论文作者以此方式对相关观点进行评述和评价;是作者引入论文主要论点、总结研究目的和方向以及呈现论文信息的一种可靠的有效途径。评价型 - that 从句表达形式的多样性反应了论文作者以不同认知视角呈现观点。最重要的是,论文摘要部分 - that 从句的高频使用表明作者运用丰富而又有些微差异的方式评述自己和他人成果,使自己的立场作为命题和主题前景化,在有效展现自己评价型观点的同时突显论文重要观点和研究发现从而激发读者通览全文的兴趣。当然,评价型 - that 从句仅是作者在摘要中提出问题、表达观点和态度的一种路径,是学术语篇实现评价和情感意义的主要方法,至于该构式在其他学术语类中是否具有同样的说服力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1] 鞠玉梅. 体裁分析与英汉学术论文摘要语篇[J]. 外语教学, 2004 (2): 32 - 36.
- [2] Hunston S & Thompson G. Evaluation in text [M]. Oxford: Oxford UP, 2000.
- [3] Martin J. Beyond exchange: APPRAISAL systems in English [A]. In Hunston S & Thompson. (eds) Evaluation in text [C]. Oxford: Oxford UP, 2000.
- [4] Crismore A. Talking with readers: Metadiscourse as rhetorical act [M]. New York: Peter Lang, 1989.
- [5] 姚俊. 英语论文摘要的语篇模式与作者介入[J]. 外语教学, 2010 (4): 29 - 33.
- [6] 曹雁, 牟爱鹏. 科技期刊英文摘要学术词汇的语步特点研究[J]. 外语学刊, 2011 (3): 46 - 49.
- [7] Hyland K. Disciplinary discourses: Social interactions in academic writing [M]. London: Longman, 2000.
- [8] Chalker S & Weiner E.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grammar [M]. Oxford: Oxford UP, 1998.
- [9] Quirk R, Greenbaum S, Leech G & Svartvik J. A grammar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M]. Harlow, Essex: Longman, 1985.
- [10] 王勇. 评价型强势主位结构的功能理据分析[J]. 外语学刊, 2011 (2): 56 - 61.
- [11] Halliday M A K & Matthiessen C M I M.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3rd edition) [M]. London: Edward Arnold, 2004.
- [12] Biber D, Johansson S, Leech G, Conrad S & Finegan E. 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M]. Harlow: Longman, 1999.
- [13] Herriman J. The functions of extraposition in English texts [J]. Functions of Language, 2000, 7 (2): 203 - 383.
- [14] Eggins S. An Introduction to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M]. London: Continuum, 1994.
- [15] Thompson G & Ye Y. Evaluation in the reporting verbs used in academic papers [J]. Applied Linguistics, 1991, 12 (4): 365 - 482.
- [16] Coates J. Epistemic modality and spoken discourse [J].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1987 (85): 100 - 131.
- [17] 陆元雯. 基于语料库的英文论文摘要的语言特点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9 (6): 8 - 13.
- [18] Rodman L. Anticipatory IT in scientific discourse. Journal of Technical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J]. 1991, 21 (1): 17 - 27.

[责任编辑:吴晓红]

基于概念合成理论的矿冶戏剧认知诗学分析

——以《钢铁夫人》为例

李金妹, 吴晓云

(湖北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 湖北 黄石 435003)

摘要:从认知诗学的角度,探讨概念合成理论对矿冶文学戏剧《钢铁夫人》在词汇层、语义层以及语篇层的意义的建构和理解,揭示话剧理解的认知过程,使读者能清楚地了解该话剧情节的发展过程以及剧目之间内在的联系网络。验证了概念合成理论对话剧理解的解释力,旨在为中国本土的文学作品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为研究黄石矿冶文学作品提供一种新的方法。

关键词:《钢铁夫人》;矿冶戏剧;概念合成理论;认知诗学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4)01-0074-06

A CBT – based cognitive poetic analysis of mining and metallurgy drama text: The Steel Lady

LI Jin – mei, WU Xiao – y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be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uangshi, Hubei 435003,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poetic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functions of 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 on the meaning construction and comprehension at the lexical, semantic and discursive levels and reveals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interpretation in the mining and metallurgy drama The Steel lady, clarify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plots and the internal relational network among the acts. The paper tests CBT's interpreting power to the drama with a view to supplying new theoretical support to Chinese local literature works and supplying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mining literature in Huangshi.

Key words: The Steel lady; mining and metallurgy drama; 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 cognitive poetics

戏剧内涵丰富,艺术手段多样,是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剧本”既可以作为文学作品供读者欣赏,也可以作为舞台演出的蓝本与观众见面^[1];它如同小说一样强调情节、人物等,但却有独特的语言方式。

侯涛提出戏剧文体学从描写性研究发展为解释性研究,目前已进入戏剧话语语用和文学认知关系的研究^[2]。如:俞东明、左进探究了语用模糊、会话策略这两类语用方法对戏剧人物刻画的作用^[3];侯涛、俞东明从语用文体认知的角度分析了

《雷雨》人物对话和文学话语的语用建构和文体特征,提出了戏剧文本话语多层分析方法^[4];高剑妩、申丹采用礼貌策略和人物塑造理论对《慈善家》剧本进行了文体分析^[5];高剑妩在修正 Brandt 等的四空间模式的基础上,以《伽利略转》为例提出戏剧认知诗学分析的一般模式^[6];徐海云运用认知语言学的典型理论、认知模型和文化模型诠释了莎士比亚戏剧的欣赏和批评^[7]。

由此可见,国内学者大都运用语用学的理论,如礼貌策略、会话分析和合作原则等对剧本进行文

收稿日期:2013-04-23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认知诗学视角下的英语教学模式研究”(2012B212)、湖北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艺术学理论”(2013XKJS)、湖北理工学院青年项目“认知诗学与文学语篇分析”(12xjr49Q)、黄石市社会科学研究课题“认知诗学理论视域下的黄石矿冶文学研究”(2012SSK05)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金妹(1983-),女,湖北荆州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认知诗学和英美文学。

学认知分析,从其他学科角度对剧本进行研究的比较少。本文力求对“认知诗学视域下的矿冶文学的研究”这一课题有所贡献,从认知诗学的角度,探讨概念合成理论对矿冶戏剧《钢铁夫人》在作者构思和读者理解方面的认知机理,从而验证概念合成理论对话剧的解释力,旨在为中国本土的话剧分析提供实际的指导作用,为研究矿冶文学作品提供一种新的方法。

一、话剧《钢铁夫人》简介

无场次大型话剧《钢铁夫人》^[8]是湖北剧作家裴有猷的著名作品,也是长江中、下游矿冶戏剧的代表作之一。它以改革大潮中的现实为题材,描绘了钢铁工人的生活画面,围绕厂内资金紧缺,原钢铁厂厂长胡涓进行机构调整、人才培养、设备改造等一系列措施展开故事情节,领导与领导之间、领导与工人之间发生的矛盾和冲突将剧情逐步推向高潮。最终经过大家锲而不舍的艰苦努力,排除障碍,钢铁厂在改革大潮中稳步前进。《钢铁夫人》塑造了以原钢铁厂厂长胡涓为代表的大批钢铁工人的形象,反映了今天的矿冶人的精神风貌,展现了改革大潮中黄石矿冶人身上那种特有的无私奉献、乐观向上、刚性的精神风貌,理性与感性结合的特质。同时它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典型独特的时代场景,别出心裁的开放式结构和浓厚的富有人情味的地方特色方言,使得我们感受到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吸引了广大矿冶文学研究学者的注意^[9-10]。

二、概念合成理论及其发展应用

概念合成理论(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是在心理空间理论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是认知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成果,属于认知语义学范畴^[11]。心理空间可建立起一系列如时间、信念、虚拟等概念。概念合成理论认为意义的生成和理解是通过非组合性的概念整合积极建构意义的实时动态过程,是人们进行创造性思维和活动时的一种认知过程,它为文学的创造性与新意义的动态建构提供了系统的解释。

Fauconnier & Turner 指出,基本的概念整合网络模式是由四个空间构成的,即两个输入空间,一个类属空间和一个合成空间。类属空间反映的是由两个输入空间共有的普遍概念结构;合成空间除了包含类属空间中的普遍结构外,还包含两个输入

空间选择性投射的特定结构以及合成空间本身通过组合、完善、扩展而建立起来的新创空间(emergent structure)。新创空间不存在于原有的输入空间中,体现了概念整合的创造性。这四个心理空间通过投射彼此连接起来,构成了一个概念整合网络^[12-13]。

概念合成理论自问世以来,被广泛地应用于语言、文学、艺术、音乐理论、宗教、计算机科学等领域,并取得丰硕成果。

三、认知诗学模式下概念合成理论对《钢铁夫人》的解读

戏剧文本的研究不但要对戏剧语言进行一般的静态描述,还应通过描述把戏剧语言与内容联系起来,借助全新的语言学理论着重研究话语意义的生成和理解的动态过程^[14]。戏剧作为一种文学作品,对于读者而言,阅读是发生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种互动活动,作者所创造的语篇并非完整,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利用背景知识和概念整合的认知加工方式加以补充和完善,也就说读者是处于一个重新创造的过程^[15]。

将认知语言学的概念合成理论用于探讨剧本解读的认知过程属于认知诗学的研究范畴。概念合成理论,作为一种认知操作模式,为话剧分析提供了比常规分析理论更加理想的推理机制。下面本文基于概念合成理论,以黄石矿冶文学戏剧《钢铁夫人》为语料进行认知分析,讨论概念合成在词汇层、语义层以及语篇层的认知建构,揭示话剧理解的认知过程,使读者清楚地了解该话剧情节的发展过程以及剧目之间内在的联系网络。

(一) 词汇层面

例1:

杨世杰:来这么三个人就能扭转局面了?

胡涓:这不是三个人,是一批人。

孟辉:怎么?还有人?

胡涓:你忘了那个典故了?燕王濒临灭亡的时候,燕昭王重用了一个郭瑰,不是招来了乐毅、邹衍、剧辛那一批人杰吗?

例中的典故出自于《史记》。该典故的源认知域与剧本中描述的剧情背景空间拥有很大的相似性:一个是陷入窘境的钢铁厂,而另一个是濒临灭亡的燕国。读者在理解该句时,典故中描述的地点,角色,事件被纳入输入空间I,而话剧描述的厂

内情况则被纳入输入空间 II。两个空间中的事物通过跨空间映射起来,产生一个具有共同联系的类属空间,即依靠人的智力,困境得以扭转。最后,通过一系列的层创,读者在合成空间中产生新的意义:厂内必须引入新的人才,局面才会得到改变(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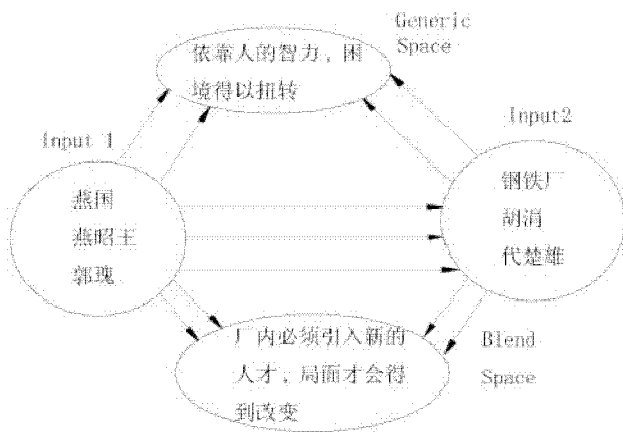


图1

例2:

胡涓:这有什么?

碧茜:好轻松!老杨刚才那个样子你没看出来?他和老代怎么相处?你的女儿胡撞是你和老代生的,她要是知道了,她在两个爸爸之间的距离怎么摆?会给孩子心里种下什么?还有苏云那伙人的流言蜚语你怎么对付?别像尼克松,当了四年总统被水门事件纠缠了三年,落得身败名裂,舆论能杀人哪,即便是无中生有也能逼得人投河上吊的。

碧茜认为如果胡涓让自己的前任丈夫进入钢铁厂帮忙,那么就会让只顾眼前利益的障碍者(苏云)等人制造出绯闻,使得胡涓失去人心。从概念合成理论来看,读者头脑里形成两个输入空间——输入空间 I,里面有尼克松,水门事件,舆论;输入空间 II,里面有胡涓,与前任丈夫的关系,厂内工人的反应。同时,当两个空间内输入的元素彼此映射时,读者的头脑会将输入空间 I 和输入空间 II 中所具有的共同元素放入类属空间,即绯闻会让人走投无路。于是,通过类属空间的加工,读者形成一个合成空间来理解剧本的内涵——流言蜚语的作用非同小可,胡涓不能忽视。

(二)语义层面

例1:

胡涓:暂时,(代楚雄)任决策中心办公室主

任。他外出,对外是法人的全权代表,我外出,对内行使厂长职权。孟总经济师的辞职,理由不充分,继任原职。

巩川:很好!我走了。嗨,你怎么互撞?

胡撞:谁叫我妈替我取这么个名字?嘻……

例中作者巧妙地运用双关的修辞手法,取得幽默的前景化效果。此时的“胡撞”涵盖了两层意义:第一,胡涓与前夫代楚雄所生的女儿的名字;第二,表达一种动作方式,“胡”可以理解为“乱”,这样一来,通过读音相似让读者建立起了两个输入空间,虽然两个输入空间的字面表达相同,但却表达了不同的意思,而以字音相同的类属空间通过整合让读者充满联想,有如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得出这样一个合成空间:胡撞走路时不小心与巩川相碰。这种语音结构的安排,不仅体现了巩川风趣机智的性格特点,也让读者产生愉快的体验。

例2:

胡涓:东江哥,你别觉得受了什么委屈了,革命对你公平!过去革命需要那样,你那样作了,给了你荣誉了嘛,今天需要科学技术文化,要四化,你为什么不变?没有劝你?没有批评没有拉你?像一截子系牛桩,摇不动拔不起移不走,还要把周围的人都系住,你,你成了绊脚石了!

刘东江:我是绊脚石?好!好!我去市委告你!

剧本中,作者把固执、停滞不前的刘东江比作坚硬、不易动摇的系牛桩。这种比喻的修辞手法的运用产生了一种生动形象、贴切精准、耐人寻味的文体效果。通过认知加工,读者分别将因循守旧的刘东江和根深蒂固的系牛桩放入输入空间 I 和输入空间 II,在类属空间中抽象出两个输入空间共有的特性:顽固不化、故步自封、墨守成规。最后通过合成空间的扩展和完善,读者理解剧本得出:刘东江的保守和古板,在改革中无疑会被淘汰。

例3:

胡涓:你怎么还不结婚?

代楚雄:说不清楚,也许是失去的东西附着在记忆里太牢固了。

胡涓:……应该连那篇记忆一起失去,在现实中事情的确储存在记忆里,一跳出记忆就品尝现实中失落的痛苦。何必?过去,随着光阴消逝了,以每秒三十万公里的光速消逝得无影无踪了……成家吧。有人给你介绍过吗?

作者在本句中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表达了人物丰富的想象和强烈的情感,使描写的事件更加

生动形象。在这里,读者建构起一个过去的输入空间 I,胡涓与代楚雄原来是夫妻,但由于种种原因,迫不得已他们离婚了。而现实的输入空间 II 里,胡涓已经成家,但代楚雄却仍旧一个人。投射到类属空间表现出来的就是时光飞逝,事过境迁。最后在合成空间里组合和完善,得出:胡涓认为代楚雄应当忘记他们以前在一起的生活经历,开始新的生活,早日成家。作者恰当地使用夸张,体现了身为钢铁厂厂长的胡涓也不缺乏应有的柔情和细腻,表达了她对前夫的真诚而恰如其分的建议和亲情如水的关心,真心希望他能过得好的想法。

(三) 语篇层面

在整个剧目中,语篇整体的理解成为最重要的部分,语篇作为由语句组成的表达多层意思的具有内在逻辑相关相关性的结构系统^[16]。下表 1 是对《钢铁夫人》十个剧目的剧情发展进行的简单概括:

表 1 《钢铁夫人》十个剧目的剧情概括

剧目一	钢铁厂濒临倒闭,胡涓四处借钱,厂内捣乱分子拉轧机卖,胡涓苦心劝导,不计前嫌请前夫代楚雄入厂
剧目二	胡涓想方设法改造旧设备,多方筹措资金
剧目三	苏云百般为改革设置障碍,职工集资被迫停止,厂内陷入窘境
剧目四	捣乱分子无端闹事,代楚雄正式入厂内出谋划策
剧目五	胡涓不畏权势,秉公处事,果断换人
剧目六	胡涓教育工人科学办事,厂内情况扭转
剧目七	厂内举办员工舞会,孟辉借机制造绯闻
剧目八	“相片”风波引起亲人与工人误解
剧目九	胡涓对女儿倾诉苦衷,厂内设备改造再次停止
剧目十	澄清事实,冲破阻挠,在群众支持下,钢铁厂起死回生

1. 相邻剧目的概念合成。《钢铁夫人》中的人物众多、事件较为复杂,头绪纷繁,加之故事所涉及的时间跨度较长,作者采用了开放式结构,剧情按照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局的自然顺序展开,能够让观众非常清楚地从头至尾原原本本地了解剧情的自然发展过程。这种结构方式能够较为完整地展示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而读者也能够通过剧情的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人物动作,比较方便地透视人物的整体面貌及其性格变化。由于戏剧艺术

的时空限制性,作者在剧目和剧目之间的组织和安排力求严密、紧凑、最大限度地展示出尽可能丰富的内容。如:

(1) 剧目二与剧目三的概念合成。在概念合成理论的基础下,剧目二与剧目三分别建立起两个输入空间 I 和 II,即工人争论卖楼以及轧机,苏云挑拨孟辉并且对调入人才阳奉阴违,厂内进行集资的输入空间 I 和罗满因卖轧机事件调入废钢库,苏云仍未落实调入代楚雄,厂内集资被迫停止,厂内情况陷入窘境的输入空间 II。两个输入空间通过跨空间映射建立起对应连接形成包含调入人才,职位调动以及厂内集资这三个元素的类属空间;输入空间各元素通过投射进入合成空间,经过组合、完善和扩展形成层创结:即厂内部分职工只顾眼前利益,阻碍厂内前进,资金问题并不是集资就能解决的。此时,通过概念合成,读者感受到胡涓身上的坚强和乐观向上的精神,即使遇到了许多人为或者其他客观因素的干扰,她也没有犹豫和退缩,一如既往迎难而上(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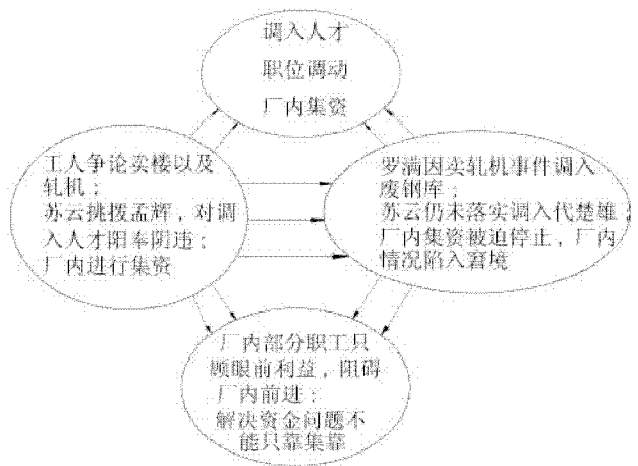


图 2

(2) 剧目三与剧目四的概念合成。在理解剧目三和剧目四时,我们的大脑中也存在着“剧情三”的事件框架 I 和“剧目四”的事件框架 II 这两个输入空间。输入空间 I 包含罗满因卖轧机事件调入废钢库,苏云仍未落实调入代楚雄,厂内集资被迫停止,厂内情况陷入窘境等元素,输入空间 II 包含胡涓请代楚雄来家中作客,罗满进行报复,代楚雄解决厂内资金问题等元素。类属空间提取了两个空间的共同元素:调入人才,资金问题以及职员职位变化;两个空间跨空间映射得到合成空间:

引入了优秀人才,厂内看到了生机,钢铁厂的工作有了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可能。随着剧情的发展,在面对钢铁厂在改革大潮中所遇到的重重困难,迎难而上,坦然面对。围绕转产的问题,还有机制改革、机构调整、班组成本核算,规范管理、人才培养、设备改造等问题,胡涓根据钢铁厂的实际情况,在周密调查研究、严格的理论论证和有关专家的知道基础上,进行一系列措施,让读者在理解剧本的过程中能深刻感受到胡涓尊重科学、坚持真理、按科学规律管理工厂的优秀品质,同时这也是胡涓理性的完美体现(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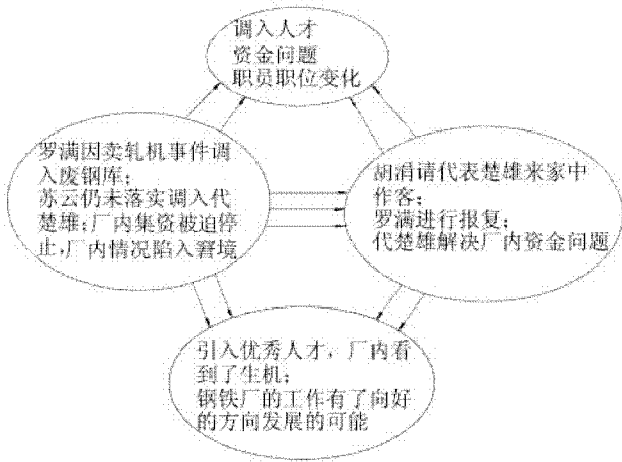


图3

2. 跨剧目的概念合成。(1) 剧目三、剧目五、剧目七的概念合成。在概念合成理论下,剧目三的剧情形成了输入空间 I,它包含了罗满因卖轧机事件被调入废钢库对胡涓不满,苏云百般为改革设置障碍,职工集资被迫停止,厂内陷入窘境等元素;剧目五的剧情形成了输入空间 II,它包含了罗满和向荣私吞运费、厂内制度有漏洞,执行不得力等元素;剧目七的剧目形成了输入空间 III,它包含了厂内举办员工舞会,孟辉借机制造绯闻等元素;三个输入空间通过跨空间的映射对应连接得到包含:障碍者阻碍改革这一共同元素的类属空间;最后经过认知能动性,得到一个合成空间:厂内障碍者制造的麻烦不断,必须彻底铲除障碍者,合理运用人才,厂内情况才会好转。这也让读者感受到胡涓作为厂长该有的魄力:在人为干扰面前,不畏权势,果断换人,秉公处理无端闹事者。在日常工作时,胡涓为人正直,不弄虚作假,不口是心非;她的性格特点时时闪烁着“钢铁夫人”的自豪感和责任感(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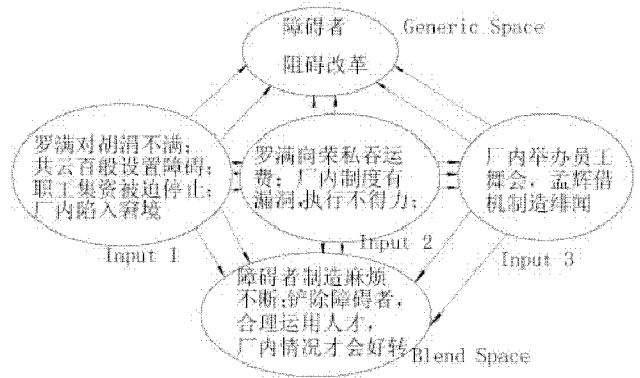


图4

(2) 剧目一、剧目四、剧目十的概念合成。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剧目一、剧目四、剧目十看作三个不同的输入空间。输入空间 I 是钢铁厂濒临倒闭,胡涓四处借钱,厂内捣乱分子拉轧机卖,胡涓苦心劝导,不计前嫌请前夫入厂,输入空间 II 是胡涓请代楚雄来家中作客,罗满进行报复,代楚雄解决厂内资金问题。输入空间 III 是照片事件真相大白,捣乱分子受到处分,杨世杰与代楚雄及时回厂,厂内设备改造与资金问题得以解决。三个输入空间对接产生了包含厂内资金问题、厂内障碍者以及胡涓得到帮助的一类属空间,类属空间将各空间中的元素投射后得到新的合成空间:只有解决厂内资金问题,梳理好厂内人际关系,在众人的努力和支持下,钢铁厂才能起死回生。这三个剧目分别在处于剧目的前、中、后,通过跨空间的概念合成以及结合剧目,胡涓的一言一行都在我们的脑海里了塑造了一个沉着,刚毅,无畏,坚持真理的改革者的形象(见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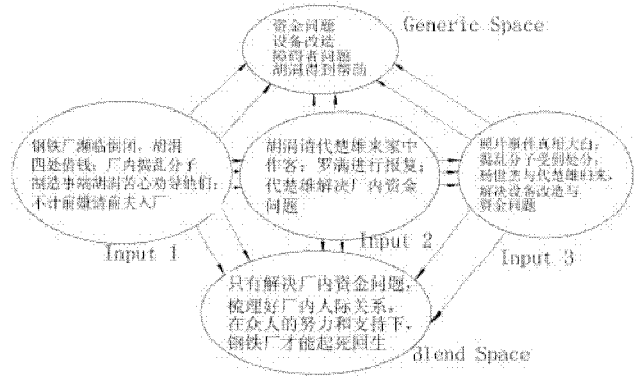


图5

在概念合成理论下,我们可以看到剧目与剧目之间都有一定的联系,并且这些联系通过跨剧目的合成使剧情显得紧凑,深入人心。上文分别例举了相邻空间两两的概念合成以及跨剧目概念合成的过程,通过理解剧情以及剧情的发展,读者清楚地明白该剧本的主题是,即主人公胡涓为了把企业搞活,她坚持不放弃,这与剧本题目“钢铁夫人”相呼应,彰显着黄石矿冶人的“刚性”,展现了新时期矿冶人为钢铁事业的艰苦奋斗和前赴后继,进而能够领悟矿冶人积极向上,不屈不挠的精神风貌。

四、结语

话剧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的手法,将人物的真实情感用语言形式表达出来,因而,对话剧的解读不应该只探究作品本身,同时也可以用来体会人物的情感。用不同的理论来解读话剧可以使得读者更加深入、全面的体会其丰富的艺术价值。概念合成理论作为认知语言学新兴的学科,已经证明对多种语言现象具有独到的解释力。本文正是基于该理论对矿冶戏剧《钢铁夫人》进行全新的解读,通过对剧目写作手法的详细分析,构建了不同的整合网络,最终证明该理论对话剧有很强的阐释力。同时,在概念合成理论视角下,也能帮助我们进一步加深对矿冶文化的理解。

参考文献:

- [1] 杨雪燕. 试论戏剧在语言文体学中的地位[J]. 外国语, 1989(1): 67-70.
- [2] 侯涛. 文学语用学视角下的戏剧话语分析[J]. 外语教学, 2011(1): 16-19.
- [3] 俞东明, 左进. 语用模糊、会话策略与戏剧人物刻画[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4(5): 379-384.
- [4] 侯涛, 俞东明. 戏剧话语: 语用建构和文体认知——基于《雷雨》的研究之一[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4): 115-123.
- [5] 高剑妩, 申丹. 礼貌策略、人物塑造理论与戏剧文体学——综合性实例分析及模式修正[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6(6): 428-436.
- [6] 高剑妩. 基于概念复合的戏剧认知诗学分析一般模式[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9(9): 7-13.
- [7] 徐海云. 认知语言学与戏剧欣赏和批评初探[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2): 122-125.
- [8] 李社教. 黄石矿冶文学作品选[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0: 150-196.
- [9] 周进珍. 黄石矿冶文学研究[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9.
- [10] 王昭, 周进珍. 黄石矿冶戏剧的美学价值[J]. 黄石理工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2): 6-9.
- [11] Fauconnier G & M. Turner.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16.
- [12] 李福印. 认知语言学概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74.
- [13] 王文斌. 概念合成理论研究与应用: 的回顾和思考[J]. 外语研究, 2004(1): 6-12.
- [14] 俞东明. 戏剧文体与戏剧文体学[J]. 浙江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6(1): 100-103.
- [15] 陈海庆. 文学语篇的语用学阐释: 互动性及其取效行为[J]. 外语教学, 2009(1): 30-34.
- [16] 王全智. 可能世界、心理空间与语篇的意义建构[J]. 外语教学, 2005(7): 5-8.

[责任编辑: 吴晓红]

诗歌押韵与起承转合

毛 翰

(华侨大学 文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21)

摘 要:起承转合,关于诗文的意蕴结构或曰章法的这一术语,也可以用来概括诗歌的押韵规律。在诗歌的各种韵式中,起承转合这一韵式有着独特的优势,至今葆有顽强的生命力。

关键词:起承转合;诗歌;押韵;韵法;韵式

中图分类号:L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4)01-0080-03

Rhyme and transition in poetry

MAO Han

(School of Literature,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21, China)

Abstract: Transition, the term about poetry's implication structure or composition, can also be used to generalize the rhyming rules of poetry. In a variety of rhyming styles of poetry, the rhyming style of transition has unique advantages and therefore retains strong vitality.

Key words: transition; poetry; being in rhyme; rhyme; rhyming style

吴颂今先生大著《歌词写作十八讲》^①交付出版之前,命我作一序言。于是,我作为此书的一个读者,认真地拜读了全稿。我发现,此书在歌词的审美特征和创作技巧的多个方面的论述,都不乏创见和个性。譬如,关于中国歌词的押韵规律,就独出心裁地提出,其中有一个“起承转合”。

书中说,首句起韵,就是歌词的第一句先要选定一个韵脚,接下去,后面每逢双句押相同的韵,即二四六八句的尾字押韵。第一句就入韵,即押‘起韵’,定下一个基调,以提示后面的诗句所采用的韵辙,满足中国听众特定的心理期待。书中接着写道,如果是四句歌词,通常是一、二、四句必须押韵,第三句不押。为什么这样呢?

这种押韵跟起承转合的道理是一样的:第一句是起句,你就确定了一个韵。第二句就是承,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承接上一句,既然第一句规定了一个韵,那么,你第二句就要继承,所以,还要押韵。第三句是转,转是变化,这个时候就可以不押韵了。

第四句是合,就是回到了开头,又押上第一句开头相同的韵,圆满地结束一个段落。

众所周知,“起承转合”从来就是关于诗文的意蕴结构或曰章法的术语。这一术语甚至可以借用于音乐,概括音乐的曲式结构:起即显示,作为主题的最初陈述;承即巩固,通过有变化的复述来加强主题;转即转变,展开新的主题;合即结束,回归最初的音乐主题。但“起承转合”这一术语一直与诗歌的押韵无关。歌词的押韵规律居然也可以用“起承转合”来概括,这是颂今先生的一个独到的发现。

关于押韵,在诗、歌词尤其是在民歌民谣里往往是四句一段,构成一个韵律单元,如“高高山上一树槐,手攀槐枝望郎来。娘问女儿望什么?我望槐花几时开。”其中,第一句就要押韵,第二句也要押韵,第三句不要押韵,第四句又要押韵。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第一、二、四句入韵,第三句出韵,这种规则是怎么形成的?它有什么内在的逻辑吗?

收稿日期:2013-12-10

作者简介:毛翰(1955-),男,湖北广水人,教授,主要从事诗歌研究。

①吴颂今《歌词写作十八讲》,2012年4月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它有什么审美的理据吗?我们可能从来都没有深究过,只当是古来如此,习惯使然。但颂今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较真了,他关于歌词押韵的起承转合之说乃独家创见,就笔者阅历所及,从古至今,还从来没有过类似的论述。

依据现存文献,诗家所谓起承转合,最早见于元代。杨载(1271~1323)在其《诗法家数》论述律诗的创作方法时,拈出“起承转合”四字,并以破题、颔联、颈联、结句与之对应。傅若金(1304~1343)《诗法正论》转述范梈(1272~1330)之言,说作诗成法有“起承转合”四字:以绝句言之,首句为起,次句为承,三句为转,结句为合;以律诗言之,首联为起,颔联为承,颈联为转,尾联为合。起承转合的运用则要求“起要平直,承要春容,转要变化,合要渊永”。范梈宣称,以这一原则来衡量古今诗歌,莫不皆然。

将关于诗歌的意蕴结构或曰章法的“起承转合”转用于诗歌的韵法,让人耳目一新。而以“起承转合”的韵式去考察中国诗歌,不难发现,这一韵式早已客观地存在着。中国古代诗人早已在娴熟自如地运用着,中国古代诗歌的韵脚早已在那里起承转合着,它的历史是那样地悠久,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古的《卿云歌》:“卿云烂兮,糺纒纒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以及《诗经》首篇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五七言绝句一经问世,也即见韵脚的起承转合,如曹植《七步诗》:“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如南朝宋汤惠休《愁思引》:“秋寒依依风过河,白露萧萧洞庭波。思君末光光已灭,眇眇悲望如思何。”唐人张若虚一首长歌《春江花月夜》,每四句一转韵,分明在进行着韵脚的一轮又一轮的起承转合。先是庚青韵的起承转合:“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再是先天韵的起承转合:“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三是人文韵的起承转合:“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全诗共三十六句,每四句一节,不断换韵,先后用了九个不同的韵脚。每节四句,皆为第一、二、四句押韵,第三句出韵。

然而,这样的用韵规范,用得久了,便不免有老套之感。于是,人们就想突破这起承转合的套路,另

辟蹊径。但套路之外,可行的路径并不多。对于四句诗歌,四个可能的韵脚,跳出起承转合(AAXA)的韵式后,可能的选择大概只有几种:要么首句不押韵(XAXA),要么句句押韵(AAAA),要么后两句换韵(AABB),要么交韵(ABAB),要么抱韵(ABBA)。此外,就只能句句不押韵(XXXX)了。

首句不押韵(XAXA)亦即偶句韵。因为首句未入韵,次句便无所承接,诗的声律便不大和谐。为了减少其负面影响,就只能在平仄上打主意,依靠平仄的对应来做些许补救。办法是,押平韵则仄起,如王勃《山中》:“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押仄韵则平起,如王维《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这一韵式在五言诗里用得较多,《三字经》用之更理所当然,因为五言以内的诗,其句子短促,不妨说,其一句只是半句。而当诗歌的句子较长,加上平仄不能自然应对,首句无韵的缺憾就凸现出来。笔者曾习作歌词《钓鱼岛》,用“以虹为丝,以月为钩,有一位仙人在这里垂钓”开头,因首句未能入韵(该押韵的“钩”字难以押韵),就感觉很不上口。虽然第三、四句连续用韵:“御风为歌,鼓浪为谣,有一座仙山神州怀抱。”仍然不能补救。为此,只好在前面加了一个引子:“仙山约,水云邀,泛兰舟,望海潮。”

句句押韵(AAAA)亦即排韵。这一韵式也是古已有之,它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吴越春秋》所记载的上古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①其短促的诗句,句句都落在韵脚上。《诗经》四言诗也屡见句句押韵者,如《硕鼠》第一节。汉晋时代,句句押韵的七言诗风行,其四句者如晋代《丁令威歌》:“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但七言诗的这一韵式,终因用韵太密,一韵到底,缺少变化,刘宋之后迅速衰落。而五言诗较七言诗句式简短,句句押韵就更显迫促,所以一直不见有句句押韵的作品。民歌里句句押韵的要多一些,但也不如起承转合的韵式更为常用。

后两句换韵(AABB),这一韵式也渊源有自,《沧浪歌》云:“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七言诗换韵,最早的则数东晋人熊甫的《别歌》:“徂风飏起盖山陵,氛雾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可长叹,念别惆怅复会难。”

① 宍为肉的古字,代指猎物。古汉语里,竹、土、宍的韵母应该都是ou,在南方的一些方言里,至今如此。

但这样前两句一韵、后两句一韵,与后世绝句的韵式不合,历来的文人诗里十分少见。绝句不用此韵式,也应该是一种基于声韵美的取舍。

交韵(ABAB)即两韵交替出现,单句与单句押韵,双句与双句押韵。交韵常见于欧美诗歌,罕见于中国诗歌,《诗经》里偶有所见,后世近乎绝迹。试看欧阳修《生查子》上片:“含羞整翠鬟,得意频相顾。雁柱十三弦,一一春莺语。”

抱韵(ABBA)即在四句诗中,一、四句押一韵,二、三句押另一韵,后者被前者所抱,故名。抱韵亦常见于欧美诗歌,罕见于中国诗歌,《诗经》里惊鸿一现,后世已成吉光片羽。试看五代词人欧阳炯《壶天晓》(西江月)上片:“月映长江秋水,分明冷浸星河。浅沙汀上白云多,雪散几丛芦苇。”

句句不押韵(XXXX),依中国传统的诗歌美学,那已不大成其为诗了。

如此看来,起承转合虽成套路,另寻蹊径却非易事。起承转合之外的几种韵式,因其各自的局限,均难以成为主流。而起承转合的韵式,则以自己独到的审美优势,至今葆有顽强的生命力。

《歌词写作十八讲》出版后,有人对拙序推崇吴颂今先生的“词韵起承转合论”不以为然,不承认中国诗歌有“起承转合”这一押韵规律的存在,理由是清人沈德潜《说诗碎语》说过“起句可不用韵”,只此一句便可说明问题,断定根本无此规律^①。

只凭沈德潜一语,即断定诗歌押韵根本没有起承转合的规律,这未免武断。起句不用韵时,固无起承转合可言;起句用韵时,韵脚的起承转合则往往是存在的。况且,诗与歌词二者有别,歌词,尤其民歌民谣,多是开头一句即押韵,从南宋民歌“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零在外头。”到今日民谣“全厂拼命干,挣了几十万。买个乌龟壳,坐个王八蛋。”韵脚的起承转合,是很少有例外的。现代歌词以起承转合方式押韵的也随处可见,例如方冰作词的那首民歌体的经典之作《歌唱二小放牛郎》:“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那放牛的孩子王二小。……”

第一、二、四句入韵,第三句出韵,这是民歌民谣押韵的惯例。文人诗歌源于民歌民谣,欲淡化其

影响,显示自己的创意和雅气,首句会故意不入韵。但不能因此就否认中国诗歌的“起承转合”、“入入出入”这一押韵规律的存在。

如果因为有例外,就否定规律的存在,那么,作为诗歌的意蕴结构或章法规律的“起承转合”也是不能成立的。试读“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这四句诗,描绘了四幅图画,四图并列,呈现于读者眼前,哪里还有什么平起、顺承、跳转、妙合可言呢?但我们能因为这“两个黄鹂”式及其它各式的另类章法出现,就否定诗歌的起承转合式的章法的相当普遍的存在吗?

明清时代,诗家对起承转合多有质疑。王夫之《姜斋诗话》就认为,起承转合只不过是诗的章法之一,对于用它套用于律诗,更予以严辞痛斥:

起承转收,一法也。试取初盛唐律验之,谁必株守此法者?法莫要于成章,立此四法,则不成章矣。且道“卢家少妇”一诗作何解?是何章法?又如“火树银花合”,浑然一气;“亦知戍不返”,曲折无端。其他或平铺六句,以二语括之;或六七句意已无余,末句用飞白法颺开,义趣超远:起不必起,收不必收,乃使生气灵通,成章而达。至若“故国平居有所思”,“有所”二字,虚笼喝起,以下曲江、蓬莱、昆明、紫阁,皆所思者,此自《大雅》来;谢客五言长篇用为章法;杜更藏锋不露,转合无垠:何起何收,何承何转?陋人之法,乌足展骥骥之足哉?近世唯杨用修辨之甚悉。用修工于用法,唯其能破陋人之法也。

然而,任凭姜斋雄辩滔滔,有理有据,斥之为“陋人之法”,起承转合作为诗歌布局谋篇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终究是不可否定的。虽然范梈所谓古今一切诗歌无不合乎起承转合,是言过其实了。

同理,起承转合作为诗歌的押韵规则,它合乎中国人的审美传统和审美心理期待,至今盛行不衰,尽管有很多例外,其存在的事实和合理性却是不可否定的。试看田汉《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人文”“庚青”两韵通押了。)试看崔健《一无所有》:“我曾经问个不休, / 你何时跟我走? / 可你总是笑我, / 一无所有。……”

[责任编辑:吴晓红]

① 陈维建新浪微博 2012 年 9 月 7 日。

从《大街》透析辛克莱·刘易斯的自我超越

张燕, 方海霞

(安徽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淮南 232001)

摘要:生理上的缺陷、心理上的创伤以及缺陷的成长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刘易斯自卑的低下感和他对成长环境的不满感,但是刘易斯却努力发展出了具有积极上进、宽容大度和强烈社会兴趣等特点的健康人格,实现了人格上的自我超越。他的成名作《大街》体现了他在背景、人物、主题、文风和叙事风格等多方面的艺术突破,标志着他在创作上一次伟大的自我超越。从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人格理论出发,通过对《大街》的文本分析来透析辛克莱·刘易斯的自我超越。

关键词:阿德勒;人格;刘易斯;创作;自我超越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1-0083-04

Sinclair Lewis' s self - transcendence embodied in Main Street

ZHANG Yan, FANG Hai - xi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 Physical defects, psychological traumas and imperfect growing environment have to some extent jointly induced Sinclair Lewis' s sense of inferiority and his discontentment with his growing environment. But he still successfully develops a healthy personality characterized by positiveness, tolerance, and intense interest in social affairs, thus achieving a self - transcendence in his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Main Street, his signature novel, exhibits his artistic breakthrough in such aspects as setting, characterization, theme, writing and narrative styles, which symbolizes his self - transcendence in literary creation. Departing from Alfred Adler' s theory of healthy personality,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Sinclair Lewis' s self - transcendence through the textual analysis of Main Street.

Key words: Adler; personality; Lewis; literary creation; self - transcendence

正如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 1885 - 1951)本人说所,“我的文学创作生涯,就是从《大街》开始的”^{[1]30},长篇小说《大街》(Main Street, 1920)被公认为刘易斯的成名作。小说出版不足一年就卖出了十八万册,后来几年内竟然达到两百万册^{[2]235},被称为“20世纪美国出版史上最为轰动的事件”^{[3]168}。刘易斯在小说中对戈镇式乡村生活的种种陋风恶习进行了直率猛烈的批判,表达了自己对其成长环境的不满,甚至是憎恨;但批判的同时,小说又流露出他对故土乡亲的宽容大度以及他那份希望改变这一切的社会责任感,体现出他在人格发展上的一次自我超越。在艺术成就方面,

《大街》完全不同于他“学徒”时期(1908 - 1919)的那些有关“舒舒服服人们的舒舒服服的问题”的平淡无奇的作品,开创出了新型的、地道的美国文风,标志着他在文学创作上的一次自我超越。

一、从自卑不满到宽容大度的人格之旅

辛克莱·刘易斯土生土长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小镇“苏克中心”(Sauk Center)。他的父亲是一位严厉冷漠的乡村医生,母亲因肺结核在他6岁时就去世了,而且刘易斯生来一头红发、相貌不佳,因此不善社交、学习一般的他常遭人挖苦奚落。很明

收稿日期:2013 - 05 - 21

基金项目:2013年度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SK2013B159)资助

作者简介:张燕(1978 -),女,陕西富平人,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显,先天生理上的缺陷、年幼时遭受的心理创伤以及缺陷的成长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刘易斯儿童时期自卑的低下感和对其成长环境的不满感。

“个体心理学”之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 1870—1937)认为人格(personality)是在战胜自卑和追求优越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我们都发现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是希望加以改变的。没有人能长期忍受自卑之感,它一定会使他采取某种行动,来解除自己的紧张状态。”^{[4]46}没什么朋友的刘易斯喜欢到大街小巷去郊游,了解镇上发生的一切事,这一切培养了他非凡的观察力和准确的表现力。而且他还喜欢在家里或是在镇上的布瑞杨公立图书馆中一个人阅读各种各样的书报杂志,从而在他“儿时最大的冒险经历”^{[5]80}中寻找快乐。父亲虽然常责怪他不能跟别的孩子一样,但是却鼓励他读书,要求他在阅读中不认识的字要查字典。因此,刘易斯在早期就积累了惊人的词汇量,为他后来的写作储备了渊博的知识。继母伊莎贝尔则尽努力启发他的心智和个性天赋,并做些实事美化苏克镇,促进小镇的发展。“这一切让生活更美好的举措不会不给刘易斯幼小的心智以启迪——污染之地是需要和可以改造的。”^{[5]80}并且在无形之中培养了刘易斯积极向上的人格特征。

阿德勒所指的自卑感“不仅指人生理上的缺陷,也包括人面对现实的社会和生活产生的种种不完美和不理想感中产生的自卑感,……人受不满感的刺激而寻求超越之道,便使人向更高的层次进展”^{[4]26}。孤僻自卑的刘易斯总是觉得和镇上的一切都格格不入,想要摆脱这种压抑的感觉。于是13岁那年,当美西战争爆发后,刘易斯就想偷偷去报名参军以离开家乡,但是却被父亲在小镇的火车站给抓了回来。后来刘易斯在他敬佩的德语老师和博学的镇长朱利安·杜波斯博士的影响下,努力考上了耶鲁大学,才逃离了他认为是愚昧不堪的苏克小镇(1903—1908)。上大学期间,由于不满足课堂生活,刘易斯就利用假期到船上打工体验生活。而且还因讨厌学校生活离校1年(1906年)去厄普顿·辛克莱创办的社会主义居民试验区和纽约、巴拿马等地,后又重返学校。回来后,刘易斯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读书和为校刊《光明》和《库兰特报》写稿上,为他以后的文学生涯打下了基础。刘易斯就是在一次次的逃离中表达着自己对现实社会和生活的种种不完美和不理想感,寻求着超越自我的道路。而这种成长经历既锻造了他的反叛胆识,又赋予了他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阿德勒指出“生活的意义是对同伴发生兴趣,作为团体的一分子,并对人类幸福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4]28}。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远离家乡在耶鲁上大学让刘易斯更能看清戈镇生活的单调沉闷和乡民的愚昧保守。上大学后的刘易斯经常利用假期外出打工,很少回家乡。但1905年的暑假刘易斯是在家乡度过的,他无意中听到一些居民问:“刘易斯大夫干嘛不叫他儿子在农场找个活干,偏要让他围着书桌转,读那一大堆的历史和谁也说不准是啥的那些玩意儿?”^{[6]53}这时,他在日记中郑重写下了他要写一本“乡村病毒”的书,“表现这种病毒怎样已浸入了好公民和人间真理的血脉中”^{[7]24}。大学期间,“威廉姆·D·豪威尔斯的《一个现代实例》和赫姆林·加兰的《旅行大道》就对刘易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鼓励他相信即使单调乏味的中西部小镇和农场也能成为文学。”^{[7]24}大学毕业后,随着不断的写作磨练,刘易斯越来越意识到正是这一“乡村病毒”侵蚀了人们的心灵、阻碍了美国乡村文明的发展。而且“美国人已是一个成熟的民族,能够冷静老练地思考对其所生存的大地进行任何剖析批判,无论这些剖析批判是多么带有嘲弄性。”^[8]终于在1920年,刘易斯完成并出版了这部酝酿已久的小说,并定名为《大街》。作为一个大街儿女和具有反叛胆识的作家,刘易斯把他对故土乡亲的不满感表在了他的作品之中,因为他相信他有责任去警醒人们,帮他们进行自我审视。无怪乎美国著名评论家谢尔登·格雷布斯坦(Sheldon Grebstein)称刘易斯是“他那个年代的良心”^{[6]3}。

阿德勒相信,一个对社会怀有积极的看法和强烈的兴趣的人对他人的理解、接纳和包容的精神通常都较强。刘易斯在对待现实生活和社会关系上,就表现出真诚热情、富于同情心等特征。刘易斯爱自己的家乡,但又不能像它那样活着。《大街》中的戈镇原型是苏克中心,所以在他对美国乡村文化的种种弊病与虚假的价值观的批判声中,读者还能感受到他对故乡的无比眷恋。正如格兰·拉夫所说,刘易斯“同进步主义的实践者们一样,一方面希望纳入城市的机器文明,但另一方面又不希望以牺牲传统的民主构架中纯朴的乡村价值为代价”^{[9]11}。另外,刘易斯满怀体谅地将他笔下的人物人性化。《大街》的主人公卡罗尔试图通过各种不切实际的方法改变戈镇的面貌,是读者嘲讽的对象。但是当刘易斯揭示了小镇生活的各种阴暗面后,读者就会觉得她很有胆识抱负;后来当发现“浪漫主义”的卡罗尔面对重重挫折仍不气馁时,读者又不禁会向她表示敬意。后来卡罗尔迫于各

种压制而不得不向现实妥协时,卡罗尔的痛苦也被刘易斯同情的笔触描写的那样真切:“哦,我们这些永不知足的女人,简直已经完全绝望了!”^{[10]673}

刘易斯因对周围环境的不满而讽刺批判,但他同时也表现出了对他人的理解、接纳和包容,实则是他人格发展上的一次自我超越。

二、从平淡无奇到美国文风的创作之路

刘易斯没有成为先天的遗传影响和缺陷的成长环境的消极接受者。相反,对成长环境的不满感和不理想感却促使他努力发展出了健康的人格特征。在学习和文学创作上,刘易斯表现的勤奋认真、感知敏锐、富有想像力,尤其是具有创新意识。从刘易斯的创作经历可以看出,刘易斯能按照自己理性的、健康的生活目标有选择地去看待生活中的社会经验,然后把它们反映在他的创作之中。

1910年到1919年通常被称之为刘易斯创作的学艺时期,在这期间他总共写了6部小说:《步行与飞机》(1912)、《我们的雷恩先生》(1914)、《鹰的足迹》(1915)、《无辜的人》(1917)、《求职》(1917)、《费力的事》(1917)和《自由的空气》(1919)。总体上讲,这六部作品强调了美国的积极方面以及美国人奋发向上的精神,表现出他健康的人格发展对其小说创作初期的影响。虽然这些“平庸者浪漫史”大多还没有什么创新之处,但是这段写作经历却帮他培养了对小说题材敏感的触觉,并逐渐锁定了他的写作背景(中西部)和人物(小镇和城市中的美国人)。

1920年到1929年通常被称之为刘易斯创作的巅峰时期。揭开完美乡镇生活面纱的《大街》(1920)、指控美国工商界的《巴比特》(1922)、揭露医学界贪婪的《阿罗史密斯》(1925)、批评虚伪宗教界的《埃尔默·甘特利》(1927)、和反映英美两种文化对比的《陶冶沃斯》(1929),凭借这五部巨著,刘易斯一举摘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1930)。在这些代表作中,《大街》是刘易斯的成名作也标志着他文学创作之路上的一个转折点,展现出与以往作品完全不同的面貌。

典型的区域环境。刘易斯“很善于选取一个典型环境,采取细节描摹的方法,集中火力放大这个环境的缺点和消极面”^{[11]9}。刘易斯说过“实际上,《大街》里所有一切的人物和场景,是我在美国各地看见的许许多多城镇中所注意到的事件和人物的综合,或者是完全想象出来的。”^[12]《大街》中的戈镇以刘易斯的家乡苏克中心为原型的,它是当时美国中西部小镇的缩影,是整个美国的暗喻。他

在小说一开始就点明了拥有几千人口的戈镇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它的大街“不仅是被称作戈镇的心脏地区,而且还是从奥尔巴尼一直到圣迪戈的成千上万个类似的市镇”^{[10]56}。戈镇“周围的一切事物,都是呆板划一,缺乏灵感的;人们举止言谈,无不呆滞迟钝;……这里禁止人们享乐,要人们心甘情愿受奴役,就像笃信上帝一般崇拜这种死气沉沉的生活”^{[10]424}。小说出版后,刘易斯便被指责为一个毫无爱国之心的叛逆者,但是他震耳发聩的批判让无数的美国人在震惊之余开始了自我审视,大街也几乎成了美国社会保守生活的代名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时人们为什么一边诅咒着刘易斯,一边又争先恐后地到书店买他的书了。“1921年,你拜访任何一个美国家庭,几乎都可以看到和家中《圣经》拜访在一起的是《大街》。”^{[7]158}

典型的人物性格。刘易斯以机智幽默创造新型性格的才能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肯定。《大街》的女主人公卡罗尔就是刘易斯塑造的第一个典型形象。她受过教育、思想独立,但又好高骛远、充满幻想,试图以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激进的改革去改变戈镇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从试图重建戈镇中心,到尝试改变固有的聚会形式,再到成立戈镇戏剧协会,再到改革图书馆的实践,卡罗尔遭遇了重重失败,但她始终不曾气馁,并忠于自己最初的信仰:“尽管我一生中屡遭失败,……但我至今仍然终于自己的信仰。”^{[10]721}。不难看出,目标明确,积极主动,意志坚定的卡罗尔就是当时美国社会千千万万个女性的代表。另外,卡罗尔最后因迫于现实毫不留情的压制而妥协接受现实的事实对美国女性来说也有很大的普遍性。

典型的冲突主题。人与环境的冲突是刘易斯小说永恒的主题。处在刘易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总是从不适应、到反抗,再到起冲突,最终因无法生存于受困的环境而出走。《大街》中卡罗尔真正的敌人不是几个乡民,而是已彻底侵入整个戈镇五脏六腑的一种思想上的“乡村病毒”,主要表现为“人们标准化的价值观、既定的行为模式和文化态度”^{[13]104}。因此,卡罗尔空洞激进的改革注定会失败,而她也注定会受困于戈镇。“你要是相信这儿公认的习俗,那就得好好遵守;不过,你要是不相信,也还得照样遵守。”^{[10]596}失望之余,卡罗尔选择了逃离,放弃了她对戈镇的改造。在华盛顿生活一年后,她在丈夫的劝说下又回到了一切如故的戈镇。显然,卡罗尔和戈镇“两者之间的改造其实是双向的,卡罗尔渴望拯救戈镇的灵魂,但戈镇在反叛之余,也同样希望同化她,这样又造成了卡罗尔

的反抗,两者之间就是处于这样的拉锯战中。”^{[11]16}

地道的美国文风。刘易斯创造了地地道道的美国文风:“粗犷,充满讽刺诙谐,具有‘文献’式的真实性”^{[14]553}毫无疑问,《大街》是刘易斯讽刺文学的杰作,他的讽刺经过精心的安排,幽默而犀利。“一家服装店,橱窗里陈列着一些红褐色趾部凸起的浅口便鞋。还有好几个模特儿,活像是脸颊上涂了红的死尸。”^{[10]288}“沾满蝇屎的玻璃窗”^{[10]384}“好像得了佝偻病的椅子”^{[10]384}在《大街》中,刘易斯就是用这种幽默的讽刺描写把戈镇的丑陋表现的淋漓尽致。此外,刘易斯还擅长于用现实主义的细节描写来达到漫画式的讽刺效果。“这些呆板乏味的人们,吃的东西简直味同嚼蜡,饭后就坐在扎屁股的摇椅里,身上连外套都没有穿,脑子里则是空空如也,耳朵里听着机械刻板音乐,嘴巴里赞美‘福特’牌汽车机械性能好,竟然还把自己看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呢。”^{[10]424}美国小镇居民的言谈举止及精神风貌通过他那支笔跃然纸上。刘易斯就是在对美国社会的自我批判和文献式的现实主义写作中创造出了粗犷而有活力的美国风格,为美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活力,也使国际文学界开始认可美国文学。

独特的叙事方式。二十世纪初的人们普遍认为“大城市腐败,中西部小镇是健康的、干净的、保持着早期开发者的纯正”^{[15]68}。当时以麦里迪斯·尼尔森为代表的“诗意化”乡村叙事派也在小说中极力美化乡村生活,“隐去了对乡村的真实表现”^{[13]95}。事实是,随着机械革命的到来和工业城镇的发展,人们所感受到的乡村小镇是“人格的沦丧,人性的扭曲,偏狭和闭塞挥之不去”^{[13]95}。辛克莱·刘易斯对他们这种虚构的乡村叙事提出了质疑。在《大街》中他以犀利的笔锋颠覆了人们心目中世外桃源般的乡村生活概念,并在一片谩骂声中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家。但是让刘易斯超越同时代其他作家的真正原因却在于他对中西部乡村文化中存在已久的“乡村病毒”的洞悉与挖掘。《大街》向人们展示了这种“乡村病毒”对人们精神、道德方面的毒害,让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批判力量。“为了得到别人尊敬,精神上就得受到严格节制。这是一种满足的情绪……就是弥留之际的死者蔑视自强不息的省着那种满足的情绪。他们却把这种消极态度推崇为唯一美德。”^{[10]424}除了反“诗意化”的乡村叙事^{[13]94}和“病毒化”的反乡村叙事^{[13]102}之外,刘易斯叙事方式的独特之处还表现在他对城市与

乡镇两种文化较量的描写中。在《大街》中,通过对卡罗尔在城市和乡村迥异的生活经历(从圣保罗来到戈镇,后逃往华盛顿,最后有返回戈镇)的叙述,刘易斯向读者展现了二十世纪初美国城乡权力争夺战中美国人普遍的矛盾情结:“他们即留恋作为田园理想寄托的乡村,也不赞同城市对‘保守落后’的中西部的占领。”^{[13]102}

《大街》体现了刘易斯在背景、人物、主题、文风和叙事风格等多方面的艺术突破,实现了刘易斯在文体上的狂欢愿望,标志着刘易斯伴随着他人格发展的自我超越,在文学创作道路上一次最伟大的自我超越。

参考文献:

- [1] 阮美英. 辛克莱·刘易斯《大街》中的反叛精神[J]. 岱宗学刊, 2005, 9(1): 30.
- [2] Mark Schorer. Sinclair Lewis: An American Life [M]. New York: McGraw - Hill, 1961.
- [3] Michael Spindler.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Social Change: William Dean Howells to Arthur Miller [M]. London: Macmillan Pub Co, 1983.
- [4] 阿德勒. 自卑与超越[M]. 黄光国, 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86.
- [5] 杨海鸥. 刘易斯小说反叛的文化叙事情结[J].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30(2): 80.
- [6] 谢尔登·N·格雷布斯坦. 辛克莱·刘易斯[M]. 张禹九, 译.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4.
- [7] Richard Lingeman. Sinclair Lewis: Rebel from Main Street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2.
- [8] 核桃·兰花草. 辛克莱·刘易斯受奖演说——美国人对文学的担忧(1930年)[EB/OL]. 豆瓣小组: 豆瓣网.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250963/2006>.
- [9] Glen A Love. Babbitt, an American Life [M].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 1993.
- [10] Sinclair Lewis. 大街[M]. 潘庆龄,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 [11] 夏雯韵. 永恒的斗争——论辛克莱·刘易斯小说中的冲突主题[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7.
- [12] 唐达成. 文艺赏析词典[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 [13] 张海榕. 《大街》中的“反乡村”叙事[J]. 外国文学评论, 2012(2): 95.
- [14] 吴富恒, 王誉公. 美国作家论[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 [15] 张海榕. 辛克莱·刘易斯的创作历程[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1(6): 68.

[责任编辑: 吴晓红]

“托物取象”与诗性言说

——论古典文论对李健吾文学批评的影响

丁燕燕

(山东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18)

摘要: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在古典文论的影响下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批评风范。他强调直觉感悟,善于营造意象,运用比喻、象征、类比等手法传达阅读感受,形成“托物取象”的论证方法;形式自由,短小精悍,文字飘逸、饱含诗情,形成了诗性言说下的散漫文体与诗意语言风格。

关键词:李健吾;古典文论;托物取象;散漫文体;诗意语言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1-0087-04

“Target picking based on object” and the poetic speech

——on the influence of classical critical literature on Li Jianwu's literature

DING Yan - ya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Law,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Shandong 271018, China)

Abstract: Li Jianwu's literary criticism has formed an independent school of criticism sty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lassical literary theory. He emphasizes intuition and adept at creating imagery, metaphor, symbols, analogy and other methods to convey the reading experience. Moreover, he has formed “target picking based on object”; free form text, elegant, full of poetic, formed a poetic expression of undisciplined style and poetic language style.

Key words: Li Jianwu; classical literary theory; target picking based on object; undisciplined style; poetic language

李健吾的文学批评注重捕捉直觉印象,以对阅读体验的感性传达见长,通常被当作借鉴西方印象主义批评理论的代表人物。然而不能忽视文化传统对批评者心理结构与审美情趣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文化及其产生的美感并不因外来的‘模子’而消失,许多时候,作者们在表面上是接受了外来的形式、题材、思想,但下意识中传统的美感范畴仍然左右着他对外来‘模子’的取舍。”^[1]与其说李健吾对西方印象主义批评观念情有独钟,不如说他有效激活了批评者内心积淀已久的文化符码,使其在中西融合的现代化进程中恢复了古典文论传统。李健吾以《咀华集》、《咀华二集》为代表的文学批评强调直觉感悟,善于营造意象,常用比喻、象征、类比等手法传达阅读感受,形成了“托物取象”的

论证方法;形式自由无羁,文章短小精悍,语言飘逸灵动、饱含诗情,向世人展示了一派自然天成、不同流俗的风范。

一、“托物取象”的论证方法

中国古典文论不重条分缕析的逻辑判断,而是强调批评对象在批评者心理上形成的主观印象,对这种印象的描摹常“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生动鲜活的物象暗示阅读感受,通过立象以尽意,属于“托物取象”的论证方法。“身”与“物”是古典文论最常见的两类比附物象,如以人体部位中的主脑、血肉、眉目、风骨比喻文章内容、结构和风格;有时甚至将人体与诗体一一对应:“诗有肌肤,有血脉,有骨骼,有精神。无肌肤则不全,无血脉则不

收稿日期:2013-09-28

作者简介:丁燕燕(1980-),女,山东日照人,硕士,讲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

能,无骨骼则不健,无精神则不美。四者备,然后成诗”(宋代吴沆《环溪诗话》)。人与诗成为拥有内在情思感应的统一体,诗体的完备正如人体之全美。至于“物”象比附在古代文论中则更常见,钟嵘的《诗品》盛赞谢灵运的诗:“犹譬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诗品·上品·谢灵运》),品评范云、丘迟曰:“范诗清便婉转,如流风迴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诗品·中品·范云、丘迟》),鲍照在《南史·颜延之传》中对比颜延之与谢灵运诗的优劣说:“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颜延之)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绘满眼”……无一不是以物比文。诗品家不对诗歌细部作理性分析和评价,而是用比喻拟象的方式将阅读体验和盘托出,以“青松”、“白玉”、“迴雪”、“落花”、“初发芙蓉”、“铺锦列绣”这样画面感极强的描述,引发读者的联想和想象,使其在诗意盎然的审美愉悦中体悟品评者所要传达的意图和观点。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2]。对于文学批评,此论也相当恰切。古典文论家不直接评判文学作品的内容和风格,而是通过渲染与之类似且能传达相关精神气质的物象来侧面烘托批评者的审美感受和审美判断,“托物取象”,以象立意。

对这种“托物取象”的论证方法,李健吾无疑深得其中三昧。因为,文学作品表达的思想情绪往往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要用准确无误的判断性语言评判作品势必会损害其多义性与丰富性,况且,要妥帖地传达作者的独特体验也绝非易事。所以李健吾没有做徒劳无功的评断,而是将阅读感受凝定于特定的物象之上,运用比喻、象征、类比等手法“托物取象”,达到曲尽其意的效果。

李健吾拿叶紫小说作比:“始终仿佛一棵烧焦了的树,……不见任何丰盈的姿态,然而挺立在大野,露出棱棱的骨干,那给人茁壮的感觉,那不幸而遭电击的暮春的幼树”^{[3]162}。不对叶紫小说的故事、情节、艺术技巧作学理性分析,也不对其粗糙凌厉、激愤昂扬的作品风格作过多阐释,李健吾只是用“一棵烧焦了的树”、“遭电击的暮春的幼树”这一形象来比附阅读小说时的情绪体验,反而引发人们对小说作者坚韧不屈却英年早逝的坎坷人生经历的联想,更深刻地感悟叶紫小说刚毅遒劲的风骨,出人意料地获得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审美魅力。借“树”这一自然物象比附作家作品风格、诗歌流派演变是古典文论源远流长的既有传统。从魏晋

人物品评:“岩岩若孤松之独立”、“神态高彻,如瑶林琼树”(刘义庆《世说新语》),到晚唐诗风分类:“大风卷水,林木为催”、“萧萧落叶,漏雨苍苔”(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再到清代诗论专著:“譬诸地之生要然:三百篇,则其根;苏李诗,则其萌芽由蘖;建安诗,则生长至于拱把;六朝诗,则有枝叶;唐诗,则枝叶垂荫;宋诗则能开花,而森之能事方毕”(叶燮《原诗》),都与李健吾文学批评的“托物取象”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类似的物象比附在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中比比皆是,他将沈从文的《边城》比喻成是“一颗千古不灭的珠玉”^{[3]154};评价巴金的小说《神·鬼·人》,认为作者将社会生活中无法释放的满腔热情倾注在文学创作中,“好像一匹不羁之马,他们宁可牺牲艺术的完美,来满足各自人性的动向”^{[3]147};评论萧乾小说的叙述和语言像“一片异样新绿的景象”,文笔绘成“一幅自然的锦霞”,“娇嫩”但充满希望,总有一天“会长成壮实的树木”^{[3]177}。不直接给出结论,而是依靠营造生动具体的物象传达审美感受,托物为比,意附物中。李健吾将对文学之美的鉴赏和艺术规律的认识凝结在“珠玉”、“不羁之马”、“锦霞”、“树木”等姿态各异的物象中,深得古典文论“托物取象”之精髓。他不直接向读者教诲,而是以意象启发读者主动思考和体味,为文学鉴赏留下了广阔的阐释空间。

李健吾不仅以物象比附审美感受,“托物取象”,还常用博喻、象征、类比等手法将这种物象比附极力扩大,形成恢宏磅礴之势,以此增强评述效果。他认为《画梦录》“把若干情境糅在一起,仿佛万盏明灯,交相映辉;又象河曲,群流汇注,荡漾圆环;又象西岳华山,峰峦叠起,但见神往,不觉险巖。他用一切来装璜,然而一紫一金,无不带有他情感的图记。这恰似一块浮雕,光影匀停,凹凸得宜”^{[3]128}。通篇比况,句句用喻,极尽铺排渲染之能事。用“明灯”、“河曲”、“峰峦”、“浮雕”等众多意象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比喻一位作家作品的艺术风貌,意象纷繁,用喻恰切,读来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不仅如此,李健吾还常常将艺术风格相近或相对的作家作品并置在一起,以类比的形式打比方,表现批评对象的各有千秋或大相径庭。在比较了巴金与茅盾的行文风格后,李健吾得出结论说:“读茅盾先生的文章,我们像上山,沿路有的是瑰丽的奇景。然而脚底下也有的是绊脚的石子;读巴

金先生的文章，我们像泛舟，顺流而下，有时连收帆停驶的工夫也不给。”^{[3]17}以在路上行走比附阅读作品时的主观感受，用“绊脚的石子”和“顺流而下”比喻阅读过程中的流畅程度，评论生动形象，类比浅易有趣，让人读后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他评价沈从文的《连城》是“一首诗，是二佬唱给翠翠的情歌。《八骏图》是一首绝句，犹如那女教员留在沙滩上神秘的绝句”^{[3]52-53}，则用空灵自由的“诗”与韵味悠长的“绝句”分别比拟同一位作家的两篇风格迥异之作，形式活泼，结论得当，有一种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独特效果。

二、诗性言说下的散漫文体与诗意语言

中国古典文论具有极强的人文化和风格化特点，文章体式灵活多样，词藻笔致婉转多姿，带有浓郁的诗性色彩。在文体方面，老子认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老子·四十一章》），作为意义核心的“道”是无论用什么具体言辞也不能传达的，一旦将其诉诸任何具体语言，“道”便会隐匿不见，反而不如用言简意赅的具象语言，点到即止，启发人们的感悟。对此，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得最明白：“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这就要求批评者对作品的解读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避免太过坐实的评价。因此，古代文论没有推理细密的长篇巨制，文论观点多散布于其他文章体式之中，即使有专门的文论篇章，也多短小精悍之作，以传达直观体悟的诗文点评、序跋、笔记为主，文无定法，形式自由：陆机以赋论文，刘勰以骈骊文字析文，杜甫以七绝论诗，司空图以四言描述诗歌风格和意境……不一而足。与此同时，古典文论中还出现了许多用语精当的名言隽语：“诗庄词媚”，“元轻白俗”，“岛瘦郊寒”，“周清真之典丽、姜白石之骚雅、史梅溪之句法、吴梦窗之字面”，“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等无不在片言只语中蕴含幽深。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文论批评文体几乎无体不用，无体不有。博采众体，包括众体，涵泳众体，融通众体，这便是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无体之体”^[4]，以“无体之体”概括古典文论的文体结构特点可谓有识之见。

李健吾的文学批评继承了古典文论这一特点，往往写得枝蔓松散，自由无羁，长不过五六千字，短则三言两语便将批评对象的整体形貌勾勒出来。因为他推崇“咀华”式的批评，“分析一首诗，好象把一朵花揉成片片。冷静下头脑去理解，潜下心去

体味”，即把文学作品当作“每早饮露餐阳的鲜花”来咀嚼、品味^{[3]337-338}。既然是对作品的“含咀英华”，自然只需把直觉体验中最突出的那份滋味传达出来即可。正如古典文论形成了诸多名言隽语一样，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也往往在寥寥数语间便突显出批评对象的某一优长，然后围绕这一焦点荡开笔墨生发开去。他对林徽音的细密蕴藉、何其芳的精致忧郁、废名的冷涩、李广田的质朴都把握精准，一语中的。但李健吾的行文却并不仅仅局限于对这些特点的发掘，而是讲究游离的功夫，往往节外生枝又涉笔成趣，文章结构散漫多变，形式灵活自由。他的批评文字视野开阔，指涉广泛，谈人，谈事，谈物，谈社会……海阔天空，娓娓道来，将阅读的感觉和体验融会在看似不关主题的闲谈中，最后笔锋忽然一转才揭出主题。例如在评论巴金的《爱情三部曲》时，李健吾着重强调作者的热情，但行文时却在中途调转笔锋，似乎信手拈来地谈到法国作家乔治·桑，从而将文章引入另一重天地：“乔治·桑把女性的泛爱放进她的作品；她钟爱她创造的物；她是抒情的；她要救世，要人人分到她的心。巴金先生同样把自己放进他的小说：他的情绪，他的爱憎，他的思想，他的全部精神生活。”^{[3]15}由中国的巴金到法国的乔治·桑，由作家乔治·桑到其作品人物中女性的泛爱，再由女性的泛爱回到巴金这里，话题跳跃多变，结构松散枝蔓，读来却文理自然，摇曳生姿。

中国古典文论家本人往往既是文学作者也是批评家，冷暖自知的创作心态使他们像对待艺术创作一样写作批评文章，很多诗话、词话、序跋、评点本身就是一篇辞采藻丽、个性鲜明的艺术作品。刘勰说：“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刘勰《文心雕龙·原道》）在“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中，“文”就是对宇宙内在律动的感应和展现，自然万物与人为创造无一不因此“皆文”，批评家的点评文字既然属于“有心之器”，自然应“郁然有采”。历史上也确实存在许多为人称道的文论作品被后人当作雅致的艺术作品诵读：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严羽的《沧浪诗话》……无疑都既是字字珠玑的文论名篇也是富于艺术魅力的文学美文。由此，古代文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意语言风格。

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与此类似,一般都文体清丽、用语新奇、个性鲜明,满溢着一派诗意盎然之气。他认为:文学批评“犹如任何艺术具有尊严”,“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有它自己的宇宙,有它自己深厚的人性做根据。一个真正的批评家,犹如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犹如任何创作者,由他更深的人性提炼他的精华,成为一件可以单独生存的艺术品。”^{[3]40}李健吾注重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将批评活动与文学写作看成是地位相当的艺术创造,需要以批评者自身“深厚的人性做根据”,做成一件单独存在的艺术品。所以,他的批评文字往往都灌注着鲜明的主体意识,注重阐发批评者的主观情思,写得通体潇洒,文采斐然。例如在评价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时,李健吾感同身受地写道:“一声霹雳,‘九·一八’摧毁了这座殖民地的江山。他不等待了。‘那白的没有限际的雪原’,‘那高的没有限度的蓝天’,和它们粗大的树木,肥美的牛羊,强悍的人民,全要从他的生命走失。他当了义勇军。眼睁睁看见自己争不回来他心爱的乡土,一腔悲愤,像一个受了伤的儿子回到家里将息,他投奔到他向未谋面的祖国,一个无能为力的祖国!萦回在他心头的玫瑰凋了,他拾起纷零的幻象,一瓣一瓣,缀成他余痛尚在的篇幅”^{[3]141}。以充满诗性的语言描述了一幅情景交融的社会图景,字里行间包含着批评者本人的精神面影。读这段文字,读者与其说是接受某种文学批评的理论观点,还不如说是在欣赏和体味一首清新隽永、韵味无穷的诗,不仅批评对象——萧军作品的艺术特质一目了然,就是批评者本人——李健吾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也在个性色彩强烈的诗意表达中展露无遗。难怪唐湜赞赏李

健吾的沈从文评论说:“不仅小说家沈从文写活了他的人物,他的湘西世界,而且,批评家刘西渭也写活了他的人物,他的小说家沈从文!”^[5]

三、结论

李健吾是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由于其时中国社会强烈的现代化焦虑,人们更倾向于将他的文学批评看作是西方印象主义本土化发展的成果。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他那“托物取象”的论证方法与极富人文特色与个性风采的诗性言说无不深受中国古典文论的熏染。在当代文艺理论面临创生能力低下,西方因袭严重的危机时刻,重新发现李健吾文学批评中的古典质素或许会对改变当代文论的现实境遇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 [1] 叶维廉. 东西文学中“模子”的应用[A]. 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叶维廉比较文学论文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17.
- [2]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1.
- [3] 李健吾. 李健吾文学评论选[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 [4] 李建中. 论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无体之体[J]. 文学评论,2009(2):88-92.
- [5] 唐湜. 含咀英华[J]. 读书,1984(3):50-57.

[责任编辑:吴晓红]

意美、音美和形美

——许渊冲诗词翻译的理论与实践

程永生^{1,2}

(1. 安徽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淮南 232001; 2. 北京工业大学 耿丹学院, 北京 101301)

摘要:许渊冲在汉语诗词外译的实践中认识到,翻译所涉及的两种语言各有劣势、等势和优势,因此在翻译中可运用浅化、等化、深化手段,力求在意似、音似、形似的基础上传达原诗的意美、音美、形美,从而使译者本人和读者都能知之、好之、乐之。这五个三,加上以诗译诗等原则,构成了许渊冲诗词翻译美学体系,而意美、音美、形美实为该体系的核心。许渊冲诗词翻译美学既来源于实践,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自己在汉语诗词外译中也一直以一贯之。

关键词:意美;音美;形美;诗词翻译美学;许渊冲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4)01-0091-05

Striving for aesthetical excellence in ideology, phonology and morphology: the focal point for Xu Yuanchong's poetry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CHENG Yong - sheng^{1,2}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 2. Gengdan Institute,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1301, China)

Abstract: When translating Chinese poetry into foreign languages, Xu Yuanchong comes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 two languages involved in translation are each as advantageous as the other, more advantageous or less advantageous than the other. These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 provide the translator with so much convenience that in translating, he can turn to terms less effective than, as effective as or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original whenever necessary. In turning to such terms, he aims at achieving such an effect that the translated poem will be similar to the original in the aspects of ideology, phonology and morphology. With some polishing touches added, consequently, the translated poem will be aesthetically excellent in terms of ideology, phonology and morphology. Such a poem will then be eligible, appealing and fascinating both to the translator and the reader. The above theory consists of five elements, each composed of three aspects. And these five elements together with such principles as the principle that poetry translation should produce a new poem constitute Xu Yuanchong's aesthetic poetry translation theory, in which the idea that the translated poem should be aesthetically sound in terms of idea, phonology and form lies in the focus. From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Xu Yuanchong has developed hi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we appreciate it very much that in his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ems into either English or French, he always observes the translation theory he has developed.

Key words: semantic aspect of aesthetics; phonological aspect of aesthetics; formal aspect of aesthetics; aesthetics for Chinese

收稿日期:2013-06-28

作者简介:程永生(1946-),男,安徽潜山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poetry translation; Xu Yuanchong

许渊冲可谓我国现代翻译史上的一位奇人,他独自一人在国内外出版了几十本翻译著作,发表了几十篇论文,汇集成了《翻译的艺术》,于1984年初版,2006年增订再版,在译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细读他的论文,我们清晰地看到,许渊冲的翻译理论是在研究翻译标准、直译和意译等传统译论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是随着他从外译汉逐步转移到汉译外、从其他文学体裁翻译逐步转移到汉语诗词外译而发展起来的,乃至今天我们可以将他的译论称为诗词翻译美学。许渊冲诗词翻译美学,简言之,就是以诗译诗,用浅化、等化、深化等手段,求得意似、音似、形似,在三似的基础上,追求意美、音美、形美,从而使自己和读者均能知之、好之、乐之。

许渊冲诗词翻译美学源于何处?我们认为,一则源自他的汉语诗词外译的翻译实践,一则源自曾盛行于国内的传统译论。众所周知,我国传统译论常常将原文和译文分为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并据此提出以信达雅或忠实、通顺作为翻译标准。所谓直译和意译,也多半是从内容和形式的角度讨论的。诗词作品和其他作品一样也有内容和形式之分。所谓内容就是意义,可简称为意;而形式则可分为韵律和诗形;而韵律又可分为押韵和节奏,诗形也可分为诗行、句长、音步或诗顿等。许渊冲正是这样看的。他说:“在我看来,翻译的艺术就是通过原文的形式(或表层),理解原文的内容(或深层),再用译文的形式,把原文的内容再现出来。这种再现不是机械地逐字对译,而是原文‘意美’的再创造。翻译散文一般只要再现原文的‘意美’,而翻译诗词,却除了‘意美’之外,还要尽可能再现原诗的‘音美’和‘形美’。”^[1]这儿的讨论仍然局限于意和形。至于“三似”和“三美”,也是有所本的。例如,陈西滢在讨论诗词翻译时,认为“信、达、雅”只要取一个“信”字就足够了。由于全面的“信”很难做到,译诗应从三个方面贴近原诗,于是他提出了“意似、音似、形似”的译诗三原则^[2]¹³⁵⁻¹⁴³。许渊冲在其诗词翻译理论体系中提出了“三似”,是否受到陈西滢的影响?但许渊冲突破了三似,追求三美。追求“三美”,据许渊冲自己说是受到了鲁迅的“意美以感心,形美以感目,音美以感耳”的影响^[3]。是否也受到了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的翻译标准^[2]²⁵⁹⁻²⁷²的启发?此外,许渊冲还提出了用浅化、等化、深化的手段追求三似

实现三美^[3]^{82-96,120-131}。他还阐述了之所以可用“三化”的手段追求三似、实现三美,那是因为语言有“劣势、等势、优势”^[1,3]。后来他又借助孔圣人的话提出了他的“三之”理论,即“知之、好之、乐之”^[3]⁹⁷⁻¹⁰⁸。因此,我们可以将上述五个“三”看成是许渊冲的诗词翻译理论的主要内容,而三美则是其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

许渊冲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诗词翻译理论,这套理论不但来自他的诗词翻译实践,而且他本人在翻译实践中也身体力行。周所周知,韵律(versification)在很大程度上是诗之所以为诗的决定性因素,汉语的唐诗宋词如此,英语的传统诗歌也如此。将汉语诗词翻译成英语,如何能借助浅化、等化、深化,使译诗在韵律上贴近原诗或与原诗音似、形似而成为翻译文学中的一首音美、形美之诗而又不损害原诗的意美呢?这是许多翻译工作者都望而却步的一大难题。在这方面,许渊冲确有手段。下面先以李白的五言绝句《静夜思》为例予以说明。

静夜思

李白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李白在我国被尊为诗仙,主要不在于他的诗多,也不在于他善于描写自然风光,更不在于他是一位有道教倾向的诗人,而在于他的诗写得放荡不羁,豪爽飘逸。然而眼前的这首《静夜思》并没有“白发三千丈”那样的夸张,也没有“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那样的飘逸,而是抓住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活脱地刻画出了一位思乡之客。

Before my bed.

There is bright moonlight,

So that it seems

Like frost on the ground.

Lift my head,

I watch the bright moon,

Lowering my head,

I dream that I'm home.

(Translated by Arthur Cooper^[4]¹²¹⁻¹²²)

Arthur Cooper 英译过李白和杜甫的诗歌,虽多有建树,然则以三美观之,未必尽如人意。这首《静夜思》英译,如不分行排列,就不是诗,因为在翻译过程中,原诗已音形两失。原诗为五言绝句,共四行,每行五个音节,其顿式前两行为 2 + 2 + 1,后两行为 2 + 1 + 2,第一、二和四行最后一个音节押韵,押平声韵。英译共 8 行,其中单数行为四个音节、两个音步;双数行为五个音节,可看成三音步;但第五行为三个音节;英译基本上不押韵。其中,第五行的 lift 和第七行的 lowering 一个为动词不定式,一个为现在分词,有失对称。译者使用了语法结构完整的诗句,因而可以看成是分行散文。

The Moon Shines Everywhere

Seeing the moon before my couch so bright,
I thought hoar frost had fallen from the night.
On her clear face I gaze with lifted eyes,
Then hide them full of Youth's sweet memories.
(Translated by W. J. B. Fletcher^{[4]80})

Fletcher 翻译了不少汉语诗歌,颇富名望。译诗一如原诗,也由四行组成;基本上为五音步抑扬格,押韵格式为 aabb,但 bb 押的是临韵。从意义上看,用 hoar frost 可能是为了凑齐 10 个音节,结果显得有些夸张;full of Youth's sweet memories 意义和意境似与原诗有别,可算因韵损意之一例。

A Tranquil Night

Abed, I see a silver light,
I wonder if it's frost aground.
Looking up, I found the moon bright,
Bowing, 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
(Translated by 许渊冲^{[4]81})

与 Fletcher 的做法相同,许渊冲也将原诗译为四行;不同的是,许渊冲使用了 8 音节、4 音步诗行,每行比 Fletcher 的少 2 个音节、1 个音步,在诗行的长度上更接近原诗。这样做与他主张用亚历山大体也就是 12 音节、6 音步译汉语的七言诗,用 8 音节、4 音步或至多用 10 音节、5 音步即英雄体译汉语的五言诗^{[1]72-73 [3]129-130}有关。许译基本上

为抑扬格,押韵格式为 abab。另外,译诗的最后一句,许更胜 Fletcher 一筹,因为许译是实实在在的“低头思故乡”,虽然这个“思”略有夸张。Fletcher 最后一行中的“them”指代什么呢?“Youth's sweet memories”与“低头思故乡”又有什么相干呢?

许渊冲英译唐宋词的时候,也坚持了上述原则,如:

长相思
白居易

汴水流,泗水流,
流到瓜洲古渡头。
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
恨到归时方始休。
明月人依楼。

Tune: "Everlasting Longing"
Bai Ju - yi

See the Bian River flow
And the Si River flow!
By Ancient Ferry, mingling waves, they go,
The Southern hills reflect my woe.
My thoughts stretch endlessly,
My grief wretches endlessly,
So thus until my husband comes to me,
Alone on moon-lit balcony^{[5]16-17}.

原词的形美、音美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首先,原词分上下两片,每片 3 个诗行,第一行六个字,第二行七个字,第三行五个字,但第一行中间有停顿;其次,原词一韵到底;第三,原词上片第一行重复了一个双音节顿 + 一个单音节顿的形式,第二行由三个双音节顿 + 一个单音节顿构成,第三行由两个双音节顿 + 一个双音节顿构成;下片完全重复了上片的节奏;第四,原词上片第一行重复了“水流”,第二行的开头重复了第一行的结尾的“流”字,第三行“点点”为叠字;原词下片第一行重复了“悠悠”,第二行重复了第一行中的“恨”字。

许译在追求音似、形似时是有所变通、有所侧

重的。例如,将原诗的第一行译成了两行;将原诗上下两片的头两行均译成了三音步,将第三行译成了五音步,将最后一行译成了四音步。如此看来,许渊冲意在用三音步对应原词的三音节,用五音步对应原词的七音节,用四音步对应原词的五音节。这也符合许氏的一贯主张,即一般用长行译长行,短行译短行,用亚历山大体译七言,用英雄体译五言(同上)。至于用三音步译三音节等,看来是专门用于英译唐宋词的。下片更换了韵脚;将原诗的“人倚楼”译成了“在阳台上”,更换了时空。这些都是变通。另外,原词中第一行和第二行的重复字,原词上片中的叠字,由于无法翻译而舍去未译。这说明,许译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但仔细分析,可以看出,许渊冲在翻译过程中的确是牢记三似、追求三美的。

笔者拜读了不少许渊冲汉语诗词英译,欣喜地看到,他翻译了那么多汉语诗词,却基本上没有因音害意、因形害意的现象,赢得了译界的普遍赞誉。但智者千虑,也还有少数地方仍值得进一步推敲,如:

浣溪沙^①

无名氏

五里竿头风欲平,
长风举棹觉船轻。
柔橹不施停却棹,
是船行。

满眼风波多闪烁,
看山恰似走来迎。
仔细看山山不动,
是船行。

这首词及下面的英译均引自许渊冲文献[5]8-9页,许渊冲在注释中认为“五里竿头”系“五两竿头”或“五里滩头”之误,我也有同感。联系“风欲平”,我更倾向于认为系“五两竿头”之误,因为“五两”是古人测风向风速的一种工具,用五两鸡毛制成,故名。

原词格调清新,遣词造句贴近口语,读来朗朗上口。上片的大致意思是,刚才有风,我们乘风举棹,觉得船行起来很轻,认为船行是风之力,是橹和

棹之力。现在风也停了,棹也停了,橹也停了,我们仍然发现船在行。下片的大致意思是,水面上波光闪烁,山似乎在迎面朝我们走来,然而仔细一看,山并没有动,是船在行。换言之,上片以动态物体为参照,下片以静态物体为参照,结果都一样,可见这船倒有点“坐地日行八万里”的味道了。然而作者不是气吞山河的政治家,而是一位诗人,他是在描写一种令人惬意的恬静生活,是在创造一种意境。好在诗无达诂,姑且妄诂之。汉语的诗歌如果既没有明确交代也没有暗示,一般可看成省略了指代作者本人的“我”,换言之,可以看成是第一人称叙事。由此观之,作者在船上。为什么既觉不到船动又认为是船动呢?这种感觉一般人都有,但作者可能是进入了庄周梦蝶的境界。有一天,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大蝴蝶,醒来发现自己依旧是一个人,但经过一番自我追问之后,他彻底糊涂了,到底是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变成了自己呢?这时,他与蝴蝶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了,“合一”了,他已经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6]。眼前的这首清新可餐、沁人肺腑的《浣溪沙》描写的不也是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吗?是船在动还是风在动或棹橹在动?是船在动还是周围的山水在动?这个问题,恐怕作者一时也糊涂了吧?再者,眼前的这首《浣溪沙》实际上是《摊破浣溪沙》,因为它在《浣溪沙》的基础上,上下两片都增加了“是船行”的诗行。为什么要增加这个诗行呢?为什么上下片要增加完全相同的文字呢?我认为,增加“是船行”是为了创造物我两忘的意境;上下片增加相同的内容是为了强调。如果有人追问,为什么要强调呢?我的回答是,作者旨在暗示,感性地看,他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然而理性地看,依旧“是船行”,真是“难得糊涂”哇!

从形式看,原词上下两片,各由四个诗行组成,前三行七言,后一行三言,是合乎词谱的长短句。从韵律看,平仄也合乎要求。上片一、二、四行押韵,下片二、四行押韵,押平声韵,一韵到底,押韵形式合乎要求。总而言之,是一首合乎意美、音美、形美标准的好词。

Tune: “Broken Form of Sand of Silk – washing Stream”

Anonymous

^① 其实是《摊破浣溪沙》,而且许渊冲也是按《摊破浣溪沙》英译的。

After passing the five mile beach, the breeze stops blowing,
With sails unfurled, the boat seems light when we are rowing.
We use no scull and take our oars from water flowing,
But still the boat is going.

The water shimmers in the breeze before the eye,
As if to bid us welcome, the mountain comes nigh.
On a close look, it does not move but towers high!
The boat is going by.

许渊冲的英译也分上下两片,共8个诗行。两片的前三行基本上都是六音步,但第三行多一个音节,第七行少一个音节,有一个逗号,可资弥补。押韵形式为aaaa bbbb。如果将许译回译,应该是“过了五里滩,微风不吹了,扬起了帆,我们一摇桨船似乎很轻。我们不用棹,从流水中拿起橹,但船仍在行。眼前的水在微风中熠熠发光,似乎在迎接我们,山向我们走近。仔细一看,山没动只是翘首,船从旁边走过。”虽然没有刻画出物我两忘的意境,但悠闲自适之情仍跃然纸上。译词本身也是一首符合意美、音美、形美标准的好诗。但我们如不为贤者讳,也不得不承认,英译在意义上与原作有些距离。首先,“风平”译成了“the breeze stops blowing”;其次,“sails unfurled”,“nigh”,“towers high”等是原文所没有的;第三,“是船行”分别译成了“But still the boat is going”和“the boat is going by”,前者翻译时凭空增加了still,预设了此前作者已经知道了是船行;后者增加了by,仿佛作者不在船上而是站在岸上或别的什么地方看船;另外,原文的重复和强调也被扭曲了。别的改动且不说,仅第三条改动就产生了如下的结果。原文的字面重复不见了,见不到船行但仔细一想却是船行的意义不见了,相对运动没有了,物我两忘的境界丢失了,一时糊涂却又难得糊涂的境界荡然无存,仅存一幅悠闲自得、观风赏景的画面。而这些损失又恰恰是

为了趁韵!这与许氏提倡的原则是否有些抵牾?

许渊冲诗词翻译美学,发展了我国传统译论中关于内容和形式的论述,结合诗词翻译的实际,将形式分为音和形。在此基础上,和陈西滢一样,认为译诗难以完完全全地忠实于原诗,只能贴近,因而舍信求似,求“意似、音似和形似”。但许渊冲并没有就此却步,而是既解决了求似的手段(浅化、等化、深化),又解决了求似的目的追求(意美、音美、形美),并且反复阐述了三似、三化、三美之间的关系,最后从审美客体转移到审美主体,在审美创造中,使读者和译者都能知之、好之、乐之。这种诗词翻译美学,不但实用,具有可操作性,又自成体系,具有理论深度,是我国译论尤其是翻译美学理论中的一大硕果。难能可贵的是,许渊冲诗的由“五个三”构成的翻译理论并不是为理论而理论,更不是仅用于约束别人的,自己在翻译实践中完全置之不顾的。他身体力行,怎么做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

参考文献:

- [1] 许渊冲. 翻译的艺术前言[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 [2] 陈西滢. 论翻译[A].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 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C].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35-143.
- [3] 许渊冲. 翻译的艺术·前言[M].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
- [4] 毛荣贵. 翻译美学[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 [5] 许渊冲. 最爱唐宋词[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 [6] 赵焰. 水和人——庄周与安徽[J]. 江淮文史,2000(2):51-63.

[责任编辑:吴晓红]

后殖民理论国内二十年译介回顾与展望

孙 妮

(安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外国文论的引进和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是翻译。后殖民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引进中国后,成为学界探讨和争论的热点之一。早期由于理论翻译的滞后和不足,导致部分学者对后殖民理论产生一些偏颇之解。后殖民理论原著和文献的陆续翻译出版,有益于学者和读者对这一理论的了解和掌握。迄今国内后殖民理论的译介工作取得不少成果,但依然存在很多空白。拟对二十年来国内后殖民理论译介成果和不足进行简要回顾并展望其发展前景。

关键词:后殖民理论;国内译介状况;回顾与展望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4)01-0096-05

A review and prospect of postcolonial theory translation for the recent twenty years in China

SUN N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Abstract: One important way for introducing foreign critical theories is translation. Postcolonial theory has become one of the heated focuses of discussion and debate since it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at the turn of 1990s. The initial backwardness and inadequacy of translation led to some scholars' bias against this theory. The continual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postcolonial is conducive to the scholar and the reader's comprehension and command of the theory. Despite the considerable progress made so far in postcolonial theory translation at home, there still exists many vacancies now. The paper attempts a brief review of postcolonial theory translation for the recent twenty years at home as well as a prospect for its future.

Key words: postcolonial theory; translation of postcolonial theory at home; review and prospect

外国文论的引进和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是翻译^①。后殖民理论作为20世纪西方学术中的一门当代“显学”,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引进中国后,成为中国学界探讨和争论的热点之一,掀起了一股后殖民理论研究的热潮。其涉及的内容包括后殖民理论的评介和翻译,运用后殖民理论对国内的文艺、文化现象进行批评与重新解读西方经典文学作品和当代中外文学作家作品,以及研究后

殖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等。早期由于理论翻译的滞后和不足,导致部分学者对后殖民理论产生一些偏颇之解。后殖民理论原著和文献的陆续翻译出版,促进了学者和读者对这一理论原貌的了解和掌握。

国内学界对后殖民理论的译介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早的翻译资料是王逢振等编译的《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1988)和《最

收稿日期:2013-09-16

基金项目: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WW050)资助

作者简介:孙妮(1958-),女,安徽芜湖人,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英美文学与翻译、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

^①关于对“文论”这个术语的界定和翻译,可参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张中载、王逢振等主编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导言部分。

新西方文论选》(1991),其中收录了赛义德访谈录和《世界·文本·批评家》的译文。张京媛在《彼与此》(载《文学评论》1990年第1期)一文中较早地对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做了相当细致系统的介绍,并指出赛义德有意识忽略了东方学的积极作用。刘禾在《黑色的雅典》(载《读书》1992年第10期)一文中,也提及了赛义德等后殖民理论的几位代表人物。但这些译介和评介当时都未引起学界重视和共鸣。直到1993年后殖民理论才真正引起国内学界关注^[1]⁵²²,该年《读书》杂志第9期同时推出张宽的《欧美眼中的“非我族类”》、钱俊的《谈赛义德谈文化》、潘少梅的《一种新的批评倾向》、李长莉的《学术的倾向:世界性》四篇讨论“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的文章,专门介绍后殖民理论的创始人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及其新著《文化与帝国主义》,在学界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此后,众多学者撰文介绍有关后殖民理论,掀起了后殖民理论评介的热潮。

已有多位学者对后殖民理论在中国学界引进的来龙去脉以及回应和影响进行了反思性的描述、梳理和再现,这里不再赘述^①,但是对后殖民理论著述及其研究文献译介状况的梳理和述评略显不足,本文拟从后殖民理论原著译介状况、后殖民理论研究文献译介状况、后殖民理论译介的空白和不足这三个方面对二十年来国内后殖民理论译介状况作简要回顾和展望。

一、后殖民理论原著译介状况

相对于国内学界上个世纪90年代如火如荼的后殖民理论研究,后殖民理论著述翻译出版起步较晚,长期以来仅有零星的节译,散见于一些报刊和编著中。最早的翻译资料除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以下资料,《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和《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发表的唐建清、张建民翻译的《东方不是东方:濒于消亡的东方主义时代》,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解

殖与民族主义》收录了《东方学》的前言和后记^②,《外国文学》1999年第1期发表的法农《地球上不幸的人们》中的重要一节《论民族文化》(马海良译)和霍米·巴巴的《纪念法农:自我、心理和殖民状况》一文(陈永国译),《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刊登的霍米·巴巴的《黑人学者与印度公主》(生安锋译)以及《后殖民性、全球化和文学的表述——霍米·巴巴访谈录》(载《南方文坛》,2002年第6期)和《后殖民主义、身份认同和少数人化——霍米·巴巴访谈录》(载《外国文学》,2002年第6期)。此外,北京大学2002年出版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弗·马尔赫恩编著,刘象愚等译),收入了赛义德的《简·奥斯丁与帝国主义》一文。与国内后殖民理论研究的进展相比较,译介工作显然十分滞后。

1999年,后殖民理论译介工作取得重大进展。该年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京媛主编的《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4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罗钢、刘象愚主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这是国内最早出版的两部西方后殖民理论译文集,各自收录了后殖民理论主要代表人物赛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与后殖民理论有密切关系的美国学者詹姆逊、后殖民理论先驱法农以及后殖民理论的一些批评者、研究者的部分论著。继这两本译文集之后,5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赛义德的《东方学》(王宇根译)。作为开启了后殖民理论领域的著作,该书的翻译出版是后殖民理论引进中的一个重要成果。8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谢少波、韩刚等选译的《赛义德自选集》,收录十多篇赛义德的文章以及关于赛义德的专著《文化与帝国主义》的专题讨论会发言。这些后殖民理论著述的翻译出版,有助于国内学者比较全面地了解有关后殖民理论的基本思想和发展趋向。

进入新世纪以来,后殖民理论原著尤其是赛义德著述的翻译出版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2001年6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杨乃乔等翻译的《后殖民批

^① 参见陈厚诚“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载《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6期)、丰林“后殖民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响”(载《外国文学》,1998年第1期)、刘康、金衡山“后殖民主义批评:从西方到中国”(载《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宋国诚“后殖民理论在中国——理论旅行及其中国化”(载《中国大陆研究》,2000年第10期)、周兴杰“近十年中国后殖民批评综述”(载《燕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马建高“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之后——20世纪90年代国内后殖民理论研究综述”(载《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和“中国后殖民理论研究现状及反思”(载《名作欣赏》,2012年23期)、赵稀方“一种主义、三种命运——后殖民主义在两岸三地的理论旅行”(载《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刘海静“我国学术界对萨义德后殖民文化理论研究述评”(载《兰州学刊》,2010年第10期)、苏晖、王珊“后殖民理论之争与批评实践——中国后殖民批评研究综述”(载《库切研究与后殖民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2010年)等。

^② 萨义德《东方论述·后语》,载香港岭南学院翻译系“文化/社会译丛”编委会:《解殖与民族主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4—65页。

评》,这本书是英国后殖民理论家巴特·穆尔——吉尔伯特于1997年所编著的后殖民理论选本,收录了后殖民理论“三剑客”赛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三篇文章,作为后殖民理论先驱的艾梅·赛萨尔、法农和阿切比的三篇文章,以及作为后殖民理论延伸性、拓展性研究的学者戴安娜·布莱顿、赫珂斯、简穆罕默德和阿赫默德的四篇文章。涉及到后殖民理论的一些主要问题,比如关于东方学、民族文化、黑人女性批评、现代性以及种族和阶级的关系等。但该书在内容上与罗钢、刘象愚主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有重合之处,比如两部译文集都有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再思考”、法农的“论民族文化”、斯皮瓦克的“三位女性的文本和帝国主义的批判”^①。2002年4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赛义德的《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2003年10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赛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2004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格格不入:萨义德回忆录》(彭淮栋译);2006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赛义德的《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薇思瓦纳珊编,单德兴译);同年,新星出版社出版赛义德的《最后的天空之后》(金玥瑀译)和《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朱生坚译);2009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赛义德的《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从奥斯陆到伊拉克及路线图》(唐建军译)以及阎嘉译的《论晚期风格》;同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赛义德的《报道伊斯兰》(阎纪宇译),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推出《爱德华·W·萨义德、戴维·巴萨米安·文化与抵抗:萨义德访谈录》(梁永安译)。

无疑,后殖民理论原著特别是赛义德著述的翻译和出版,不仅为国内学者比较深入研究后殖民理论思想提供了有益的资源与保障,而且为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从《东方学》到《文化帝国主义》,赛义德对于西方文学经典与帝国主义关系的重新解读,开启了阅读西方文学的新视角,引起了一场“重读经典”的革命,它几乎颠覆了传统的英美文学研究^{[2][17]}。由此开启了国内学界对西方经典文学作品尤其是英国经典文学作品的后殖民解读^②。

二、后殖民理论研究文献译介状况

除了后殖民理论原著的译介,有关后殖民理论

的研究成果和文献也陆续翻译过来。例如,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拉尔夫·科恩主编的《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一书中,收进了美国黑人批评家小亨利·路易斯·盖茨和伊莱恩·肖沃尔特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可谓较早地运用后殖民理论视角对黑人所遭受的来自白人的种族压迫和剥削进行了批判,是后殖民理论研究的比较主要的早期文献。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艾勒克·博埃默的《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是一部运用后殖民理论作为批评视角,从文学作品研究的角度来阐发后殖民思想的专著。这本书讨论了过去两百年中以英语写成的文学作品,并界定了殖民文学、殖民主义文学和后殖民文学等概念,认为“殖民”文学主要是指那些有关殖民的想法、看法和经验的文字;殖民主义的文学专门指与殖民扩张相关的文字,充满了欧洲之上和帝国合理的观念;后殖民文学主要指对于殖民关系作批判性考察的文学。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抵制殖民主义视角的文字^{[3][2-3]}。简言之,书中很多观点和作家作品分析对国内学界后殖民文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启发和思路。2000年11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汪民安、陈永国和马海良主编的《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把从福柯到德里达、拉康、利奥塔、哈贝马斯到赛义德等经典文献集中在一起,试图通过文献的阅读勾勒出后现代性的谱系。该书对理解赛义德的福柯渊源以及后殖民理论与后现代性的关系提供了某种线索。200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吉尔伯特的《后殖民理论——语境、实践、政治》(陈仲丹译),这是一部对后殖民研究领域比较全面的概览性著作,着重探讨了后殖民理论“神圣三剑客”——赛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总体上来看,该书涉及种族、民族、帝国、文化等后殖民理论的“话语领域”,是西方后殖民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

此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林赛·沃特斯的《美学权威主义批判》(昂智慧译);200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瓦莱丽·肯尼迪的研究专著《萨义德》(李自修译)和美国学者保罗·博维的《权力中的知识分子》(萧莎译),以批判性人文主义谱

① 张京媛主编的《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也收入了斯皮瓦克的“三个女性的文本与帝国主义主义批判”(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一文,中文译名略有不同。

② 参见拙文《英国经典文学作品的后殖民解读述评》(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可窥一斑。

系对萨义德知识分子观点的清理,以及林赛·沃特斯对萨义德艺术批评的美学“新论”都展现了非常重要的研究视野与方向。2013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罗伯特·杨的《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容新芳译),则从世界局势、个人经历和史实评述入手来审视非殖民化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影响,将讨论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下,涉及土著人、无地农民、后殖民女权主义以及全球性的社会和生态运动。

在译介后殖民理论的过程中,一部分学者对后殖民理论的形成做了一些纵向上溯的考察,他们把目光投向作为后殖民理论先声的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殖民主义批评话语,例如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核心人物弗兰兹·法农的《全世界受苦的人》和《黑皮肤,白面具》的分析。译林出版社也于2005年推出由万冰翻译的这两部重要著作的中译本。

除了以上专门的后殖民理论著述外,国内学界还作了一些延伸性译介工作。包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两本专著《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和保罗·鲍威所编的论文集《向权力说真话:赛义德和批评家的工作》(王丽亚等译),以及三联书店出版的詹明信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把后殖民理论放到“文化研究”的栏目下,知识分子图书馆出版的一系列丛书,如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乔纳森·卡勒的《论解构》(陆扬译)、J.希利斯·米勒的《重申解构主义》(郭英剑等译)、阿里夫·德里克的《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雷蒙德·威廉斯等的《文化研究读本》(罗刚、刘象愚主编)、谢少波的《抵抗的文化政治学》(陈永国等译)布鲁斯·罗宾斯的《全球化中的知识左派》(徐晓雯译)、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萨达尔的《东方主义》(马雪峰译)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等为后殖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宽广的思维出发和着陆平台。

三、后殖民理论译介的空白和不足

迄今为止,国内后殖民理论译介取得不少成果,不仅翻译出版了一些理论原著,特别是赛义德

著述,而且还译介了一些后殖民理论研究文献。但总体看来依然存在不少空白和不足。国内译介主要集中在赛义德的理论著述,被称为后殖民理论“三剑客”中的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著述,则除上面提到的散见于一些报刊和编著中的零星节译、个别文章和访谈录外,各自还有一个读本:即《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读本》和《霍米·巴巴读本》^①,几乎没有其他中译本。学者们常常引用的霍米·巴巴的《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 1994)和《民族和叙事》(Nation and Narration, 1990),斯皮瓦克的《在他者的世界里:文化政治学论文集》(In Other World: Cultural Politics, 1987)、《后殖民批评家》(The Post-colonial Critic, 1990)、《对性属后殖民性学术自由的思考》(Thinking Academic Freedom in Gendered Post-coloniality, 1992)、《后殖民理性批评:走向行将消失当下的历史》(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1999)、《不时髦的论文字学:重温殖民话语》(An unfashionable Grammatology: Colonial Discourse Revisited, 2000)等重要著述都没有翻译过来,对后殖民理论的研究者不能不说是个重大缺憾。当然,这种状况与这两位学者行文晦涩难懂应该有很大关系。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一向以文风晦涩著称,其文章往往集多种理论于一身,引经据典,谈古论今。翻译其作品对译者来说确有难度。

美国学者帕瑞克·威廉姆斯(Patrick Williams)和劳拉·克瑞斯曼(Laura Chrisman)1993年编辑出版的《殖民话语与后殖民理论》(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是后殖民理论的第一个选本^{[2][21]},是迄今为止介绍后殖民理论最全面和包含后殖民理论家、文本最多的一个读本,目前国内还没有中译本。此外,对国外后殖民理论研究文献的译介也严重不足。例如,罗伯特·杨(Robert Young)的《白色神话:书写历史与西方》(White Mythologies, 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est, 1990),被认为是研究后殖民“神圣三剑客”“最好的”著作^{[4][16]},不仅首次系统深入地讨论了赛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思想,还谈到了后殖民理论先驱塞萨尔、法依等人,给后殖民理论的溯源提

^① 陈永国等主编的《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该书内容分为:解构的开启;责任;底层人能说话吗?;法国女性主义回顾等。张颂仁等主编的《霍米·巴巴读本》,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该书分为向后看,向前走;对本土世界主义的注解;另一个国度;关于全球化与矛盾意向的笔记;塑造法农这四个部分。

供了线索;比尔·阿什克罗夫特(Bill Ashcroft)、加恩里·格里菲斯(Gareth Griffiths)和海伦·蒂芬(Helen Tiffin)合著的《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和实践》(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1989)不但是后殖民理论的第一本论著,还是后殖民文学的奠基之作,只有台湾地区出版了译本^[5]。还有这三人合著的《后殖民研究读本》(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1995)和《后殖民研究关键词》(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 1998)对于深入拓展后殖民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地位和学术价值:前者是学界后殖民理论的权威读本,后者是一部全面归纳了后殖民理论术语的词典,对后殖民理论的关键概念一一予以解释确认,例如:散居、摩尼教、东方主义、法依主义、模仿、帝国主义、黑人性、跨文化等。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后殖民理论家罗伯特·扬(Robert Young)评价说,“(这本书是)一种无价的资源——一部关于后殖民理论的包容全面的词典——对所有工作在这个领域的或者是任何新手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6]。遗憾的是,上述这些著作迄今没有中译本。无疑,翻译出版的滞后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后殖民理论研究的规模 and 水平。

后殖民理论著述的译介除了数量上的不足,还存在一些翻译问题,如误读、误译,曲解原文信息等。国内有关学术期刊的论文大多是对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研究和评析,鲜见对外国文论翻译的研究,笔者曾就斯皮瓦克一篇重要的后殖民批评文章《三位女性的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的三个中译本存在的上述问题、以及西方文论的翻译标准撰文进行探讨和商榷^[7]。国内出版的几部后殖民批评理论文集,如张京媛主编的《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罗刚、刘象愚主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编撰的《后殖民批评》(杨乃乔等译),包亚明主编的《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四卷):《后现代景观》和张中载、王逢

振等主编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英文版节选本)都收入了这篇文章,由此可见该文章的重要性。希望能引起译界对国外文论翻译存在问题的重视,引来对文论翻译的批评之玉,文论翻译也要出精品。

四、结语

展望后殖民理论译介前景,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仅要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后殖民理论翻译过来,还要关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后殖民理论开创者赛义德虽然逝世多年,但后殖民理论没有止步不前,从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到后殖民生态批评^①,发端于文学批评的后殖民理论早已不囿于文学文本的解读和剖析,而扩展并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后殖民理论和研究还在不断发展中。

参考文献:

- [1] 陈厚诚,王宁.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 [2] 赵稀方.后殖民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3] 博埃默·艾勒克.殖民与后殖民文学[M].盛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 [4] Moore-Gilbert, Bart. Postcolonial Theory, Contexts, Practices[M]. London: Verso, 1997.
- [5] 阿什克罗夫特,嘉雷斯·格里菲斯,凯伦·蒂芬.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和实践[M].刘自荃,译.台北:骆驼出版社,1998.
- [6]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7] 孙妮.评《三位女性的文本与帝国主义的批判》译本——兼论西方文论的翻译标准[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325-331.

[责任编辑:吴晓红]

① 例如格莱汉姆·哈根和海伦·蒂芬合著的《后殖民生态批评文学,动物,环境》(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Animals, Environment. London: Routledge, 2010.)该书目前只有少数节选翻译过来。参见张慧容译“后殖民生态批评发展观”,译自该书第27-33页,载《苏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格莱汉姆·哈根(Graham Huggan)现为英国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英联邦和后殖民文学”研究中心主席;海伦·蒂芬(Helen Tiffin)现为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New England University)“后殖民与动物”研究中心教授。)

论邳州农民画的象征审美空间

马筱

(淮南师范学院 美术系,安徽 淮南 232038)

摘要:邳州农民画的语言样式具有中华民族深厚的民间传统文化内涵,可贵地为我们展示和阐释了民间的造型艺术及其象征审美空间,把传统民情风俗和内涵以图形的方式凝固为视觉形态。既有美化生活、传递信息的实用功能,又有表现精神需要、情感需要的审美意义。以“审美”为核心,论述了邳州农民画的象征审美空间。

关键词:邳州农民画;象征性;审美

中图分类号:J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4)01-0101-04

On symbolic space of Pizhou peasant painting from the aesthetic perspective

MA Xiao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 Having profound folk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Chinese people, the language patterns of Pizhou peasant paintings display and interpret to us the shaping art and its symbolic space and how to concrete the traditional folk culture and its connotations into visual shape. They have both utility functions of beautifying life and transmitting messages and aesthetic meanings of displaying the spiritual and emotional needs. This paper, by taking "aesthetics" as its focus, expounds the symbolic aesthetic space of Pizhou peasant paintings.

Key words: Pizhou peasant painting; symbolism; aesthetics

“农民画”在中国历来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后来有人称它为“现代民间绘画”^[1]。邳州农民画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1955起就有以壁画形式出现的初期作品,从时间上看应是最早的农民画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邳州农民画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一时期的邳州农民画:充分展示乡土气息和人的原初质朴性、天真和生命力,承袭了古老的民间传统艺术基因,把民间刺绣、剪刻纸、彩陶、汉画像石等传统艺术元素融进农民画卷里。邳州作为下邳县旧址,悠久的历史,赋予了这一地区民众的审美意识:具有对真善美的认识与追求的标准,促成了地域性的文化心理,决定了他们的艺术是民众日常生活的美化与象征。邳州农民画作为一种精神表象活动,具有自发性、群众性和

传承性。我们知道“在农民的精神世界里所蕴藏着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自有其审美的传统,一旦引发出来确要刮目相看”^[2]。而社会审美力量根植于社会实践,并且影响和支配人的行为和人的社会审美心理。因此处于相同地域的人们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将演变成一种支配大多数民众的牢固的审美“观念”,并以习俗、传统和文化等形式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邳州农民画经历了近六十年的发展,在造型与装饰的审美意识、功能含义的拓展和延伸等诸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作品来看,邳州农民画不仅具有极为丰富的造型形式,更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意蕴。

收稿日期:2013-09-10

基金项目:淮南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邳州农民画象征性研究”(2012WK49)资助

作者简介:马筱(1978-),女,安徽砀山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美术教育与动画创作。

一、祈福求吉的象征审美共性

中国悠久的农耕经济产生了与此相应的农耕文化。靠天吃饭的农耕经济,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六畜繁盛、五谷丰登成为人们共同的向往;四世同堂、合家和顺、夫妻和美、人寿年丰则成为民众普遍的祈盼;勤劳善良的中国农民在憧憬与向往的过程中不断地创造出悠久的文化和艺术,共同的愿望,共同的追求,必然形成共同的审美标准;这也造就了象征性是中国民间审美文化的显著特点。农民画这种俚俗文化就是在上述思想环境中发展起来,它的“俗”恰是民众之所爱。邳州农民画美在世俗,美在追求,美在表达了普通民众的共同愿望和理想,美在表达了普通劳动群体共同的心声,也正是这种共同积淀成农民画的审美共性。

从邳州农民画中可看到,在表达大众的共同情感愿望方面,农民画的选材多取具有象征内涵的动植物形象:如象征爱情的鱼和鸳鸯,象征幸福的蝴蝶,象征吉祥的龙凤,象征长寿的桃子,象征多子的石榴等等。王克莉^①的《喜床》可谓是象征性审美的典范:从帐幔上的“龙凤呈祥”到床围的“莲生子”(一个娃儿手托红莲骑鱼而乐)、“鸳鸯戏水”纹样,都是祈福求吉的,并有寓意夫妇和美、祈望早生贵子的含义(见图1)。邳州农民画中这样的例子随手可得。比如蝙蝠与钱币组合叫“福在眼前”,鞭炮和花瓶并置叫“竹报平安”或“岁岁平安”。凡此种种,约定俗成是民众的一种审美共识,都在隐喻祥和与美满。而为了使作品中的形象和寓意更加完美,农民画家们可以让鸟的冠和尾化为朵朵盛开的鲜花,鱼尾可以变成孔雀的尾巴,他们还可以让两只眼睛象比目鱼那样长到头的同一侧面上。如此的表现方式,乍看好象不合理,但是,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人们,在审视这些农民画时,却无需任何的逻辑思维,便可以从中领悟到它的审美寓意。鉴于此我们认为,邳州农民画的审美意蕴不是纯粹的艺术审美创造,而是假借艺术创造来表达民众对生活的那种渴望实在的、执着的、功利的目的方式。在其审美意蕴中较为突出地体现了一种艺术发生时期的造物观念与生活原型意义,最实际功利地体现了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追求,是一种对现实的补偿和对理想的抚慰。农民画家们在自娱自

乐中创造着艺术,又在艺术中实现了自我心理调节。可以说农民画是艺术与人生紧密结合的产物。而从人们的审美情感来说,邳州农民画反映了民众对美好理想的追求。

农民画是广大民众的艺术,大众性是农民画的根本,它根植于生活,凝聚着普通民众的生活观和艺术观,折射出人民向往幸福、如意、长寿和富裕的美好愿望,以及喜爱圆满、完整的审美心理。古今往来,向往追求吉祥,希望万事万物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是任何民族,任何文化都具备的共同心理。由于人类有着共同的趋利心理,因此,人们便对事物做出有利于自身的解释,或赋予有利于自身的特性。农民画所体现的祈福求吉的涵义,便是这种趋利心理的表现。农民画家们把造型生动、灵捷、活泼、有趣的物象,经过巧妙构想,营造出舒展夸张、姿态含蓄、喻意深邃的具有丰富思想内涵的美术形象,从而揭示出具有象征吉祥、幸福、如意、欢乐、吉庆、和谐、美满的民俗风情,达到寓情灵动的艺术境界。在邳州农民画中,对头鸟、并蒂莲、双蝴蝶、鱼戏莲、鹊登梅等成双配对吉祥如意的例子比比皆是,这是邳州农民画寓意象征的审美共性。不言而喻,它是言志,也是祝福,更是人民大众祈福心理的流露。综而论之,邳州农民画的审美共性为——祈福求吉、追求美满、期待团圆、乐观进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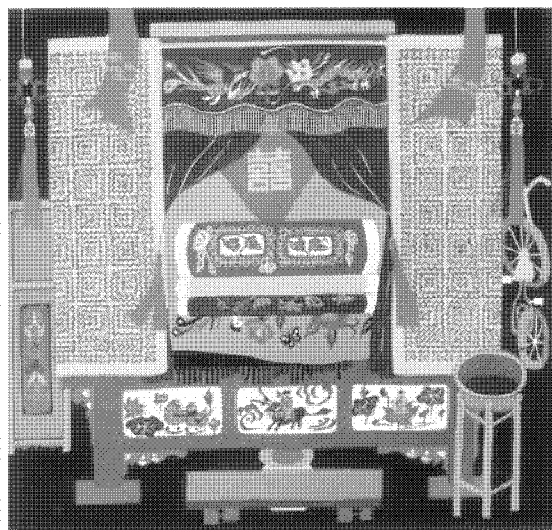


图1 《喜床》 王克莉

^① 本文所用图片,均为笔者收集、拍摄于邳州文体局、博物馆和农民画作者家中。

二、真善美一体的象征审美创造

张道一先生认为,中国人传统的观念中,美与好、祥、善是分不开的^[3]。而对民间艺术审美观念而言,审美是合目的性的,功利性的。吕品田先生对此有论述,他说:“在民间文化观念中,善的观念也就是美的观念,合目的性的事物也就是美的对象。”^[4]邳州农民画“红红绿绿,图个吉利”的设色观念就是传统的民间文化观念导致的审美观念使然,吉利是合目的的,是善的,从而也是美的周聪的《迎新娘》,这种题材的画面内容描述的是丰收富足、欢乐美满、吉祥喜庆的内容(见图2)。当面对婚礼喜庆场面的画面时,人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表面欢乐的热闹气氛,还有在丰富多彩的婚礼仪式中体验到的、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各种愿望、情感、情绪以及相应的吉祥观念。当询问农民画家的创作时,他们大多回答“好看呗”,“这样好”,“这样吉祥”,却很少用“美”来表达。其实“好看”、“好”、“吉祥”就是美,就是美与善,美与吉祥,美与好的统一体。



图2 《迎新娘》 周聪

(一) 邳州农民画中的美与善

在邳州农民画中,处处洋溢着民众对吉祥、幸福的祈求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民众也总是用善的形式来表达或寄托对美的追求,因而求吉、趋利、避害的象征功利意愿像一根红线一直贯穿在邳州农民画的审美愿望之中。总的来说,邳州农民画中对美的评价、判断常常就是对善的肯定,在这里美和善是完美统一的。

“善”虽然没有也不可能绝对的、统一的标准,但它无论在什么时代都应是反映社会进步的愿望和要求,并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善”是邳

州农民画重要的特性。这首先表现在它是民众对吉祥幸福的渴求和对生命繁荣的期盼。求善的审美观念往往使民众把现实生活中的人生的要求和生命的需要作为自己的审美理想,以自身的功利意愿和要求作为审美判断和审美选择的标准,将征服客观世界、改造自然和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和理想诉诸审美形式。这与中国传统审美思想的向善求真是一脉承传的。凸显在邳州农民画里就是:构图均衡、饱满;造型完整、意象;色彩鲜艳、明朗;气氛热烈、生动;这些形式特征“所表达的福禄寿喜,祥和平安,富贵康宁的人生理想,从属于‘善’的范畴”^[5]。它所凝结的“善”的内容也决定了象征符号的运用。农民画家通过象征的意愿取其美好的形象,把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善意祈求通过农民画这种载体转换成“善”的力量。这种在观念上趋利避害的功利追求方式,通过恰当的审美形式表达出来,使参与者或受众群体的功利意愿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从而获得一种自我肯定,使合目的性的审美想象转化为自我力量对象化的美。由此我们认为:邳州农民画对美的认识是一种功利性的象征观念的审美思想,是从主体的心灵出发,以主体的内在要求为主线,将人生的切实需要转化为审美形式的体现。

(二) 邳州农民画中的美与真

邳州农民画不仅仅是一种观念意义和感性审美形式的存在,同时还具有情感内容。邳州农民画具有的情感内容是显而易见的,如:有描绘迎亲的锣鼓,打枣的欢歌,赶会的热闹,串亲的兴奋,新年的喧闹,丰收的喜悦……,等等。邳州著名的农民画家王艳创作的《过大年》(见图3),该幅作品以乡村的街道为背景,描绘了农村过新年的热闹场景。画面突出描绘了舞狮子、放鞭炮、载歌载舞的形象,主要描绘了人们热闹祥和的形态,人、物、景的绘画线条流畅,画面中的人物众多,其神态、动作各异。色彩的使用上着重使用了大红、黄、绿、蓝、粉红、白几种颜色,搭配合理。整幅画面看起来生动、形象、喜庆,较好体现了作品“过大年”的含义。这是劳动者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邳州农民画并不以“创造”为目的,却创作出了最真诚、最自由的美。于是,越单纯,手法越简洁,美的流露,自然也就越轻松流畅。清新活泼、神奇的创造正是出自于这些随时随地的无拘无束的想象之中。这就是农民画!这就是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和土地终日相亲的农民们的心声!所以对少有理论支撑的邳州

农民所画出的这一幅幅图画,更可视为他们心灵深处的真挚歌声。对此国画大师李可染曾这样点评邳县农民画:“画家画画用技巧,农民画画用感情。”^[6]一句话点出了邳州农民画的特征和实质。邳州农民画的这种真情实感的流露既是一种情感的真实、真诚、纯真,也是一种风格的质朴、率真,张道一先生把这一特征归结为“真”^[7]。这种真实的情感是一种审美情感,农民画在唤起人们纯真情感

的同时,也唤起了人们的美感,这种美感也是真诚的,而不是矫揉造作、无病呻吟或哗众取宠的,这种“真”不见得是一种现实生活的真,那些表现了民众的理想、向往和意愿的趋吉避凶、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人丁兴旺等的吉祥象征内容也是一种情感的真诚。当然,也只有这种“真”才会具备“美”和“善”的特征。



图3 《过大年》 王艳

邳州农民画的审美功能与其说是民众审美观念的体现,毋宁说是民众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表述。在这种审美想像中,主体的愿望和理想得到了精神性、意念性的满足,从而使自我得以肯定,精神得到抚慰。农民画的精神性的功利目的和审美判断振奋鼓舞了广大的民众,使他们时刻以达观向上、理智现实的态度面对人生、面对生活;当然,这种精神的功利性民众也有着清晰的认识,是人们唯我的、能动的充满理性色彩的审美创造,这种审美创造是民众对生活的美好追求的一种替代性的补足和实现。总之,邳州农民画艺术,说到底它是一种观念性、主观性的事物,是民众的精神需求和审美意识的一种物化,一种寄托,是民间审美心理传统根深蒂固的一种传承,但同时它自身又以审美客体的属性诱发、强化着民众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培养、训练着他们某种特定的审美心理图式和审美价值标准。

参考文献:

- [1] 左汉中,李小山.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农民画[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3.
- [2] 张道一,廉小春.美在民间[M].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87.223.
- [3] 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M].北京: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87.
- [4] 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2:143.
- [5] 王海霞.中国民间美术社会学[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5:20.
- [6] 李怀林.论邳县农民画35年的演变[A].杨先让.中国民艺学研究——第二届民间美术研讨会文集[C].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3:8.
- [7] 张道一.心灵之扉[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1:180.

[责任编辑:吴晓红]

徽州回形纹饰的美学价值

宋尧, 黄凯

(安徽工程大学艺术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回纹是一种常见的辅助装饰的纹饰,多用在徽派建筑的砖雕、木雕、石雕的边缘装饰。回纹不仅具有线条简洁、虚实相间的特点,还包含了对立统一的哲学意味以及通透的灵性。通过分析回纹中所蕴涵的美学价值研究,探求回纹这种古老纹样经久不衰的原因,以求将回纹及其特性更好地运用于现代设计。

关键词:回纹;装饰;美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J-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4)01-0105-04

On the aesthetic value of Huizhou emblazonry fret

SONG Yao, HUANG Kai

(School of Art Design,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Abstract: Fret is a common auxiliary ornament often used on the edge decoration of the brick, wood and stone sculptures in Huizhou - style buildings. It is not only characterized by concise lines and alternation between reality and fantasy, but also contains the philosophical sense of the unity of opposites and the spirituality of transparenc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esthetic value of it, which helps explain why the old Fret can stand the test of time.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to better apply Fret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to the modern design.

Key words: fret; decoration; aesthetic value

一、回纹的概念和起源

回纹是徽派砖雕、木雕、石雕上常见的纹饰,因其单体外观类似于中国汉字“回”字,故名回纹。其组合方式有单体、平移、反射以及滑动反射等,主要起辅助装饰作用。回纹由云雷纹演变而成,云雷文是我国最古老的装饰纹样之一,图案呈圆弧形卷曲或方折的回旋线条,以连续的回旋线条所构成。作圆形的回旋纹样,单称为“云纹”;作方形的回旋纹样,单称为“雷纹”^[1],云雷纹是两者的统称。关于云雷文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传统的解释是起源于原始人类对天上的云彩和水中的波纹形态的模仿;另一种说法来自于李泽厚先生,他在《美的历

程》一书中认为这种原始的几何纹饰来源于对动物形态的模仿,是一种原始的蛇图腾崇拜,因为“在原始社会时期……彩陶纹饰是一定的人们共同体的标志,它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是作为氏族图腾或其他的崇拜标志而存在的。”^[2]

回纹最初是一种装饰在青铜器皿之上的纹饰,多装饰于器物的瓶颈或边缘处,在青铜鼎的立耳上也多有发现。现存最早的回形纹发现于距今五千七百多年的马家窑遗址中(见图1),其单体形态与我们现在见到的回纹已经没有差异,但在使用方式上与现代回纹有所区别,例如会将回纹作为主体图案描绘在陶器和青铜器上,反映出当时回纹在图形符号领域中的重要地位。

收稿日期:2013-10-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安徽省徽州雕刻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研究”(08BF35)、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安徽民间艺术中的图形符号研究”(2007sk161zd)资助

作者简介:宋尧(1989-),女,安徽芜湖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环境艺术设计研究。

方形回纹,纹饰简单、朴素,包含丰富的美学内容,不仅在美学上符合了简洁、灵动的审美要求,而且包含对立统一的哲学意味。回纹在徽派装饰艺术中常作为主图案的辅助纹样雕饰于木雕、砖雕、竹雕、石雕主体图案的边缘处(见图2),围绕着主体图案的四周起辅助装饰作用;有时工匠们会利用回纹围出如三角形、方形、菱形等特定的形状,在辅助装饰的同时起到勾勒该雕饰图案外部形状的作用。回纹也常出现在徽州雕刻作品的内部,作为主体图案的花纹,使画面更显精细。



图1 马家窑遗址出土的陶器^①



图2 胡雪岩故居砖雕^②

二、回纹的审美及美学价值

回纹之所以能成为徽派装饰纹样中的经典纹饰,在徽派的砖雕、木雕、竹雕等装饰艺术中得到广

泛运用,得益于它具有丰富的美学价值。回纹是中国最古老的人工雕饰纹样之一,包含了人类对于自然形态从模仿到再创造的过程,反映了人的意志,凝聚了人类的创造力。人类的艺术史正是由人类开始发现、创造美的事物开启的,而类似回纹这样看似简单的纹样其实凝聚了人类几千年来对美的追求与创造。

(一) 简洁的线条之美

1. 回纹的简洁之美。相较于较复杂的传统图案,如大气雄浑、纷繁精巧的龙凤纹,或卷曲优雅、自由伸展、变化无端的卷云纹,回纹是一种由简单线条构成的纹饰。回纹所有的转角都为直角,且不包含任何曲线和随意形,因而显得十分简洁、质朴。不仅如此,徽州装饰中的回纹与徽州更有一种精神上的和谐和灵魂上的共鸣。一方面回纹的简洁、质朴、大方的特性与徽州文人崇尚质朴、不爱矫饰的审美特点和简洁明了的行文风格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回纹作为一种装饰图案,几乎永远是以材质的原色或者单色出现,这又暗合了徽派建筑白墙黑瓦、洁净素雅的水墨风格。

2. 回纹的线条之美。线条之美是中国文人历来最为崇尚的。我们在欣赏国画时,赞颂线条的行云流水;在泼墨挥毫时,创造线条的艺术;在建筑设计中,塑造线条的规整。一方面,追求洒脱不羁的文人画家给予了流动的线条丰富的精神内涵,他们用流动的线条表现中国人对自由的向往,对无拘无束生活的追求;另一方面,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中国人又有着无规矩不成方圆的思想,对于规整的线条有种特殊的敬意。而在纹饰艺术上,徽州的雕刻艺人们同样在雕琢中追寻线条的韵律,故而不论主体图案为何,都常常不约而同地选择回纹这一身兼线条流动之美和规整之美的纹饰作为辅助和填充。

此外,由于直线具有可以向远处无限延伸的特性,因而由直线弯折卷曲而成的回纹也具有了连绵不绝的特点,故回纹在徽州的民间常被赋予一些十分美好的寓意。例如,因为回纹没有断点和接头,故人们认为这种纹样代表着“富贵不断头”,将其广泛运用于门窗、桌椅、墙面的装饰中。

① 图1来自上海家庭报 http://shjt.shfamily.com.cn/zx/200711/t20071114_1650003.htm.

② 图2来自张道一,郭廉夫主编,《古代简直雕刻纹饰——寓意吉祥》,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8.

3. 简洁的力量。纵观现代设计史,那些由简单的元素所构成的图案和标志总是更具有生命力、更易创造经典。例如 Versace 的品牌标志就选用了回纹做辅助装饰(图3),并将其运用在皮包、餐具、服装、配饰、汽车装潢、室内家具等领域。而 Chanel 的标志则是先从窗户的纹样上得到灵感,提取了两个相同的元素相对交叠组成,赋予其新的意义,再将其在设计中大量重复使用,并最终成为世界上最为经典的图案之一。其原因,是因为相对于复杂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纹理而言,简单的纹路更加易于辨识,也更容易给人留下清晰而深刻的记忆。这或许是线条图案不断重复、简洁、素雅的回纹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历经千百年而长盛不衰的原因。虽然组合方式和装饰内容有所不同,但基本形态不曾发生根本性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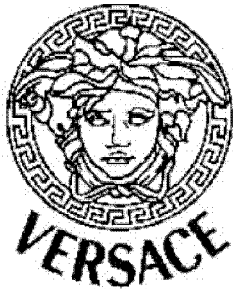


图3 Versace 标志^①

(二) 对立统一的哲学意味

对立统一的美感,不仅是一种视觉上的审美需求,还有丰富的哲学内涵;不仅是我国古老的道家学说的思维哲学,也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则。回纹这一看似简单的纹样,内部其实蕴含了丰富的矛盾性和统一性,回纹包含有序化和无序化的对立统一、对称性和非对称性的对立统一、虚与实的对立统一等,这些矛盾性因素共同构成了回纹对立统一的哲学之美^[3]。

1. 秩序化和无序化之美。回纹由线条组成,而线条的变化可以是不规则的。回纹的外观特点决定了它的每一个格子都有着向四条边中的一个或几个方向延伸的可能性;而每增加一个回纹的格子,就又会增加更多的可能性,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图案。所以回纹可以通过各种创意性的延伸构造出任意的图案,因而拥有一种无序化的美。但与

此同时,回纹是一种折线式的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纹样,在它组成的纹样中,虽然依据器物或者装饰的尺寸、形状不同,最终的形态总是不尽相同,但从这些由回纹组合而成的图案的整体来看,变化的图案中的每个不断重复的单体回纹,犹如乐谱中的一个音符,足可以奏出一曲有序的旋律,因而回纹又具有秩序化的美感,形成了秩序化和无序化的对立统一。

2. 对称和不对称之美。回纹从表面上看是对称的,因为回纹本质上是由不断重复的近似矩形的图案组成。矩形是一种四角为直角、对角线相等、可以无限垂直对称分割的平面图形,矩形所在平面内任一点到其两对角线端点的距离的平方和相等^[4]。因而回纹应当是一种具有高度对称性的图案。而纵观徽派雕饰中对回纹的使用,也往往利用了其对称之美,回纹总是对称分布或沿着矩形的四条边分布。但是,单独审视构成回纹的每个近似矩形的局部单体,又会发现不管如何分割,每个单体的“回”字图案其实都是不对称的。回纹看似对称实际却不对称的特点,可谓是对立统一之美的典范。

3. 虚实之美。回纹由变化的直线组成,外观上是一个个小小的方形分割,每一个“回”字的小方块都近似于一个个单独的实体。但实质上我们细看这一个个“回”字方块,却可以发现它们并非真正独立的个体,而是由一些首尾相连、行云流水般连绵不绝的线条所卷曲而成,又谓之“虚”;虚者实之,实者虚之,不知其何处所起,也难寻其终将归于何处。这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虚实相间的现实表现,并且能为现代哲学的对立统一理论所解释。

(三) 通透的灵性

1. 通透的美感。回纹看似由连续的实体方块组成,但这些实体本质上是由线条和线条之间的留白共同构成的,这就形成了一种窗格式的开放性的构造,理所当然具有很强的通透感。中国人对于通透之美的追求古已有之,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一书曾解读过易经《离卦》中以通透如网孔为美的思想^[5]。而正如中国人认为只有通透的玉才是好玉一般,具有通透性的纹样,往往看起来更加有灵性,从而更能惹人喜爱。当回纹用于隔断

^① 图3来自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9613.htm>.

时,一方面,由于其本身是实体,可以起到障景法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其自身的通透性,每一个小的回形,又都是一个借景的小窗口。

2. 通透的生命力。正如一间房子必须有门窗、徽派建筑在高墙之内必有天井采光通风一样。纹饰如果缺乏通透性,难免显得无法呼吸从而失去生命力。这种通透性带来的呼吸感,也是中国古人喜爱在画中留白的原因之一,因为有了通透性,画中的水流、云彩、动物都有了呼吸和生命,画面也因此变得鲜活了起来。可能也正因为通透的纹样可以带给人们以顺畅的呼吸感,所以回纹被工匠们以镂空的技法雕饰于徽派建筑的窗棂边缘,这样阳光就可以通过缝隙照射进屋子;或以透雕的手法雕饰于砖石木板以及木雕中的桌椅、隔断图案之上,以抵消材质本身坚硬、呆板的感觉。

3. 通透感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通透性的美感同样符合现代设计、特别是现代室内设计的要求。因为在一个相对封闭且面积不大的空间中,视觉上的通透会让人更加舒适。这种通透感,不仅可以通过对室内结构的通透性设计得到,也可以学习古人的做法,通过选择具有通透性的装饰纹样,进行辅助性的心理暗示,从而得到更好的心理感受。

三、启示

回纹作为徽州雕饰中的经典装饰纹样,既有简洁的线条之美,又富有对立统一的哲学意味,还具备了通透的灵性,因而具有丰富的美学内容和审美价值。回纹在徽派建筑装饰领域内得到过广泛的运用,通过探究徽州雕饰上的回纹装饰的美学价值,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徽州文化、领悟徽州建筑的细节之美和线条之美,而且对现代创意设计具有一定的启示^[6-7]。

首先,类似回纹、万字文、如意纹这种简洁又富有哲学意味的线条纹饰之美是客观的、不以时间和空间的转移而转移的。正如 Versace 将回纹运用于多种设计领域那样,我们也可从此类古典纹样中

选取一种或几种,重复的运用在设计中,利用不断重复的视觉冲击,在潜移默化中给人留下清晰而深刻的印象,创造自己特有的风格;其次,可以借鉴 Chanel 从教堂窗户上得到灵感创造经典标志的范例,从徽州的雕饰中寻找灵感,模仿和提取这些古典纹饰的审美特质,通过整合和改造,利用简单的纹样更容易被辨识的特点,创造出新的经典品牌标志,让古老的纹样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最后,类似回纹这类徽州传统雕饰图案,兼具隔断和通透作用的特性可以被运用在室内设计中,在分隔空间时,灵活的运用这些特质,可以在保证功能性的同时,增加设计感和心理上的舒适度,从而将实用性和美观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更增加了设计作品的生命力。

总之,我国诸多历史传承的古老纹样,包含着中国古人对美的认识,以及关于美的客观规律,值得我们深入的挖掘、思考和探究,在研究中获得设计的灵感,并将其运用到设计作品中去。

参考文献:

- [1] 陈瑞林. 中国古代图形艺术简史[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14.
- [2] 李泽厚. 美的历程[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17.
- [3] 郭道荣. 艺术美学[M]. 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6: 17.
- [4] 沃什伯恩, 克罗. 设计艺术原理:设计、对称性设计教程与解析[M].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6.
- [5] 宗白华. 美学散步[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80-81.
- [6] 杨建生. 徽州木雕与徽州古民居室内装饰[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 2009(6): 169-170.
- [7] 刘伟, 张兴蕊. 浅谈回形纹在陶瓷装饰中的应用[J]. 美术教育研究, 2011(3): 40-41.

[责任编辑:吴晓红]